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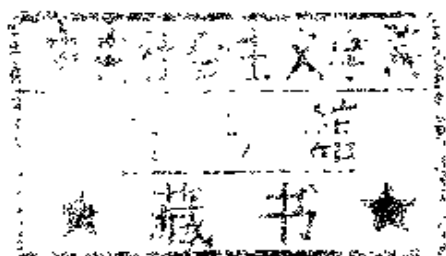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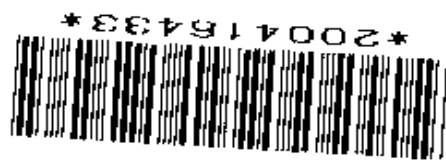
——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

· 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

(上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 编
一九九〇年·北京

前 言

1934年8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 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五千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任何战争的胜败，都是由主客观各方面的情况 定的。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主观因素外，还存在着客观因素。当时，中国正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割据势力还很强。蒋介石企图借消灭红军之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造成一个由他统治的统一局面。各地方势力既怕红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又怕蒋介石势力侵占本身利益。红军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打破了他们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胜利。与此同时，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这也是红军能取得长征胜利的客观因素。

据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军政部统计，1934年，国民党军共有步兵132个师29个旅；骑兵8个师6个旅；炮兵5个旅14个团；共计134万人（不包括空军部队和两广、川黔滇部队）。这些部队大部分在“清剿”、“围剿”红军各根据地。开始用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主要有粤军11个师、桂军5个师、湘军5个师两个团、中央军11个师1个支队、黔军5个师3个旅、滇军4个旅、川军12个旅。红军长征到达川陕甘地区后，部分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及马家骑兵也都投入“追剿”长征红军的序列。

红军长征开始时，蒋介石从消灭红军和削弱地方势力出发，

命令湘、粤、桂等军设置四道封锁线，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粤、桂军出于本身利益，采取应付和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的方针。只有湘军行动积极。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企图首先让粤、桂、湘军与红军作战，行动较缓。

这时中央红军在错误领导指挥下，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结果，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沿湘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极为严重。红军长征出发时8.6万余人，过湘江后，仅剩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又在湘面南、黔东北部部署了近20万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大口袋，等待红军到来，企图聚而歼之。中央红军如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五六倍的国民党军决战，将有覆灭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

当中央红军突然改变战略方向，向贵州前进，突破黔军乌江防线，进军遵义时，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势穷力蹙，企图借“追剿”红军之机图黔和控制西南，一面督饬黔军堵截红军北进及返回湘西，同时抽调川军和滇军封锁长江和横江；一面令尾追红军的中央军8个师改向贵阳急进，攫取黔政。这样，使中央红军能顺利地打垮黔军，占领遵义，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当蒋介石发觉红军西渡赤水河，有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时，又调整部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宜宾以南的川南地区。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后，挥戈东向再渡赤水河，攻占桐梓、娄山关、遵义，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整个部署。从此，红军从被动转为主动。接着，红军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威逼贵阳。蒋介石急调部队拱卫贵阳安全，确保自身安危。

蒋介石将滇军东调，中央红军乘虚进入云南，巧妙地跳出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佯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地区。

蒋介石认为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绝地，必步石达开后尘，要求各“追剿”军“同仇敌愾，灭此朝食”。并电令川康军杨森、刘文辉等部赶赴大渡河地区布防，严防中央红军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中央红军趁大渡河国民党军兵力空虚，防御未固之机，抢渡大渡河，兼程飞夺泸定桥，迅速北上川西北懋功地区，于1935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蒋介石认为该地人烟稀少、气候严寒、给养困难，只要胡宗南、薛岳部和川军加强守备，必能困毙红军于岷江以西地区。因面改“追剿”战略为“长围高困”。同时，蒋介石乘机的裁减和整理川军，削弱和控制四川地方势力。

1935年10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北上，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师。而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指挥下南下。

鉴于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川西南，蒋介石命令川军暂停整编，仍以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率川军堵截红军。这时，南下的红军接连击败川军，开辟了以天全等地为中心的川康边区。蒋介石恐红军继续南进，危及成都，急调薛岳率领第二路军堵截红军南下。红军在东进南出均不可能的被动局面下，向甘孜地区转移。

由湘赣根据地突围长征的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到达黔东与红三军会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并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二、六军团，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粉碎了多次“围剿”，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逐段筑碉、交替推进的作战方针，压缩湘鄂川黔根据地，企图围歼红二、六军团。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撤离根据地，先后突破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澧水封锁线和沅江封锁线，到达湘中地区。蒋介石令何

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率领5个纵队追击红军。红军甩开国民党军，进入贵州境内，逼近贵阳。国民党军由于派系较多，各踞己利，“追剿”行动迟缓。红军乘机绕过贵阳，经黔西、毕节到达黔滇边境，又抢渡普渡河，进入滇中。滇黔“剿共”总司令龙云一面派兵堵截，防止红军进攻昆明；一面防备中央军入滇削弱地方势力。红军又乘机分两路向滇西挺进，继而北渡金沙江。这时，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金沙江、大渡河之间，制止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红二、六军团翻越雪山，绕道进入康藏高原，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后，红二、六军团改称红二方面军。

国民党军对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虽然进行围追堵截，但兵力不足。因而，红二十五军能顺利地越过平汉铁路，进出桐柏山区，北上开辟鄂豫陕根据地，粉碎了两次“围剿”。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再次北上，进入甘肃，威胁国民党军后方，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马鸿宾部的阻击。不久，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延川县同陕北红军会合。

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发表《抗日救国初步纲领》。西南粤、桂军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通电全国吁请国民党政领导抗日救国，并率部入湘北上抗日。蒋介石一面急调兵准备镇压；一西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瓦解粤军将领。不久，两广事变平息。此时，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开辟以豫旺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当蒋介石抽调胡宗南纵队对付两广事变，汤恩伯第十三军北调绥远之机，红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甘南，进入岷县地区。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命令部队“追堵红二、四方面军及阻止红一方面军南下。此时，红一、二、四方面军南北呼应，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行经11省，付出巨大流血牺牲的长征遂告胜利结束。

为了给历史研究和军事史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使广大青年一代了解这段历史，1985年6月上旬，全国政协和江西、安徽、广东、广州、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成都、武汉、甘肃、陕西等地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同志，在成都研究决定：将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追堵红军长征的文章汇集一起，加以筛选、核实，共同编辑出版一部《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会后，广州、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成都、甘肃、宁夏、陕西和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征集、审稿和编辑工作，并于1986年1月和4月，分别在贵阳、遵义和兰州、延安召开了定稿会议，使本书得以出版。

为了给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方便，我们还编写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大事记》和《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指挥系统表》，并绘制了28幅战役要图。因篇幅关系，分为上下两册，指挥系统表和战役要图分附于后，大事记则总附于全书之后。

本书所记史实，因时隔几十年，作者记忆难免有误，而且有些章节的资料还不够完整，尽管我们做了大量征集研究和核实工作，并到实地调查，仍难免有错漏，敬请读者和知情者补充订正。

本书的问世，还得到遵义市政协、遵义会议纪念馆、仁怀县政协、延安市政协、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山西省政协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
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

1990年2月

目 录

(上 册)

前 言

第一章 概述

- 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晏道刚(1)
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李以助(35)
国民党空军对红军的追堵……………张有谷(90)

第二章 设置四道封锁线 堵截红军

- “互不侵犯、借路西行”协议的制定和执行…黄若天(93)
红军借路西行谈判情况点滴……………秦庆钧(99)
陈济棠的“保境安民”令……………李悦仁(102)
粤军第一师对红军的堵防……………李 振(104)
粤军第二师追堵红军概况……………侯 梅 李友庄(106)
牛岭之战……………黎天荣(111)
何键部阻截红军纪实……………李 觉(116)
截堵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王天锡(122)
堵截红军，防蒋入桂……………李宗仁(128)
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刘 斐(131)
第二十四师追堵红军简记……………黄炳钿(139)
尾追红六军团，阻击中央红军……………覃 琦(144)

DPO 5/24

白崇禧部队堵截红军经过·····	蓝香山(150)
刘斐献策, 机动阻击·····	梁津(154)
千家寺阻击战·····	颜僧武(160)
桂北堵截红军记·····	张文鸿(164)
桂北民团阻击红军纪实·····	虞世熙(168)
关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情况·····	周游(177)

第三章 遵义战役及堵截红军四渡赤水

黔军阻击中央红军经过·····	王家烈(179)
黔军阻击红军纪要·····	万式炯(190)
黔军第一师追堵红军经过·····	何知重(211)
黔军第二师娄山关阻击战·····	刘鹤鸣(216)
蒋在珍部追堵红军经过·····	朱振民(220)
犹国才被红军牵着鼻子走·····	张适南(232)
乌江战役和侯之担部的改编·····	侯汉佑(238)
侯之担部防守乌江溃败经过·····	李祖明(246)
江界河、土城战斗纪实·····	许俊陶(253)
蒋介石在贵阳·····	王天锡(257)
贵州“防共委员会”的组成和活动·····	黄乾埜(261)
贵州省各派地方势力概况·····	李祖明(264)
吴奇伟部追剿红军溃败记·····	宋少华(266)
遵义地区防守战·····	李骏(272)
第五十九、九十三师遵义被歼记·····	陈金成(275)
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经过·····	李清献(279)

第四章 堵截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 过雪山

- 红军过云南时龙云的决策……………孙 渡(286)
- 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经过……………安恩溥(288)
- 滇黔边境追击红军记……………刘国举(302)
- 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
纪实……………萧本元 卢浚泉 余建勋(305)
- 滇军堵击中央红军简记……………常绍群 王伯勤(309)
- 追堵红军过云南……………萧本元(314)
- 康南会理阻击战……………吴剑洲(316)
- 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杨汉域 向廷瑞(325)
- 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张伯言 杨学端 张怀猷(332)
- 防守大渡河实况……………杨学端(348)
- 进攻懋功、抚边记……………李介立(352)
- 夹金山地区追堵红军纪实……………陈亲民(355)

第五章 川西北堵截红军的战斗

- 堵截红四方面军过涪江地区的几次
战斗……………邓锡侯 杨晒轩 田颂尧 张熙民(360)
- 川西北防堵之役……………奉伯常(379)
- 在川北松潘截击红军的经过……………李炳藻(384)
- 第一师参加松潘战斗简记……………王应尊(391)
- 第一师追堵红军的经过……………彭竹林(393)
- 第一师在川西北与红军作战记略……………石德安(404)
- 天、芦、宝的堵截与大小金川的追击……………李介立(408)
- 红四方面军反攻懋功与第二十军惨败……………李介立(416)

松潘先姬山战斗……………沈仲文(418)

附录：

一、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部队指挥系统表

二、附围

- 图 1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略图
- 图 2 赣粤湘桂边追堵要图
- 图 3 黔东追堵要图
- 图 4 追堵红军第一次西渡赤水要图
- 图 5 追堵红军第一次东渡赤水要图
- 图 6 追堵红军第二次西渡赤水要图
- 图 7 追堵红军第二次东渡赤水要图
- 图 8 贵阳防御与黔南追堵要图
- 图 9 滇北追堵要图
- 图10 川西南追堵要图
- 图11 大渡河地区追堵要图
- 图12 四川各军防区略图
- 图13 嘉陵江大渡河地区追堵红军要图
- 图14 懋功、松潘地区追堵红一、四方面军要图
- 图15 陕甘边追堵红一方面军要图

第一章 概述

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

晏道刚

1933年(在国民党军第四次进犯中央苏区后期)何应钦任我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处理作战业务。1934年3月,蒋创设侍从室以统率其随行人员,调我为侍从室主任。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过程中,我随蒋往返于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策划追堵。因此对追堵红军的内幕大体有所了解。

一 红军长征前蒋介石的策划

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发动第一、二、三、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被红军挫败,损将折兵30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的何应钦,亦以第二、三、四次“围剿”的失败,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加以蒋介石径听陈诚报告不通知何应钦,听任陈诚将调赣参加作战的川军张英师突然缴械,使何十分气愤,事后虽经贺国光等密告蒋介石记陈诚大过一次,以敷衍何的面子,但何终觉对陈的指挥不便,借故返回南京。蒋介石乃亲到南昌,一再改组南昌行营,以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

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扩大职权达于粤闽湘赣浙五省，变该行营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权力机关，与当时行政院权力冲突亦在所不顾。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迭次失败，受到了一些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发表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赣粤边境；一面由我和贺国光归纳各方面建议制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蒋介石大力宣传他在军官训练团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数十万兵力的军事围攻。蒋介石这些办法在1933年10月以前逐步付诸实施。我和贺国光还替他制订了各个阶段各种情况变化的军事部署计划。

约在1933年冬，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反蒋，使北路军的进攻计划受到很大影响。当时蒋介石进到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合，异常紧张。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第十九路军的战事。

1934年2月，蒋在解决福建事变后，以为可以专心对付红军了，乃将进攻福建的第二路军、第四路军、第五路军编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向西进攻苏区。约在3月间，蒋又发表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何即在长沙召集有关头目开会，并请行营派员指示。蒋乃派我飞往长沙与何会商调整西路军指挥序列，督促何执行“围剿”计划，允许何

在湖南发行公债作为作战经费。何键并请我对在湘鄂赣边及赣江西岸参加“围剿”的湘军、杂牌军、蒋嫡系军各部队长传达蒋的意旨及对红军作战应注意事项。蒋介石恐西路所属各军指挥官不听何键的命令，要我特别注意从中协调。

1934年4月以后，蒋介石令各路军步步向苏区进攻。我随蒋回到庐山策划指挥，并举办军官训练团统一战术和政治思想。当时，东路军李延年纵队在朋口，汤恩伯部在泰宁，遭红军反击受创；北路军陈诚的第三路军在黎川以南之团村、黎川西南之横村及南丰之王家山、五都寨等地区，也受到红军反击；南路军李扬敬纵队在粤赣边之筠门岭，受到红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据有碉堡线，在红军迭次打击下，虽有很大的损耗，但包围的总形势仍能维持；而且国民党军官兵对修碉技术日益熟练，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不少困难。是年夏，陈诚部攻破广昌，薛岳部侵占兴国、古龙岗，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驿前构筑工事进行阵地战。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马上把重炮兵调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遂于9月攻占宁都、石城^①。

1934年9月，蒋介石曾对我们几个高级幕僚说，看来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之局。他于是下令各路军加紧包围，还写了许多亲笔信给高级将领勉以雪历次“围剿”失败之耻。这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竟能突围长征。

二 蒋介石得悉红军西移时的决策

1934年9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他每和我们谈论形势时，洋洋得意地说：“湘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

^① 据查，国民党军占领宁都是1934年10月26日，占领石城是10月6日。

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以此显示他的指挥比别人高明。在谈到红军历次提出北上抗日及合作抗日时，他总是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他强调说：“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这些谈话正是暴露了蒋介石的既定政策。

国内舆论自《塘沽协定》之后到第五次“围剿”后期，对蒋不抗日专反共的搞法早已不满，华北人民尤其激烈。蒋认为这都是对共产党同情，对“围剿”非常不利。为了便于一心对付红军，收最后围歼之功，约在1934年10月上旬，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杨永泰和我随行，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当时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回南京去了。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他那“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的反动谬论，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10月中旬突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丰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于是蒋介石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和我商谈对策，议论纷纷，对红军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亦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

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随后蒋还对大家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1934年10月18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湘粤边。从国民党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在南昌于是日下午7时召集我和贺国光谈，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9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我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问贺国光是否拟就。贺对我说，蒋似迫不及待，挂电话听筒之声甚重，要我迅速草拟让他去看算了。依计划要旨发出的电令大意有：①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②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③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④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委何人担任的问题，蒋初意是陈诚，而陈却保荐薛岳。后来蒋同意以薛岳充任，决定抽出九个师的兵力归薛岳率领；陈诚则任预备军总指挥，集中亟待休整的嫡系部队作为机动兵团策应各方面的需要。迨11月上旬，红军先头到达粤湘边，蒋认为何键原是西路军总司令，红军进入西路作战地

境，一面明令发表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一面命我电告何键指明薛岳所部入湘后悉归何统一指挥。但蒋并未把这样做可将何键部调离湖南而使何键更易受控制的企图明确告知薛岳。这件事曾引起狂妄自大的薛岳不服。我当时对调动嫡系及何键的部队没有顾虑，只想到两广是半独立状态，不如湖南那样基本上能控制得住，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中央军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军。当蒋命我严电陈济棠、李宗仁全力防堵时，我曾对蒋说：“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说：“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几句话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蒋对粤桂的阴谋诡计。

11月间，追堵部署初步完毕，蒋介石即调整留在江西各“围剿”部队的部署，分区清乡，划定好几个“绥靖区”，订立各种清乡规章，采用所谓“剿抚”兼施的毒辣手法来危害人民。军事部分由第一厅主办。政治、经济、文教部分由第二厅和办公厅主办。同时借口红军可能去西南，蒋介石把他策划已久的组织参谋团入川的计划乘机拿了出来，决定以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率参谋团进驻重庆，统帅川黔各部配合作战。

三 在粤湘桂边布置各道封锁线和追堵措施

粤湘桂边区封锁、追堵红军的部署和战役，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亲自在南昌指挥的。名义上何键是“追剿”军总司令，薛岳是前敌总指挥，事实上在派系林立下的国民党政权内，牵涉到三四个省、上十个军（粤军2个军、湘军3个军、桂军2个军、薛岳所率嫡系3个军）三四十万兵力规模的行动，即令蒋介石亲自出马也不可能指挥得好，因此始终是以南昌行营这套机构在那里敷衍行事。

红军西进，于10月下旬突破赣南余汉谋部的封锁线（即第一

道封锁线)，蒋介石即电陈济棠、何键出兵火速在汝城、仁化间阻截（即第二道封锁线），并指示他们分兵在乐昌、郴州、宜章、临武间沿粤汉路南段利用原有碉堡加强工事作防堵措施（即第三道封锁线）。当时湘军主力已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衡阳、郴州间，在汝城守备的只有陶广所部一个旅。粤军第一、二军主力及几个独立师原已集结于湘粤赣边，这时陈济棠令李汉魂统率独立第三师、独立第二旅及第二师赶到乐昌、仁化、汝城附近进行堵截。11月上旬（九、十日左右）粤军和红军在延寿圩、靶子场、珊瑚岗附近激战两日，陈济棠曾向蒋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发现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等军团番号。蒋介石认为延寿战役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在这一仗以前行营命空军侦察红军动向，总是找不到真实具体的情况）。与此同时，何键以原在湘南的一个旅（旅长钟光仁）守汝城，在11月上旬也与红军打了几天，没有激烈战斗，估计红军对汝城意在牵制。何键向蒋介石告捷，无非表示湘军反共是卖力的，在湖南境内抗击红军他是舍得牺牲的。自11月上旬经过湘粤边阻截之后，蒋介石自认为对红军情况已经比较明了。

蒋介石为了对付红军长征的行动（当时称为突围）虽考虑了几个方案，而在他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将来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故当11月中旬红军主力先后行进至郴州、耒阳、衡阳之线后，蒋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据地），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即第四道封锁线）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

当时蒋指示何、薛的部署要旨有如下几点：

（一）以第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

盛、唐云山、郭思演 5 个师（这 5 个师是归薛岳直辖的），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怕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这个 5 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蒋介石是很用了一番心机的。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儿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我个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是否能渡过湘江、潇水这一条地障，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大关键。

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怕他的部属不认真贯彻执行，叫我引用古代兵家尉繚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写进电令中。他希望部下能够依照他的计划行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好好打一个歼灭战。

当红军先头部队越过粤汉铁路宜章、临武地区，蒋在指示何

键、薛岳部署的同时，曾电陈济棠派兵进占连县、星子防堵，并指定李汉魂（由于延寿战役见重于蒋）率两三个师编一个纵队进至蓝山、江华地区防堵红军入粤。那时蒋为利用粤军参战，要我们在电令措词上尽量客气，特别是对粤军仁化、延寿之役一再嘉勉。

红军进入湘粤边时，蒋只命白崇禧在桂北防堵；当红军进据湘南后，蒋即电白崇禧集结桂军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并要白崇禧至灌阳指挥。这时蒋介石为了利用桂军，特别发了一笔相当大的军费（具体数字记不清）。总之蒋介石是挖空心思策划湘桂军联合作战堵击红军，唯恐不达目的。

湘桂边的追堵战役进行的时间将近两周（由1934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真正苦战的时间约为一周，使用兵力二三十个师。这个时期，蒋介石是聚精会神，行营则函电交驰。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基本上是呆在蒋介石身边，赞助策划。由于薛岳唯陈诚之命是听，因此第六路军的行动多由陈直接秉承蒋的意旨行事。有时蒋陈密议的问题，作为待从室主任的我，也不知道。在11月下旬会战开始后，蒋介石曾亲笔写信给第六路军薛岳以下各军师长，诬蔑红军为“流寇”，认为这次向西突围已“势穷力蹙”，规定该路军9个师以穷追为首要任务，信中且有“毋容红军再度生根”等狂言。蒋惯于用权术收揽部属为其卖力，他自己写信频繁，内容不给别人知道，我只是事后与蒋闲谈中了解一些（当时蒋派有飞机一队驻衡阳助战，蒋的信件均由我通知飞机空投）。

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我阅后凡属重要的即交给蒋的机要秘书汪日章摘要转给蒋看。我素知陈诚、薛岳见重于蒋，蒋对薛的来电比较重视，因此薛岳的来电在当时是不能积压的。至于这个仗是怎样打的，时隔太久，只能记忆大概如下。

（一）薛岳所率吴奇伟部及直辖部队，由于红军不是由永州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该部在湘南境内没有战斗。但薛对

何键的湘军及白崇禧的桂军这样摆长蛇阵未阻止红军通过湘江，曾向蒋表示他的不满，对白、何等怕中央军抢地盘的处置也有所揭露。这一点我当时是理解到的。薛岳所率周浑元部，这次也没有大的战斗。惟该部抢先占领道县，使红军行动受阻，达成战略任务，曾受到蒋的嘉奖。

（二）湘军刘建绪部在全州觉山堵击红军两天。红军主力是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湘江的。刘建绪及何键向蒋告捷，虚报伤毙红军人数。他们为逃避湘江失守之责，曾指控桂军撤出文市以南各关，私自转移兵力并未通报友军之罪。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我知之甚深，对他们这种所谓捷报，我心里很明白。但嗣后蒋介石未曾追究湘江失守的责任，还给何、刘两人嘉奖。非何键嫡系的湘军李韫珩部由于进入湘南时间迟，沿途没有和红军接触。湘军李云杰部在宁远天堂及湘江东岸的下灌、水车附近与陈光中部合力对红军后卫作战，蒋介石对李云杰也有嘉奖。

（三）桂军白崇禧所指挥之夏威、廖磊两军在前线的部队，为保全实力，未照蒋介石的指示扼守灌阳以北完成堵击任务，自动撤至灌阳、兴安间新圩附近占领侧面阵地，阻击红军掩护部队，打了两天，红军主力即安全渡过湘江。事后白崇禧亦来电虚报战果。这件事却大伤蒋介石的脑筋，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

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当时行营综合各方来电，估计红军渡过湘江向贵州前进途中实有兵力不过三四万人，认为红军牺牲、损耗很大。惟蒋介石意犹未尽，责怪桂军避开正面，以致功亏一篑。

自从红军突围后，我们在蒋身边的一些人闲谈时，总说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国民党军不得人心，士气不

振，于此可见一斑。

四 在贵州指挥黔、川、滇作战的挫败

（一）红军入黔初期蒋介石的企图

1934年12月红军突破湘江向贵州前进时，蒋介石担心中央红军会走萧克的老路与贺龙会师，除电王家烈率黔军在黔东堵截外，一面电何键、李宗仁派兵尾追，一面电薛岳率主力经武冈、芷江入黔以防阻红军会合。1935年1月，红军主力击破黔军渡过乌江解放遵义，蒋乃将防堵红军会师的任务交给刘建绪，令刘部进至黔东石阡、印江沿乌江东岸布防，并电原在鄂川边的徐源泉（第十军）派兵进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部联防。当时湘西红军正在沅陵以北进行反攻，策应入黔的中央红军。何键深恐湘军入黔后他自己失去控制，乃借阻击湘西红军为由，苦苦要求调其亲信部队李觉、陶广、章亮基等师回湘西，蒋介石允其所请，于是刘建绪只带4个师布防黔东。这时蒋令薛岳率所部8个师不顾王家烈是否愿意，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沿途并未与红军发生大的战斗。

在政治上，蒋介石早已安下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我最初是从陈布雷处得知这一消息的。当红军于12月进入黔边时，蒋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薛岳进占贵阳，正是这一阴谋的具体行动。

（二）川、滇、黔边追堵战役的挫败

红军于1935年1月中旬由遵义西进时，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第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堵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急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蒋一度计划调第三军王均部滇军入黔，后来怕龙云误会而中止）；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1月底，川军旅长郭勋祺率兵9个团在土城附近顽抗两昼夜，被红军击败。蒋据报后认为郭勋祺“鏖战有功”，立即升郭为模范师师长；同时以守乌江的侯之担作战不力，令参谋团拘押查办。在红军压境下，蒋对川、黔军阀一赏一罚，不仅是施展其对部属威胁利诱的惯技，也是他欺软（黔军阀）怕硬（川军阀）的表现。

2月间红军进入滇东行动情况不明时，蒋介石从贺国光、薛岳送来的情报中，知道有遵义会议，从此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行动，引起他很大注意。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内部意见有分歧，幻想红军会不统一，会各据一方；一方面觉得更应加紧围攻，不可轻敌。蒋随即调整战略部署：以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以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

在贵州的第二路军作战序列也重新划分，以吴奇伟部编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编为第二纵队，滇军（第十路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编为第四纵队，湘军李云杰部编为

第五纵队，川军郭勋祺部编为第六纵队，湘军李韫珩部编为第七纵队。蒋介石妄想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歼。正当蒋介石打着这个如意算盘时，不料2月下旬红军挥戈东向，击破王家烈在鲮水前线部队，势不可当。蒋得此情报，研究对策，认为红军北渡西行均遭阻拦，黔北穷困，不可久留，回师向东一定是再图去湘西与该地红军会师。于是急命薛岳拿出吴奇伟部由贵阳驰援王家烈坚守遵义、娄山关，令上官云相部驰援桐梓，令刘湘督促郭勋祺部尾追，并令第一路军何键注意黔东防堵。虽然是仓卒应战，但以为围攻军队已处于绝对优势，这样就可扼阻红军。哪知到了2月26日左右，红军竟乘胜再度攻取遵义城^①，击破了王家烈直接指挥的好几个团。吴奇伟部赶到遵义城外接战，不到一天就被红军打败，狼狈退回乌江南岸。事后得知吴、王两部，伤亡损耗在万人以上（柏辉章、韩汉英、唐云山3个师均被歼过半，郭勋祺师在温水尾追的损失不计在内）。这是蒋介石布置川、黔、滇围攻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他在指责薛岳的电文中认为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挥戈东向，二渡赤水，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是蒋介石最初意料不到的。

（三）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

在遵义战败后，蒋介石坐立不安。两三天后（1935年3月2日）他就飞往重庆，住在范庄（范绍增之家），陈诚和我随行。遵义失败的真情，陈诚为掩盖薛岳，不敢如实向蒋报告。我当时也有顾虑，因为薛岳部队一向归陈指挥，薛部失败，陈不说而我说，不仅陈不满于我，蒋会以我有嫌隙于陈，也对我不满。蒋到重庆后，不仅因前方打败仗恼火，另外又因何应钦在北平受到国人责难，且遭日寇的过分侮辱，赖在南京许久不回北平军分会，使

^① 中共红军是2月28日晨再占遵义城。

他更加大发脾气，责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服”。我委婉建议蒋作出处置，稳定一下华北局面。蒋生气地说：“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这些话说明蒋一心反共，不惜向日寇屈膝。

薛岳、吴奇伟在陈诚庇护下没有受到蒋介石的惩处，王家烈迭失桐梓、仁怀、遵义等地，蒋一时也不便追究，只针对这一教训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指王家烈逃离遵义），一律治以失土纵敌之罪。

蒋在重庆不久，约在3月中旬，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吴奇伟，勉吴“雪遵义失败之耻”，指示对飘忽无定之共军作战要极慎重。蒋写后，面交贺国光与我火速派飞机空投给吴。

红军在遵义获胜后，约在1935年3月9日左右复全师西进，这一着又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当郭勋祺率部首先到达遵义时，蒋介石还认为是胜利，再度犒赏该部。虽然这次郭师尾追红军只是扑空，在蒋介石看起来川军还是十分卖命的。正当蒋介石捉摸不定之际，红军已三渡赤水。这时蒋在重庆范庄和我们讨论时认为：红军战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因此，决定严密封锁，再把碉堡政策拿出来。于是他指示薛岳令各纵队尾追侧击，采取在江西修碉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并调李韫珩部由黔东开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调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长江防线，并挺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土城、古蔺地区修碉封锁；电龙云以孙渡部进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防堵，修碉封锁，并切实加强封锁横江。3月下旬各方来电，碉堡大致完成，乌

江南岸各渡口，乌江北大定、黔西、金沙、仁怀、遵义、桐梓沿线都已初步形成碉堡线。蒋介石当时沾沾自喜，认为这本旧皇历——碉堡战术，是“消灭共军的可靠法宝”。

（四）蒋介石在贵阳张皇失措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有蒋的顾问端纳、陈诚和我。随后何成濬、吴稚晖、陈布雷也专机飞来。当时蒋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野心勃勃，一抵贵阳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篇乐观的训话。他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在他看来，红军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他的决策是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决战。他当即督促薛岳尽量把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以为红军再无回枪之力。

但没有几天，约在3月底（确期欠详）薛岳转据周浑元来电：该军在仁怀以南之鲁班场、枫香坝附近防线被红军袭击，打鼓新场也发现红军。蒋还以为这是红军的战术行动。接着忽报在4月1日左右红军先头在安底坝将江防部队击破，巧渡乌江。红军这一出乎意料之外的战略行动，使蒋介石惊惶失措，手忙脚乱。

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约在4月2日左右，蒋介石召陈诚、薛岳、何成濬和我一起商谈。大家判断红军这个行动，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蒋介石随即作出决定，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调遵义李韫珩纵队迅速南移至息烽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贞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大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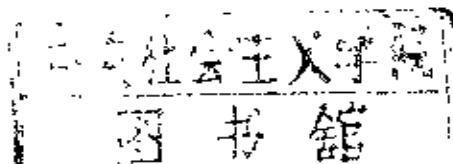
孙渡纵队限期东进集结贵阳，另外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薛岳奉命之后，即用火急电报和电话下达命令，力竭声嘶。当时贵阳只有郭思演的第九十九师所辖4个团的兵力，而且这4个团的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原来在遵义打败仗的唐云山、韩汉英两部分驻息烽、清镇，一部守乌江南岸，犹如惊弓之鸟，根本没有战斗力，蒋也知道这些部队不能再作战。其中只有驻在黔西的唐师陈金城团比较完整，薛岳限令该团昼夜兼程赶到贵阳警卫。

4月4日蒋接李韫珩电告，该纵队在息烽县的黑神庙与红军遭遇，打了一仗，得知红军先头已过息烽的情况。蒋介石立即传令嘉奖李韫珩并给犒赏，同时立即召集我们商量对策。当时我们认为，红军距贵阳仅百余里，判断红军急求东进，估计在优势兵力跟踪尾追下，顿兵攻坚难免受挫，可能不致进攻贵阳城，即使有靠近贵阳的行动，也只是虚张声势，掩护主力东移。在贵阳的守城部队只要坚持一天，追击部队即可赶到。但当时贵阳兵力单薄，援军（指孙渡部）尚在向贵阳急进途中，必须妥为安定人心，并加强城防工事。此外，则命令甫抵清镇之空军第三队，必须更番侦察敌情并探明追击、增援各军位置。为了保障蒋个人安全，令韩师组织有力部队确保清镇飞机场不得有误。

4月5日左右，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竟步出行轅查勘城区工事，申斥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事后我对陈诚说了，陈深悔过去不该提拔郭当师长，认为太不替他争气，随后即予以撤换，由傅仲芳接充。）蒋每当军情变化时总要表示其临危不惧以示其大将风度，蒋的侍从们要我劝蒋不要疏忽，我只好写一条子交宋美龄请她规劝。

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

约在4月6日（或7日），滇军孙渡纵队先头急行军三四天走



了400多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开确实固守飞机场。薛岳马上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长去见蒋介石。当时这些所谓“勤王之师”、“救驾部队”的来到，蒋真是喜上眉梢笑在心头，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对该纵队及各旅长均有犒赏。孙渡在贵阳周旋不到一天即奉命率部向龙里前进，途经黄泥哨（距贵阳三十里）即与红军便衣队接触，随进至观音山乃与红军先头遭遇，激战竟日。蒋为此电龙云嘉奖孙部忠勇善战乃龙训练之功。这时蒋亲自命空军侦察并轰炸红军。空军人员发现红军在离贵阳东三四十里外转向西南急进，把所有东追的国民党军甩在龙里以东地区。到这时，蒋介石才算初步解除警报。从此红军调开了云南的堵军，甩开了后面的追军，坦行无阻，大步前进。当时蒋介石还大肆宣扬他用兵如神，指挥若定，为自己遮丑。可是追击部队师长万耀煌（我在陆大五期的同学）在贵阳时曾悄悄地对我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他这话真是一语道破真情。

（五）压迫王家烈交出贵州军政权力

搞垮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是蒋介石布置长追红军的时候就便收拾川、滇、黔的计谋之一。贵州军阀王家烈所部在西南四省军阀中力量比较薄弱，所部号称五个师，其中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三个师均割据一方，名义上归第二十五军，实际上王指挥不了。王所能掌握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的第一、二两师十多个团。在薛岳进入贵阳的3个月中，早已把王的罪状向蒋揭露，并向何、柏两人进行了分化收买工作。1935年4月前，红军尚在贵州时，以情势紧张，蒋对王还有所利用，所以迟迟未动手。迨至4月上旬，红军主力入滇，4月中旬黔境战事已近尾声，由黔军编成的第二路军第四纵队留在大定、黔西整理。当时黔军非王嫡系的各师已完全脱离王的指挥，薛岳取得蒋之同意吞并了侯之担师。犹国才的吴剑平师得力于龙云的支援，蒋在珍师得到刘湘的支援，都保存了番号。蒋决定将王部何、柏两师

并入中央建制，给以第一〇二、第一〇三师的番号，将14个团缩为6个团，由南京军政部直接发饷。

蒋介石决定先让王家烈在所任“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逼王交出贵州军政权力，并着我去大定与王商议。4月20日左右，我由贵阳出发经过黔西，适遇第六纵队（川军）与第四纵队（黔军）为驻地问题闹纠纷，经我劝解停止下来。我便到大定见王向其传达蒋意。王最初表示两个职务都不愿放弃，理由是：“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有保障。”我只好对王说：“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王于是借口要与两师长商量再决定，意在求援于何知重、柏辉章两人。我乃密与何、柏两人会晤，诱以利之所在，说明不要军这一级，可编为直辖师，可以领十足军饷，再不会受王家烈从中克扣。何、柏两人听我这样一说，都表示赞成王辞第二十五军军长职专任主席。王找两人商谈时，表示如两者不可兼得时，愿辞主席干军长。何、柏两人不便当面反对，却在暗中纵容部下包围军部闹饷。王再与我会谈时，表示愿干军长辞去主席。我把何、柏两人向我讲的话如实告王，并询王是否知道有士兵包围军部闹饷之事。王遂改变主意，表示还是干主席辞军长，以免兵变。但是王却举棋不定，过了一会儿又对我说，还是想干军长辞主席。我便对王说：“你控制不住军队，军长怎么当呢？”王说：“只要有饷，军长还是可以干的。”王要我对他的部队讲讲话，表示中央支持他。我拒绝了，只劝王还是干军长好（我当时是秉承蒋意让王先辞主席再说），今后不克扣军饷就行了。

王家烈恐风声传出，部下对他不客气，要求随同我一道去贵阳。王到贵阳，蒋即要我带王去见他。王当面向蒋表示辞主席职，蒋甚喜。王问何时交卸，蒋告以不必急。当日蒋还亲自到王家中看王。次晨蒋问我：“吴礼卿（忠信）现在哪里？”我反问是不是要找他。蒋说：“你不必找，已交布雷去找了。”事后我对何成濬说，我猜一定是吴忠信要当贵州主席了，果然次日即发表吴继王任主席职。

据我当时了解，王家烈与桂系军阀长期勾结，蒋去王当然会引起桂系反感（特别是在经济上切断了广西对贵州鸦片烟过境的税收）。蒋知吴与李、白有交情，所以起用吴忠信以缓和与桂系的矛盾。王家烈的主席下台后，蒋为敷衍王的面子，发表王一个“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的空衔。王回到大定整编部队，因师长们早被蒋介石收买，再度向王闹饷。蒋此时故意坚持部队未缩编，未经点验即不发饷。在众叛亲离、上下夹攻的情况下，王被迫回贵阳向蒋辞总指挥及军长职，于4月底调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军权被蒋夺去。迨至5月初，王随张学良离开贵阳到武汉行营服务。王离黔时蒋送他五千元旅费，随又特准免考入陆大肄业。蒋介石排除异己，趁反人民的机会扩大他的权力，运用狡猾手段吃掉王家烈，从这段情况可见一斑。

五 飞昆明策划金沙江、大渡河的追堵

（一）云南金沙江南岸的作战情况

红军于1935年4月中旬向云南急进，所向无敌，很快就突破了犹国才盘江八属的防地渡过北盘江（这也是一条地障）。蒋介石在贵阳急电龙云，命将云南仅有的一些军队布置于滇、黔边黄泥河以东防堵，下令薛岳亲率吴奇伟、孙渡、周浑元、李韞珩等部尾追。薛岳以地形熟悉的滇军孙渡部作为前锋（李云杰、郭勋祺、王家烈三部留黔，原在遵义打败了的薛岳嫡系之两个师残部也驻贵州整补），分三路西追，月底沿红军去路到达云南境内，沿途在滇、黔边的兴仁、黄泥河、平彝、白水有些接触，没有大的战斗。滇军旅长龚顺璧一度负伤，蒋曾发给一些治伤费。对于留在乌江北岸的一部红军，蒋命令各军追堵，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这一支红军后来也顺利地经水城渡过乌江上游进入云南。

5月初，红军主力分向沾益、马龙、寻甸、嵩明前进。龙云

当时因滇军仅有的6个旅主力早已外调，坐守昆明空城，只有卢汉指挥的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担任守备，十分恐慌。蒋介石要薛岳兼程驰援，不料红军甫抵昆明附近又转头向昆明西北前进。当空军侦知这一情况时，蒋介石和我们研究，认为红军声东击西，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便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蒋在电令中有“同仇敌忾，灭此朝食”之语，妄想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他以李韫珩部经会泽向巧家北追外，其余主力经寻甸、禄劝、武定向元谋尾追。此外，他又分电西康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进行阻截，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他命令空军每天在巧家渡口、寻甸属之洪门渡口、禄劝属的绞车渡口、元谋属之龙街渡口进行侦察。约在5月7日，薛岳、龙云两人乘飞机到金沙江侦察后来电告蒋，始知红军主力已在后卫掩护下巧妙地突破了刘文辉部防线渡过金沙江。向绞车渡前进之周浑元部，向巧家前进之李韫珩部，向洪门前进之孙渡部，向龙街前进之吴奇伟部，均为红军后卫所牵制，稍有战斗；旋又得知红军取道通安正在围攻会理。蒋介石乃命薛岳以李韫珩部为先头由巧家渡江驰援会理，周浑元部继续前进，前敌总部及吴奇伟部从元谋渡江继续追击，孙渡部滇军留在金沙江南岸沿江掩护。事后得知红军在云南过境时，禄劝、武定、会泽、寻甸、富民、宣武各县县长，在龙云压迫下率领团队顽抗红军，被击毙县长数人，还有因作战不力被龙云处死的县长数人，团队伤亡数以千计。另外还听到有一个赤手空拳的参议寻某，因督战不力被龙云处死。

（二）飞昆明部署大渡河的会战

约在5月12日（或迟一二日，记忆不确），蒋得悉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薛岳所部也渡过了一部，此时会理正在红军围攻中。我随蒋介石乘飞机至昆明，此行随从人员不多（只有军事人员，没有党政人员）。到昆明后住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共计住

了20多天。蒋在昆明的措施，除拉拢龙云之外，主要是部署大渡河的会战。我回忆所及，有如下几件：

(1) 当薛岳所部渡过金沙江后，蒋令薛岳转告前线各军，行动要稳扎稳打，每到一地先做工事（主要是碉堡）才能入营。这是因为吃了红军几渡赤水的亏，有此教训了。

(2) 电令刘湘以第二十军全力及第二十一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第二十四军大渡河以南部队（约六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红军北上，掩护薛岳部主力北进；第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指定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

(3) 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大意是：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等语。

(4) 当刘元璋守会理到了第六天的时候，蒋下手令升刘为中将旅长，犒赏一万元交飞机投送，以收买刘文辉所部为其出力。当红军在5月16日左右，达成围困会理取得休整的任务后继续北进时，蒋命侍从室发一电令，通告川、黔、滇各军“嘉奖川军刘元璋守会理之功”。

大渡河会战计划，策动的总兵力计十余万人，5月中旬以后各部依计划行动。蒋介石曾两次由昆明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表示他亲临前线督战和官兵同甘共苦的样子。空军队长张有谷在当时也是很卖力的。可是蒋介石梦想红军重蹈石达开一样的覆辙并未出现。红军到泸沽之后，只一部经大树堡，主力却分两路，一路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击败了刘文辉的守军，一路迂回到泸定桥击败刘文辉另一部守军，渡过大渡河取道汉源（在汉源也打了一仗）、天全、芦山、宝兴，在6、7月间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懋功（今小金）了。

当红军渡过大渡河后，薛岳命李韫珩率所部及指挥川军刘元

*

璋部三四个旅过河尾追红军，经汉源、泸定北进金汤、丹巴。薛岳率主力经汉源、大相岭集中雅安，沿途虽没有战斗，但官兵死亡及病号很多，部队人少枪多，弹药无法携带，士兵拖得疲惫不堪，到达雅安时约在6月中旬了。

关于尾追红军的任务，川军杨森自告奋勇，率该军及邓锡侯、刘湘之一部共9个旅经芦山向宝兴追击北上。所谓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就是这样收场。蒋介石在昆明住了3个星期，随战事的发展，于6月中旬由昆明飞回重庆。约在7月初又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进行下一幕的活动。

（三）收买龙云与对付李、白的诡计

蒋介石5月中旬到昆明，即以金钱地位向龙云拉拢。蒋知道云南军阀自辛亥革命以来，从唐继尧起都有谋黔野心，龙云扶持犹国才、王家烈就是这种野心的暴露。过去蒋桂战争时期，龙听命于蒋，派兵围攻南宁，被白崇禧反攻才收兵。这次红军入黔，滇军服从蒋的命令作战，获得蒋一再嘉勉。迨红军入滇进入龙云老巢时，龙云利用团队抵抗红军也极为凶恶。国民党中央军当时只能控制贵州，无力深入控制云南。龙云断然拒绝薛岳部进入昆明，就是抗拒中央军侵占其地盘的反映（这件事薛岳的部下向蒋控告过龙云）。针对这些情况，蒋介石在未到云南前，财政部长宋子文送来的特支费一百万元，除在贵阳开支一部分外，都交我带来昆明。凡龙云求蒋补助的各项费用，蒋都从宽批发，以示关怀信任。蒋对昆明各界人士讲话，总是当众表扬云南军队训练有素，团队组织严密，以肯定龙云统治云南的政绩。蒋在昆明亲自和龙云密谈多次，我未参加，不知具体内容，但事后和蒋闲谈中也了解到一个大概。其中有中央提高龙云在滇、黔方面的权力，要龙云在滇、黔方面作为中央的支柱（蒋利用龙反桂的故技）。蒋还在口头上答应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统率两省军政，由龙云主持。蒋当时面嘱我与龙云多加联络。龙云在蒋到昆明几天之

后的一个傍晚，组织群众手持火炬列队庆祝蒋的到来。6月上旬红军越大渡河向大小金川前进时，蒋准备离开昆明，龙以黄金制的大牌子上刊“蒋委员长莅滇纪念”字样献蒋，也送了一个小的给我，对其余侍从人员都有分送。蒋离昆明去成都时，还剩下特支费现洋十四万元没有开支完，我问蒋是不是带走。蒋说：“何必带走，给志舟（龙云号）去算了。”我乃将此款亲交龙云。

六 在成都采取一箭双雕的阴谋

（一）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的四川形势

在1935年以前，为了对付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所建立的根据地，蒋介石以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将川军主力二十余万人编为六路进行围攻，但迭经红军打击，伤亡很大，弄得川军焦头烂额。因此蒋特派参谋团入川，一面担任策划，一面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作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同时由参谋团派出军事督察专员到各军师随军行动实行监军。蒋并派特务头子康泽率别动总队数以千计的队员渗透到川康各地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作为蒋的耳目。1935年2、3月间，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边苏区向西突破嘉陵江、涪江，一路由广元经平武，一路由苍溪经剑门关、江油，一路由阆中、梓潼齐集北川，随又渡岷江入川西。蒋得悉川北红军渡过嘉陵江，便将放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罪名加在川军第二十九军田頌尧头上，将田撤职查办，杀鸡给猴子看，使川军将领有所恐惧。1935年6月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于懋功时，刘湘、贺国光等人估计红军实力，计红四方面军所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等四个军约有四万余人，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二三万人，合计当在六万人以上，分别占领岷江以西地区，北自松潘附近，南至

理番、汶川，西迄大小金川之懋功。川军在刘湘、贺国光策划下，仍按一至六路进行部署。在蒋介石未回到成都以前川军各路位置大致如下：

第一路邓锡侯部（川军第二十八军）进至北川西北地区；

第二路孙震部（川军第二十九军）进至北川西南地区（岷江东岸）；

第三路李其相部（四川边防军两个师）进至汶川地区；

第四路杨森部（川军第二十军）由宝兴向懋功前进；

第五路唐式遵部（川军第二十一军一部）进至茂县附近；

第六路王缙绪部（川军第二十一军主力）进至茂县、汶川间地区向理番推进。

约在7月上旬，全川形势除蒋嫡系胡宗南部占据川西北的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点几乎均被川军所占据。中央红军主力似有计划地分向西北转移，缩短防线模样。以上是我随蒋介石由昆明飞抵重庆从参谋团贺国光那里所了解的概略情况。当时贺国光的看法是：自红军撤出川北以后，在参谋团督促下，川军形势比较有利。

（二）初到成都的下马威

约在7月上旬，蒋介石由重庆乘车到成都，时薛岳所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部直辖各师已到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的局面。这时蒋的气焰颇高，比这年3月初到重庆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一方面是与薛、胡等部入川有关，一方面也和蒋已控制了黔、滇两省有关。6月下旬，杨森率该军及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八军各一部追击中央红军，于占领芦山、宝兴越夹金山向懋功前进时，在灵关附近要隘与红军后卫接触，该部夏炯旅截获一部红军伤病员，摄影宣传，诡称为灵关大捷。蒋来成都得悉这一情况，以杨森反共积极，马上通令嘉奖（蒋收买杨森即从这次起的）。与此对照，刘文辉部先在安顺

场、泸定桥两处被红军突破大渡河防线，蒋恨在心头，当时未加处理，只命刘文辉督部尾追。随后又命归李韫珩指挥的刘元璋部三四个旅直趋金汤阻击红军侧背，其中刘元璋旅抵金汤时又被红军击败。此外红军渡过大渡河经芦山、宝兴北进，先头进抵懋功以西地区，也将刘文辉据守于丹巴、大金川西岸的余松琳旅击败。蒋介石甫抵成都，即根据参谋团贺国光所报刘文辉部在大渡河、金汤、大金川再三败北的情况，电令刘文辉将刘元璋、余松琳（刘元璋是刘文辉的侄子、余松琳是刘文辉的大邑同乡）两旅长押解参谋团法办，给刘文辉以打击，使川军头日不敢不卖力气。蒋介石的下马威是有其阴谋的。据我所知大渡河战役以前蒋介石派西康活佛诺那回康北宣抚，派李韫珩部驻康定不走，除反共原因外，镇慑刘文辉是其主要目的。

（三）调集川军主力封锁岷江

蒋介石到成都设行辕之后，我担任的侍从室主任与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工作上有些分工，我主要负党政方面的协调工作，关于四川反共军事方面由贺负责。因此我在成都这个时期策划军事方面的具体工作比较少一些，只能从蒋与幕僚们商讨的大问题上了解一个大概。

蒋在成都行辕和我们一班幕僚研究过川西地形，认为红军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即大渡河上游）边，北至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处处布防，几万红军兵力不够分配；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生，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稞、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有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

据贺国光、杨永泰等人说，徐向前部有赤化西北打通苏俄国际路线的企图，与中央红军会合之后，其策略如何虽不明确，但只要封锁得紧，在此地区盘踞不会持久。杨永泰并强调采取江西

的经济封锁是十分重要的。于是蒋接着召集川军各路总指挥刘湘、李其相、邓锡侯、孙震、唐式遵、王缙绪、潘文华等人在成都开会（杨森未来）。蒋在会上先说明对红军在川西意图的判断，拿出他要各路川军集中力量迅速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加以包围封锁的计划，⁵指示各军在四川“剿总”指挥下同心协力，寻求最后胜利。后来川军第三路李其相部攻占松潘、茂县间之叠溪时，贺国光与刘湘曾召开一次叠溪会议，川军各路均派员参加。会议内容除了交换岷江沿线封锁情报和交流作战经验外，主要是认为红军粮荒严重，决定采取“困死政策”，一面交换岷江沿线封锁情报，一面交流作战经验，并决定强迫藏民区实行坚壁清野。会上订出两项禁令：（1）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处死刑；（2）藏民有参加红军、供应乌拉者以通敌论罪。至于川军各路二十余万人具体进攻与执行情况，我不甚了解。

（四）调薛岳部入甘肃堵截

蒋介石于7月下旬（或中旬）在成都行辕（设在刘文辉私宅）召集薛岳所部少校以上军官讲话并给予犒赏之后，另召集该部师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蒋在会上指出，根据胡纵队情报，红军先头已抵毛儿盖，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当前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在会上，蒋介石决定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第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以上归薛岳统率的嫡系部队约在14万人左右，在8月间均就战略位置。当时川甘边区交通不便，军粮补充十分

困难。蒋要参谋团仿南昌行营的老办法，组织铁肩队几个支队约2万余人专门运粮到前线。肩夫昼夜络绎于途，备极辛苦，累死无数。

（五）调大军入西北

1935年7月间，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陕游击区，西进至高县、洛南、山阳，消灭杨虎城部几千人，8月间取道凤县进入甘南。成都行辕当时由川军杨森部进抵懋功西北之绥靖（今金川）所获情报中，知道中央红军已纷纷备粮北上。这时蒋介石判断红军会向西北前进，乃先后调动大军进入甘陕地区。

首先，他同意朱绍良的请求，调第七路军毛维寿所率前第十九路军改编的第四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等4个师分别由安徽、河南、河北三地调集甘肃，归朱绍良指挥。这4个师抵甘之后，蒋介石即免毛维寿职，所部拨归胡宗南指挥，南调至松潘担任堵截。其次，他从豫皖边调第三军王均部（原滇军朱培德旧部）到甘肃以确保兰州安全，于8月以前在洮河两岸的和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天水之线构筑第二道封锁线。此外，他还从江西调第二十七军毛炳文部（原湘军底子）到甘肃会宁、华家岭、静宁、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在8月中旬前后，他又调东北军张学良所部的骑兵军何柱国部进驻平凉，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进至甘肃之天水，一部挺进至兰州；其余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已进入陕西，一部进至平凉、固原地区作最后堵截准备。最后，他又电驻宁夏的马鸿逵第十五路军派兵进出固原及甘陕边之环县布防。

以上七八个军的兵力多达二三十万人。蒋介石估计红军主力如北进甘肃，在北面堵截的兵力已不足为虑。

（六）红军越过草地突破胡宗南部防线胜利北上

在蒋介石的“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策划下，前方在8、9月间已布置就绪，蒋遂在峨眉举办训练团，训练川军将领，我

亦随往。这时，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来电说，红军已从草地到达巴西，正同该纵队骑兵团激战中。9月中旬，又得悉驻守上下包座的伍诚仁师封锁线被红军突破消息。蒋介石在震惊之下火高万丈，即将该师长撤职查办。接着，蒋介石急电甘肃朱绍良，令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另令胡宗南回甘肃，又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及天水、武山地区利用已构筑之工事布置堵截。但是不久即接朱绍良电，红军通过岷县哈达铺时，先头不足万人，没有发现后续部队，已在9月下旬通过渭河王均所部防线。王均在武山阻击不力，备受蒋介石的申斥。蒋随即径电毛炳文打气，大意是要毛效法湘军“先贤”左文襄（宗棠）在西北所创之楷模，使尽全力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后来该军只在通渭及华家岭地区打了一下，这道防线即被红军突破。10月间，红军如入无人之境，翻过六盘山，又突破平凉、固原间马鸿逵部及东北军骑兵军的堵击，扫除沿途障碍，取道环县，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9月底，我随蒋下峨眉山时，蒋心情抑郁，暴躁异常。因为据朱绍良电告，华家岭之役从俘获中得悉：这一路红军系红一、三军团，由毛泽东率领。蒋从此知道毛泽东行踪后，认为“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时生慨叹。他随即下令胡宗南率第一师回甘肃天水整补，下令薛岳率各军从川甘边区撤回四川待命。

七 西北“剿总”的下场

1935年11月至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的一年之中，西北“剿总”策划围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蒋介石发动十年内战中的最后阶段。我是1936年2月间调充西北“剿总”参谋长的。作为幕僚长，我了解一些具体内幕，下面分别揭露蒋介石、张学良两人当时对红军的策略和蒋张两人的分歧情况。至于反动军队作战经过，我只能回忆一些片断。

(一) 中央红军抵陕北后，蒋介石对其他方面红军的围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1、12两月和1936年1月，我还是跟在蒋介石身边。蒋这时对红军区分三个方面分别作战：(1)对陕北根据地，由西北“剿总”张学良负责；(2)对回据川西的红四方面军，由重庆行营顾祝同负责；(3)对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由宜昌行辕陈诚负责。蒋本人不像长追中央红军时那样直接插手指挥，只是从战略上作全盘指示。

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召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在四川开会时，曾决定集中主力作“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会议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调薛岳的第二路军四个军东下，加入川鄂边归陈诚指挥的战斗序列，进攻红二方面军。旋因红四方面军在11月间从草地回师，重新占领宝兴、芦山、名山、荃经、汉源并包围了雅安地区，蒋乃停止薛岳所部东调，改令该部西开，协助川军全力进攻川康边区红军。关于这方面的作战是重庆行营指挥的，我不清楚，只知是年冬川军败讯频传，迨薛岳部加入战斗后，始稳定下来。1936年2、3月间，红四方面军转移后，川康战事始告一段落。至于蒋介石对付红二方面军，除原有刘建绪、徐源泉等所率各纵队在鄂、湘、川、黔边境围攻外，并从江西及鄂赣边、豫皖边抽调樊崧甫、孙连仲、汤恩伯各军十余万人向湘鄂边进攻。迨1936年1、2月间，红二方面军长征入黔，蒋介石要顾祝同到贵阳指挥，命刘建绪率领李觉、樊崧甫、郭汝栋、郭思演、郝梦龄各纵队长追；并命龙云再度派出滇军堵截，发表龙云为滇黔“剿匪”总司令，统一指挥这些部队，具体战斗经过我也不清楚。这是我到西安任参谋长以前随蒋来往于成都、重庆、南京所了解的一些战况。当时蒋介石看到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感到异常高兴。

(二) 西北“剿总”的成立及蒋介石对陕北初期的围攻

设立西北“剿总”的命令是1935年10月1日发表的，蒋介石

自兼总司令，调武汉行营主任（原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以钱大钧为参谋长，但钱久不到差，于是张向蒋请求于贺国光、林蔚和我三人中派一人任参谋长。林、贺均不愿就。我虽不愿就这参谋长，但更不愿再呆在侍从室。于是蒋决定把我和钱大钧对调，派我到西安任参谋长职。1936年2月我临行时向蒋告辞，蒋只说：“西北剿共任务重大，你要好好帮助汉卿（张学良号）去完成。”没有说及其他。总部辖区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所以当时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西安绥署主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兰州绥署主任朱绍良的第三路军及青海马步芳部，均受西北“剿总”节制。山西虽不舍，但阎锡山派进陕北的孙楚部也在被指挥之列。当时张学良所部东北军的兵力装备，非一般地方系军队可比。张学良共辖五个军与两个独立师共二十余师人，除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主力留北平外，其余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的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均在1935年9月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这样，张学良指挥的兵力约在三十余万人，与当时陕甘宁的红军比较是十与一之比，在数量上国民党占绝对优势。

蒋介石对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红二十六军的“围剿”已有多多年，原以杨虎城所指挥的井岳秀、高桂滋、冯钦哉等部，并配合山西阎锡山所派西渡黄河的部队及宁夏马鸿逵所派进入陕北三边的部队，“围剿”两次均告失败。蒋介石乃调在中原担任尾追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进入陕南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辖刘翰东、吴克仁、周福成、何立中四个师），开赴陕北洛川准备再度进攻。王部于1935年9月间曾进占延安。当红二十五军长征抵陕北并和红二十六军合并为红十五军团时，王以哲因已占领洛川、郿县、甘泉、延安之线，认为红军力量不大，除修碉外，戒备疏忽。不料月底甘泉突被红军包围，王乃派第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南解甘泉之围，维护交通。这对张学良已命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辖牛元峰、江维仁、沈克、常经武及董自兼的一个师共五个

部)入陕直开宜川、延川、清涧之线，与王以哲合力修碉围攻。惟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到达甘肃，蒋介石改令第五十七军火速开平凉。10月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红十五军团已击败王以哲部一一〇师何立中部于甘泉以北之劳山，并加紧包围了甘泉城。这时第五十七军回师庆阳、合水，蒋介石又电该军经鄜县到甘泉解围，并进行对陕甘宁边区三次“围剿”。11月下旬该军进抵直罗镇之第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又被红军消灭。甘泉之围迟至次年春始解。劳山、直罗、吴起三役，张学良部损失师长两员，骑兵一个师，步兵两个师，共兵力二万余人。中央红军北上陕北后，声势浩大，迫使东北军人人自危。在东北军高级军官中，由于何立中、牛元峰被击毙之后，军心动摇。张学良甫经出师，即一蹶不振，加以受红军号召停止内战的影响及对蒋介石拒绝补充的不满，因而苦闷万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反共，所谓三次“围剿”，在1935年底就宣告结束。

(三)对红军东渡黄河以后的措施

1936年2月，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接受蒋介石围攻陕北红军重新部署的指示。此时由于红军有一部已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正竭尽全力在汾河地区进行阻截。会后蒋介石命张学良火速回去，张乘专机绕道武汉偕我一道回西安。3月以后，在陕北的红军第一、三、十五各军团除留置一部外，主力均在晋西，于是东北军王以哲部得以解甘泉之围。守城的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所率第一一〇师残部困守甘泉数月，为张学良挽回一些面子，张文清便一跃而升第一〇八师师长。蒋介石为给东北军打气，也予张文清以奖赏。张学良由南京回西安后，即到洛川设指挥所，亲自驻在前方指挥。他一面令各军(主要与第十一、第三十七、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六十七等军及骑兵军)在陕甘宁边迄陕晋边，西自正宁、枸邑、淳化，东迄鄜县、甘泉、延安、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之线筑碉进行封锁；一面调杨虎城的孙

蔚如军由陕南进至陕北与高桂滋、冯钦哉等部进驻宜川、延长、延川之线进行封锁（杨部缺开拔费，我挪借东北军军费十万元发给该军以促其行动，事后多次报请蒋介石发给，终未予归还）。约在是年4月间，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堵截红军东征，与阎锡山商妥组织一个晋绥陕甘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任总指挥，在2、3月以来先后调集嫡系部队汤恩伯、李仙洲、关麟徵等十多师人入山西，此时均归陈诚指挥。阎锡山则以李生达为陈诚的前敌指挥官。准备渡黄河西犯，以策应蒋嫡系部队在山西方面的进攻。这时张学良怕重演何立中、牛元峰败亡的覆辙（西北“剿总”为检讨劳山及直罗镇战役，曾召各高级将领开过一次会议，研讨失败的教训），在洛川迟迟未使各军行动。约在4月下旬，西北“剿总”得到蒋转据阎锡山所报红军主力均已入晋西，要求西安、陕北军队及时东进以收夹击之功的电报，西北“剿总”却以红军只是一部过河，主力仍在陕北的实际情况复告蒋介石。但蒋则相信阎的报告，怀疑张学良畏缩不前。张乃与我商议，要我飞往南京面报蒋介石。我赶往南京径去见蒋。蒋仍坚信阎锡山的报告，指示驻陕甘各军从速向陕北进攻。我再次见蒋，也不能消除他的成见，我不得要领，只好回陕。

约在5、6月间，得悉红军确已从黄河东岸回师，前线突然紧张。虽知红军已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但蒋置之不理，下令陈诚在山西率领各部渡河西犯，严令张学良督率所部北进。以上是红军东渡黄河前后蒋介石加强兵力围攻的一些措施。自1936年6月底以后，在陕甘的东北军及杨虎城部与红军可以说只是保持对峙状态，基本上没有发生大战斗。当时总部特务科长江雄风综合各方情况，迭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所部和红军已有默契的模样。“我当时亦只知东北军怕与红军作战，下面与红军有某些来往是事实，但由于蒋的严厉督促进攻，责任所在，不能不将张之处境困难、部下不听张之指挥据实告蒋。

(四) 山城堡战败后蒋介石的毒计及其破灭

1936年5、6月间，陈诚以“四省边总”名义在山西指挥大军向西进犯。西北“剿总”奉蒋之命也令前线各部北进。但在6月间，两广军阀发动“六一”事变，进兵湖南。蒋介石为对付两广，忍痛从甘肃抽调胡宗南部南下，并从其他方面抽调兵力南下，陈诚也被调往南方指挥。这时陕北前线由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避战，进展缓慢；红军当时为打破包围，也变更计划，主力转向西进。张学良此时由洛川回到西安，一面电马鸿逵、朱绍良派兵阻截，一面除留陕北封锁线及守点部队外，抽调东北军的第六十七军、骑兵军向陇东推进。

9月间，蒋介石利用分化利诱手段瓦解粤桂的军事行动，使两广事件得到所谓和平解决。接着蒋又将南下兵力抽回来加强反共力量。当时红二、四两方面军由西康北上已进入陇南，蒋介石命重庆顾祝同派川军孙震、邓锡侯等军由川北进入陇东堵截，命兰州朱绍良以王均、毛炳文、胡宗南等军在陇南堵截，电西安张学良派何柱国、王以哲等军进至平凉、固原堵截。结果处处扑空，红二、四两方面军部队在中央红军接应下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之静宁、会宁胜利会师，然后取道固原以北之七营及靖远、海原、同心地区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来西北“剿总”据马步芳电告，始知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兵力计红五、红九、红三十等三个军在靖远以北渡黄河后向新疆进军，被马步芳、马步青所部在武威、永昌、临泽、高台地区击败，蒋方所谓高台大捷即指此事。)

约在11月中旬，蒋介石错误认为红军三大部队已会合于陕甘宁边区，力量有限，乃策划集中兵力由庆阳、固原、七营、同心、中宁地区向环县地区进攻。其部署是以马鸿逵的第十一军在中宁，王均的第三军在同心，胡宗南的第一军由固原以北编为左纵队（另有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均受朱绍良控制为预备兵团），张学良的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配合骑兵军一部

在固原、庆阳间地区作为右纵队，均向环县进攻，其余各军亦在原封锁线向陕北进攻。此时张学良依命传达，而内心抑郁不安。东北军前线各军则阳奉阴违，按兵不动。王以哲军由于用无线电呼叫不应，命令无法传达。胡宗南率部按蒋令向环县东北前进，他既不向西北“剿总”报告（胡心目中向来轻视张学良），又不与友军联系，孤军深入。约在11月5日，这个纵队的先头部队（李铁军等师）在山城堡吃了败仗，损失两三旅人，其中廖昂旅被全歼。第一军第一师是蒋介石的起家部队。蒋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张追究责任，限期复电，意在惩办王以哲。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数日不至总部。我亲往其家商谈。张在此情景下向我诉说：“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言罢凄然泪下，我竭力安慰，劝张向蒋当面解释，以免电文难以表明心迹。张觉得只有如此，乃在11月下旬飞抵洛阳见蒋，备受蒋的斥责。

山城堡战败后，蒋介石存心更加狠毒。当时由于两广问题业已解决，百灵庙被傅作义部收复，三大红军又集结在一个地区，蒋认为此乃十载以来难得之良机，乃亲去洛阳指挥。蒋鉴于东北军及杨虎城部厌战、避战，乃先后调集在江西参加过五次“围剿”的嫡系部队蒋鼎文、樊崧甫、万耀煌等所属二十个师以上，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及西北地区的地方系军队，总兵力达六十多个师计二百多个团，企图一举摧毁陕北红军根据地。他计划以蒋鼎文为副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将张学良、杨虎城换下来。然而，正当蒋介石大举进犯红军的狠毒部署已定，只等通过西安会议付诸行动之际，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响应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发动了双十二西安事变，阻止了这一罪恶阴谋的实现。

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

李 以 助

自1934年10月中旬迄1935年10月下旬，这一年，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险阻，胜利地到达陕西吴起镇，同时也是蒋介石集团凶残毒恶地集中七八十万军队危害红军比较惨重的一年。1935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对薛岳所率的中央军讲话，特别指出“国军长途追剿，从中枢到边陲，军行所至，中央德威远播，诚为我国历史空前壮举”，就是指“追剿”军从东南到西南、从西南到西北、迢递万里，沿途追击、截击、堵击红军的行动。

当时红军长征，经过闽、赣、粤、湘、桂、黔、川、滇、康、甘、陕、青等省。蒋介石除调动各省地方杂牌军，如粤军陈济棠，桂军李宗仁，湘军何键（李韫珩、李云杰），黔军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滇军龙云（孙渡），川康军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頌尧、孙震、李家钰、邓锡侯，甘肃鲁大昌、邓宝珊，以及西北军杨虎城、东北军张学良、青宁马家军，分别在各省区截击堵击之外，特派“剿匪”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后任贵阳绥靖主任兼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担任“追剿”前敌总指挥，率中央军9个师（其中一个称支队）沿红军长征道路后面尾追及侧翼堵截。在追截途中，蒋介石直接指挥薛岳，曾经布置三次大兵团追截堵围红军的计划：一次是在湘桂边，利用湘江地障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六路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

的追堵计划；二次是在川黔滇边，两度想利用赤水（乌江北、长江南）地障的追截计划；三次是在川甘边，利用雪山草地地障的围歼计划。蒋介石为了在战略上集中力量，捕捉战机容易起见，曾在沿途令各省地方军队，如粤军李汉魂部，湘军刘建绪、李云杰、李搢珩等部，黔军王家烈、犹国才部，滇军孙渡部，川军郭勋祺、刘元璋部，和中央军胡宗南、上官云相等部，均拨归薛岳指挥。蒋介石在长追红军一年中，虽先后发表了何键任“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最初称粤、闽、赣、湘、鄂“剿匪”军追剿总司令），龙云任“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朱绍良任“剿匪”军第三路军总司令，但薛岳却从江西迄甘肃都是担任前敌总指挥，沿途虽在何键、龙云等遥遥节制之下，实际上在南昌、重庆、贵阳、昆明、成都各地都是受蒋介石的直接指挥。

薛岳，广东乐昌人，别号伯陵，是蒋介石集团陈诚系的要角，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副师长胡宗南），曾率部在上海参加“四·一二”清党大屠杀；同年夏投靠李济深，任新编第一师师长，曾率部在潮州堵击南昌起义军，并曾镇压广州起义。1933年，陈诚在江西指挥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亲信罗卓英、吴奇伟的推荐，向蒋介石保举薛岳充任北路军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没有几天，陈诚升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三路军总指挥后，即让出第六路军总指挥职，保薛继任。第三、六两路军是江西第五次“围剿”中最大的主力兵团。1934年10月间，当第三路军攻下石城时，薛岳即率第六路军攻下兴国及古龙岗，进迫宁都，企图围困瑞金。他当时趾高气扬，自认为了不起；加上早在崇仁就任第六路军总指挥不久时，陈诚在军官集会上曾说“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更使他非常狂妄。这年10月中旬，正式证明红军主方向粤桂边境，通过赣南信丰、安远间的南路粤军封锁线后，薛岳即以火急电，分电陈诚、顾祝同及蒋介石表示，愿率第六路军负责“追剿”，随即得到蒋、陈、顾复电鼓励。可以说红军长征这一年，也是薛岳长途追击红军最多的一年。

我随薛岳任带兵官及幕僚10余年。薛岳率中央军长追红军的情况，有些是亲身见闻，有些是听到在薛岳指挥下的军师长们说的。但关于主要的决策，是抗战中我从陆军大学毕业重回长沙，在薛岳身边任少将高参，为他个人编史料时，他亲自告诉我的。1953年至1956年这3年间，我在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写述军事史料时，又从该团曾经参加长追的国民党军一些人员的口述中，获得了一些有关的资料现按所经各省区分别叙述。

蒋介石长追红军的战略和并吞地方的决策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前往华北视察时，南昌行营已发现红军主力在古龙岗、白水等战斗后去向不明，曾下令北路军各纵队进行威力搜索；10月13日始得悉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模样。17日左右，北路军及东路军先头逼近瑞金，俱无激烈战斗。19日左右，薛岳接到南路军总部及北路军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电，知道红军主力已通过信丰河继续西进，南路粤军余汉谋部防线已被突破。薛岳随即奉蒋介石命率第六路军进行“追剿”；红军由瑞金为起点长征，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即由兴国为起点进行长追。

薛岳在长追一年中，蒋介石给其亲笔信十余封。在当年到达川康地区时，我曾听到这些信的一些内容。抗日战争中，我受命编纂关于薛岳的“精忠”事迹时，他又多次对我谈及“追剿”经过和蒋介石的机密指示。1945年冬抗战胜利后，我在江西吉安及南昌办理第九战区军官总队复员工作时，薛在吉安寓所和南昌洪都招待所曾找我谈及关于编纂抗日反共的史料。有一次我同薛的胞妹薛官珉到薛住所，薛嘱其妻子方少文打开一个皮箱，满箱都是蒋介石十余年来亲手写给他的信件和机要手令，他抽出几封交我阅读；其中有三封是关于对长征红军“追剿”的决策，他并从旁说明，认为“当年未能灭共是军人之耻事，现在来打，就不

容易了”。这些信件是1934年11月下旬薛在衡阳等地收到的。兹就回忆所及的写下几点（为了存真，保留原来的诬蔑词汇）：

（一）“赤匪此次西窜，虽号称十万，据空军毛指挥官（邦初）侦察报告，匪军分几路前进，队伍很乱，且民伕甚多，确是倾巢西窜，辎重甚长，行动维艰。据陈总司令伯南电告，匪军通过信丰、大庾、上犹、仁化、汝城、延寿地区，迭经阻击，溃散不少。据俘供：一、三军团在前、五军团在后，朱、毛确在军中。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应特加注意，倍加奋勇。”

（二）“过去赤匪盘踞赣南、闽西，纯靠根据地以生存。今远离赤化区域，长途跋涉，加以粤、湘、桂边民性强悍，民防颇严，赤匪想立足斯土，在大军追堵下，殊非容易。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事者，由于军心离散，士卒思归故土，明末李自成最后败亡九宫山，可为明证。”

（三）“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毋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

（四）“要令各军将士，应认识西窜流寇，人数虽众，乃多裹胁，在江西经国军四年血战，无以生存，才相率西逃。今已势穷力蹙，内部不和，缺粮缺弹，形如缺水之鱼。我军要人人同仇敌忾，树立灭匪雄心，为个人建立殊勋，为国家开太平之信念。”

以上这些函件的内容和1935年8月10日我在四川古江油关（南坝）第九十二师师长梁华盛处联络时，所看到蒋介石给梁的信的内容，大致相同。据梁说，当时中央军每一个师长、军长均接有同样的信。

薛岳于1934年11月中旬，行抵衡阳附近，即接到南昌行营文酉行一电：“已特派何键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追剿总司令，第六路军入湘后改受该总司令指挥，该总指挥着兼任前敌总指挥。”薛岳随于15日接到何键寒（14日）参电，表示“欢迎北路

军第六路军入湘，戮力同心，共矢有我无敌之决心。”但薛认为率中央军9师之众入湘，还要受制于何键，先电陈诚表示不满。当时陈诚曾复电安慰，认为薛率中央军入湘，又以前敌名义兼任指挥湘省第四路军各师，“将来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后来据薛同我谈及，当时蒋介石深怕粤湘桂三省军队联合，希望他率湘军进入外省，调虎离山，使何键无所凭借云云。

11月下旬，蒋介石在薛岳指挥的第三路“追剿”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时，曾亲函薛岳指示机宜，主要是应付地方军阀的措施，大意有如下几点：

（一）“朱、毛扰湘南逐日继续西进，有沿今秋萧克窜道入黔与贺龙合股之公算大。近日在粤桂边之窜扰应是伴动，图粤图桂公算小。”

（二）“弟（指薛岳）入湘佐松樵（何键）任前敌，实乃肩负追剿重责，望善体斯意，与何通力合作，谦虚为怀，俾在战略上统率前线部队，摒弃境域观念，越境长追。如情况变化，进入粤桂境内与友军相处，尤要慎重，以顾大局。”

（三）“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救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

第三点蒋介石表面上说的是一套官腔，实际也显出他一箭双雕之计。薛岳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湘江追堵战役

湘江追堵计划的实施，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这一战役，是粤、桂、湘三省地方军队及中央军的联军作战，它对长征红军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兹纪要如下。

1. 第六路军的部署

前已略及，薛岳在1934年10月19日左右，据驻兴国附近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电告，红军已通过零都（今于都）、信丰、麻溪附近地区，昼夜行军，继续向西南行，似无经三南（龙南、虔南〔今全南〕、定南）入粤企图。同时接到南昌行营电：“赤都瑞金已被我东路军收复，该部着急整装待命。”迨是月下旬（约在10月23日左右），第六路军总部接南路军第一纵队（第一军）余汉谋电，谓红军西移，先头已通过信丰、安远间及赣州、南雄间公路碉堡线，正跟踪追击中。约在10月24、25日（最迟不至月底），薛岳奉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电令说：“着第六路军各军师由赣南取道上犹、遂川、莲花、永新入湘南，加入西路军及南路军作战地境向共军进行猛追。”薛随即下达如下部署：（1）第三十六军周浑元部由兴国取道上犹入湘南资兴，一部由遂川经酃县，再集结粤汉路南段之郴县附近。（2）第四军吴奇伟部由古龙岗取道奉和、永新入湘南之茶陵后，再集结衡阳待命。（3）第五军（军长由薛岳兼）直辖的第九十九师，由兴国附近取道赣州，经上犹沿第三十六军路线，进入湖南之资兴后，再向耒阳、衡阳地区集中待命。（4）归第六路军总部直辖的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及惠济第一支队（辖第二师郑旅、第二十五师张旅等于一个加强师）由原防地取道永新、宁岗分别经茶陵、桂东、攸县至衡阳集结待命。以上中央军，均于11月15日以前先后到达衡阳、耒阳、郴县地区沿线。

2. 湘粤桂军出动情况

第六路军向西追抵粤汉线衡阳段时（粤汉铁路当时由耒阳至广东坪石段尚未敷轨），总部参谋长柳善（际明）综合湘桂各路军情况如下：

（一）何键部的西路军（以湘军第四路军为基干）原区分为

刘建绪的第一纵队，刘膺古的第二纵队，加上西路总部直辖部队约8个师，原守备赣江西岸，仅一部留湘南修碉“清剿”。其中有第十九师主力及湖南警备旅共6个团，由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率领，于是年8、9月间追击红军第六军团萧克部至黔东，业已东调回湘。何键根本没有想到红军江西主力突围，会经粤湘边入湘南而不经西路防线。当时在湘南的，只有地方团队胡风璋、欧冠等部，及在汝城、桂东间布防的第六十二师之钟光仁一个旅。当红军10月下旬向南突围到南雄附近时，何键始接南昌行营电告，他下令除留罗霖的第七十七师及地方团队归刘膺古指挥担任“清剿”外，其余主力西调。在10月下旬及11月10日以前，何部的战略部署是依湘江为天然障碍，在粤湘铁路、湘桂公路线各要点，构筑阻击堡垒线。除第六十二师先在衡阳后集中邵阳外，第六十二师、第十九师一部集中衡山、衡阳间；第十五师集中耒阳、郴州间南与粤省南路军于坪石衔接；第十六师先集柳州后调零陵（永州）；第十九师主力当时已由贵州回抵祁阳、零陵地区，使粤汉南段及衡（阳）、永（州）间形成一道封锁线，防止红军西进。各部均火速加筑工事。其余临时配属西路军指挥的第二十三师、第五十三师则均由赣西分向湘南推进中。当红军11月3日开始进入湘南突破防守汝城之第六十二师钟光仁旅防线时，全湘震动。何键来往于萍乡、长沙、衡阳、宝庆间布防，深怕湖南地盘难保，非常焦急。（1945年秋，何任军委抚恤总监到南昌青云谱慰问第九战区复员军官时，亲和我谈过这段事情。）

（二）陈济棠的南路军（原系西南政府第一集团军）实力近50个团，区分3个军、4个独立师、1个教导师、2个独立旅及1个警备旅和几个独立团。参加第五次“围剿”时原区分余汉谋第一军为第一纵队，李扬敬第三军为第二纵队，守备赣南、闽西地区。当红军西征首先突破信丰、南雄防线时，陈济棠除留第三军李扬敬及独一师黄任寰、独二师张瑞贵守粤东北门户防共防蒋进入外，其余全部主力，以第一军余汉谋主力尾追，以第二军张达

部（前军长香翰屏）及独立三师李汉魂、独四师邓龙光、教导师缪培南、独二旅陈章、警卫旅陈汉光等布置于曲江、南雄、仁化间和曲江、坪石间防堵。陈济棠本人设行营于曲江坐镇。10月底陈将余汉谋指挥下的第二师叶肇部、独二旅陈章部及独三师归李汉魂指挥，编成一个纵队，布置于乐昌、仁化及湖南汝城间，与西路军联系，利用原有碉堡守护粤北门户。这个纵队于11月11日在延寿九峰（乐昌境内）地区与红军第一军团林彪部、红九军团罗炳辉部后卫遭遇，于延寿、靶子场、珊瑚岗地区激战一昼夜，伤亡千余人，红军也有很大伤亡。陈济棠为安定广东人心，曾以此役向各方告捷，说是毙伤红军五千，俘八千余。后来红军通过粤汉线进入湘南，一部南下粤边连县、星子时，陈济棠令邓龙光堵击，当时粤军情况是慌乱的。但南路兵力却相当雄厚，其留粤闽边的兵力，陈仍在继续西调，增援粤北。

（三）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原西南政府第四集团军）共有两个军：第七军廖磊部，辖第十九师周祖晃、第二十四师覃联芳，曾于是年8、9月间，追红军第六军团西进至贵川黔东，10月开始调回桂林附近；第十五军白崇禧部（夏威代军长），辖第四十三师黄镇国、第四十四师王赞斌、第四十五师韦云淞，11月上旬以来，利用地方民团，沿湘江修碉，布防于桂北恭城、贺县、富川、灌阳、全州间。由于地瘠、民穷、兵单（桂军共有16个团，只是粤军的1/3），防线过广，当时捉襟见肘，恐慌万状。其第四十四师王赞斌部原调在赣南、安远、寻乌间归陈济棠指挥，已于10月以前调回广西沿湘江布防。在全部桂军中，以这个师对红军作战有些经验。

从以上情况总计，参加这次追堵于湘粤边、湘桂边的兵力，中央军9个师、湘军7个师加1旅、桂军5个师、粤军在粤湘边的约8个师加1个独立旅，合为30个师，按番号有30万人左右。（中央军缺员较多。但桂北、粤北、湘南的地方团队几万人尚不计在内。）

3. 衡阳策定军事计划

薛岳于11月16日左右抵衡阳，会见新发表的顶头上司（“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后，遵照蒋介石指示，先后分别召集各军军长刘建绪、吴奇伟、周浑元、李云杰、李韞珩等及各路军参谋长柳善等会商“追剿”计划并面授机宜。何键又派刘建绪为代表至广西全州，与广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军长廖磊、夏威等，遵照南昌行营决策，协商、布置湘江堵截计划。何键在衡阳督战时，曾分电各军，勉各将士立奇功，悬赏缉拿红军首领，甚至规定：“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10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另增赏5万元。”薛岳与何键在衡阳策定的军事计划要点为下。

（一）敌情判断

据南昌行营及南路军战报与沿途作战所得资料估计，红军西进番号有一、三、五、八、九等5个军团由朱德、毛泽东亲自率领；正规红军与地方部队、民伕等通过余汉谋防线时，人数当在10万以上。惟沿途被截迫于粤、赣边及粤、湘边损耗很大。据湘南民团指挥胡凤璋及汝城县陶县长报告：红军通过文明司时，实有人数约六七万人（内民伕很多）。薛岳向何键提出对红军战力估计：红一军团林彪部系朱、毛起家的嫡系部队，1927年冬至1929年，曾在湘、赣边活动过，战力最强，善于机动与突击，所辖第一、二两师曾在延寿与粤军李汉魂部发生遭遇战，颇有伤亡。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湖北人，当时年未及三十。红三军团彭德怀部（辖第四、五、六师）非嫡系红军，一九二八年彭在湘军充团长，干平江起义，所部在湘、赣边扩充后，在江西、福建方面作战也尚能打硬仗；据说该军团有不少湘军旧官兵，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在红军中仅次于红一军团；彭出身湖南讲武堂，作战骁勇沉着。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所辖第十三师、三十四师，在江西作战时期表现有顽强的防御力；该军团多北方各省士兵，董振堂原

是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旅长，后在宁都起义；该军成分不纯，突围以来一向打后卫；如发现此番号应加以猛击。红八军团军团长不详，在江西“围剿”时没有发现此番号，当然是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会强；突围几次出现在侧翼，可能是牵制掩护军团。红九军团罗炳辉部，罗为云南人，出身云南讲武堂，原在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当过营长，1928—1929年间在江西吉安率民团起义；该军团有不少滇籍官兵，军团编成历史几度变动；当在江西时，该军团有一定机动能力，比诸红一、三军团较差，突围以来多任侧翼掩护。查红军总部及共产党中央确随红一军团之后行动，据在文明司向“追剿”军投降的自称红军某团团长谢×自述，已完全证实不误。（谢系黄埔一期毕业，湖南汝城人，我在抗战后期于文明司里田见过其人，谈过其事。当地民众知之颇详。）据飞机侦察，红军行军迟缓，远非江西时期可比。

薛岳综合红军的行动作下列判断：“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技可能性大。为此，“追剿”军按照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加以追堵是刻不容缓的措施。”

（二）追堵作战方针

关于利用湘江地障进行追堵方针（薛岳、柳善在战后曾对我谈过，现在只能记起主要内容）：共军西窜，沿萧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迤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

基于以上方针，由何、薛决定“追剿”军作战要领：如红军全力渡湘江西上，即照原定方针，湘江沿岸堵击兵团，协同地方军队进行堵截，迟滞红军行动，使尾追部队进行“追歼”；如红军在

道县附近向南进入桂境贺（川）富（县）地区时，追击兵团进行穷追，配合富川堵击的地方军队共同行动；如红军不经道县由宁远北经零陵，向东安西北进洪江，企图与湘西萧（克）、贺（龙）会合，即将原堵击兵团与机动兵团，进行东西截击。

（三）作战序列

“追剿”军总司令何键；

前敌总指挥兼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

第一纵队指挥官（原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辖第十六师章亮基、第十九师李觉、第六十二师陶广、第六十三师陈光中（原辖的第十五师拨第四纵队指挥）；

第二纵队指挥官（原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辖第五十九师韩汉英、第九十师欧震；

第三纵队指挥官（原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辖第五师谢溥福、第九十六师萧致平、第十三师万耀煌；

第四纵队指挥官（原第二十七军军长）李云杰，辖第二十三师李云杰、第十五师王东原；

第五纵队指挥官（原第十六军军长）李韞珩辖第五十三师李韞珩；

机动纵队指挥官由第六路总指挥薛岳自兼，直辖第九十二师梁华盛、第九十三师唐云山及第五军第九十九师郭思演、第一支队惠济（该支队12月中旬追抵湖南芷江时，脱离薛岳的指挥）。

（四）作战任务与部署

（1）第一纵队先行入桂，限10月25日以前到达全州，沿湘江布防，北自觉山、朱蓝铺，南至永安关与广西第十五军切取联系。

（2）第三纵队经桂阳、新田直趋宁远，跟踪红军追击，并先占领道县固守，阻止红军南移压迫其向西行，予以追击。

（3）第四纵队先于宜章、嘉禾地区“清剿”，利用该部官兵人事地形熟悉，跟踪进占宁远，阻击红军向零陵北进；如发现红

军有久据湘南企图，即发动地方团队进行围攻（该纵队第二十三师多嘉禾人）。

（4）第五纵队经宜章、临武与南路粤军李汉魂纵队联系，利用该部官兵熟悉地形便利（该部多是湖南宁远人），并指挥地方民团对蓝山、江华进行截击，并确保第三纵队左翼安全，打破红军南下企图。如发现红军有久据湖南企图，即组织团队进行围攻；如红军继续西上，即行追击。

（5）前敌总部率领之第二及机动两纵队为机动兵团（一般称薛岳率领5个师1个支队，即指此两纵队），沿湘桂公路经祁阳、零陵向黄沙河前进，策应追堵各纵队之作战，主要防红军北上。

作战经过纪要

国民党军自11月17日起，依蒋介石指示，全线急行跟踪红军，进行追击与布置堵击。何键、薛岳在空军指挥官毛邦初帮助下，一面散发告红军官兵书，进行利诱；一面每日派飞机轮番侦察轰炸（据陆大同学刘牧群说，他任空军队长时，参加湘南追击战的飞机是两个中队，飞机是30余架）。同时分电转达国民党中常会慰劳前方将士的电文，“迅予追歼，以竟全功”。薛岳并接粤省南路军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等师长（老第四军同事）来电，表示粤湘边大军云集，愿以全力相助。

（一）湘南方面的追击

在湘南的追击，没有大的战役，只有在嘉禾之仙人桥，宁远之天堂、洪观、蒋家岭、水车等地及道县城发生十余次小战斗，但给予红军特别是辎重与后卫部队造成的损失却很大。

四纵队李云杰指挥第二十三师和配属的十五师11月19日追至嘉禾（李云杰的故乡），当时地方团队指挥官欧冠全力协助李部在仙人桥附近与红军遭遇，随即进抵宁远（李韞珩的故乡）洪观

附近及宁远城南万石山与红军后卫发生战斗。

第三纵队周浑元指挥第五、十三、九十六等三个师，由资兴、郴县、宜章、桂阳、新田、宁远分途尾追，没有大接触，直至20日进抵宁远梧溪洞、天堂附近与红军第一、三军团接触，互有伤亡。周浑元在红军南撤之后，即向薛岳、何键告捷。薛岳向蒋介石虚报周纵队协助李纵队在天堂“歼敌逾千”，吹嘘中央军入湘所向无敌。周纵队24日经蒋家岭，25日渡潇水，由白马进占道县，即在城郊附近为红军牵制，无法西进，但对红军西南行动也增加阻力。据周浑元电告薛岳，红军主力26日后均西去，判断红军强渡湘江公算最大。（后来在水车俘红五军团军官供称，27日以后，红军先头已强渡湘江。）

第五纵队李韫珩部先于21日由临武向蓝山、江华尾追红军第八、九军团，仅有小接触。由于红军经过嘉禾、宁远只是假道，蒋介石想利用湖南二李（李云杰、李韫珩）的子弟兵打红军的企图没有得逞。李纵队随即向下灌前进与粤纵队李汉魂部（只带第二、独三两师，其独二旅陈章部在延寿损失过大，已撤下乐昌整理），分别由临武经连县之星子，取道蓝山、大桥向江华前进，仍只有小接触，没有大战斗。

当周浑元部到道县时，红军第一、三、八、九各军团在道县附近进行游击，一部在寿佛寺，一部在王母桥，一部在永明，似有入桂模样；其后卫红五军团在把戏河牵制李云杰部，向西南前进。此时，蒋介石发来有（25日）电，以“追剿”军主力偏在西北，须防红军进入桂境富（川）贺（县）；而薛岳接电后，则建议何键及蒋介石，仍照原计划行动，认为红军在道县、永明附近之行动是佯动，旨在引诱“追剿”军南进，放松对湘江堵截措施，并电告周浑元排除红军侧翼及后卫牵制，“力求压迫其主力决战于湘江，进入我天炉阵（即利用湘江地障，进行前堵后追左右截击之意）而击破之”。29日红军先头一、三军团神速地到达湘江附近的文市、永安关与夏威军接触，并在全州、觉山附近与刘建绪纵

队接触。周浑元、李云杰、李韞珩等部跟踪追击，在龙虎关、永安关以东水车附近，将红五军团后卫击破，尾追至湘江附近。

以上是薛部各军包括粤纵队追击红军半个月来的主要战况。

（二）全州觉山的堵击

在全州担任截堵任务的第一纵队刘建绪部（何键的基本部队）原配属第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4个师，因集结时间限制太急只有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由宝庆抵达全州，章亮基的第十六师由郴州抵达全州，分别于11月25日布防湘江觉山、朱蓝铺之线，而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尚在零陵至全州黄沙河途中，未及赶到。关于全州防务，刘建绪事先于24日（或25日）虽与白崇禧协商堵击计划。（据薛岳对我说，恐怕中央军到广西地区布防，会引起李、白误会，行营才决定由刘纵队开至全州。）由于部队到迟，除利用桂军及民团原修的碉堡外（追堵红六军团时的旧碉），新碉与其他野战工事均未完成。在27日下午有点情况，28日，就在全州、兴安间的勾牌山、沙子岭迄西延湾，发现红军企图偷渡。第十六师章亮基部，在觉山附近之下坡田与红军先行接触，由28日夜打至29日夜。在朱蓝铺、白沙铺的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也与红军发生接触，来电告急。当时刘建绪惊慌失措，以为红军如渡过湘江，湘军责任重大，随即令陶广的六十二师由黄沙河兼程赶往增援，并令由零陵开全州途中的李觉第十九师火速前来。何键得报，立由衡阳派飞机十余架轮番助战；蒋介石电派毛邦初在空中督战。薛岳所直辖的第二纵队吴奇伟部，先头已由祁阳、零陵向全州、黄沙河、庙头急行，希能及时加入堵截战斗。

湘江战斗也称全州战斗，在觉山打了两昼夜，向红军打冲锋十余次。这时红一军团掩护主力突围强渡湘江，章、陈两师利用地形压迫红一军团于猗子江口，依山对峙。是役战斗颇为惨烈，双方伤亡颇大，为红军长征中被堵截战斗较猛较长的一次。1936年据曾任湘军原十六师师长的彭位仁（在中央军校高教班和我同过学，被何键撤职）对我说：当时觉山战斗，刘建绪报“斩获数

千”，红军突破湘江，蒋介石不但未追究刘的罪责，且由南昌行营通令嘉奖；后来蒋介石收买刘建绪，蒋、刘直接发生了关系，由刘接替何键的第四路军总指挥职，夺取了何的军权。

（三）灌阳新圩战役

湘江追堵计划中，蒋介石决定全州附近地段归何键主力部队防守，灌阳以北四关（永安、清水、龙虎）则由桂军防守。这些地区如全州的灌阳、湘江西岸渡河点，曾派民团修过碉堡。在恭城、灌阳、兴安间采取坚壁清野的措施；惟兵少防宽自11月下旬红八、九军团在湘南江华、永明向富（川）贺（县）边活动后，桂军第十五军（其第七军一部留桂林外围不能调动）各师的布防举棋不定。事后薛岳常说：当时桂军如惊弓之鸟一样，一面既要防富川红军南下，一面又要防红军西上，同时对中央军又不放心。结果他们为了保全实力，除留韦云淞（第四十五师）防堵富（川）贺（县）红军外，将主力撤开湘江正面，只留少数部队监视，只在灌阳、兴安打机动战。

当红军不入富贺地区，于26日渡过潇水，向西进迫灌阳北西关入文市及全州的丙谷、石塘，从界首地区渡江时，桂军竟未与湘军刘建绪联系，将第十五军之第四十三、四十四两师及第七军之第二十四师均撤至灌阳北苏江、新圩、咸水之线，实行侧击，拒止红军南进。11月29日左右红军主力由界首附近通过湘江后，桂军于灌阳、新圩附近对红三军团及红八、九军团之一部作侧面疯狂的阻击，战斗达三昼夜，双方均有很大伤亡，红军方面尤甚。嗣后红军自动停攻，全部向西延（今资源）地区西进时，桂军惊魂始定，派部尾追；一面收容红军落后士兵作为俘虏告捷，一面派地方民团沿红军经过道路烧房子，诬蔑红军“杀人放火”。

在12月上旬，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前，桂方大肆宣传“广西十万民团获有七千俘虏”，并宣称桂军在湘江击败红军第三、八、九共三个军团，湘军打败红一军团，中央军只击败后卫红五军团，借以压低别人，夸耀自己。薛岳对此大为吃醋，曾向蒋介石

石、陈诚揭露过李、白的真相。（薛岳前于1930年至1932年投桂系时，与白崇禧关系一向很坏。）

（四）对红军的危害

湘江战役，从红军11月13日西进，越过粤汉铁路南段，进入湘南开始，迄12月2日全部渡过湘江，继续西征止，共20天，若从离开江西瑞金算起，计时已50天。在这段时间，红军的损失是比较严重的。红军长征向西突围时，兵力逾十万（确数不详），但经过湘江战役后，据广西第四集团军桂林行营电告第六路总指挥部说，红军通过广西境内的不足4万人，其中第五、第八两军团是溃不成军，红一、三、九军团损失也很大，估计达6万人以上。当然主要是长途跋涉的损耗，尤以后勤辎重部队散失最多；其次是战场损耗，特别是在湖南及湘江战役的伤亡。下面回忆一些事例。

（1）在战场上粤军（南路军）第一军、第二军在江西信丰、安远间和大庾、南雄间给红三、五军团；在湖南汝城与广东仁化、乐昌间特别是在延寿、九峰地区，给红一、九军团的危害很大。据李汉魂、陈章后来对我说：红军在此地区散失与落伍，被粤军所收容的达万余人。据叶肇后来说，当时粤军对俘获红军士兵予以资遣或补充，对红军军官，一般都采取秘密处决，照蒋介石规定送感化院的甚少。后来有些红军在粤、湘、赣边被截击掉队、散在边区打游击的，有好几支部队数以千计。湘军陶广师、王东原师在汝城、宜章和粤汉南段对红军有些危害。薛岳部周浑元军，湘军李云杰、李韞珩各军在嘉禾、蓝山、宁远、道县地区，特别在宁远天堂附近、道县附近，对红军各军团的袭击，危害后勤部队很大。周浑元、李云杰两纵队在追击途中，在道县以西水车附近及桂境杨家河、永安关附近，沿湘江边与湘军陈光中部合力袭击红五军团主力；红五军团本为后卫，并在侧翼掩护红八军团，此役几乎损失过半。湘军刘建绪军主力在觉山、朱蓝铺（全州附近）和红一军团打了两天，危害也很大。何键当时是以夸

耀觉山大捷来掩盖湘军对湘江封锁不力的败绩。桂军在灌阳北四关只有小战斗，后来在灌阳、新圩附近，与红三军团打了2、3天，给该军团危害也很严重（具体数日不详）。

（2）红军渡过湘江后，何键在湘南成立湖南善后处，划郴县、宜章、汝城、临武、桂阳、新田、宁远、嘉禾、江华、蓝山、永明、道县等县为特别区，将各地收容被俘的红军士兵一律集中，然后分别资遣或“感化”，据说达数千人。同时该特区也将收容的中央军落伍兵2、3千人加以处理；并在红军通过与作战期间，对所谓有赤化嫌疑的民众，一律加以清查迫害。1944年欧冠在湖南任行政专员，我带领新编第二十师追日寇过宁远时，据欧的部属王自强（曾随李韫珩任过团长）对我介绍，欧在湘南杀共产党人难以数计，尤其在湘南农民暴动及红军突围时期，比胡凤璋还凶。

（3）在湘粤边、湘桂边追击红军由于是中央军第六路军与湘军第四路军联合作战，薛岳所带9个师总的方面要受何键指挥，按作战序列薛也可指挥湘军的第四路军。但第四路军各军师也不买帐。在粤、桂军陈济棠、李宗仁方面，虽是联合作战，尽管有多方面电报联系，但各怀鬼胎，通力合作却不可能。中央军与地方军反共本质虽一样，但对红军作战方针不同。粤、湘、桂军只要红军在粤、湘、桂不是久留创立根据地的话，也可送送迎迎，而中央军薛部没有境域观念，任何时候都要死拚，否则就有被撤职查办的危险。此役薛岳所带的部队，除周浑元3个师加入战斗外，他亲率的两个纵队几个师作为机动兵团，在战役中未打过仗；天天跑路，落伍遍地（按该路军在赣湘地境落伍、伤病官兵事后调查共9千余人），疲于奔命。但薛岳名利心非常强，看到粤军在延寿之役，桂军在灌阳、新圩之役，湘军在全州、觉山之役的告捷，分别受到蒋介石嘉奖时，就要吃醋，说别人“车大炮”（粤语吹牛之意）；特别是周纵队在宁远、道县及湘江东岸追击获有战果（危害红五军团）未受嘉奖，他很怪何键偏心，有些愤怒。

他说：“湘、桂军不是我们中央军监视压迫他们，一仗也不会打呀。”

总的说来，红军在这次战役中，虽是损失很大，最后终于渡过湘江，突破层层封锁线，开辟了新战场。

黔川滇边追堵的挫败

黔北赤水的追堵计划及黔、川、滇边的追堵计划也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但这一战役不问粤、桂、湘军与中央军联合作战时，薛岳被制于何键之下的情况。这次薛岳名义上虽受制于龙云（第二路军总司令），实际上却是薛岳独当一面，指挥作战。川、黔、滇三省参加这一战役的军队也都买薛岳的帐。但红军这一战役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一反湘江的被动情况；结果在毛泽东战略运用下，薛岳处处被动，他的追堵计划不但破产，而且损兵折将，在土城、娄山关与遵义、乌江间遭到惨败。

由湘桂边境长追入黔

1934年12月2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即经西延、龙胜边沿山岳地区北进。蒋介石唯恐红军再度回湘与贺龙部会师，急忙命令薛岳布置堵截。

当时，桂军李宗仁侦悉红军无久留广西企图，只派不足两个师的兵力在越城岭大苗山下监视了事。后来在蒋介石一再电催下，李宗仁才派廖磊带周、覃两个师，再度入贵州边境。（据李汉魂谈，当时，广东也要求派兵入贵州，但蒋介石却婉言劝阻。）

“追剿”军总部何键不愿将全力交给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怕第四路军所辖的第一、第四、第五等3个纵队调交给薛岳指挥，离开湘境，脱离自己指挥，影响自己的实力，对他统治湖南不利。因此，便与薛岳协商，将“追剿”军分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率第一、四、五纵队原湘军各师沿新宁、城

步、绥宁、靖县进行堵击；以薛岳为第二兵团，直辖的两个纵队不入桂境，由黄沙河、庙头取道东安、武冈、洪江、芷江等地，堵拦红军北上，其所率的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则进入桂境，在湘军之后向红军尾追。何键的总部虽由衡阳移至宝庆（今邵阳市）“督剿”实际上看到红军西征，额手称庆，喜在心头。当时何键隐忧的事情却是红二军团自与萧克的红六军团汇合后，声势逐渐扩大，在湘西的桑植、大庸步步发展。在江西红军主力渡湘江时，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乘湘军全力调往湘南时，就东下包围常德、桃源，威胁岳阳、长沙。当时何键无兵可调，蒋介石才由湘鄂边调来湘西绥宁布防的第四十三军郭汝栋部（主要辖第二十六师）往援。逾12月13日（或14日）红军由通道转入贵州黎平地境时，何键怕自己嫡系入黔脱离自己指挥，一再电请蒋介石将第十九师李觉部、第十六师章亮基部、第六十二师陶广部调至湘西沅陵集结，布置进攻红二、六军团；其余湘军第十五、六十三、二十三、五十三等4个师由刘建绪率领跟踪追击。薛岳所率各纵队约在12月22日左右，先头已进抵贵州玉屏附近，进行堵截。

当红军经湖南通道转入贵州黎平时，如入无人之境，除侧卫、后卫红五、九军团被湘军王东原、陈光中尾追稍有战斗外，红军主力经锦屏、剑河、台江进抵黔东重镇镇远。薛岳统率的中央军先头第九十二师梁华盛部，只在镇远西镇雄关与红军后卫第五军团打了几小时，以后沿途主力均未有接触。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率部于12月底抵重安江，并与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前敌指挥犹国才、师长何知重等取得联络。这时红军已经黄平、余庆扫荡黔军的少数阻截部队，进抵乌江南岸，全黔震动。刘建绪率部尾追，经锦屏于是年年底到达镇远。周浑元率部经三穗施洞口到黄平附近，沿途没有战斗。但当时中央军入黔的8个师（惠济支队所辖张耀明、郑洞国两个旅已他调归建）及湘军的4个师疲惫万分；时值严冬，衣履不全，官兵情绪很坏。他们认为战场未被打死，却在路上拖死，惟在薛岳督催之

下，有无可奈何之感。

中央军抵黔后，据所了解的黔军第二十五军共有5个师。在红军抵黔境前，军长王家烈奉蒋介石电令率部在黔东布置堵击后（当时王家烈与犹国才已和好），一面令各县修碉堡、藏粮食，一面委副军长犹国才为前敌指挥，并调犹部所辖的独立第一师主力东开参战；另委第一师师长何知重为前敌副指挥，指挥第一师、第二师（柏辉章）进出黔东。当红军先头部队12月18日抵黎平、剑河附近时，黔军周芳仁旅虽进行抵抗，但一触即行避开。当红军进抵黔东镇远、施秉、黄平、瓮安之线时，黔军李成章、杜肇华、简文波、犹禹九、皮德沛各旅均有接触，但无招架之力。黔军虽称二十五六个人，但编制复杂，装备不良，训练很差（官兵有吃鸦片烟的）。由于红军西征引起中央军入黔，当时黔军军心很乱；尤以军内各师人事背景不一，各成实力体系。王家烈所能掌握的只一、二两个师较有战力，其余各部战斗力却薄弱。这些情况早为薛岳所洞悉。1935年1月4日王家烈在马场坪迎接薛岳，讨论追截计划时，薛竟居傲无礼，因如何对付地方军阀问题，他已心中有数。至于黔军第三师（蒋在珍）及教导师（侯之担）则一向为王家烈留置在乌江北岸，自行割据，王并委侯之担任后备指挥，扼守遵义。因此，守乌江的任务，便落在侯的身上。侯部号称两旅，实力不足四个团，由第一旅旅长林秀生、第三旅旅长刘翰吾率领，并指挥沿江各县地方团防守沿江茶山关、羊岩关、孙家渡、老渡口、江界河、袁家渡、梁家渡、岩门、回龙司各渡口。（后来便另调川南边防部队两个团增防，王家烈另拨驻湄潭的万式炯团受其指挥，守乌江部队共凑成六个多团。）

虽然乌江天险（主要是两岸多崖壁，江宽急流）易守难攻，但红军进展很快，在1月3、4日左右，中央军薛岳部先头甫抵贵阳附近时，红军就在江界河、茶山关等渡口突破了乌江；薛岳率中央军抵贵阳之日（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蒋介石来电令薛岳转命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归入第六路军战斗序列，迅速

布置与周浑元纵队合力衔尾紧追。蒋介石另电何键要刘建绪所率湘军各师，由镇远进占石阡、印江继续北进，与鄂军徐源泉部派驻彭水部队联系，构成黔东北阻截线，防止中央红军东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以上是薛岳追抵贵阳后，尚未布置黔北追堵计划以前的双方的战略态势。

薛岳到达贵州的措施

薛岳1月7日抵贵阳后，名义上仍受“追剿”总司令何键遥控，但薛岳除向何通报一些情况外，一切重要军务俱向蒋介石请示。1月间薛在贵阳以第六路军总指挥名义发号施令，他依蒋介石授予的两重任务，一面“追剿”，一面使地方军政“中央”化，迨2月2日蒋介石悉红军有入川、滇企图后，为调度便利，特任云南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以薛岳任该路军前敌总指挥受龙云节制。当时薛岳认为一再受地方军阀节制，心中又感不满。2月21日蒋介石撤销何键的“追剿”总司令名义，改任何为“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同时撤销第六路军总部，升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薛岳乃心满意足，认为贵州全省军权在握，名正言顺，企图趁机夺取王家烈的军队与贵州省政大权。薛岳在贵阳，首先派方学芬、王光海、余华沐等一批广东亲信，调查王家烈在政治方面统治贵州几年来的反蒋行动，如策划过粤、桂、黔三省互保，黔湘两省互保，黔滇两省互保的种种勾搭证据，及广西的代表张蕴良、简孟平等，湖南代表路邦道，云南代表马子良，广东西南政府的代表等到贵阳的活动情况，并将全部材料向蒋介石报告。记得当时南京并派有特派员李仲公来黔，薛岳深知李乃何应钦党羽，又在贵州有些声望，怕李明假“中央”名义，表示关怀桑梓，暗中为何应钦拉拢黔军，搞政治资本，因此也派人侦察李的行动。（薛岳在陈诚就任蒋介石宣

昌行轅参谋长时，曾电报陈诚，注意这件事。)同时薛岳又令秘书长王光海到处搜集王家烈在贵州所施行的苛捐杂税的名目和贪赃枉法的事实，向蒋介石报告。

在军队方面，薛岳派其基本部队第四军第五十九师副师长沈久成（贵州遵义人，在第四军多年，颇为薛岳所信任；沈出身贵州讲武堂，是何应钦任该堂堂长时的学生）调查黔军将校中，在何应钦所办讲武堂出身的有多少人，有无与何联系；其他方面出身各占多少人；并调查贵州军队的派系斗争，除第一、二两师何知重、柏辉章是王的基本部队外，其余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各师旅与王不和睦的原因，以便进行收买利用（这些话是沈久成对我说的）。因此，后来侯之担失守乌江又在土城打败仗时，薛岳就进行吞并这个部队，特向蒋介石保沈久成接任该师师长。薛也曾想利用犹国才来代理王的指挥；对王的基本部队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十分客气，函电交驰，表示信任，以促其倾向中央。总之，处处迫王家烈下台，使贵州政治军事统一于南京，结束割据局面，是薛岳入黔后向蒋介石示忠献媚的重要措施。

在反共方面，薛岳抵黔即以封疆大吏自居。1月7日抵贵阳，他对贵阳欢迎人员当场发表讲话说：共军为国家民族公敌，现强渡过乌江，我们决心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将其消灭，以拯我黔父老于水火之中。1月下旬，他指挥黔军一部在黔北打了败仗，为了掩饰却在贵阳召开所谓军民联欢会，仿效1934年春他在江西古龙岗组织党政联席会议的故技，遍发通电申述“安内期可攘外，剿共所以救民”的话，并通过几项措施，来显示蒋系势力抵黔后的“新猷”：一是通电“拥护中央”；一是电慰全国“剿共”将士；一是呈请惩办“剿共”作战不力的军政人员。这是薛岳想假借民意来整饬军纪、扩张势力吞并杂牌军的诡计。

2月间，薛岳从周浑元部俘获的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政委田丰所写的材料中了解到遵义会议的情况：“共军内部在遵义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击国

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毛泽东的井冈派胜利，但内部分裂，军心不稳”等语。薛岳得悉后如获至宝，亲召田丰到贵阳面谈，并予奖赏；一面上报蒋介石，一面通令各部知道（全文颇长，并附供词一纸，内容记不清楚）。田丰所谈长征以来许多问题，特别是红军各军团的战斗力，将领作风，派系与共产党中央当时的决策等情况，后来成为薛岳研究对策的重要资料。据薛岳后来对我说，1935年3月上旬，蒋介石抵重庆时曾有亲笔函给他，说“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薛岳对毛泽东用兵，一向有所顾忌）。

追堵前的双方情况

1935年1月7日迄19日，红军占领黔北遵义、桐梓进迫川边时，蒋介石一面令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令川军刘湘抽调兵力布防川南堵截；一面令滇军龙云抽调兵力由滇东进入黔西，归薛岳指挥布防堵截，并令黔军王家烈归薛岳指挥、配合中央军入黔各军进行追击。同时蒋又发表刘建绪为第一路军的前敌总指挥，率部布防封锁；发表徐源泉为鄂、湘、川边总司令，派兵进占秀山、彭水，在川、鄂边布防封锁；飞调第一路总指挥上官云相率第九军由豫西兼程赶往川南为预备队。这是蒋在红军占领遵义、桐梓整补期间总的决策。兹将当时参加追堵兵力情况说明如下：

（一）中央军第四、五两军原编成的两个纵队，所辖第五十九、九十、九十二、九十三、九十九等5个师（师长都是广东人），因沿途疲惫、兵员不足，薛岳以机动部队为名，令各师均在贵阳及清镇附近地区整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纵队所辖3个师，当时跟踪于1月下旬由贵阳经扎佐西进入黔西、大定（今大方）。该纵队兵员不足，官兵也疲不堪言。

（二）黔军在红军1月19日退出遵义后，第一、二两师及犹

国才所辖第二师吴剑平部主力，即先后进入遵义。第三师蒋在珍部已经湄潭、绥阳到达桐梓附近。教导师侯之担部放弃遵义、桐梓，狼狈退回习水（原名东皇）、土城、赤水原防，企图与川军联防，扼守川黔门户（侯原任川南边防司令兼师长，盘据川黔边叙、古、赤、习等县为巢穴多年）。当时川黔边境江津、綦江、南川、合江、桐梓、习水等6个县进行联防，军队与民团是合作对付红军的。王家烈向薛岳表示愿到前线去指挥，也于1月下旬到达遵义。黔军虽编制装备较差，但作战时间较短，兵员尚相当充足。

（三）滇军第十路军龙云部没有军师的编制，云南全省只有6个旅1个警卫团，第一旅旅长刘正富，第二旅安恩溥，第三旅龙雨苍，第五旅鲁道源，第七旅龚顺璧，第九旅张冲，加上卢潘泉1个警卫团共13个团，比贵州军队少一半。但滇军兵精粮足，人员充实，龙云对内统驭比较巩固，远非王家烈内部可比。滇军于1月中旬就成立总指挥行营，由参谋长孙渡任行营主任，先行统率第二、五、七等3个旅入黔西，其余各旅陆续开至滇黔边布防。据孙渡后来对我谈及，这次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结果。

（四）川军部队系统复杂，1933年为了围攻川北红四方面军，蒋介石委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统一指挥第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等5个军及李家钰、罗泽洲的两个师，分为6路进犯川北苏区，被打得焦头烂额。当中央红军主力入黔北迫近川南刘湘的防区时，刘着了慌，在1月上旬与重庆参谋团研究后，才匆匆组织川南“剿匪”总指挥部。第二十一军所辖第一师（唐式遵）第二师（王缙绪）第三师（王陵基）均用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撤不下来，其余个别师尚在川东守地盘，刘湘乃将该军教导师、模范师、第五师的主力及三个独立旅，两个边防路司令（旅），全部集中川南，以潘文华任总指挥统一指挥，堵截红军入川。川南部队不归薛岳指挥序列，据当时刘湘

及贺国光给薛岳的战报，计有郭勋祺、廖泽、范子英、魏楷、穆肃中、潘佐、袁筱如、田冠五、章安平、达凤岗、刘兆藜、蒋尚朴等约10个旅、两个路司令，加上地方团队，约达30余团（具体番号不详）。分为若干路，布置于綦江、江津、南川、合江、泸州、叙永、赤水、松坎等川黔边界，与黔军蒋在珍、侯之担等部取得联系。

总计以上兵力，除湘、鄂军在川湘边布置战略封锁线的部队及归薛岳直接控制于贵阳的机动预备队约10个师兵力不计外，实际参加在黔北追截堵击红军的兵力大约15万人以上。这对红军来说，兵力是多出5倍的绝对优势。就地形言，川、滇、黔边，南有乌江，北有长江，西有横江、金沙江重重地障，比在湘江战役的困难减轻有限。蒋介石后来亲到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督剿”，就是以统一西南，消灭长征红军的一箭双雕作为总策略的。

当红军由遵义、桐梓西征开始后，薛岳据王家烈、周浑元等前线指挥官报告，红军全部兵力加上在遵义征募的新兵合计约有3万余人（征募的新兵据说吃不了苦、逃回者不少），弹药、装备颇差。当时估计中央红军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通过赤水趁刘湘的兵力尚未集结之前情况下，由赤水直趋长江边，从泸州、叙永地区，渡过长江，另辟川西南战场，策应川北红军，或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主力会师；一是仍渡赤水仍向川滇边穿越大凉山西上，绕通滇北经西康问道入松（潘）、懋（功），支援红四方面军，背靠康藏建立根据地，赤化西川，然后进图西北；一是进入川康不易，入滇另辟战场，而多民族地区也不易发展，最后仍是回转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东与红军贺龙、萧克部会合，此策就红军言虽可暂安于一时，但出路不大。据1月中旬薛岳、龙云、陈诚、刘湘来往电文所述：龙云认为红军多江西客籍，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地方民情；云南民情较悍且有组织，地接边陲，想在此生根不易；此次如入滇，过路是上策，想久据是下策。刘湘认为红军必入川与张、徐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公算最大；因朱德、刘

伯承、聂荣臻是四川人，对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过去在泸州很熟，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湘，如要与贺龙合股就不会入贵州。薛岳认为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在贵州久据公算小；如再东下回湘，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贵州不比江西，遍地穷山恶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久据不易。陈诚则认为红军图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回湘与贺龙会合，在战略上是必然的腹案；就目前言，川滇地接边陲，蒋介石早有决策不足为虑，最应注意者是东行，因东行与贺、萧会合，“追剿”比较困难，影响也较大（长追途中，防备红军东返湖南，是蒋介石心目中最重要 的布置，这对直接威胁其中枢有关）。

追堵的部署与决策

1月19日，红军放弃遵义、桐梓西征后，薛岳于21日以第六路军总指挥名义，令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到遵义指挥，协同周浑元进行追截；令第十路军行营主任孙渡率由滇入黔各旅迅速开毕节、大定集中布置堵击；并电告重庆军委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及川军总司令刘湘转令潘文华指挥所部，迅速进入黔边赤水截击、并在叙、古地区加以堵击。薛岳企图在赤水河以西、长江南岸、横江及金沙江以东联合作战对红军进行围歼。迨2月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将指挥系统作了调整，改归龙云节制，其序列如下：

（一）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原任第十路军总指挥名义撤销），总部暂设于昆明。

（二）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原任第六路军总指挥名义撤销），总部暂位于贵阳。

（三）第四军改为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吴奇伟为指挥官（辖第五十九、九十两师），原“追剿”军第二纵队名义撤销。

（四）第三十六军部改为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周浑元为指挥官（辖第五师、九十六师、十三师，）原“追剿”军第三纵队撤销。

(五)原驻滇第十路军行营主任孙渡所部改为第二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孙渡，暂辖第二、第五、第七等三个旅，其余各旅入黔西后，仍归该纵队指挥。

(六)原驻黔第二十五军王家烈部改为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王家烈、副指挥官犹国才，辖第一〇二师柏辉章，第一〇三师何知重，第一二一师吴剑平，第一四〇师沈成久，新编第八师蒋在珍。该军前所委派的前敌总指挥、行营主任、路司令名义一律撤销。

(七)第五军兼军长薛岳所辖的第九十二、九十三、九十九等三个师归前敌总指挥部直辖，原“追剿”军机动纵队名义撤销。

调整序列后，龙云名义上遥控，薛岳却是实际指挥人，重要决策由薛秉承蒋介石企图，发号施令。1月下旬第二路军除吴奇伟纵队在贵阳附近待命及总部直辖三个师在贵阳为预备队外，第二纵队取道扎佐、修文、黔西向大定截击。第四纵队除柏辉章部置于遵义附近、蒋在珍部在桐梓附近外，其余部队归何知重率领，分向仁怀、二郎滩、习水、赤水跟踪追击。第四纵队的教导师则在1月下旬已分别经仁怀、习水退集赤水、土城侯之担的老巢布防。第三纵队孙渡部已遵薛岳电令，在1月底或2月2日先头部队已进黔境的威宁向大定、毕节急进中。

薛岳由于自己远在贵阳，不能到前线督战，为防止王家烈纵队贻误戎机，在2月1日电令周浑元代理前敌指挥官，统一指挥第四纵队何知重指挥的部队。川军方面：当红军进抵仁怀附近时，前敌总部已得悉刘湘的第二十一军截击部队已向赤水急进；潘文华已在泸州设总部，并在叙永、古蔺地区布置堵击部队；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已派出第二十四军两个旅在金沙江上游通安州附近，沿江要点布防戒备。

黔川滇边作战经过

1935年1月下旬迄2月底(或3月5日以前)，第二路军(2

月以前系用第六路军名义)各纵队在黔西北地区(黔、川、滇边)与川军配合追堵红军先后打了3次仗。所属吴奇伟、王家烈两部在土城、娄山关、遵义附近打了败仗。只有周浑元、孙渡两部事前得到叛徒告密,有所准备,未受多大的损失。兹将各战役经过,简述如下。

(一)土城、赤水附近战役

1月22日第二路军第二、四两纵队由桐梓、遵义、黔西各地分别向西追截。第四纵队教导师侯之担部先在乌江败后放弃遵义、桐梓后即退守仁怀、习水。侯之担是黔北赤水人。在红军由遵、桐继续西征时,侯部原想窜回赤水、土城集结,当时该部残破不堪已不足3千人。红军先头部队于1月24日到达土城附近,侯之担怕死不敢应战,在溃败途中只身向川境逃亡;所部交其堂弟侯汉佑(副师长)率领刘翰吾等残部在土城抵抗了不足一天,即被击溃。红军占土城后,蒋介石分电薛岳及王家烈追究罪责,认为土城不守,红军必经赤水入川南,下令将作战不力擅自离职的侯之担缉拿归案(1月28日薛岳电蒋要求严惩作战不力将领,以申军纪)。事后侯之担逃至重庆,为参谋团查获逮捕。该师残部收容改编,由侯汉佑代理师长。后来薛岳为了扩张实力,向蒋介石保第四军五十九师副师长沈文成接任师长,改编为暂编二十五师(贵州黔军改编时,该师改为第一四〇师)。以上是第一次土城之役的经过。

第二次土城附近战役(包括古蔺、叙永战役),在1月27至2月3日进行,参战部队有川军第二十一军所辖郭勋祺、潘佐、廖泽、范子英、刘兆藜、章安平、达凤岗等旅为主力。表面上是受驻泸州的四川南路总指挥兼教导师长潘文华指挥,实际上是由兼军长刘湘亲自指挥。作战地区主要在赤水的土城、青岗坡,猿猴场、陞台、枫林坳附近。当时中央军追击部队主力尚在仁怀、习水、黔西、大定地区向西急进中。在侯之担失守土城之前几天,

刘湘认为红军进攻方向必然是赤水、古蔺，取捷经北渡长江，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重新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赤化全川；所以一面在川南长江沿岸构筑江防工事及据点，一面在泸州以南的叙永地区扼要构成封锁线，进行堵击；同时用火急电飞调进抵川黔边温水附近的郭勋祺、廖泽、潘佐各旅，向赤水追堵截击。当1月27、28两日，红三军团由土城附近向四川北进时，郭勋祺、潘佐两部尾追红军在土城东北20里的青岗坡一个狭长险隘的山地，首先与红军遭遇，打了一天之后，廖泽所部先头赶到加入堵截。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双方伤亡颇重。红军看到刘湘为了生存，全力拚命迎击，后边有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部的追截，因而停止北进，改道西行，击败章安平、刘兆藜、范子英各旅在古、叙地区的阻击（在叙永打了两天）进入云南。川军进占土城，刘湘通电告捷。此役蒋介石虽通令各军，大意说第二十一军旅长郭勋祺联合友军，在1月28日收复土城之役，激战两昼夜，率所部冲锋多次，“卒将顽敌击溃，忠勇可嘉，着晋升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以资鼓励”。郭勋祺与我是陆军大学同班同学，1940年于重庆山洞，他对我谈及赤水、土城战役，说当时刘湘深怕红军取道泸州、宜宾渡过长江，号召全军官兵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因为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司令朱德是四川人，足智多谋，地形熟悉，如入川南之后，川局当不堪设想。又谈是役该旅伤亡700余人，孤军作战一天，逐次加入战斗，集中机炮火力猛扑，当时态势很危险，不是在前线督战，几乎垮下来，后来廖泽旅加入战斗后，才稳定战局，又说有一次在夜袭中，俘虏红军第四师士兵，知道彭德怀、刘伯承曾在前线督战，红军缺粮缺衣，缺乏弹药。因此，郭勋祺判断红军在追截大军云集下不会久战，果然次晨红军向西撤退。他说如果当时川军被打垮，红军一定向泸州渡江，就不会后来渡金沙江、大渡河，走雪山草地了。

（二）娄山关阻击战

1935年1月底，黔北赤水附近土城战斗之后，红军洞悉刘湘戒备严密，放弃北进强渡长江企图，改道西征入滇。约在2月初旬，时值旧历年关，薛岳据第三纵队孙渡电告，红军已由黔北经大寨、永宁、建武、罗海、金鹅池、镇雄到川滇黔三省边境地区，先头已抵云南扎西（威信）；该纵队第二旅安恩溥部，在2月11日前已向扎西挺进中；川军郭勋祺师及廖泽、刘兆黎各旅，经叙永衔尾越境追击到达滇边黄水河附近；孙渡纵队的第五旅鲁道源部在镇雄大湾子与红军遭遇。据龙云电告薛岳，2月13日据宜宾潘文华电告，川境已无红军踪迹。当时薛岳对红军进驻扎西附近的企图不明，认为红军可能由盐津渡横江，一面令孙渡以所指挥的第一旅刘正富部进至老龙滩，沿金沙江布防，其余主力进至镇雄（当时龙云已令滇东北各县，将全部船只封锁，防止红军西渡）；一面电周浑元率第二纵队直趋毕节、镇雄，一部向川南古蔺尾追侧堵；又电第四纵队何知重部扼守赤水，并派部越境尾追。总之在2月18日以前双方调动频繁，前线奇寒缺粮，山陡水急，官兵疲乏，没有主力战斗。

薛岳于18日接到孙渡转据安恩溥电，红军已放弃入滇计划折回黔北，但实情不明。突于20日接到第三“追剿”支队罗醒尘电：据原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供给部出纳员何彬向该队投降后供称：（一）红一军团到扎西以后，已回向海坝、营盘山、麻寨堡、白沙河、宝庄一带，将向东急进，其余各军团也在后跟进。（二）红军总兵力虽不详，但沿途减员，在遵义、扎西各地有补充，却无装备；且新兵多逃亡，已将战力最弱的红八军团番号撤销，扩充红五军团，各军团连新兵算上有2万多人。（三）红军不继续西行原因不详，可能与前堵后追，加以地障重重，长江、金沙江难渡有关。（四）红军2月中旬以来，已提出作战要求：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当薛岳了解红军后卫改前卫，调头东进的新企

图后，一面电请蒋介石增兵，一面匆匆作如下的处置：

（1）第四纵队王家烈部，以何知重率第一师及侯汉佑师火速由赤水撤回两滩（吼滩、二郎滩）扼守东岸，进行堵击；魏金荣部（即犹国才部3个团）速由习水撤回桐梓，蒋在珍师及柏辉章师主力速集桐梓、松坎之线布置截击。

（2）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谢溥福、萧致平两师，白镇雄取捷径渡赤水河，跟踪东追；万耀煌师在该纵队主力之后东进。

（3）第三纵队孙渡部停止跟踪尾追，由川南古蔺入黔，进占大定待命执行堵截任务。

（4）为增加前线兵力，命吴奇伟率第一纵队由贵阳驰援遵义进行堵截。

（5）以新拨入贵阳绥署指挥序列的第一路总指挥上官云相部第四十七、五十四两个师（裴昌会、郝梦龄任师长）由川南綦江速开松坎迄桐梓布防。

当蒋介石了解情况变化后，特抽川湘军一部拨归薛岳指挥加强追堵兵力：以黔东的李云杰部率第二十三、六十三两师编为第五纵队集中镇远；以黔东的李韞珩部率第五十三师编为第七纵队西开遵义；以川南刘湘部抽出9个团归郭勋祺指挥，编为第六纵队入黔跟踪追击。

在2月21日左右，红军先头第三军团击破两滩堵击阵地后，如入无人之境，直向桐梓。当时上官云相部尚未到达，第四纵队的蒋在珍、柏辉章两师也未赶到桐梓，只魏金荣等部抵桐梓外围，有如惊弓之鸟，仅接触数小时就纷纷退走。薛岳命在遵义指挥的王家烈固守娄山关，确保遵义待援。此时王的主力4个师散在前方，失去掌握，控制在身边的兵力不足5个团。此时桐梓情况不明，遵、桐电话已不通，由贵阳开遵义的第一纵队吴奇伟部尚在途中。王家烈面对当前严重形势进退维艰，命旅长杜肇华率两个团（第四、六两团）向桐梓推进企图堵击，另派一个团（第十团）镇守娄山关。娄山虽不很高，但绵延几十里长，周围山峰迂

回曲折，最高点是金山。我曾经过该关，道路弯弯拐拐，确是易守难攻的要地。23日起，杜旅和红三军团在娄山关激战将近两天，伤亡惨重，才经板桥败下来。红军一直追至遵义以北十余里的董公寺附近。王家烈以其直辖的亲信部队第八团及第一团加入杜旅阻击战斗，随因红军猛攻，杜肇华负伤下来，全线又溃败。当时王家烈（第四纵队副指挥官犹国才，在薛岳责备下，也赶到遵义参加指挥）看到战情险恶，怕遵义各城在吴奇伟的第四军未到前失守，难逃罪责，拚命率两个团在遵义城北指挥顽抗。即以在娄山关勇敢作战的第六团长刘鹤鸣代理旅长，继续指挥；26日黄昏退守城关，以五、六个团的残破兵力进行顽抗。王在是日逃离遵义，27日与进抵遵义附近忠庄铺的吴奇伟联系。当吴部先头26日入夜到达遵义时，王家烈所部在团长江荣华负伤之后，已被击溃向西逃窜。红三军团先头已于27日夜占领了遵义新旧两城。^①第九十三师团长陈金城告我他率部到达遵义城，王家烈部守城部队第八团不准入城接防，半夜红军攻进城内，以至次晨仓卒应战而遭败。其实后来查明那时王部已撤逃，遵义已是空城，薛岳追究责任加在王家烈身上，是另有作用的。娄山关迄遵义城北之战，王家烈虽惨败，但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红军官兵伤亡也不少。这是王家烈亲自指挥所部危害红军最大的一次。后来在反攻遵义时，虽然王家烈、吴奇伟先行逃跑，但王部仍作了猛烈的顽抗，并不亚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三）遵义红花冈、老鸦山战役

这一战役是娄山关战斗、遵义北郊董公寺战斗后的继续。在红军方面，参加娄山关及遵义城北作战的是红三军团主力第四、五两师。这次参加遵义城南郊迄忠庄铺（乌江渡北口）作战的除红三军团外，尚有红一军团一、二两师。“追剿”军方面参加娄山关

^① 红军于2月28日凌晨再占遵义城。

战斗的纯粹是黔军王家烈部，参加这次战斗的，却是薛部第一纵队（以第四军为骨干，该军在北伐时代颇著名，自老军长张发奎反蒋失败后，即归蒋介石收买重编，薛岳就是以该军作为骨干的）。该纵队指挥官吴奇伟原辖第四军第五十九、九十两师；这次由贵阳北上增援时，薛岳将第九十师欧震部留在贵阳，另以其直辖嫡系（纯黄埔系组成）的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拨归该纵队序列。计纵队指挥官兼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副军长陈芝馨），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副师长沈久成）所辖团长张德能、林贤察、吴道南（吴因作战不力被撤，由罗醒尘继任）；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副师长邓春华）所辖团长彭祖延、钟伟、陈金城。

当红军进占桐梓时，薛岳命吴纵队火速开遵义阻击，一路上经扎佐、息烽渡乌江，约在2月26日晨（25日夜）全部渡过乌江到忠庄铺（距遵义城20里）。这时吴奇伟与王家烈会晤，交换作战意见。王家烈以为黔军残部4个团尚扼守遵义城北部，情况岌岌可危。吴、王判断红军主力已陆续东下，就兵力言，红军占有优势，他们必须当天确保遵义，否则遵义失守再行反攻，不仅困难，而且背水作战（后面是乌江），在战略上非常危险。吴奇伟原奉薛岳指示，以第二路军前敌副总指挥名义统一指挥第一、四纵队，因此吴、王两人协商后决定：以唐、韩两师当夜赶至遵义驰援，并确保之。惟当时王家烈对残部守遵义情况，尚不明了，只知道危险而已。实际上红军第三军团先头团，在27日午夜入城，守城王军由刘鹤鸣指挥的第一、五、六等3个团看到情况危急，而军长又已离城，便在入夜后偷偷向西溜走，仅城南还有一个战败的第八团万式炯部。

27日深夜，吴纵队先头在奔疲万分的情况下，赶到遵义城边，不料红军已经入城，并占据遵义的要点红花冈、老鸦山一带。28日晨3时，吴奇伟得悉，责怪王部误事。拂晓，双方开始接触。接着吴奇伟（王家烈也在场协力）下令第九十三师占公路右侧高地，第五十九师占领南门外红花冈、老鸦山一带高地。两

师主力与第二十五军城南留置部队万式炯部（王部其他部队已失去联系）全力反攻，自晨至午攻红花冈不下，同时进攻老鸦山的第五十九师虽有进展，并已攻进了城，但伤亡颇大。吴令第九十三师第五五八团陈金城部归第五十九师韩汉英指挥。

28日正午以后，“追剿”军全部攻势顿挫。是日下午1时吴奇伟、王家烈在忠庄铺司令部悉忠庄铺西北山头附近发现红军（后查明是红一军团）已迂回包围到军部附近。此时第五十九师攻城部队已被红军反击，在老鸦山的张德能、林贤察部已溃退。韩汉英、唐云山等接得吴奇伟命令迅即向西南撤退，火速脱离战场。但在红军正面猛追，侧面迂回情况下全军溃乱，各级建制已不成套。吴奇伟、王家烈无可奈何，便率第九十三师残部不足2000人从养龙站渡过乌江，就令工兵营砍断浮桥桥索，以免红军南渡。第五十九师残部一部由副师长沈久成率领向打鼓新场窜去。韩汉英只带临时指挥的第九十三师陈金城团向鸭溪等待收容；快入夜时，又被红军追兵赶上，陈团随即向白腊坎逃走。（当时红军继向败兵追至底坝、长干山附近）第九十三师未过乌江的溃兵除被红军俘虏外，一部向南窜了几十里，另找竹筏渡过乌江，但重兵器及伙伕担子行军锅灶，一律掉光。这两师人在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以来都未败过，这次算是大败。除陈金城团因是预备队关系，撤退时掌握较完整外，其余几溃散不成部队。合计两个师伤亡被俘在3000人以上。是年8月追击红军到了四川青川，我在赴甘肃途中，亲问过吴奇伟关于失败的原因。他强调受王家烈之累，认为砍浮桥是战略问题，不这样，如红军南渡乌江，贵阳兵单，大局便受影响。

遵义战役中央军大败，各军震动，对朱德、毛泽东所率红军来去无定的机动神速都感到可怕。薛岳为了掩饰败绩，特将伤亡握失的数字减少；并为保持嫡系吴奇伟、韩汉英的地位，而嫁罪于王家烈和另一师长唐云山（其实唐师比韩师损失还少一些），向蒋介石上报，听候处理，同时也自请处分，以求得蒋介石的宽

怨。薛岳自经此役之后，狂妄自大的气焰减低了不少。

蒋介石赴贵阳“督剿”与被困

薛部遵义战败后，蒋介石来电要他查明罪责以申军纪，认为这是“追剿”以来国民党军的奇耻大辱。2月底，薛岳急令在贵阳整补的第九十二师梁华盛部第九十师欧震部驰援吴奇伟。（这时贵阳附近只留有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4个团）薛亲赴乌江南岸指挥，薛一面令唐云山在养龙站收容第九十三师残部，候命开回息烽整理，令韩汉英收容第五十九师，仍留黔西整理（韩所指挥的第九十三师陈金城团暂不归建）；一面令吴奇伟继续指挥欧、梁两师准备渡乌江反攻遵义，立功赎罪。

3月3日，薛岳令第一路总指挥上官云相部由松坎开进桐梓，并进占仁怀；令新拨归薛指挥的川军郭勋祺纵队，由桐梓开向遵义，令王家烈纵队的魏金荣、蒋在珍等部清扫桐梓外围后，协同川军郭勋祺纵队向遵义推进。

此时蒋介石鉴于黔北形势严重，除令何键派前敌总指挥刘建绪到黔东铜仁布置防堵外，蒋本人也于3月2日飞抵重庆。薛岳当时接到蒋介石两件手令，一件是强调今后在前线“剿匪”的部队长，无论“追剿”截堵或防守，如不与城池共存亡，未奉命而私自逃亡者，一律治以失土“纵匪”之罪。另一件说，由于遵义战役失败教训，今后对飘忽无定的共军在战略上虽要猛追猛截，在行动上要稳扎稳打；追剿部队每进一地，在宿营前，一定要修碉，碉未修成不许入营。围剿堵截部队也依此行事。各部队长应告诫官兵，不得有丝毫疏忽，切切毋违为要。

红军于3月10日后放弃遵义，继续西征。吴奇伟带两个师与川军郭勋祺部及黔军魏金荣部于3月12日到达遵义附近。因为是郭纵队先进入遵义的，蒋介石以郭部两个月来长途跋涉，“屡建功勋”，特予以犒赏。薛岳得悉红军全部向仁怀、茅台、赤水西进

后，依照蒋介石在重庆的电示：“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的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追歼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薛岳据此，先后电令各纵队作如下部署：

（一）孙渡纵队应在赤水河以南瓢儿井、大定、毕节地区扼要筑碉布置截堵，并派队向河东作远距离的威力搜索，并与川南古叙川军切实联系。

（二）周浑元纵队从大定以北赤水河以东向永安寺、长干山、毛坝、茅台、仁怀、鲁班场之线沿途修碉布置截击。

（三）郭勋祺纵队主力由遵义尾追红军后卫，经干溪场沿路筑碉向鐔厂、茅台前进。

（四）吴奇伟纵队尾追红军经底坝、枫香坝，沿途筑碉向仁怀、茅台方向尾追。

（五）王家烈纵队（缺侯师）除留置蒋师在桐梓间地区修碉外，主力集结金沙黔西修碉，布置阻截。

（六）李韫珩纵队火速由黔东镇远开遵义接裴昌会师防务。

当时各纵队的追截，没有激烈战斗。为了贯彻蒋介石的图谋，在红军16、17两日通过赤水河（即著名的三渡赤水）一部进入川南时，薛岳所部北起松坎，西迄大定、毕节、赤水、土城，南迄乌江特别在遵义以西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仁怀、鐔厂、长干山均有碉堡星罗棋布，采江西“围剿”故技实行封锁（当时红军粮食十分困难，装备又无补充），企图消灭红军。

当3月17日左右，红军主力由仁怀、茅台三渡赤水河的时候，薛岳指挥的追击纵队也跟踪抵仁怀，堵截纵队也抵赤水、古蔺及滇边地区。蒋介石认为时机有利，于是在3月24日乘飞机抵贵阳督战，满认为“歼灭红军于川、黔、滇间胜利有望”。同时也对吴奇伟在遵义打败仗，丢了中央军面子之事，余恨未消，迨陈诚由宜昌飞抵贵阳后不久，蒋介石即将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撤职调

陆大十三期肄业，遗缺调在陆大十期肄业的甘丽初（广西人，黄埔一期）充任；对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则仅撤职留任。吴奇伟身为指挥官，得力于薛岳嫁罪于王家烈的关系，只记大过了事（事后唐云山对我说薛岳有偏心，赏罚不公）。

蒋介石住在已故前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毛光翔的“公馆”内和陈诚、何成濬、晏道刚、李仲公、薛岳等会商。薛岳条陈王家烈贻误戎机的很多罪状，建议撤换王家烈的军政各职，使中央在黔军令政令趋于统一以利“剿共”措施（据说特派员李仲公也揭了王许多罪状）。事后薛岳、晏道刚、李仲公、何成濬等人对王施加压力，分散其所部的指挥序列加以收买利用，迫使王交出军政权。在何成濬疏通下，王被迫辞去贵州省主席职。4月17日，蒋介石以老政客吴忠信继任贵州省主席，蒋并耍手段，给王家烈任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的虚衔，将黔省第二十五军所辖各师编入陆军番号（第一〇二、一〇三、一二一等三个师）及非正式陆军番号（暂编第二十五师、新编第八师）共5个师。过了几天，王在部署何知重、柏辉章威胁下，只好又辞军职；蒋立即照准，改调王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派在武汉行营服务，一边进陆大肄业。5月上旬，适逢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到黔公干，蒋介石要张邀王同坐飞机至武汉。王想离开苦境，游历外地，欣然随张前往。这样，盘踞贵州多年的地方实力派从此被蒋介石借机驱逐了。1934年11月蒋介石写给薛岳的亲笔信中的指示，在贵州初步得到实现。

蒋介石抵贵阳之日起，实际代理薛岳的指挥，如同一个战场指挥官一样。薛岳遇事不请示即不敢办。当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以后，3月23日起，任堵截的孙渡纵队没有战报，薛岳对前线情况不明。约在28、29日薛岳虽曾接侯汉佑在土城来电，知道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但他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完成，不足为虑。30日薛岳突接周浑元急电说，该纵队于长千山、枫香坝、鲁班场封锁线内的倒流水地区被红军强袭，激战

竟日之后，红军已继续经沙土南移，似有偷渡乌江模样。这一情况很出薛岳的意料之外，颇感惊慌。请示蒋介石后，火速调第七纵队李韫珩部，由遵义昼夜兼程赶回乌江以南养龙站接第九十三师残部防务，并急调驻黔西的第五十九师为总部直辖。由于薛岳所部主力均在前线，乌江南岸无兵可调，红军于3月31日由后山渡乌江进入息烽以北，4月2日在黑神庙、潮水场将李纵队第五十三师李清献的阻击部队击溃后，一部经开阳、修文、龙里间向贵阳南进，一部向瓮安、余庆东进。蒋介石开始恐慌，匆匆召见陈诚、顾祝同、何成濬、晏道刚、薛岳等了解情况后，作如下紧急处置：

（一）令第五纵队指挥官李云杰，指挥第二十三师（李兼）第六十三师（陈光中）火速由镇远星夜兼程经施秉、黄平西进，限4月6日到达余庆，于清水河东岸阻击共军。

（二）令第三纵队指挥官孙渡率第二、五、七等3个旅即由毕节、大定（今大方）取道黔西，昼夜兼程，经鸭池河直开清镇，限先头于4月4日到达，巩固贵阳外围防务（3日行程，须步行400余华里）。

（三）令第一纵队指挥官吴奇伟，第二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第四纵队指挥官王家烈、第七纵队指挥官李韫珩所属各部，沿敌后分途猛追，不许停留。（当时第三纵队在鲁班场，第四纵队在打鼓新场颇有损失。）

（四）令空军（据晏玉琮对我说队长是张有谷）在乌江南跟踪，更番侦察轰炸，切实协同各纵队作战。

（五）分电徐源泉、刘建绪在铜仁、酉阳、秀山防止红军东下，布置迎击；并电李宗仁所属廖磊军进出独山、都匀以防共军南移。

薛岳奉蒋的指示分电之后，即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指挥宪兵团及警察加紧戒备，清查户口，检查城厢工事；令驻贵阳防卫部队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负责贵阳外围防务，在市郊黔连山，图云关、大关等地加强据点工事，在贵阳龙里封镇线的守碉部队加

紧备战，并派出一部进出贵定、平越（今福泉县）作威力搜索相机堵击。同时薛岳打长途电话给黔西的驻军原属第九十三师团长陈金城（遵义败后随第五十九师退至该地），令其昼夜兼程于4月7日前赶至贵阳，接受任务，随即转至龙里归第三纵队旅长安恩溥指挥。薛岳并在贵阳绥靖公署内召开党政军重要人员讲话，说追堵大军云集，勉以精忠救国，确信在领袖指挥下必可成功，以安定人心。他再度转电各县长要与城共存亡，闻风即弃城者杀无赦。打电话给前线各县长，要他们指挥团队协助军队办粮草，作向导、侦察情况等措施。

4月4日飞机侦察红军主力先头已过平越西鸡场，清水江发现有浮桥，后续仍在东进，是夜开阳、高寨附近发现情况。陈诚、薛岳等起初认为红军是东进，乘虚袭击贵阳公算不大。但在4月5日得悉红军先头已抵龙里属的脚崖似有向东南迂回贵阳模样，他们又着急起来。随后孙渡所带第三纵队先头安恩溥旅已经清镇抵贵阳城郊布防，该纵队后续龚顺璧旅（第七旅）抵达鸭池河。蒋介石为了要该旅抽兵进占清镇平远哨飞机场，巩固贵阳清镇间安全，亲自打长途电话给龚顺璧，要龚旅长火速完成此项任务。龚听浙江话不清，老是反问，弄得蒋大发脾气。

约在4月6日上午，蒋介石召见第三纵队指挥官孙渡于贵阳（当时贵阳附近冈寨、脚崖、洗马河等地均发现红军游击队，贵阳人心浮动），在座有顾祝同、陈诚、薛岳、何成濬等多人。蒋见了孙渡表现异常的客气。薛岳表扬孙渡所带的是“勤王之师”。蒋以“该纵队乃革命军人的模范，动作迅速作战勇敢”，除当面表扬外，并传令嘉奖，犒赏孙渡二万元，所部每旅长一万元。接着蒋介石为了拉拢龙云，在召见孙渡后又特别嘉奖龙云，电文说：“三纵之忠勇，乃贵总司令平时训练之功劳。”是日（或次日）孙渡赴龙里时，红一军团先头已抵龙里的观音山，同该纵队龚旅接触。红军另一部抵距贵阳南30里黄泥哨附近与第三纵队鲁道源旅及第九十九师守贵阳外围部队接触，贵阳之图云关已可听到枪声。蒋介石

令薛岳发火急电，要各纵队驰援贵阳。（据后来孙渡对我说，在他乘车赴龙里经过黄泥哨附近谷脚时，被红军游击队在山上伏击，打了一阵，几乎丧命；由于蒋介石赏他2万元、升中将见疑于龙云，几乎被龙撤差。）

蒋介石这几天在贵阳如坐愁城，但守兵实在单薄，市内情况又很复杂，蒋介石就借口视察滇政在7日下午乘军用飞机，秘密飞往昆明，至10日各纵队已抵贵阳附近，情况缓和，贵阳解除戒严后，蒋介石才又飞回来督战。1936年我由西康随军回到贵阳，在绥靖公署听顾祝同的侍从参谋张立人说，在1935年4月5日、6日夜，谣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郊外有枪声时，吓得蒋介石很慌乱，大骂城防部队长郭思演一番。他的妻子宋美龄也急得蹦跳，在看地图时把地图甩在地下。

4月7日红军迟迟未过清水江，忽而由东折回经马河，钻隙经龙里之观音山与滇军第三纵队一部遭遇，激战竟日（龙云曾为此战斗虚报观音山大捷）。9日，贵阳外围黄泥哨发现红军，薛岳派飞机十余架低空轰炸。红军与郭思演部及鲁道源部激战一天多即突破龙里封锁线，取道经青岩前进。10日，孙渡与吴奇伟纵队开始尾追。红军第一、三、五，军团直趋定番、紫云向黔南前进。蒋介石自10日由昆明赶回贵阳时，惊魂甫定，匆匆召见薛岳即布置向而追击的计划。

蒋介石在贵阳30天，几乎天天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可说是完全被动。红军四渡赤水河的真正企图，蒋介石、陈诚、薛岳等事前判断不着，事后洞悉情况，重新布置，而红军却又改变行动了。国民党军长追半年，地经六省、多次调动，却达不到“追歼”的目的。

红军主力掉头向黔南西征，一路经定番、长寨、紫云，4月17日渡过北盘江。盘江八属原是犹国才部队防地。这时该部归魏金荣、蒋明庠率领，调在乌江追堵红军，被红九军团在白腊坎附近击溃了第五、六、七等3个团。北盘江因此无正规军守备，只有

犹部师长吴剑平带了2000余人在贞丰阻击一下，红军随即渡过，占贞丰、兴仁、兴义、经黔南入云南，经霪益、马龙直趋昆明附近。另一部红九军团罗炳辉部，原留置乌江北牵制川、黔军，后来由于主力红军西进，该军团经毕节进入滇东的会泽。

蒋介石在发现红军主力不东进，掉头西征时，他自4月13日起即命薛岳离开贵阳，进至安顺跟踪向西追击。蒋本人仍在贵阳坐镇，除令李云杰的第五纵队开贵阳待命，桂军廖磊部进至册亨相机堵击，及前在遵义被红军打败过的第五十九、九十三两师和原驻贵阳附近的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该师抽出周化南旅随薛岳行动担任警卫）集贵阳附近作为战略预备队外，其余第一、二、三、四、七等纵队由薛岳率领跟踪追击。4月下旬蒋又命第四纵队留下在黔整编。4月底薛部进入滇边，沿途吴奇伟在兴义观音洞与红军后卫作战半天，伤亡三百余人；孙渡纵队在黄泥河以西被红军后卫击伤旅长龚顺璧以下200余人；周浑元纵队在盘县以西旧洞附近与红军后卫稍有接触；李韞珩纵队在平彝西南和红军后卫稍有接触；此外没有激烈战斗，即跟踪进入云南。

国民党军在滇康地区尾追红军的活动

1935年4月底，薛岳率前敌总部到达云南平彝（富源），孙渡、周浑元、吴奇伟、李韞珩等部均进入滇境。孙渡纵队原是滇军龙云的老本，地形熟悉走在先头，当时云南全省空虚，就昆明省会而言，正规军守也寥寥无几。当红军4月29日红军先头占领嵩明、寻甸附近时，距昆明仅60华里。龙云在昆明城内十分紧张，急电薛岳驰援，另电孙渡昼夜兼程回援，并令龙雨苍、安恩溥两旅回据昆明作顽抗准备。惟当时红军只在战略上佯动，先头到达距昆明30余里的杨林地区就掉头北进，分别取道禄劝、武定指向元谋。

薛岳主力约在5月5日到达嵩明、富民附近时，前方指挥官

及薛岳本人都分别接到龙云的电报通知，各军师除采买人员凭证入城外，部队不许入城。当时薛岳、吴奇伟异常不满，曾就此事要参谋长余华沐电告贵阳绥署参谋长柳善向蒋介石面报三事：（1）朱德与龙云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过去曾有私交；（2）据报龙云曾派人向罗炳辉进行工作，怕有默契；（3）龙对中央军太无礼貌，官兵多表不满，尤以第四军为甚。

但5月5日（或6日）薛岳入昆明时，却受到龙云的盛礼招待。龙发动两广旅滇同乡欢宴薛岳，说明部队不能入城的原因也有三条：（1）怕误了追击日程；（2）防止红军冒充“中央军”（着中央军服装符号）混入嵩明之事重演；（3）由于在曲靖、马龙附近被共军截去地图事，对昆明虚实有所泄漏，不能不有戒备。（据后来薛岳对我们闲谈，这三点都是次要的借词，实在的主因是怕“中央”夺他的地盘。）

5月6日晨，龙云与薛岳乘军用飞机至金沙江沿岸各渡口视察红军渡江情况，并在通安、会理两地上空盘旋一番后归来。他们均痛恨川军对江防布置太疏忽，使红军过早在通安暗渡成功。龙云并要薛岳向蒋介石建议，由第三纵队沿江筑碉防止红军回转，以免追入西康后滇省空虚。对此问题双方取得协议。下午龙到都南酒店访薛，大吃“龙虎斗”（粤名菜）后，并谈及今后红军北去之后，如何治理黔滇问题，表示滇黔应结成联盟，龙、薛应结成兄弟。于是两人拜起把来，相约同甘苦、共患难，在政治上互相支持。自5月6日起，两人便称兄道弟，互相勾结，延续达十余年。（这件事是薛妻方少文的叔父方学芬和薛的机要秘书谢又生亲自告诉我的。1935年至1937年，龙任滇黔绥靖主任驻昆明，薛岳任滇黔绥靖副主任驻贵阳，各设公署，互不相扰，后来在抗战中龙的滇军主力卢汉、高荫槐、孙渡、张冲、鲁道源、杨宏光等军师归薛指挥多年，也互相处得很好，确是事实。）

5月7日晨，薛岳离昆明赴前线赶部队。当时他所率各纵队均已分别沿红军行进路线追击：一路经会泽，一路经寻甸，一路

经禄劝，一路经武定，直趋金沙江边。薛扬言红军先头虽已幸渡金沙江北岸，但主力还在南岸，各纵队一定要包围红军于普渡河西、龙川江以东加以聚歼，不容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但8日夜，孙渡纵队先头由元谋沿红军去路追至禄劝的皎平渡口时，红军后卫第五军团已快渡江完毕，其余在寻甸的驿江渡口及原留置在贵州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虽受到第六纵队郭勋祺部及第四纵队黔军的追击，也已经宣威、会泽在巧家以南附近渡过了金沙江。因此，薛部各纵队在滇境无激烈战斗，沿途疲于奔命，而真正和红军作战的乃是地方民团。据事后了解红军在滇过境时沿途各县县长带领民团顽抗，被消灭的团丁达1000余人；县长被击毙的，查明有禄劝县长何泽周，武定县长周自得，会泽县长杨茂章，寻甸县长李荆石，富民县长郝煊。此外尚有宣威县长陈其栋因临阵脱逃及一个督战不力的参议被龙云枪决，一个通共绅士张秀升被龙云斩首。从地方团队来看，云南比贵州还顽固，甚至和正规军一样凶恶。这也证明龙云统治云南比王家烈统治贵州的政权巩固得多。蒋介石不敢乘红军入滇的时候向龙云开刀，这是原因之一。

薛岳在前进途中，于5月10日左右接到贵阳绥署（薛岳兼贵阳绥靖主任，许多电报通过该署转达薛岳所在的前敌总部）转来刘文辉电，已知红军在通安、会理附近地区有一二万人，后续仍在前进。薛岳命孙纵队在金沙江南岸环州、慕连、大松树一带修碉掩护主力渡江；命吴纵队及前敌总部直辖部队取道元谋、龙街渡江。5月13日左右，薛部始渡江完毕，随即命李韫珩火速率部驰援会理解刘文辉部之围。李纵队主力经松平关、河口、五里坡向会理前进。薛部在渡金沙江时，由于江面宽（700米以上）水流急、气候闷热，船少人多，各部队不听渡江指挥官的调度，各纵队官兵之间和各纵队与总部直辖官兵之间有的打起架来，弄得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等互相埋怨，大发脾气。

“追剿”各军渡过江后，薛岳虽接蒋介石电令驰援解会理之

围，但薛因在贵州迭次受了红军回击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办法，每到一地必先筑碉，碉不成即不敢进宿营地。于是迟迟其行，迨李韞珩部先行到达会理后，5月19日左右，主力才到达会理附近；表面上是李纵队解了川军刘文辉所部之围，其实乃是红军自动退去的。

西康是地方军阀刘文辉的地盘。刘是川康边防总指挥兼第二十四军军长（该部兵力据该军旅长杨生武、余松林对我说约有7、8个旅约20团左右，总兵力两万余人，封建色彩比刘湘还浓厚）自1933年被刘湘击败退守川康边陲割据以来，旅长以上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刘元瑄等尽是刘的侄儿。所部因防广兵单，异常分散；康定以西地区布置屯垦部队两个旅，雅安地区布置3个旅归刘文辉直辖；在宁远（西昌）地区守金沙江沿线布置3个旅，则归其侄刘元璋率领。当红军进入其防区时，刘部担任守备的顽抗力量是相当坚强的。刘元璜率第二十四军两个旅守会理地区，除在通安及沿江被红军击破1个团，退守会理兵力不足4个团。自5月9日红军开始围城，刘元璜不顾会理居民死活，下令扫清城外房屋，在会理城进行顽抗达8天之久。刘元璜在城内负伤，仍坚持挣扎。我记得5月19日薛岳曾接到蒋介石从云南打来的巧（18日）滇参电（蒋当时在昆明督战），表扬刘文辉反共积极，嘉奖会理守将刘元璜并犒赏一万元，晋级中将。薛岳在会理时曾亲自慰问守城负伤官兵，并由刘元璜陪着巡视守城工事和搜集红军攻城挖地道的资料。同时接到蒋介石电，将刘文辉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刘元璋所率的刘元璜、刘元琮、刘元瑄、许剑霜等4个旅（兵力约10个团）统归其统一指挥。后来到达西昌时，当时西昌有第二十四军刘元璋部两个旅扼守，红军未进攻该城，守军却将城外烧成焦土，居民流离失所。薛接到蒋介石一电（时间记不清）大意是：共军主力此次渡金沙进入川南，张国焘渡嘉陵江西移，企图会合于川西另造苏区；此乃我军聚歼良机，着该总指挥晓谕各军官兵，人人洞悉八十年前石达开率师十万尚败亡在

大渡河的故事；今共军形势远非石达开可比，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的壮志，与友军同心协力（当时大渡河北岸，刘湘、刘文辉、杨森各军均派有一部担任守备），在大渡河南北夹攻加以聚歼。

薛岳率部经西昌约于5月22日左右到泸沽，一面以第七纵队李韞珩部（原配属之万耀煌师归还建制）另拨川军刘元璋部四个旅归该纵队指挥，取道冕宁，向大渡河安顺场北进，其余各纵队则取越嶲向大渡河的大树堡北进。当时薛岳下令各部在彝民地区行军，应多加说明第二路军是中央军（因沿途发现彝民对刘家军有仇恨），特别是薛岳沿途发现当地彝民不但对红军没有害怕心理而且欢迎红军，要各部政工人员对老百姓作诬蔑共产党的宣传，并送枪弹给彝族头人羊仁安、张金波等多人，企图拉拢。在金沙江大渡河前后遥遥千余里，逐日因病死亡与落伍病兵甚多，弄得每团不足千人，每连人少枪弹多，逐日雇民伏抬枪扛弹。沿途虽没有战斗，但部队已拖得疲惫不堪。

5月24日（或23日），红军先头一部占领大树堡并在安顺场渡过了大渡河，分别击败了川军第二十一军王泽浚旅，第二十军李朝信旅（一说该旅在途中未到达富林），第二十四军杨学端旅，先后沿大渡河上游避实就虚，出敌意表，直趋西康泸定。29日，红军渡过有名的泸定铁索桥，击败了第二十四军袁国瑞旅，占领了泸定后，一部直趋天全、芦山，（先头到达雅安飞仙关）；一部取道金汤、丹巴击败了第二十四军余松林、刘元琮等部的阻击。蒋介石得悉红军向泸定挺进，于26日，即匆匆由重庆乘飞机抵成都，并设成都行辕进行“督剿”。5月底左右，原在雅安、荣经以南大相岭汉源地区布防堵截的川军第二十军主力（主要有夏炯、杨汉域、杨汉忠、罗润德、李朝信等五个旅）与第二十四军一部（刘文辉当时在汉源）及退回荣经的第二十一军第六旅（王泽波）均接蒋介石及刘湘电，开往天全、芦山地区，进行全力阻击。

薛岳自5月27日（或月底）率领3个纵队渡过大渡河后，即

下令急行。6月6日左右，先头抵达蒙经地区。10日前后，进入西康的中央军相当于7个师，除李纵队集结泸定、康定鱼通河地区另有任务外，主力全部抵达雅安作为战略预备兵团，进行整补待命。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大渡河重重天险地障，取得了战备转移的决定性胜利；而蒋介石这一段阴谋决策又告失败。

川军尾追红军的战况

6月上旬，薛岳各部进抵雅安地区，由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蒋介石不给予尾追红军的任务，也没有像在湖南、贵州、云南一样将各省地方军拨归薛岳指挥。为了把该路军军容搞好些，兵力充实些，特留下在雅安补充新兵（周、吴两军补充四川士兵，李军则调补湘籍士兵）及服装弹药逐渐恢复战力，作为川西的战略预备兵团。当时追击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是四川杨森的第二十军（战列为四川“剿共”军第四路）。杨森在雅安迎接薛岳时曾说过，“外人总认为朱玉阶（朱德别号）当年在我二十军工作过，怕第二十军有赤化分子潜伏。其实我第二十军反共不会落在友军之后。我确信全军上下是不会受朱的影响的。”（当时传说朱德有信告第二十军官兵说明红军北上抗日之事，故杨对薛有此表示。）当时，杨所表示对蒋的忠实，在刘文辉、刘湘等之上。后来杨森为了取信于蒋介石，在6月中旬率该军主力并指挥第二十一军王旅、第二十八军李树华、刘乃铸两旅尾追红军进占芦山、宝兴，并占领灵关要隘、和红军后卫激战一昼夜。他就谎报战果，说红军被夏炯旅围攻于灵关无法逃走，战死及投江者三千人。蒋介石为壮军心，以杨森的“灵关大捷”，传令各军嘉奖。

约在6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小金川地区）不久，杨森部在蒋介石、薛岳鼓励之下，约在7月间进占懋功、抚边一个时期，后来被红军反击，全军溃退下来。

其余尾追部队余松林进占金汤、丹巴地区支援杨军的进犯。后来余松林旅在丹巴、刘元琮旅在金汤垮下来，蒋介石威迫刘文辉要将余、刘两人押解法办。当时川西一带尤以大小金川地区，粮食补给甚难，一个旅在先头作战，就要一个旅在后面作输送队搬运军粮。士兵厌战跳崖自杀者迭有所闻，战场苦境不堪言状。后来据王泽浚对我说，在“追剿”红军时，川军人人争学刘文辉对红军作战的“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的十六字方针，对红军确有一种畏惧心理。

关于红四方面军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共4个军由徐向前率领，自1935年春由川北通、南、巴地区，突破嘉陵江击败田頌尧的第二十九军阵地后即行西移，逐步从广元、昭化、剑阁、梓潼、平武、青川、江油、彰明等地击破胡宗南、邓锡侯、田頌尧等部的阻截。在6月以后逐步移至涪江以西的北川、安县以迄岷江沿岸；北自松潘附近，南至汶川、理番，西及大小金川俱为该方面军所控制。当时刘湘的四川“剿匪”总部在参谋团策划下，在薛岳所率中央军未抵成都前，四川作战序列仍区分为第一、二、三、四、五、六等六个路作为进犯的战略单位，其中除第四路（二十军）杨森部负尾追中央红军任务外，其余各路均负围攻红四方面军的任务。自蒋介石6月下旬在成都召见川军各路总指挥指示集中力量，迅速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加以包围封锁的方针之后，迄7月间各路进展颇速，从成都行辕战报了解先后攻占如下的战略位置：

（一）第一路（以川军第二十八军为基干）邓锡侯部及第二路（以川军第二十九军为基干）孙震部（当时前任军长田頌尧作战不力已被撤换）会攻北川，已占领该城，并向西推进中。

（二）第三路（以川军第六、新编第二十三两师为基干）李家钰部，已由汶川北进于7月中旬占领威川附近。

（三）第五路（以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一、五两师为基干）唐式遵部，先头范绍增师与第六路（以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二、三两

师为基干)王纘绪部,于7月中旬攻占茂县向理番推进中。

7月间全川形势除蒋嫡系胡宗南纵队占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点几乎均被川军所占领。红军主力似有计划地分向西北转移模样。

上述川军在蒋介石亲督之下,进犯红区包围封锁的措施比较日趋严密,从战略形势来看,当时川军比较占优势。

蒋介石召集成都会议的新部署

7月中旬,蒋介石在成都召集薛岳所部师长以上人员会议,讨论新的决策,并在会前一日在行辕先召各军师的少校以上军官佐讲话,慰勉一番,由宋美龄当场犒了一些慰劳金。次日蒋召师长以上将领参加会议。参加的有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欧震、梁华盛、谢溥福、赵锡光(萧致平作战不力已被撤)、万耀煌、周化南、余华沐等人。据后来薛岳、余华沐、梁华盛等对我谈及此事,说蒋介石当时曾作如下指示:

(一)对当前红军情况的估计

蒋介石认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之后,迭经多次追堵围攻,目下兵力最多不会超过5、6万人,其中病残当在1/5以上,面分据千余里山岳地区,东扼岷江、西迄丹巴、北至松潘、叠溪,南至懋功、处处布防,处处薄弱。目下四川各路修碉围困封锁,赤区日渐缩小。区内多是游牧为生的番民,宗教迷信浓厚、不事耕种,粮食只有玉米、高粱、青稞。加之气候奇寒,雪山草地成为天然地障。据半月前到阵前投降的红军官兵所述,粮荒严重,病兵很多,每人准备行军干粮无法筹措。红军在此地区生根不易,困守殊难。蒋判断在下雪前必然转移,但向东向西向南均不可能,最大公算是向西北(据梁华盛师长会后对我说这与国际路线有关)因此,薛部必须调整部署作好堵截准备。

另有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约数千人,自1月间由豫西进入

陕南山区后，经第三路军杨虎城部（原第十路军）在商雒、山阳、华阳、九间房各地阻击后，现该红二十五军避实就虚，有经凤县向甘南移动模样。蒋介石判断徐部在战略上有策应四川红军主力北上作战之可能。因此薛部必须及时进行对甘南的阻击处置。

（二）对川军策略的指示：

关于川军编制，装备，训练和传统有异于中央。但其中有些部队作战能力颇强，如当年1月第二十一军郭勋祺旅攻赤水，5月间第二十八军杨晒轩旅守江油、第二十四军刘元璠旅守会理，6月间第二十军夏炯旅攻灵关（宝兴属），均表现强悍善战。自中央军从川东、川南、川北长追入川之后，川局已趋稳定，力求川军国军化，统一编制、装备、训练和军需关系非常必要，决定加以整编，裁弱留强，编余军官分别送军校集训转业并准备在峨眉办军官训练团，统一战术思想。中央军官兵与川军比肩作战时应友好相处，毋存歧视态度。各部队长回部后要以身作则，指导部署。

（三）对第二、三路军战略部署调整的指示：

（1）第二路军除第四、五两纵队留黔，第六纵队留川，第三纵队留滇另有任务外，规定该路军作战任务，由追剿改堵截。第一纵队（四军）辖第九十、九十二两师即开平武、青川、旧州接胡纵队防务后对西南堵截。第二纵队（三十六军）辖第五、九十六两师即开江油进入甘肃文县、武都地区对东北部署堵截。第二路前敌总部推进至甘肃文县。（限8月上旬以前到战略位置。）

（2）第二路军第七纵队（第十六军）主力集结西康的康定，以所指挥刘元璋部进至鱼通河封锁丹巴、金汤，一部分驻道孚防止红军西进，并协助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活佛）进入康北采取宣慰中央德政，深入防共宣传的措施。

（3）第三路军第二纵队（胡宗南部）改为第二路军指挥，将平武防务交吴纵队接守后主力集结于松潘附近地区，对西南封锁堵截。该纵队所辖的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3个师（这3

个师是前第十九路军失败后改编的，官兵多粤籍，善于机动攻击），到达甘南后速行进入松潘布防，就战略位置。

以上是蒋介石入川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决策，一方面集中入川的蒋嫡系军队全力在川甘边境堵截，准备与红军主力决战；一方面派李榘珩进入西康接受刘文辉防地，企图将来与藏军对峙（当时藏军有一代本[营]驻甘孜以西），显示中央军力已至边陲；同时将川康军改编为国军，逐步结束川军的割据局面。

甘肃堵截的扑空与收场

薛岳所带的3个纵队在成都受命之后，7月中旬分别向目的地就战略位置。除李纵队留西康另有任务外，直辖的吴、周各纵队取道广汉、罗江、绵阳、彰明、江油（薛留置前敌总部后方于江油，当时此城为川军邓锡侯部困守时大部烧光）前进，薛自己率前方指挥所人员，并带着第四军第五十九师第三五四团林贤察部作为警卫部队，于8月上旬到达甘肃文县、武都地区。第二纵队周浑元各师，也先后由江油开入文县、武都附近。第一纵队吴奇伟各师另附第九十九师的周化南旅开平武及其以西与胡纵队（该纵队梁华盛师驻南坝（古江油关）旧州、青川地区）连接。

拨归薛岳的第三路军第二纵队胡宗南部，所辖的基本部队是第一师、计第一旅李铁军、第二旅李文、独立旅丁德隆、补充旅廖昂（每旅三个团共十二个团，外加一个骑兵团）。该师自1935年春由天水南下入川北，曾在广元与红军第四方面军激战一场，后即转经碧口、剑阁、江油进至平武、青川接替川军邓锡侯部防务，6、7月间主力乃进入松潘（在松潘附近有一个旅败了一仗）。蒋介石当时鉴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合，为加强堵截红军主力向西北转移，接受朱绍良、杨永泰的建议，蒋将前第十九路军改编后的3个师调入甘肃，因此从保定调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皖南调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开封调第六十师陈沛部均拨归胡宗

南指挥；另从河北调第二师补充旅钟松部，江西调第一补充旅王耀武部至甘肃（补充旅相当于一个师）。后来这些部队悉拨入胡纵队序列。约在8月上旬，上述新调的部队除王耀武旅。杨步飞师在途中未到达外，其余均到达松潘上下包座地区。总计薛岳在川甘边的堵截兵力相当于13个师，10余万人，几乎在当时蒋介石可能调到的中央军，都拉到这一地区，企图和红军一决雌雄。

薛岳在甘南的堵截，一面对付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由陕南向甘南进军，一面对付红一方面军北进甘南。记述其措施要点如次。

（一）对红二十五军的堵截

当8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已由陕南到达凤县附近时，薛岳在武都以驻贵阳绥靖主任兼“剿匪”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名义，已和驻兰州绥靖主任兼“剿匪”军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驻西安绥靖主任兼“剿匪”军第三路军副总司令杨虎城确取联系。第三路军下辖四个纵队，第一纵队杨虎城兼，第二纵队胡宗南，第三纵队毛炳文，第四纵队王均。该路军当时除第二纵队拨归薛岳指挥占据松潘外，其第一纵队主力在陕南追击红二十五军，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于8月间已由江西调抵甘肃会宁，构筑阻截封锁线。第四纵队第三军则自津浦路南段开入甘肃西自临洮经定西、陇西、通渭、武山、天水之线，着手构筑一道封锁线。薛岳曾派员进入岷县花园，同鲁大昌部（原系盘据岷县洮州迭文县西固地区十余年的著匪，后来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第十四师归邓宝珊建制）取得联络，该师一度归薛岳指挥。由于鲁部的防区是古代暗渡阳平的古道，由碧口以西迄柴门关、腊子口这些险地也都构成一些阻截工事。

约在8月10日左右，薛岳接到杨虎城电，知道红二十五军已经入凤县城入甘肃之两当县，有续向成县西南进军模样。要周浑元命各师派出侦探队，一律轻装向武都东北进行远距离搜索与警戒。但当发现徐部迟迟未南下，薛岳判断徐海东此行主要是策应

四川红军主力行动而佯动，红军主力必然北上无疑，于是电蒋介石申述意见并分电胡宗南、吴奇伟及刘湘。薛岳认为徐部在陕南的商雒、山阳给杨虎城部损失四五千（旅长以下官兵阵亡达七八百人），该部机动性之大，纵横无敌，很使薛岳顾虑。8月中旬，薛岳感到兵力不足，曾一度电请保升周浑元原辖的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升为第二十五军军长，继犹国才任该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指挥第十三师及暂编第二十五师沈久成部（该师是由黔军侯之担部改编的）速开四川广元及汉中作为战略预备队，防止红二十五军进入川北（万师集汉中、沈师集广元）。8月下旬，红二十五军改道北进，9月上旬已进抵天水附近后，这时薛岳面对东北面的堵截任务告一段落，剩下的是面对西南红军包围封锁与堵截的主要任务。

（二）胡宗南在川西北松潘地区的堵截

8月间，第二路军吴奇伟纵队与第三路军胡宗南部联防，在薛岳指挥下（名义上胡归朱绍良、薛岳等指挥，实际上有些事情是归蒋介石的成都行辕直辖），所谓包围封锁的川西北“平松防线”，东起古江油关，西经平武八河场（属吴纵队），八河场以西经松潘、包座（属胡纵队）。由于平武吴纵队没有战况，下面所述是7、8、9月间我奉派从平武、青川、碧口调查兵要回来所知道松潘胡纵队及文县、江油前敌总部几点具体活动。其中第（1）项是胡宗南的参谋刘宗汉对我说的。

（1）进攻毛儿盖威力搜索：7月间，胡宗南对红军先头部队所在地不明，非常着急，特派第一师的一个加强营由李日基率领，并带了无线电南下，进占毛儿盖作为前进据点，威力搜索情况。7月中旬被红军攻击，放弃该地，溃退回来。胡宗南了解红军位置，并洞悉沿途兵要地理后，颇为高兴，不但不惩办该营官兵，携枪跑回的还有奖赏。他认为红军绝不可能走草地自取灭亡，一定取道松潘附近。8月下旬，川军李家钰部进至松潘南叠溪

时，肃红四方面军投降军官供称，红军全部已开始向西北移动。胡当即调整部署：以第一师主力布置于松潘西南，先头进至日则寺草地边缘；以第六十一师控制松潘南之西宁关；以第六十师布置于漳腊营附近；以第四十九师进至包座。当时王耀武部尚未到达，留钟松旅在城厢附近，东与吴奇伟纵队第四军联系，均进入战备状态。

(2) 利用藏族上层作为工具：松潘是藏民区，藏族上层黄正清等人多被胡宗南收买利用，向藏民作反共宣传，并代反动军队调用乌拉运粮食，向巴西、阿坝、甘肃、青海边地藏区搜集红军情况以及进行经济封锁。(按王耀武后来告我，他接松潘防务之后，曾向蒋介石保黄正清任司令。)

(3) 清扫战场埋掩尸首：6、7月后，江油以西至松潘沿涪江上游几百华里沿线，臭气难闻，江中时发现浮尸，附近山头尤以平武为甚。因作战后未曾清扫过战场，以至病兵甚多。薛岳曾接成都行辕电，限各部派卫生人员沿江两岸扫除掩埋，截至8月底才告完竣。这些尸首多是川军与红军作战时留下，因掩埋过浅，被水冲出。

(4) 组织铁肩队解决粮荒：川西北多是山地，粮食不足，几个月来大军云集，就地采购全无希望，前线官兵自到基地运粮，终日不得一饱。在此情况下，薛岳、周泽元、吴奇伟、胡宗南等分别向蒋介石诉苦，请组织铁肩队运粮上前方。自8月以来，开始实施，但仍接济不上。铁肩队在1935年至1936年间成为追堵红军与包围红军时期的一种战略辅助队伍，也是蒋介石支持中央(川军除外)军的特殊组织。

(5) 参加叠溪会议，采取“困死”策略：在9月上旬，由于川军第三路在叠溪封锁红区有成绩，从投降的红军官兵口中了解红军粮荒严重，难于支持下去，蒋介石令刘湘派所属各路指挥部、薛岳指派所属各纵队指挥部派参谋长或高级幕僚到叠溪，开封锁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采取所谓“困死政策”；除交换各路军

的封锁情况、交流作战经验、优待红军投降官兵，规定藏民区坚壁清野之外，还规定两项禁令：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到红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及供乌拉者以“通敌罪”论处，后来据薛岳的参谋长余华沐谈，这次会议是由川军与中央军共同参加，是基于蒋介石“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目的而召开的。

9月上旬，薛岳接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来电说，据报红军日食野菜，久缺食盐，饥寒交迫，行将瓦解；希转告前线将领最后坚持，“完成八年茹苦含辛，安邦定国之丰功”。过了几天，突接胡宗南电告，该纵队骑兵团蔡仲部在草地边缘搜索，进抵巴西附近发现红军一部已渡过草地，先头被骑兵部队击溃。薛即一面电告胡宗南速令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由包座向巴西方面出击，乘红军后续未到前进行猛袭，一面电鲁大昌加紧布防。伍诚仁贸然率领团长余程万前进，在9月10日左右就和红军在包座河边救济寺附近打了一昼夜，先头团团团长先逃，接着就溃下来。伍部主力在中途又被袭击，于是全师放弃上下包座全线阵地，在胡宗南率第一师驰援尚未赶到（先头李铁军旅距伍师尚有数十里）时就垮下来，损失将近两个团。因此胡宗南怕孤军深入吃亏，便中途停止前进。

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通过几百里无人烟的草地，进行大迂回运动。当红军如天兵似地出现于班佑河边的巴西附近，第四十九师出击又被打败的消息得到之后，蒋介石就愤怒地分电薛岳、胡宗南将伍诚仁撤职，遗缺以副师长李及兰升代，该师撤下整理。

约在9月中旬，红军继续将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守腊子口及花园之线的部队击败，进入甘肃境内，鲁大昌残部向岷县溃逃。胡宗南在9月20日左右才弄清红军先头部队万余人，的确是红一方面军不是红四方面军时，乃照蒋介石指示留下第四十九师残部及第六十、六十一两个师，松潘防务交王耀武旅接守，胡自己只带着第一师4个旅（钟松的补充旅归还第二师建制），向甘南前

进尾追红军。9月下旬，得悉红军在岷县哈达铺、理川趋向天水，胡部即沿西固取捷径并回自己的老窝，急向天水前进。

9月24日，薛岳在文县接朱绍良电，据王均电告，入岷红军确是林彪、彭德怀的第一、三军团，人数虽有万余人，但官兵疲惫不堪；据俘供红四方面军不愿北上已退回川西毛儿盖。另据当时成都行辕及第三路军总部通报，第二路军总部所知“追剿”军情况是：除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及陕西的杨虎城所部不计外，甘肃地区，王均的第三军在岷县武山地区阻击，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在静宁、会宁、定西以南及华家岭之线布防，东北军张学良部各军如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已到达天水附近，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在西兰公路前进中，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已到西安待命，骑兵军何柱国部已抵陇东平凉地区。

约在9月25日左右，蒋介石给薛岳来电说，甘、陕作战计划另有决策（10月2日发表蒋介石自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第二路军全部回师川北，限令薛岳于10月3日到成都接受新任务。薛岳依限到成都，蒋介石召见三次，除要薛岳与张学良、刘湘三人交流对红军作战经验外，命薛岳率领第二路军（当时辖八个师）东开川、鄂边进攻红二方面军贺龙部。薛部开至南充、重庆等地时，又奉急命折回川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薛岳统率国民党军追堵中央红军，由江西至甘肃长追万里，不仅扑空，最后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空军对红军的追堵

张 有 谷

1934年10月，驻在吉安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在大庾、南康、上犹一带大山中侦察，发现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约有几万人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时红军是白天行军，目标暴露，故为空军侦察到动向；这也是国民党空军在红军长征期间侦察到红军主力动向的唯一的一次。蒋介石南昌行营据此判断是红军突围，令第三中队转驻吉安，不几天又调往衡阳。第五中队仍留在江西协同陆军作战。

第三中队曾在东安、全县、道县发现部分红军踪迹。接着又被调经长沙、宜昌到重庆广阳坝机场。贺国光曾说，周浑元、吴奇伟对红军是“追剿”，而张有谷是“兜剿”。

1935年蒋介石在贵阳被红军包围发生危险时，急调第三中队飞到清镇。第三中队曾在青岩一带发现一些红军踪迹。不久，第三中队又调驻昆明，增加了一个第四侦察队，队长刘克常，原是第三中队的副队长。第三、四中队的主要任务是侦察红军渡江的地点，予以轰炸。几乎每天都派飞机沿金沙江侦察，都未发现红军渡江痕迹。我们仅在元谋北面江中发现半截浮桥，当对桥头轰炸时，半截桥顺流漂去。当时满以为这就是红军渡口，已完成了轰炸任务，实则红军早已从万山丛中过江了。此后我们经常由昆明飞往会理、德昌、西昌侦察（因油量限制，不能再向北飞），都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空军第三中队上校中队长。

未发现红军，只看到会理城被红军攻打时炸掉的缺口。

有一天，蒋介石突然要龙云和我陪他坐一架外国人驾驶的民航机，由昆明经会理到西昌转经巧家、会泽回来。实际这一次空巡，什么也没有看见。随后蒋介石要我们投信给会泽以南山头上的李韞珩和昭通城内的某军长（忘其姓名），大概是讲他对前方作了飞行视察，借以鼓励国民党军萎靡不振的士气。不久第三、四中队都移驻成都，连同原在成都的第六中队，组成空军指挥部，任我为指挥官。

在成都这段时期，记起两件事。一件是刘湘部队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狼狽万状，在名山东面公路上，刘湘部队成千成万，争先恐后地逃跑，而我们在刘部的后面详细侦察，并未发现一个红军。另一件是在红军到达毛儿盖、漳腊附近时，蒋介石的参谋团曾令我们往投“青白弹”（毒气弹），并嘱保密，但我们因未发现红军部队，又怕带回来会挨骂，看陆有危险，便把这几十枚“青白弹”都投到树林里面去了。后来我到西安见到蒋介石时，蒋问我这种炸弹效力如何，我只好含糊以对。

这时胡宗南在成都的办事处同空军联系密切，主要是对他们投送物资和传达情报、命令，这些活动经常不断。其他陆军将领也很重视空军，总认为空军可以助威。对于芦山城的攻破，空军轰炸出力不少。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也非常重视我们，还在成都大请其客。可是，他们使用空军都是外行，只向空军要情报，而很少把陆军作战情况告知我们。我们的空中侦察经常是盲目的。特别是这时红军大多夜行昼宿，不走大路，空军侦察发现的情况很少。

国民党空军连年作战，伤亡很多。到西安时，仅我直属第三中队的飞行员，就死了2/3还多。现将我所记起的国民党空军参加对红军作战中的损伤，略述如下：

（一）第三中队刚到江西时，飞行员俞铮驾机去抚州送信，中途机坠摔死。

(二) 在红军长征以前进攻兴国时，第二、五中队飞机各一架协同国民党军作战，空中互撞，两机均毁，机中第三中队张宝衡、邱振中，第五中队张杰三等4人均死。

(三) 第三中队飞机一架在湖南道县低飞侦察，被红军击落，飞行员谢廷藩、魏德被俘。

(四) 四川天全、雅安战事吃紧时，天气不好，第三中队飞机两架撞山，飞行员徐夏、陈瑾云及杨某等丧命。

(五) 第三中队飞机一架在黑水河因故障迫降，飞行员朱嘉鸿、郭诗东被击毙。

(六) 第五中队队长王伯岳驾机飞至漳腊西北山头上被击落。

(七) 到西安后，天水机场曾因飞行事故，死飞行员李辉、金恩心二人。

(八) 在固原第五中队队长符克起驾机起飞时，所带炸弹爆炸，机毁人亡。

蒋介石为了利用空军卖命，对空军的薪金比陆军高过20%，名为飞行加薪（我当时任上校，月薪487.5元），另外空中飞行一小时，给予奖金二元。飞行员死亡，抚恤金每人一万元。

蒋介石对我们尽力笼络，时常找去面谈，问我月薪是否够用。蒋介石去江西和追击红军长征期间还颁发给我“宝鼎”“云麾”勋章。周浑元曾对我说，老头子（指蒋介石）把我们都当孩子看待，打你一个嘴巴，给你一块糖吃。他有一次受到蒋的严厉斥责，临行蒋却又问他的母亲何时做寿，说他准备写副寿联。

1936年，两广地方军阀反对蒋介石，剑拔弩张，战争迫于眉睫。第三中队曾被调驻贵阳月余。两广事平，第三中队才回成都转往西安。这时驻西北的空军有第三中队（主队），第十二中队（驻兰州）和第九中队，仍组织陕甘空军指挥部。第三中队曾派一个分队飞到云南丽江，配合陆军堵击红军贺龙部队北上。“西安事变”结束后，全部空军调到蚌埠集训。

第二章 设置四道封锁线 堵截红军

“互不侵犯、借路西行” 协议的制定和执行

黄 若 天

1934年春，陈济棠邀请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从广西来粤，共商防蒋防共军事大计。白崇禧来粤后，作了赣南之行。走了一个月，经过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县，最后到达赣闽粤交界的筠门岭。

白崇禧去赣南返穗后，向陈济棠谈了此行的观感。陈便召开了一个由军参谋长以上将官参加的会议，会中白报告了此行的见闻，作了形势分析，大意是：“……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产党的根据地逐步缩小。这一战略战术，有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汇报，近日在上列韩坊、古陂等地，每隔十日左右，常发现有共产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一军警卫旅第二团少校政训员。

人，多者七八人，东张西望，用望远镜，进行地形侦察。这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自此次白崇禧作了形势分析之后，陈济棠逐步加强了粤北的部署。陈汉光的警卫旅，李汉魂的独立第三师，张达的第二军一部，都先后布置在粤汉线两侧。

红军长征前夕，1934年8月间，红军出动了一支较大的部队，由赣南进入湘南蓝山、嘉禾一带，似对地形作威力侦察。

这时，陈济棠的直属部队——驻广州近郊江村、高塘的警卫旅第二团，奉命紧急移防连县。到连县后，作防堵红军入粤的部署。第一营开往东陂布防，监视蓝山方向；第二营开往屋子布防，监视临武、嘉禾方向；团部直属队和第三营则驻连县城，作固守城防的部署。

部队到达连县时，又调来独立第三师第二团李绍嘉部增防，并归警卫旅副旅长指挥。当时指定李团直属队及第一营配置在县城；第二营在阳山县城和犁埠；第三营位于阳山的青莲和英德的大湾、浣洗，作为援队。

在连县驻防了两个多月，警卫旅第二团于9月初奉命移驻翁源，独立第三师第二团仍驻连县、阳山、英德一带。

警卫旅第二团到翁源后，全团驻在通往江西全南的坝仔。团的任务，作防堵红军入粤的布防。具体布置，由坝仔到江西全南边境的二三十公里的公路，沿路纵深构筑散兵壕，并择要加筑机枪掩体。

那时警卫旅第二团的指挥，是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江国梁。我经常随他去看士兵构筑工事，沿途闲聊。有一天，他感慨地对我说：“我与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同学几年，千万不要碰头打仗。”黄国梁与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是同学，毕业后同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服务；黄于北伐后期，任顾祝同部第三师师长，蒋介石

石怀疑他与白崇禧暗通，被撤职走南洋，后回国投效陈济棠。常于言语间，对蒋介石表示极度不满，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情绪，也溢于言表。

在坝仔驻防三个多月，由坝仔到全南边境沿公路的散兵壕工事，差不多都完成了，10月中旬一天，接到总部通报，说红军在江西信丰附近的古陂、版石、重石、新田一带与余汉谋第一军接触，战况激烈，双方伤亡很大。

见过总部通报之后，不久，跟着接到出动的命令。记得作战命令是在1934年10月19日到达的。命令指定警卫旅第二团要在10月22日午前到达南雄城。紧急行动，把多余物资行李，派员全部带回广州。部队于20日拂晓轻装出发。由坝仔取道始兴县属的司前，经过柴塘、始兴，直趋南雄。

时间紧迫，夜以继日急行军，人劳马困，官兵疲惫不堪。接近南雄城时，三三两两，不成队伍。能于22日午前赶到南雄城的，只有团旗、团长、团部和特务连少数官兵而已。就是说，做一个象征性遵时到达。

粤北重镇南雄古城的大街小巷，睡满士兵，风声鹤唳，一片战时混乱。

正在这个时候，闻说红军先头部队已过乌径。又闻独立第二旅陈章部在水口圩与红军有小接触，随即停火。

在南雄住了一夜，团奉命移往仁化。队伍到达始兴县城附近，奉到急电，着黄国梁即到韶关地区司令部，他要我同行。队伍由第二营营长韦卓升率领，直趋仁化县。

到达韶关，先到地区司令部去见独立第三师中将师长、北区绥靖主任兼地区司令李汉魂。

跟着又去见独立第三师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地区司令部参谋长李江，都因他们休息，没见到。

最后，见到第一师上校参谋长，调地区司令部参谋处工作的李卓元。

李卓元一见面就说：“没有仗打了，但要求下面不打仗，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跟着李卓元分析了战局，部署任务。

他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边境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巫剑虹的第四师负责运送，到乌径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李卓元一面讲、一面指着1/100000军用地图）：乌径、百顺、长江圩以北、城口、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

李卓元面对黄国梁，继续说：

“至于任务呢，警卫旅3个团，集中在仁化一线。陈汉光旅长在海口不能来，旅部也不能赶到，由你全权指挥。除你的第二团外，第一团莫福如部已向长江圩前进中（莫团由肇庆开来）。第三团彭智芳部的第二营何汉武部，已由广州来韶关列车中；第一营、第三营现在海运途中（彭团从海南岛开来）。

“同共产党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下达，但要明确要求，共军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共军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可不容易啊！”

由于形势紧迫，我听完战局分析及接受任务后，便行告辞。

告辞后，黄国梁对我说：“李卓元说的是对的。无仗打似乎容易，但要求全不接触，却很艰巨。郭士槐（二团中校团附）平日很恨共产党，我想不要他到前方了，留他在韶关，接应第三团。免得到前方惹麻烦。前方的事，我与你轮流处理就是了。”

经过仁化县城，到县府见过姓戴的县长，我们便乘骑直奔扶溪，25日到达扶溪，接到通报，红军前头部队，已到百顺。便把部队作了一些调整部署。

莫福如一团部署在长江圩以南地区，彭智芳三团布署在厚坑以南地区；并通知何汉武营经董塘时，直出厚坑。第二团位置在扶溪圩，作总预备队。

26、27两日，第二团就地休息。第一团即布置、构筑些简单防御工事。26日第三团何汉武营已到董塘，命令27日午前到达厚坑，在厚坑南面高地布防。

27日夜十时许，我接班不一会儿，第一团团长莫福如来电话，说红军部队徒涉锦江，队伍庞大，有乘骑，有辎重，好像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请准半渡出击。我在电话上答，碍于上头规定，还是不要出击。莫便取消了这一意图。这一夜，锦江方面长江圩境，红军队伍，不断西行。

28日凌晨4时左右，厚坑方向（在扶溪正西），突然传来交织着的步枪声和轻机枪声。电话询问何汉武，为什么有枪声？答以红军侧翼在恩村（距厚坑约十公里左右），并向厚坑搜索前进，逼近厚坑。问何营的位置，答在厚坑以北。责问为什么不依照作战命令布防在厚坑以南，却突出厚坑以北？便命令他即刻撤退到厚坑以南。何在电话上缠个不休，不愿撤退。我放电话，决定通过仁化县戴县长转去电话命令，着何营切实执行，即刻撤至厚坑以南。不久枪声停了，我叫醒黄国梁，简单报告了厚坑方面情况，他同意我的处置。

警卫旅第二团撤回仁化县城时，队伍正在城边休息，遇上余汉谋第一军尾随红军队伍西行的第二师队伍。为首带队的是陈济棠的侄儿、第五团团长陈树英。他一见到我们便破口大骂，“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饭桶！”

红军过后，警卫旅在仁化召开营长以上参加的军事会议。在会上，黄国梁对何汉武营长作了严厉的批评。并曾大骂要把他枪毙。

会议之后，跟着紧急移防；第二团接独立三师第二团李绍嘉部的乐昌防务。第一团、第三团暂移驻韶关，听候命令，准备回防。

第二团到达乐昌后，团部位置九峰山南麓。这时红军队伍已过二塘，独立第三师李绍嘉团即移驻连县。陈济棠整个部队，都

在准备回防中。

正在这个时候，陈济棠转下蒋介石责备他不堵截红军的电报。这个电报，我曾背诵过，但如今只记得零星的词句：

“……平时请饬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贲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这封电报，陈济棠加了几个字按语转发下达：“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陈济棠曾命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诸部，沿着宜章、临武、蓝山一线，追击长征红军。但先头部队亦距离红军一·二天路程。各部追至蓝山后，即回防广东、赣南。

警卫旅不几天从乐昌、韶关回防广州，整个旅集中广州近郊从化整训。

红军借路西行谈判情况点滴

秦 庆 钧

1943年5月，我被任为抗战时期广东省大后方的平远县县长。得严应鱼先生之介，与武平抗日游击队商谈，共同努力保卫平远。某日，与严先生夜宿于七寮严氏别墅，山野人静，联床夜话，无所不谈。*严先生历述1934年间秉承陈济棠命与红军商谈协定停战的经过。1945年初我到梅县，县长温克威请客，当时协定停战的主角黄旭南、杨幼敏亦在座，但绝口不提此事。解放后多年亦未见当事人提及。这使我十分怀疑：协定停战，放开堵口，让红军远征，究竟是否事实？直至1982年何长工发表《难忘的岁月》，其中“粤赣风云”一章，畅谈协商停战的情形并影有朱总司令的手令为证，此案才大白于天下。严氏告诉我的情节大体与“粤赣风云”所述相同，但还有些细节可作补充。

严应鱼字碧生，平远县仁居乡人，早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是时任陈济棠的独立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长期驻在赣、粤、闽边——即寻乌、平远、武平三县的交界处。其师长为黄任寰，字旭南，一般人尊称他为“旭公师长”。《难忘的岁月》中误为“黄旭初”，“黄旭初”系广西省政府主席，不属于陈济棠系统。

1934年7、8月间，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增兵“围剿”江西苏区红军。陈即转电黄师严旅进往。严旅长立即率领第四团（团长

* 作者1943年任广东省平远县县长。

李恒中)、第五团(团长陈绍武)、第六团(团长伍汉屏)抄小路进入江西寻乌前线。并派出第六团工兵营长黄德毅沿路掘壕、建堡、设网、架炮,以困苏区,严阵以待。旅部则设于寻乌县的罗塘镇。严旅部下多是武、平、寻的子弟兵,与苏区的红军不无香火因缘,现在虽严厉对垒,仍不愿互相残杀,故始终两方都未开过一枪。

蒋介石这种借刀杀人方法,陈济棠熟知,但无法公开抵抗,不能不予敷衍。周恩来、朱德利用蒋、陈间的矛盾,向陈宣传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同胞不要互相残杀,枪口应一致对外的道理。陈氏当即接受并派第七师师长黄质文、第一集团军总部杨幼敏赶到罗塘与黄旭南师长会同,作为代表,和红军商谈停战协定。红军方面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严旅还派旅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会谈的接待工作。

严旅长派出其特务连(警卫连)连长严直迎送何长工、潘汉年两位代表,并负警卫保护之责。严直是广东新会人,严旅长的心腹,故派他负此重任。轿夫4人原是湖南人,其后都落籍于平远仁居乡。其中一人名李春凌,现尚健在,据他回忆,何、潘俱“斯文”,和蔼可亲,轿到罗塘镇,何送给轿夫每人大洋一元。广东都行使“双毫”,见到大洋甚觉名贵,将它储藏不用。何、潘两代表到罗塘镇后,住进旅部在该镇的小洋房的二楼。黄质文、黄旭南、杨幼敏即住楼下;会谈在二楼的会议室内进行。

停战协定签订后,严旅长并奉命以大量食盐送给红军,随又赠送子弹几百箱与红军。

以后红军突围不是向东南寻乌、武平,而是向西南。由于都经信丰,沿着大庾岭边缘而进入广东边界。陈济棠执行协定,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惟是仍装模作样,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但秘密通知各高级将领,谓共产党只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互不侵犯,应属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当时

负责指挥警卫旅的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黄国梁是增城人，与叶剑英系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极不愿意碰到相打，接到这互不侵犯指令，心情舒畅，多方设法饬属避免与红军接触，让红军安全通过。

这种事情蒋介石不会不知道，闻曾有电向陈济棠谴责，但当时陈的兵力雄厚，蒋无如之何。后来用收买、分化的手段，才将“南天王”推倒。严旅第四团团长李恒中“升调”到南京，不久亦为蒋借故枪毙了。

陈济棠的“保境安民”令

李悦仁

1933年2月，我到粤北南雄古城，投效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师司令部参谋处，任中尉书记，管理该处的收发文件、图书、档案等工作。该师中将师长李汉魂，兼任北区绥靖委员。绥靖委员公署驻韶关，师司令部驻南雄。李汉魂多在韶关绥靖委员公署。

1934年10月中旬，有通报，江西红军从瑞金、于都、会昌等地向西突围。独立第三师奉命由南雄向仁化县长江、城口移防，在该线与独立第一旅、警卫旅组成防堵红军西进的防线。

有一天，余汉谋第二师经龙南、大庾向西追击红军，到达金樽坳（延寿附近）时，与一支红军队伍遭遇。第二师将坳口堵住，并知会我师，由坳背分两路，沿着山腰战斗前进，将该红军包围。但红军凭借民房，利用山沟隐蔽，顽强抵抗。经过半天战斗，我师与第二师，终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将该支红军小队伍打败，并俘虏了几十个穿便服的人。

经过这次小战斗后，红军绕过广东仁化境，在湘粤边山区继续西进。独立第三师奉命向乐昌县境进发，分驻九峰圩，粤汉铁路广东段两侧，继续堵防红军。

11月下旬有一天晚上，云雾蔽天，细雨濛濛，午夜时分，九峰圩附近，又闻机枪声阵阵，间有密集的掷弹筒的发射爆破声，估计是一支主力队伍通过的激战。我师与各团严密联络，了解战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师参谋处中尉书记。

况，方清楚是由于天黑气候恶劣，从湖南汝城尾追红军的第二师，在九峰山与独立第三师发生误会而交火。后前方指挥部发现对方的火力不像红军，用军号联系，方知是误会。

战斗刚停，天将拂晓，无线电台送来陈济棠总司令部的电报，文意如下：

伯豪兄：

关于金樽坳战报，各悉。我军以“保境安民”为主。

陈伯南 穗总参××

自是之后，我师再没有与红军发生过战斗，仅奉命由九峰山过坪石，入湖南宜章，沿着红军西进的道路，尾随追击。过临武，抵蓝山，便停止前进。我们在蓝山休息一天，即南返回防。从蓝山南下连县，再回乐昌县城驻防。这时得知红军已过广西全州。不久，我师回防韶关。

粤军第一师对红军的堵防

李 振

1933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大军对中央红军展开第五次“围剿”，并以陈济棠任南路军总指挥，陈以第一、第三两军分作东西两路，担任东路（粤、赣、闽边境）的第三军（军长李扬敬）曾一度进占筠门岭，担任西路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仍在原地赣州、南雄一线担任堵击。

1934年2、3月间，担任西路的第一军为防红军向南突围进入广东，重新调整了部署：以第二师（师长叶肇）主力仍驻信丰城，并派一部接替第一师赣州防务；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师部及第三团驻防信丰县属的古陂，第一团移驻重石，第二团移驻新田，教导团移驻版石，并由原独立第二师新改为第一军第三师的张瑞贵部接替桂军第四十四师的安远防务。这就使安远至信丰至赣州形成完整的一线，并以安远、信丰段作为重点。第一师进驻古陂等地后，经常派队到天心圩、龙布圩、牛栏等地游击。

在这段时期中，蒋介石为了配合其第五次“围剿”的军事行动，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更加严密，致使苏区所需的食盐、布匹、药品等更感缺乏，价格昂贵，因而师及第一团与大劣绅赖某（名字忘记）勾结，贩运食盐、布匹、药品等进入苏区，牟取暴利。

同年7月间，第一、第三两团奉命交换防务，即第一团移驻古陂，第三团移驻重石接替第一团防务，教导团驻版石。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团长。

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由会昌出龙布圩，一路由于都经小溪向大庾进发。余汉谋为了保存实力，巩固粤防，急电第一师撤回大庾、南雄布防。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命第三团团长彭霖生并指挥教导团经月子岗取捷径先开大庾，归军部直接指挥，准备亲率师主力经安息（今安西）向南雄后撤。驻新田的第二团刚开始行动，后尾部队即遭受前进迅速的红军袭击。李师除派第一团一部前往迎接外，并命第二团团长廖颂尧迅速向古陂后撤。第二团到达古陂，师部及第二团急向安息先行撤退，而以第一团殿后，并将大量弹药交由第一团处理。当时因运输力不足，无法搬运，为了避免落入红军之手，竟大肆破坏。第一团尚未撤出古陂，即遭红军袭击，发生战斗。战至深夜，我决心利用夜暗撤退。为了避免红军尾追，掩护主力安全退却，先派一个营撤至金莲山隘路占领阵地，主力部队则采取留少数兵力维持火攻以欺骗红军掩护撤退，然后听号音全线撤退到指定地点集合的办法脱离红军。当红军发觉我团撤退进行追击到达金莲山隘路时，遭到我团温营的突然袭击，始稍后退。第一团于次日9时到达安息，正准备做饭，红军先头部队又已跟踪追至，因而又展开了战斗。激战至次日下午4时，红军后撤。第一团为了迅速脱离红军，即经月子岗向南雄撤退。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在信丰、大塘间架桥渡信丰河绕经大庾以北地区向湖南汝城方向前进。当余军撤到大庾、南雄时，曾与余军作战的红军，亦已经大庾以北的黄龙、青龙间向湖南方向前进。此时，方知与余军作战的红军，在以积极行动掩护红军主力部队的转进，目的已达，遂主动后撤。当时蒋介石虽然急电余汉谋尾追红军，但余汉谋为了巩固粤防，并未沿红军经过的路进行追击，而是命令第一师向乐昌前进。第一师除以一部用汽车输送至曲江再转乘火车先到乐昌外，主力则经南雄、百顺、扶溪、仁化至乐昌。到乐昌后并无情况，为了应付蒋介石的追击电令，又继续向坪石前进，达到坪石时，红军已离去更远。在坪石休息数日，遂仍回防南雄及赣南各地。

粤军第二师追堵红军概况

侯 梅 李友庄

陈济棠围堵红军的作战 指导思想及兵力部署

蒋介石从1930年开始至1934年春，对江西苏区红军发动一、二、三、四次“围剿”，均被红军击败。继而采用碉堡政策，封锁围困，妄图彻底消灭红军。并用借刀杀人的办法，驱使陈济棠出兵两个军，担任封锁赣粤边境、截击红军的任务。陈济棠深知蒋介石的用心，便采用阳奉阴违、避实击虚的对策，把广东部队以集结为主，以小部队分驻各地，虚张声势，对蒋介石表示服从和拥护。其实，这是陈济棠保存实力的对策。由于派出的部队小，行动容易，万一遭遇红军袭击，所受损失也不大。大部队与小部队之间，经常保持联系，万一战况不利，小部队则向大部队靠拢，取得一致行动，相机转移，避免打硬仗，以免严重损失。

1934年10月中旬，红军突围到达赣粤湘各省边区，急速地向西移动。余汉谋的第一军第一师首当其冲。10月17日上午早饭时，驻新田、重石的部队，同时得前哨电话急报，红军约有几百人，正向他们前进阵地威力搜索。当时，第二团、第三团的团长均不相信是正式红军，以为只是“土共”来骚扰，各派一营出击

* 作者侯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二旅参谋长；李友庄当时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二师第五团第一营营长。

驱逐。没料到该两营出发未几，即遇红军迎头痛击，愈战愈烈，才知是红军大部队。此时第二团之一营（出主营）在挨打之下，勉强支持至天黑，乘夜撤回新田，红军衔尾追击，吓得在新田的副师长莫希德惊惶失措，慌忙撤出新田，逃回古陂集中。而重石、版石的第三团和教导团团长沙霖生一贯狂妄自大，错误地认为红军大部队不会那么快来到，可以打一场速决战捞一把再走，却不料被红军以迅雷之势，分路合击。这样该两团虽得师部急撤古陂集中的命令，但已陷于无法脱离的困境。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该两团伤亡颇大，只好边打边走，极其狼狈，师部及第一、第二团退到信丰安息圩（今安西），部署了掩护阵地，等了约两天，总算陆续收容到第三团、教导团的残存部队。该两团经过是役伤亡颇大，辎重行李抛弃甚多。后来该师回到大庾，余汉谋把彭霖生痛骂一顿。未几，教导团团长沙霖生以作战不力被免职。

由于红军要突围长征，非击破余汉谋的赣南第一道封锁线不可。因此红军在占领新田、重石、版石、古陂各据点之后，接着即节节进迫安息圩，把安息圩三面包围。喘息未定的第一师处于战守两难的困境，急电余汉谋请派增援部队。余派第二师第五团（当时驻信丰县）是夜赶至安息圩助战，以第一团（团长李振）及第五团的第一营向北佯攻红军，掩护其余大部队向南撤退。由于红军不打算在此决战，而是急于向西转移，因而第一师和第二师一部也得乘机向龙南县撤退，转向粤北南雄，据守广东地盘（当时陈济棠既要防红军入粤，也要防蒋介石的中央军来抢地盘）。10月20日，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到了大庾县附近，形成了包围大庾的态势，大庾极为危急。

红军围大庾掩护主力西进

余汉谋的第一军自1932年开入赣南参加“剿共”以来，其军司令部驻在大庾县城，花了不少人力、物力，构筑城防半永久性

工事，企图固守（深沟高垒，四面旧城墙脚都以水泥修补）。红军装备较差，更主要的是红军目的在西进，故对大庾不作恋战。而余汉谋等到其基本部队集结大庾完毕后，于10月下旬即派第一师的第三团团长彭霖生（被红军击败后逃回曲江，再到大庾，衔余汉谋戴罪立功之命出战）率领第二、第三两团向大庾之北西峰山（距大庾约二十里）之红军攻击。其实，这批红军的后卫部队，已先占好阵地，居高临下，而彭军仰攻不易，双方相持一天，战斗不甚激烈。红军乘夜撤离阵地，分向湘粤边境山区地带撤去。彭霖生洋洋得意地率队回大庾向余汉谋夸大战果，把红军的主动转进说成是击败了红军。

延 寿 之 役

1934年10月下旬，红军撤离大庾之后，余汉谋即部署一面防堵，一面追击的两套办法：以第一师（欠教导团——该团留守大庾）由大庾经南雄、曲江向乐昌、坪石相机堵截红军，极力拒止其进入粤境；以第二师（欠教导团——该团留守信丰）及独立第二旅（归第二师长叶肇指挥），经仁化的长江、城口向九峰一带衔尾追击红军。当时，第一师方面，一直未遇红军。独立第二旅、第二师方面沿着红军前进道路尾追，最初两三天，两军的距离不过一天或半天的行程，随时都有接触的可能。11月6日，第二师由仁化的城口附近出发，独立第二旅走另一条路早一小时出发，当时第二师的行军序列按第三团（前卫）、师部直属部队，第四团、第六团的次序前进。中途得报：延寿（属湖南汝城）附近一带山地森林仍有红军的后卫，是红军第五军团在那里掩蔽休息，状极疲劳等语。第五团团长陈树英即令全团加速步伐向延寿急进。先头营（营长李友庄）行抵延寿东南端的两边高山右前方一条小河流（河面颇宽，水却不深，可以徒涉）的地方，发现在对河山峭上的红军，当即双方展开战斗。红军居高临下，且倚河作障，

有险可守，而第五团团长江树英强令李友庄营涉水强攻，红军沉着应战，俟李部半渡而击，因而该营官兵伤亡较大。李友庄到达彼岸后，即拿起望远镜瞭望，亦中弹伤手。营附潘国吉带着第一连的一排横冲几个山头，最后爬上一个较高的山林，遇着红军集结大批队伍（千人以上，只少数有枪，疑属后勤运输部队）样子像整装待发。此时该营附潘国吉及其身边剩下的十多个士兵，欲逃不能，只好作了俘虏。他们以为必死，可是红军对他们不杀不辱，问他们愿不愿随同北上抗日，他们表示不愿，随即获得释放。

叶肇的第二师在延寿附近追上了红军，而真正上火线的只有一个团（第五团）。该团打得比较激烈的只有一个营（第一营），打的时间也不过一昼夜。战斗结束，清扫战场，红军被打死十余名，粤军被打死的约三十名。红军乘夜撤离阵地，粤军不但不敢跟踪尾追，而且连红军的去向也弄不清楚。

延寿之役第二天，竟闹出一场乱子：由于粤军各部行动不协调，联络不周密，叶肇第二师的先头部队在黄昏时候，从延寿向九峰搜索前进，在离延寿二十余里的地方，突然发生战斗。这是因为该两路追击部队，事前没有联系好，其中一路是由江西大庾出发，经热水向湖南延寿前进，即叶肇所率领的第二师独立第二旅；另一路由广东仁化经城口向延寿前进，即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和独立第一旅。两路部队都在急进中。碰见队伍，便误认为敌人，立即打了起来。经过两小时战斗以后，觉得枪炮之声不似红军，乃以号音问答，始知是友军误会，然而互有伤亡，演出了一场丑剧。以后，陈济棠曾派李汉魂率领两个师，编成一个纵队进至蓝山、江华等地防堵红军入粤。李汉魂竟把这次战斗的伤亡数目混合在延寿与红军战斗的伤亡内，夸大战斗，虚报战果，因而得到蒋介石、陈济棠的嘉奖。

11月中旬，第一军第二师协同湘军追堵红军，由广东坪石进至湖南的临武和蓝山后，即告停止（沿途相距红军仅一天路程，

实是为红军送行)。第一师在坪石休整一个时期。到11月下旬第一军全部开回赣南，独立第二旅仍调回南雄整训。此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又在江西实行划分几个“绥靖区”的清乡办法，余汉谋受命兼任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司令部仍设大庾，对赣南十县采取“剿抚兼施”的手法，妄图彻底消灭红军和镇压人民革命。1934年冬，派部队到老苏区进剿，叶肇第二师与留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大战于赣南地区。

牛 岭 之 战

黎 天 荣

1934年春余汉谋为了防红军向南突围进入广东，乃调整部署，以叶肇第二师主力驻信丰，并以一部接替赣州防务；以李振球第一师驻古陂、新田、重石、版石地区，以张瑞贵独立第二师接替桂军四十四师安远防务。

1934年10月间，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一路由会昌经龙布，一路由零都（今于都）经小溪向西移动。余汉谋为了保存实力，巩固粤防，急分电第一师由古陂、新田、重石、版石现驻地撤回大庾、南雄布防；电独立第二师仍固守信丰。第一师师长李振球接电后，即命第三团团长沙霖生并指挥教导团从重石、版石经月子岗先开回大庾归军部直接指挥，他自率师主力经安息圩向南雄后撤。李师第三团及教导团在重石、版石开始撤退就受到红军迅猛袭击，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导团通过版石附近山地隘路，受红军袭击，伤亡惨重，行李辎重全丢失。战后教导团团长陈克华以作战不力被撤职。第三团李克煌营在重石撤退时受到袭击则绕道龙南，曲江归队。第一师师部及第一、第二两团在从古陂、安息圩节节撤退。驻信丰之叶肇第二师以防守为目的，红军过境，不来进攻，叶肇也就下令部队固守阵地，不必出击，而让红军绕道向西北方向前进。当第一师撤回大庾、南雄时，红军已经从大庾以北，青龙、黄龙间向湖南汝城方向前进。第二师曾奉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二师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

命对红军追击，但尾随红军至湖南省蓝山县后，便不再追击，11月下旬回防赣南。

自1934年冬，红军主力撤离赣南北上抗日，原来对红军非常害怕的第二师师长叶肇、教导团团长邓琦昌，此时却产生轻敌思想，认为红军主力已离开赣南，留下的是“土共”（指苏区赤卫队）算不了什么，所以他们在春节前都回广州过年，只留下副职坐镇前方。当时第二师师部驻赣州（？），教导团团部及第二营（营长谢胜芳）驻某地（地名记不起，在牛岭南15公里），第一营（营长沈干雄）驻牛岭（赣州西北约40公里），第三营（营长杨起鸣）驻畚岭，一、三营驻地大约相隔15公里。

牛岭对第二师整个驻地来说是个突出点，距老苏区社溪仅三十余公里。沈干雄营长于1935年1月上旬率领第一营进驻牛岭后，对警戒非常疏忽，毫无备战观念，对师长叶肇初入赣时提出的“剿共守则”早已放之脑后，驻地既不构筑工事，也不派出警戒部队。在春节前约一周的某天，他率领全营直奔老苏区社溪，沿途均未发现红军和赤卫队。在春节前夕，腊月二十九晚上副师长黄植楠给沈干雄打电话：“你营地处前缘，接近老苏区，要加强构筑工事，预防红军利用春节期间我军戒备疏忽时，向我军突然袭击。”沈干雄乃于次晨（1月28日晨）在牛岭村边集合各连长传达副师长命令的要旨，并粗心大意地说，我看红军不敢来，副师长为人小心谨慎，上级命令不可不服从。说完即部署在村的边缘挖散兵壕，以防万一。就在是日早晨的构筑工事中，发现有衣衫褴褛者三数人，由北边来，通过牛岭向南而去。当时认为是一般难民，并不注意。事后才推断这是红军派来的便衣侦探，侦探牛岭驻军情况。是日3时，我第三连已吃完晚饭。我即到村边，看看当天构筑的工事。见沈干雄营长已站在那边向前方观望，神色有些紧张。开口第一句问我：“你全连已吃过晚饭吗？”我答：“吃过了。”他立即对我下达命令：“紧急集合！你率全连跑步前进，占领牛岭坳，拒止敌人前进。我随后即率全营前来参加战斗。”并简要说明当前

情况：驻马岭（牛岭北30里）“铲共团”队长中午带来传令兵到营部领弹药回去，中途遇着红军大部队吹着洋号，浩浩荡荡而来，来势非常凶猛，驻马岭铲共团队兵十人早已躲开，特派传令兵跑步向营部报告情况。不出副师长黄植楠所料，红军果然来了。此时沈干雄也谨慎起来，嘱我要小心，吹着洋号来的是红军大部队，务必快跑抢先占领牛岭坳。

我接受命令后，立即回连，吹起紧急集合的号音，率领全连向营长指示目标跑步前进。全连先通过牛岭街，继续跑步前进上到半山腰后，即发现红军先头部队早已通过牛岭坳向我军急进中。我立即下令全连散开，占领半山腰有利地形，集中轻机枪、步枪火力向红军先头部队猛烈射击。红军先头部队向我猛冲两次，均被我猛烈火力击退。其后续部队即向两翼高山展开，对我连形成包围之势。激战一时余，第四连连长李秀华始率领该连在我连左翼延伸参加战斗。再激战一时许，红军后续部队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增加，我第三、第四两连已陷于红军层层包围之中。李秀华见形势不妙，即下令该连撤退，只剩下第三连苦战。我非常焦急，没有营长的命令，不能后撤，我连已苦战两时余，营长为何不率队增援呢？但闻后面山岗枪声甚密，知道那边也有战事了。片刻营长即派来传令军士说，营长命令第三连撤退牛岭村占领既设阵地，与四连协力固守牛岭村。营长指挥第一、第二两连在后山与敌人正在激战中。我奉命即指挥全连边战边退，退到牛岭村既设阵地。红军即漫山遍野而来，步步逼近向我第三、第四连阵地猛冲。在此危急关头，忽见后面有大批增援部队汹涌参加战斗。旋又听到团部发出冲锋号。此时才知道团的增援部队已到达。但环观左右各部队仍然不动。我乃急令身边的号兵发出第三连的冲锋号音，并叫旗兵举起连旗跟我带领全连冲锋，待我连冲出阵地前约百米，始听到其他各连继续发出冲锋号。在我带领全连冲锋时，通过水田小径，我个人在先，连旗兵及号兵跟随在后，各班长亦紧紧跟上，形成长蛇阵。因连旗目标显著，受到右

前方红军重机关枪的扫射，跟我后面的班长等中弹倒下三人，幸我身边号兵敏捷地叫声：“连长卧倒！”我立即卧下，才避免中弹。我连随即利用前方独立屋遮蔽，以轻机枪火力制压红军的重机枪。掩护继续向前冲锋。此时我左右各连亦陆续向前冲。待我冲至牛岭坳半山腰时，我连只有士兵三四十人跟上，三个排长都未跟上，其他各营连冲上来的仅排长一人，士兵约百余人。红军则退后占领绵亘高地山顶。此时教导团副团长周伯宗亦已跑到半山腰上，他立即下达命令：“所有到达前线各连官兵统归黎连长指挥，编为突击队，向左前方高地制高点冲锋而占领之。”我立即指定两名军士为代排长，并下达冲锋命令，指挥这些零星队伍往前冲。此时已是夜间8时，听到红军叫出“准备手榴弹”的声音，我指挥的队伍就被吓得溃退下来，我伸开两手，拦也拦不住，反而被他们撞下山沟。经此一仗，深感夜冲锋，如不是严格训练，团结一致的队伍，是很难掌握的。此时已是深夜，副团长下令将所有队伍撤回牛岭村固守阵地。我从中沟里爬上来，率领十余名士兵摸索回牛岭村的途中，看到四面高山顶上红军点着熊熊火光，并听到红军频频吹着喇叭号音。

我回到连部时，才知道营长已负伤。在我尚未归队时，营长很担心，曾派我连排长凌树声和我的胞弟天赋率一排人出来找我；红军吹的号音，是收容撤退的号音，在拂晓前就会撤走了。营长对我详谈战斗情况说，第三、第四两连在前方激烈战斗中，营长准备带第一、第二两连上前增援，忽据报有红军占领了后面高山，营长知道后路断绝很危险，即指挥第一、二两连向后山猛冲，红军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第一、二两连伤亡颇大，营长脚部亦中弹负伤。他此时才记起叫他身边的中号报务员钟××（名已忘，黄埔军校七期生）回营部打电话向团部报告。此时电话线早已被红军截断。幸营部书记事前已自动打电话向团部副团长周伯宗报告，刚说了头一句“红军来打牛岭”，电话就不通了。此时周伯宗正在吃晚饭，接得电话，知道第一营情况危急，饭也

顾不得吃了，立即叫吹团紧急集合号，亲自率领第二营及团直属队跑步向牛岭前进，增援第一营战斗。周伯宗在出发前即打电话给畚岭第三营，命令杨起鸣星夜驰援牛岭战斗，并向师部副师长黄植楠报告，请火速派队增援。当沈干雄率第一、第二两连与后山红军激战将两小时，处于形势危急中，周伯宗率领的生力军即已到达后山向红军展开战斗，持续激战约一小时，即把后山红军冲破，打通了后路，与第一、第二两连会合。周伯宗见到沈干雄便说：“后路已打通，你营全交我指挥，你可乘担架赴后方，较为安全。”沈坚决地答：“我们生死在一起，我个人不能后退，影响军心。”

战斗至次日（1月29日）拂晓前，红军伤亡损失较大，已全部撤回老苏区。畚岭之杨起鸣营及师部派来之第六团余子武营于次晨先后到达牛岭，因红军已撤退，未参加战斗。

战斗结局，红军伤亡损失惨重，遗下尸体数百具，叶师邓团缴获步枪五百余枝，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十余挺，手枪十余枝。

这次战斗是余汉谋军叶肇师入赣“剿共”，四年来给红军伤亡较大、枪械损失较多的一次战斗。当前方战报报到广州之际，叶肇喜出望外，亲率教导团长邓琦昌去见陈济棠报功。陈济棠高兴地说：“我们的军队，就是要训练成这样精良的军队，要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并发给邓团奖金万元。叶肇回到前方见着我时也很高兴地问我，在这场战斗中，应用了什么战略战术能以少胜多打败了红军。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是用了各个击破的战术打败了红军。

何键部阻截红军纪实

李 觉

1934年7月底，湘鄂赣边区红军在萧克将军的指挥下，突然集中于湘赣边的武功山地区，向湘粤边区方向前进。当时何键的第四路军总部并不明了红军的意图，估计红军可能为了集中突击某一点的部队，因此只令各部队加强封锁线，严阵以待。到8月初，萧部在湘南的汝城突然出现，对当地胡风璋的部队予以重惩后，继续向西前进，因此湘南的宜（章）、郴（州）地区告急。第四路军总部当即令第六十二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三师各部迅速向郴、桂（阳）方面集中，以观动静。这时，萧部红军由湘粤边境经宜章、嘉禾、新田、阳明山地区向广西的全州方向前进，蒋介石电令广东、广西、湖南各省部队从事堵截。但各方面都不知红军这一行动的企图，估计可能要在湘粤桂三省边区进行大规模活动，以便牵制三省的兵力，使赣闽边红军主力的决战有利，或在不利时便于突围，以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各省都为自己的安全打算，忙于堵截红军，使不致威胁自己省区的腹地。各省虽互相联系，但并不合作。

当湘南阳明、道县地区发现情况时，我奉命率领在邵阳集中的第十九师的部队，经阳明县向宁远、道县方向前进。当到达阳明时，知道红军已进入广西全州附近，继续向西。我们判断有向城步、绥宁地区进出的可能，就由现地改道，往永州（今零陵）的铲子坪向东安前进。这时知道桂系的部队已向全州、龙胜方面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第十九师师长。

前进，阻止红军向南进入广西腹地，但彼此联系不上。

那时，第四路军总部为了保证湖南境内的安全，除令湘南地方团队在新宁、武冈集中堵截，并将长沙警卫旅车运武冈协同地方团队防守外，令第十九师急速由黄沙河经东安、新宁，星夜向武冈前进。大约在8月中旬，第十九师到达武冈同警卫旅会合。这时红军已经由龙胜入湘到达绥宁境内，绥宁的保安队约一个营已退到长铺子附近待援。第十九师奉令迅速开向长铺子，并跟踪红军的进出路向金屋塘、瓦屋塘之线前进。警卫旅则在第十九师后尾跟进，因为这个旅虽成立已有两年，训练和装备都比较好，但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连长途行军也还是第一次，所以不敢放手使用，只能把它作为预备队。当第十九师到达瓦屋塘时，才发现红军已转向通道县方向前进。除地方团队在红军后尾名为追击、实际是监视送行外，第十九师和警卫旅即由现地向靖县前进，目的在压迫红军离开湖南省境。

9月19日，第十九师到达靖县和通道附近时，接到总部电令，知广西已派廖磊率领桂军4个团向湘、桂、黔边境前进，堵截红军，指定湘军各部队归廖磊统一指挥，协同围攻南行的红军（廖磊原来在湖南第一师任团长时，我当过该团的营长）。湘、桂两省的军队，这时虽是共同对付红军，但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在行动上并不协调，联络也不密切，就不免闹出笑话。记得在中秋节的前后，第十九师在通道附近继续尾追红军时，在离通道不远的地方（地名记不起了），我师先头连突然发现情况，因双方都在急进，来不及考虑，便横冲直撞地打起来。等到我们检视对方死者的符号，才发觉是桂军，可是已经互有伤亡，演出了一场哭笑不得的丑剧。

湘桂军会师后，红军已进入贵州，到黎平附近去了。我们仍然不了解红军的目的是何在，只估计可能是企图绕到湘西去同那里的红军会师。为了湘桂两省的自保，我们商定继续进入贵州追击红军。广西方面的想法，是要把红军送远一点，免得威胁广西。

我们的想法，就是要阻止这部红军不能到湘西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我们和广西的想法不同，但把这部分红军送得离湘桂两省远一点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当时同廖磊商定：湘军由靖县经会同、晃县、玉屏，向焦溪、镇远前进，以便超越到红军进路的前面，进行堵截，阻止红军向北前进，并压迫其远离湘黔边境地区；桂军则由黎平跟踪在红军的后尾，压迫红军向剑河、镇远方向北进，使不致向南转趋广西方面。我们同时电请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迅速派兵到黄平、凯里一带协同围攻，并请随时告知部队到达位置，以便联络协同，企图由三方面彻底包围红军。

当部队进入贵州后，到处山高路险，行军、宿营、补给都非常困难。那时贵州的部队，多以营为独立作战的单位，主要是因地势险要，大部队施展不开。而我们那时集结了5个团的兵力，在行动上很感迟滞，因此也组织了两个轻装的部队，进行远距离的搜索。到达镇远时，不料红军已绕过镇远，向余庆、石阡方面去了。桂军此时也到了镇远附近，主要是解决补给问题。至于贵州部队，我们按王家烈电报指定的位置去联络，但一直没有联络上。据联络人员报告说，黔军根本没有派出部队。后来才知道贵州的军队是集结在贵阳附近的龙里、贵定一带，以求保住省会的安全。

我同廖磊在镇远见面后，判断当面红军有向湘西红军会合的企图，初步决定湘桂两军应以镇远、石阡之线为基础，阻止其向东与湘西红二军团会合，并尽量将其向西压迫，以迫使贵州部队出来堵截，然后压迫红军于乌江江畔强行决战。于是，桂军以镇远为中心，向北延伸到羊场附近；湘军以石阡为中心，左接羊场，右翼向北延伸至大坝场附近，构成一条纵贯南北的封锁线，然后派出小部队向西搜索红军。

彼时红六军团（当时并不知此番号）经过长途的急行军，部队已很疲乏，需要作必要的休整，因此在石阡、镇远以西的山地

中停止未动。这一带山高路险，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有许多地方真不愧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所在。同时，我们虽然补给比较方便，但在长途行军之后，也是相当困乏，必须加以整补。而这一地区，军民关系太坏，我们的补给也感困难。当时黔军军纪之坏，在反动军队中可算是名列第一，官兵没有不抽鸦片烟的，真正是每人都有两支枪；“军行所至，鸡犬不留”，每到一地都要大肆抢掠。所以当地人民，只要看见军队，就都逃入高山岩洞中去避难。我们每到一地，都是人烟绝迹，必须由当地县政府派人到处寻找地保人员负责，才能办理补给。这些地保人员，又要从中敲诈，大事贪污，人民畏之如虎。老百姓被迫送来柴米菜蔬，也不敢说一句要钱的话，丢下就跑，因此部队也得不到够量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困难很多，部队行动因此大受影响，终于在石阡、镇远之线停止下来，就地封锁红军，不使向东发展，防止红二、六军团会师。

就这样，我们停止在石阡、镇远之线，相持了约七八天。后来在9月底的一个夜晚，红军由当地一个老猎人作向导，由石阡以南约40里处（地名记不起了）的警卫旅正面，乘雨夜阴暗，沿着一条不通人迹的谷涧水沟安全通过了封锁线。我们在第二天拂晓，才知道红军已经过去，起码已离封锁线有二三十里之远。当时除派部队跟踪搜索、实际是送行外，我们的主力部队也只好在扑空之后开始集结。

这时，红六军团既已突围向湘西而去，桂军认为他们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准备向广西回防，要我直接向第四路军总部请示今后的行动。但王家烈则一再电约要在石阡集会，商讨今后湘黔两省如何联合对付红军的问题。因此，廖磊也暂时留下，等到第三天王家烈才从余庆来到石阡。经三方面初步交换意见的结果，我们知道黔军内部复杂，王家烈本身也不能统一指挥黔军，即使作出决定，仍是空谈，反正他说的仍不能算数。大家就这样敷衍了两天，并无结果。我们就决定各取捷径回防。王家烈因地方善后

尚待处理，决定在石阡再留几天。

当我们在石阡会谈决定回防时，谁知在当天的夜间就接到何键的特急电，命令第四路军入黔部队星夜兼程回省。何键在电报中，命警备旅兼程开到沅陵后，即车运长沙警备省垣；令第十九师全部迅速到祁阳、永州地区集中待命。何在电令中并未说明集中原因，我们猜想一定是出了重大问题。但由石阡到祁阳，最快也得要半个月时间，为了执行命令，只好尽可能兼程前进。我们赶到芷江时，闻知闽赣边区中央红军主力已经集中，准备突围北上抗日。这时，我们才明白前时红六军团之突然向西行动，是替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侦察湘粤桂黔各省情况的先遣队。

大约在1934年10月下旬，我个人先行到邵阳参加总部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时进一步知道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后，已向湘粤边方向前进。为了使红军不致扩大在湘境的范围，我们打算利用湘江地障，在耒阳、永兴间及衡阳、祁阳、零陵间构筑几道防线。当时决定：以第十五师在耒阳、永兴之线，第六十二师、第六十三师在衡阳、祁阳、零陵之线，筑成碉堡线沿河固守，所有当地团队统由附近各师指挥参加防守。第十九师、第十六师到零陵集中待命。这时，第四路军总部已奉令改为“追剿”总部，率第十九师之第一〇七团即日进驻衡阳指挥作战。

那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军队都极度紧张，因湖南有过长沙失守的经历。几年来红军在江西多次反“围剿”中，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狼狈不堪，歼灭何止三数十万；尤其像董振堂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事实，对军心震动最大。因之当时湘粤桂三省的地方部队，都对堵截红军心存畏惧。

湘军那时在本省行动，收容补给都比较方便，故在急行军中还能保持一定的员额。尽管如此，但看到蒋介石的中央军那种情况，我们对堵截红军是谁也没有信心的。湖南方面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就是万幸。所以士气不高，行动缓慢。当我率领第十九师到达永州时，

中央红军已通过广西全州向湘黔边境前进。原来指定沿湘江设防的各部队，也才到达指定地点，尚未开始构筑工事。这时，由薛岳、周浑元所指挥的几个跟踪纵队的先头部队，已通过我们集中的地点，在红军后尾紧追。因而湖南方面可说是松了一口气，就开始把各师在衡阳、郴州、宝庆一带分别集中，稍事休整；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帮助汝城、宜章、临武、道县、永明一带的地方团队，对红军经过的地区作所谓“清扫战场”的工作。这时，第四路军总部认为红军已入黔境，并已有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踪尾追，湖南省内的追堵任务已告一段落，但在湘鄂赣边、湘赣边、湘粵边及湘鄂川黔边境地区，遗留的红军部队还不少，所以希望及早解除追堵任务，以便从事湖南省内的“清乡”工作。后得蒋介石指示：已由陈诚组织宜昌行辕，统一指挥湘鄂川黔各省部队及一部分中央部队对湘西红军（此时红二、六军团会师，组成红二、六军团指挥部）进行围攻，命令第四路军所部归陈诚指挥，执行对湘西红军的围攻任务。

截堵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

王 天 锡

1934年夏季，柏辉章（王家烈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由铜仁打电报给王家烈说，红二军团有由湘西大庸、桑植一带入黔的消息，请派部队增援防堵。过了几天，柏又来电，称红二军团已到川东的酉阳及黔东北的沿河、印江边境，请速增援。王家烈连接两电，并看到红二军团已入黔境，即派李成章（王家烈的第一旅旅长）率第二团（团长戴玉堂）、教导团（团长杨昭辉）由思南、石阡移驻印江、江口、统由柏辉章指挥。

这时，红二军团分布于川东的酉阳、秀山及黔东北的沿河、印江、松桃等县边境，大本营设沙子坡（距印江城北60里），并于该地组织苏维埃政府，李成章到江口、印江时，红二军团不继续前进，李也不敢进攻，双方均采取守势。当时，黔军方面还以为红二军团不再续进的原因可能是兵力单薄；后接蒋介石来电，始知江西红军主力行将突围，红二军团聚集川东、黔东北，是为了牵制黔军，掩护红六军团通过贵州。

是年8月，蒋介石派其行营高级参谋潘壮飞、路邦道为“督剿”专员，前来贵州督促王家烈“剿共”。王于潘、路二人到筑后，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会上宣读蒋介石命令贵州堵截红军的来电，继由路邦道以恐吓语调发言。他说，共产党在江西不能立足，准备西窜，前头部队已由江西出发，目的是来占据西南，如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贵州省警务处长兼贵阳市公安局局长。

果西南防守不力，一旦赤化，不仅对党国不利，同时还攸关诸位身家性命哩。接着他说，蒋介石已电令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及湖南何键出兵，广西已派第七军（军长廖磊，辖周祖晃、覃联芳两师）防堵黄沙河，何键已派李觉布防衡阳、邵阳一带。接着他又把语调提高说：“湘、桂都有重兵防守，他们（指红军）就必然窜贵州，希望诸位努力防堵。”接着王家烈宣布防堵计划，把他的直属部队和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等部分为七路：以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王家烈直属部队）为第一路司令，指挥第四团（团长蒋德铭）及李成章的第一旅（辖第二团、教导团）防守铜仁、松桃、江口、沿河、印江一带；以吴剑平（犹国才部的师长）为第二路司令，率所部由原防区盘江一带移驻都匀、独山；以蒋在珍为第三路司令，率所部由防区正安、婺川（今务川）、后坪移驻遵义的团溪及余庆司；以侯之担（王家烈的副军长兼川南区防司令）为第四路司令，率所部由原防区赤水一带移驻思南、德江，策应柏辉章；以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王家烈直属部队）为第五路司令，率所部第七团（周芳仁自兼团长）并调黎平、榕江、从江等数县民团（后来没有调集）在黎平、榕江一带防守；以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王家烈直属部队）为第六路司令，率所部第五团（团长郑金镛，后为李维亚）及犹禹九的第三旅由原防区安顺一带移驻平越（现福泉）、瓮安；以王天锡为第七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率驻防贵阳的第一团（团长江荣华）、第六团（团长刘鹤鸣）开赴黄平、施秉一带防守；王家烈亲率皮德佩（皮光泽）旅（第五旅）的第十四团（皮自兼团长）到马场坪设行营，指挥各路与红军为敌。之后，王把防堵计划及各路司令的姓名，番号，分电广西李、白及湖南何键。上述各路，只有第一路、第五路及王家烈亲自指挥的部队与红军作战，吴剑平、蒋在珍、侯之担等部均驻原防区不动。何知重部驻防安顺一带，主要任务是防犹国才，吴剑平师不动，何部自然也不动了。直到红一方面军长征经黔时，王、犹、蒋、侯才一致行动，与红军为敌，据悉是潘壮飞、

路邦道去说和，当时锦屏还没有湘黔边区司令部，直属部队有湘军一个团，黔军一个营，何知重、李觉兼任正副司令，何、李均是遥领参谋长王伯勋代行职务。当红六军团入黔时，王伯勋在清江河左岸锦屏、黔阳之线，也没有和红军接触。

1934年8月下旬，我率第一团、第六团由贵阳出发到黄平，接廖磊由广西全州来电：红军已由全州过境，步经武冈，分两路取道武阳、湄口出绥宁，有入黔趋势，嘱黔军认真防守，廖已率两个军（蒋介石指定李觉由廖磊指挥）跟追，要求黔军严防黔东南及黔东北，阻断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的道路。我把来电内容以电话告知王家烈（时王已到马场坪），王嘱我与廖磊切取联络，听其指挥。我按照王的指示将黔军布防情况电复廖磊，随即以第六团分布于濞桥、东坡（均黄平县境）、江西坡、草塘关（均施秉县境），第一团分布施秉县城望城坡的东南一带高地，向新城（施秉所属）方面构筑工事防堵。

1934年9月上旬，红六军团由湖南绥宁出靖县，取道四乡所（靖县属）进入锦屏之平茶（今属湖南靖县），经铁路、宁溪（均黎平属）到湄潭，与周芳仁（第五路）部赵璧辉营接触，战斗不到20分钟，赵营伤亡20余人，即向榕江逃走。赵营到榕江后，周仁芳率所部第七团由榕江朗洞到剑河，以后就没有与红军接触了。红军由潭溪过小里，出中黄，经整鱼嘴（均黎平县属）出瑶光（锦屏县属）到南嘉堡渡清水江，经十八拐到大广、小广（均剑河县属），过八卦河到黄桥（天柱县属）。天柱县汉寨区（今天柱石洞乡）区长罗明辉把红军行进情况以电话报告天柱县长林子贤。时廖磊、李觉两部已到远口，岔处（均天柱县属，位于清水江岸）一带，林子贤亲到岔处报告廖磊。廖命李觉率所部3个师及第七军周祖晃师由岔处到高酿，李部由高酿进天柱县城，周部由高酿出木杉、圭晚（均天柱县属）到汉寨。廖磊自率覃联芳师由远口取道小江到天柱县城。第二天李觉部由天柱上邦洞，经款场、瓦寨、长吉、三穗（今柱、穗公路线，当时还没有修公路）向镇远方向推进，把

守要隘；廖磊率覃联芳师取道洞松（天柱县）坡王、平真、过滴洞（均剑河县南明乡境）到顺洞（三穗县属），策应周祖晃师。

红六军团由黄桥前进凯寨，到孟优（剑河县南明乡属）与周祖晃师接触。双方互有伤亡。之后，红军由孟优上大洋，出梁上、巴冷、岑松（均剑河县属），过类寨（三穗县属），出羊召（镇远县属）到新城。

廖磊在顺洞侦知红军已到新城，即由顺洞出瓦寨，经三穗赶到镇远，周祖晃由孟优出南洞司上镇远，以所部第七军两个师扼守文德关、镇雄关、鹅翅膀、刘家庄（均镇远县属）堵截红六军团东下，命李觉部向石阡方向推进与李成章旅联系，防堵红二军团策应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在新城休整两天，全部向瓮谷陇（黄平县属）推进，突破东坡滥桥黔军第六团的防守线，经金坑（施秉县属）到旧州（黄平县属）。这时廖磊所部周祖晃、覃联芳两师已由文德关等地移到施秉，布防于路拉（施秉县属）、大地方（镇远县属）与李觉部在大地方一带联成线。

红六军团到旧州，我认为是进攻贵阳的趋势，即以电话告知王家烈，请其分兵，防堵瓮安、牛场，王即命皮德佩率所部第十四团进驻瓮安县城。叫我亲到施秉会廖磊，商讨如何配合作战事宜。廖对我说：“我们只要他们（指红军）不下湖南，不进贵阳就得啦，何必去硬拼呢？部队打光了是不合算的。我建议黔军远远的追，放出一条路给他们走，他们过四川，上云南，我们都听便。”我说，王军长也是这个意见，可以把重兵摆在黔东北及贵阳的四周。

我由施秉转回来后，红军已由旧州出草塘关（瓮安县属）到余庆，即率第一、第六两团走小道到瓮安，与皮德佩会合，防守瓮安、平越之线，詎知我未到瓮安之前，红军已由草塘关过羊场，经猴场，到阳岩关（均瓮安县属）准备渡乌江。因为当天大雨，山洪暴发，不能渡江，又由阳岩关东向折回龙溪（余庆属），

向紫金关、路拉、大地方前进。在路拉等地与廖磊、李觉两部展开了两天两夜的剧烈战斗，双方伤亡很大。之后，红军由路拉等地转太平场，经马溪到万重山（均余庆境）。

我率第一、第六两团到瓮安，侦知红军的行进方向，即命第六团跟追，自率第一团经龙溪到余庆县城，王家烈也由金坑到达余庆，他埋怨我说：“廖磊、李觉在路拉、大地方打了两天两夜，你们为什么不追上去呢？连‘清水鱼’都不晓得去捡吗？”又说：“他们（指红军）已进万重山去了，我拨第十四团给你指挥，赶快追去，他们如果盘据万重山，那就麻烦了。”

我受了王家烈一场埋怨后，当日即命皮德沛率所部第十四团出发，占领钉梗溪（余庆县所属）堵截红军去路，亲率第一团直趋万重山。这时，红军已越过万重山，经马场坪向竹梗溪挺进，第十四团守不住阵地，防线被突破。第六团跟追到川岩坝（石阡县属）赶上红军尾队，俘获80余人，重机枪7挺，步枪80余枝。我到川岩坝向被俘的王连长询问，始知他们是陈光中（湘军）的部队，刚被红军俘虏改编的。我又检查缴获的重机枪，枪身上都有“精忠报国”及“陈光中题”等字样，才知道所获的“战利品”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由川岩坝到大河边（石阡属）。李成章由木贡前来会我。他说：“我的防线被突破，红军已过木贡向火烧桥（松桃属）去了，我们还追不追？”我说：“还是追上去吧！我由头塘（石阡属）出印江，走天望哨（印江）到沙子坡，你跟后尾追，到沙子坡会师。但是沙子坡是红军的根据地，你要特别小心哩！”

李成章和我来到沙子坡时，红六军团已由火烧桥过刀把场经横克寨（均印江县属），到沙子坡与红二军团顺利会师了。我们到达沙子坡时，红军（包括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已全部出发经川东酉阳、秀山之间把川军田冠武、林秀生两旅防线突破，在龙潭消灭田冠武的一个营，向湖南龙山而去。

我由沙子坡打电报向王家烈请示，是否还续进追赶，王回

电：“继续追到川东。”我命李成章率第二团、教导团跟追，自率第一、第六两团续进，李部到达龙潭，我到酉阳，已见不到红军的踪迹了。

红军全部出湖南后，廖磊所部第七军由石阡经镇远、天柱、锦屏、黎平回广西；李觉所部由石阡过镇远，沿沅阳河返湘；我奉命返筑，率第一、第六两团到施秉交与旅长(第三旅)杜肇华，李成章也奉命返原防，这次与红军为敌的作战，就此告一段落。

红六军团经过天柱、三穗、剑河等县侗族地区及黄平等苗族地区时，看到贫苦农民，即送给他们盐巴、衣服，对农民群众饲养的家畜家禽和食物、家具，秋毫无犯。各族劳动人民，开始有些害怕(因为国民党政府宣传红军“杀人放火”)后来红军到贵州，对穷苦人民，爱护周到，对红军即异常热爱，据我目睹耳闻者，有下列一些事例：

当红六军团到达剑河县属之本嘉堡，准备渡清水江时，侗族人民给红军送来船只、木筏并替红军带路，还把粮食拿出来卖给红军。我过黄平，途中看到一位老年农民在路旁啼哭，问他为什么事？他说：“你们的一位官长把我的母鸡拿去了。”并说：“从前我听到乡长、保长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现在看来都是假的了。他们(指红军)过我们地方，没有动一根草，还给我们送盐巴。”他指着身上穿的一件白布衣说：“这是他们送给我的衣服，他们看我穿的巾挂巾，绉挂绉，还可怜我。官长，我是个孤寡老，这只鸡是养来下蛋的，求你行点好事吧！不退给我的鸡，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

我向沙子坡前进途中，看到许多农民(汉族)挑着核桃在路上走，我问“这样兵荒马乱，你们还挑核桃到哪里去呀？”他们闪烁其词地答道：“挑到印江去卖。”后来我才了解原来这一带的农民听到红军(红二军团)要走了，是挑去赠送红军的。我们到沙子坡时，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原因是当地的农民看到红军开走，意料国民党的军队就要到来，所以都逃上山去了。

堵截红军 防蒋入桂

李宗仁

民国23年冬季^①，中共号称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窜，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州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共军，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民国22、23年间，江西剿共战事正炽烈之时，我们也派一师军队假道广东入赣助剿。不久，江西共军在中央第五次围剿之下，有突围西窜模样，我军乃撤返广西，增加省防。

共军此次西窜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成功。这一战略原是采取德籍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共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民国16年贺、叶南窜，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① 民国23年即公元1934年，以下不另注。

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肆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共党，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民国23年9、10月间，共军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萧克率领之下，窜至湘、桂边境，全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为应付这一紧急局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共军入侵。同时将本省常备军14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不久，共、我两军遂在湘、桂北边境的全州、灌阳、资源等处发生接触。共军来势极猛，所幸该地山岭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军以寡敌众，共军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战斗，共军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①，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囑咐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我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CC系的

^① 关于七千俘虏的真相，见本书周游文。

报纸俱有报导。因而 CC 系报纸造谣中伤的阴谋，适自暴其丑，从此不敢再度造谣了。这也是剿共战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共军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窜入黔。我得报后即分电中央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建议将湘、黔边境道路彻底破坏，凭险防堵。因湘、黔边境多羊肠小道，一经破坏，共军即运动困难。中央军和我军再从后夹击，则湘黔边区便为远东共党的坟场了。孰知中央置若罔闻，其原因固然是中央别有企图，同时也可能是中央军实在不经打，与其见屈于共军，倒不如保存实力，慢慢跟进，以占领共军离去后的地盘。

23年底，共军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沦陷，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共军乃舍贵阳，北窜遵义。嗣后不久，蒋先生即偕顾祝同飞贵阳视察。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京，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待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说，你可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京。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不久，中央便发表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所以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节选自《李宗仁回忆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 “送客”方针

刘 斐

1934年9月间我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旅居上海。我因出国已久（1927年春出国），对国内情形诸多隔阂，本想在五方杂处的上海住些时，以便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由于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放弃江西根据地，向湘南进军，蒋介石一再电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竭力防堵，李、白为此寝馈不安，他们于调兵遣将作堵击准备之余，电我急赴广西。

当我到达南宁时，大约是10月底或11月初。白崇禧见到我时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广西处在共军泰山压顶的形势之下，老蒋再三来电，要广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务须把共军彻底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免遗后患。广西兵力单薄，形势险恶，任务非常艰巨，你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要来显两手才行呀！我明天到桂北前线去，请你同我一道去看看。”我连行装都来不及换，还穿着西装，也没有甚么名义就同他一路出发了。沿途从白崇禧口中了解的当时情况，大致如下：

白崇禧说，他在八九月（1934年）间，见萧克部红军由湘南经桂北、湘西入黔时，就判断江西红军会转移根据地；他认为蒋介石的碉堡政策，对于没有攻坚武器的红军来说，确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说，已预感到共军将来全部西移，届时广西就会受不了。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高参。

所以当蒋介石在八九月间要广西阻击萧克所部红军时，白就借口广西兵力单薄，要求把原先调往江西南部协助“围剿”红军的王赞斌师调回广西。白很得意地讲述他自己如何偷偷地到江西安远去的情形，说他当面指示王赞斌秘密集中全师，一俟接防部队（余汉谋部）到达，立即交防就走，毫不迟延。白对这件事越说越有劲地道：“这着棋算走对了，不那样做的话，第四十四师（即王赞斌师）就回不来了。现在他们已由粤北、湖南地区安然回到兴（安）、全（州）、灌（阳）地区，有一个团留在龙虎关设防。就广西说来，只这个师有同共产党军队作战的经验，已要他们在兴安至黄沙河之线沿湘江赶筑碉堡线。湘桂、黔桂边境各县县长，已一律改用军官担任，以便指挥民团协同作战，并协助地方修筑碉堡。”

我记得有一次和白崇禧考虑堵击方案时，白说：“你看，我们广西一共只有18个团兵力，廖磊带两个师（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追萧克部入黔，现要他们火速回桂林附近集中待命。第十五军（由夏威代领，名义上白是军长）除第四十四师已到兴、全、灌地区外，其余第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师，已由柳州及其以西地区向恭城、富川、贺县一带集中。现在共军号称十万，虽说是被老蒋打败了，但……”

我看他停了好久，就接口说：“牛虽瘠而卧于豚上，对广西说来是会被它压垮的，何况老蒋的部队又跟在后面。”

白说：“是呀！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打好呢？”

我说：“这确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白说：“是呀，我们18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我说：“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绍竑）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说来说去，我们首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在具体作法上应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通道（判断红军当时是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至于究竟如何作法，仍须到实地考虑地形状况再定。

我和白由南宁坐汽车出发，沿途除指示部队向战地附近集中外，很少停留，到桂林亦只略微部署城防，随即赴龙虎关侦察地形，这里是五岭山脉都庞岭的南部，再往南便是萌渚岭。从龙虎关往北循都庞岭主脉绵亘经永安关、清水关，至黄沙河以北的湘江地障，隔江与越城岭相对。这些都是湘桂边境线所在，没有一处不是崇山峻岭，峰峦重叠；北面的永安、清水两关较易通过，龙虎关仅有隘路一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

原来第四十四师已留一个团在龙虎关，我们到时，那位团长（名字记不清了）来报告他们筑碉守备情形和当地交通特点，并报告了北面永安关、清水关的概略情况。

我们到龙虎关东口的高地上，展望了关外的形势后，我向白崇禧建议：“在这样的地形，有一个坚强的团守住龙虎关是够了的，这里是我们关门拒客的唯一要点，也是我们向北、东、南三面作战的枢轴；我们必须固守，将主力总预备队控置在这里，使共军只能从永安关以北的地区往西走。但也可以设想，共军号称十万，在老蒋从东北面乘胜猛追的压迫下，如果我们在龙虎关一堵，后面追兵又急，则有被迫向南进入我富川、贺县（八步）一带，甚至西渡抚河（桂林至梧州这条河），乘虚进入广西腹地可能。因此必须以桂东各县民团预先固守抚河沿线大小渡口，阻敌渡河西移，主力以龙虎关为轴由抚河东岸向南侧击，压迫共军于桂东粤北而歼灭之。总而言之，就是主力部队控置在龙虎关附近

的恭城地区，机动策应三方面的作战，以有限的兵力，达到确保共军不致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这就是当时作战指导的腹案。

白崇禧听我说完后就说：“很对，很对！文章就这样做罢！且先把计划定下来。”

于是我根据以上的作战构想，拟定了桂军在桂北地区阻击红军的机动攻势防御计划（详后）。白崇禧看到我所选定的防御阵地线和军队部署时说：“战术这东西，确实要很好地学习，我们就这么点兵力（18个步兵团），对这么大的地区和这样多的敌人，我想来想去不知应怎样使用才能适合，照你这个计划，确实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真好极了。”于是他就照计划命令各有关部队和民团各就指定的位置，立即开始构筑工事，从事战斗准备。

我们在龙虎关附近的恭城定了计划，下达了必要的作战命令后，即取道桂林转赴全州，准备和湖南方面派来的刘建绪会商湘桂联防问题。白崇禧说：“见到刘恢先（建绪）时，千万不能把我们这一套完全告诉他。只说我们根据共军西行企图和中央军衔尾追击的情况，我们准备固守龙虎关，并在灌阳、兴安间占领侧面阵地，相机向北出击，希望湘军由北向南攻击，共同配合中央军的追击，务求在全州、兴安间的湘江东岸地区，包围共军而歼灭之就够了。”

白的意思是，怕刘建绪知道我们送客的企图，会向蒋介石告密讨好。至于湖南方面同样会保存实力，不真正作战，我们也都是心照不宣的。

我们在途中顺便观察了灵川至兴安沿途的地形，在灵川至兴安之间有几处隘路适宜于持久防御，即指示防守部队构筑预备工事，巩固兴安方面守势作战地区的阵地纵深，以便持久抵抗，阻止红军南下桂林。

我们到全州后，和刘建绪见面，商量了一天。由白崇禧说明了广西方面遵照中央意旨，准备在兴、全、灌的湘江东岸地区，由南向北配合中央军之追击协同歼灭敌人的计划要旨，希望湖南

方面由正面合围。刘建绪也报告了他所率领的兵力（具体情形已记不起了）和同意由湘南方面配合桂军南北两方夹击的计划，并交换了有关具体协调的通讯联络事项等，即各自返回防地指挥。

刘建绪走后，白崇禧还检查了全州设防情形，民团使用概况；召集有关人员指示应利用全州坚固的城垣，针对红军没有时间攻坚和不敢恋战等有利条件，务须固守全州县城；并指示实行坚壁清野，避免损失，随时搜集和报告红军行动的情况等，然后仍经桂林回恭城指挥所。

从以上情形，也可说明当时蒋介石和地方势力之间，尽管在对待红军问题有一致的利害关系。但在蒋介石利用追击红军来对地方势力进行兼并时，又和地方势力有尖锐的矛盾。

我们从全州来到恭城指挥所以后，即着手指导作战计划的实施。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和已经下达的作战计划（概要）如下：

情况判断

（1）共军似有突破湘桂边境的永安关及其以北之线，进入兴安、全州间地区，再经桂北、湘西入黔、滇、川山地，重建根据地的企图。

（2）但共军在向永安关以北隘路进入时，如受强大的中央追击军的压迫，不能从容从隘路退向桂北时，亦有被迫改从龙虎关附近突破，深入广西腹地的可能。

（3）在我利用龙虎关有利地形，以主力进行坚强阻击，使其感到腹背受敌时，亦有被迫南下，向富川、钟山、贺县，西渡抚河，乘虚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

作战计划要点

甲、方针

我军以机动决战防御制敌之目的，于灌阳、兴安之线向北占领侧面阵地，主力总预备队控置于恭城附近，巩固龙虎关方面作战枢轴地区的防守，并相机由灌阳方面转移攻势，与北面湘省友军协力，务求于桂北的湘江以东地区，南北夹击而歼灭之。

乙、兵力部署和作战指导要领

(1) 以步兵10个团于灌阳亘兴安之线占领阵地。重点保持于灌阳方面计步兵6个团，为攻势防御地区，以廖磊为地区司令官。当敌由桂北西进时，待其主力通过全州之线时，即对其后尾部队转移攻势，以促其早离桂境（这是没有告诉刘建绪的），并收一定战果。

左翼兴安方面为守势防御区，以步兵四个团占领阵地，以夏威为地区司令官，利用纵深阵地拒止敌人南下，以保攻势地区作战之进展，并掩护桂林之安全。

(2) 以步兵一个加强团，固守右侧后战略枢轴之龙虎关，形成守势钩形，如敌被迫不能从永安关以北西进，而以主力攻击龙虎关时，应全力固守，并在主力预备队支援下确保现阵地以待主力决战方面之成功。

如敌主力在中央追击军压力下，被迫南下富川、钟山、贺县时，应固守现阵地，掩护主力预备队左背之安全。

(3) 以步兵7个团为主力总预备队，位置于恭城附近，为主力决战兵团，适时支援攻势防御区转移攻势；或支援龙虎关守备（加强）团之战斗；特别在敌向富川、贺县、八步抚河东岸地区南下时，应以全力南下攻敌侧背，压迫其向粤北地区与粤军协力歼灭之。

(4) 抚河防守部队，调集所有桂东各县民团担任之，每一主要渡口至少有民团一个团的兵力（相当正规军一营的战斗力的），沿河固守。在统一指挥下，将所有民船集中控置于抚河西岸。在敌向抚河东岸南下或向抚河攻击时，应固守沿河之线，以配合和支援主力总预备队南下侧击之成功。

作战经过情形

当广西部队部署妥当后，中央红军已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大约于11月22、23日，已到达湖南的道县，搜索部队很快就到了广西边境。除龙虎关附近凭借工事固守外，其他如永安关、清水关等地的警戒部队，即相机撤退。

红军并没有进攻龙虎关，主力迅速由永安关、清水关一带进入广西境内，仍沿9月间萧克率部走过的老路，经文市、石塘圩、于麻子渡直全州间各渡口渡过湘江，分途由西延、龙胜方面入湖南境的城步、通道地区，再转贵州境内。

红军通过广西北部时，在进路的两侧以坚强的掩护部队形成一条走廊。迄红军主力通过石塘圩时，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也到了广西边境。这时据推算大约是11月27、28日左右，白认为红军已没有进攻广西腹地的企图，为免周浑元部深入，就命令原在灌阳附近的部队转移攻势（恭城附近的总预备队亦向前推进），向中央红军新圩附近之掩护阵地攻击。战斗相当激烈，桂军担任攻击的是第四十四师和第二十四师，经过约两天一夜的战斗，南面红军掩护部队即向石塘圩附近撤退，旋即渡湘江西去。桂军第四十四师及第二十四师向石塘圩、文市追击。第四十四师到达石塘圩后继续向麻子渡、界首方向尾追红军；第二十四师由文市西侧向北追击，当到达文市西侧时，即与尾随红军追击而来的周浑元部先头营遭遇，为拒蒋介石中央军于广西境外，桂系军队即向中央军开火，经一小时战斗后，桂军先头团将周部先头营缴械，然后诈说是误会，经解释后将人枪退还了事。

这时证实红军已全部西去，先头已到湖南城步附近。广西方面希望中央军“毋劳入境”，蒋介石也感到“投鼠忌器”，周浑元部乃由文市经全州黄沙河入湖南境；原来由湘南拟出桂北之黄沙河向全州前进的薛岳部，得到消息后，也折回湖南东安，不便再向广

西前进。李、白对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顾虑，到这时才缓了一口气。

王缙斌的第四十四师向西尾追红军到湘江东岸的界首时，红军后卫已远离接触，白即令第四十四师折回兴安休整，并令在兴安附近担任固守任务的第四十三师续行追击红军。据闻一度在马堤街附近与红军后卫激战一夜，曾报有所俘获。还记得张淦（当时任营长）在全州以西之某地，曾糊糊涂涂钻到红军主力所在的位置去了。在一个村落中被红军围攻了一夜，因红军目的在急于西行，并不恋战，张营才幸免被歼灭。

桂军第二十四师对周浑元部解释误会后，仍向西经界首、龙胜，向湖南境追击，同时归还第七军建制，由军长廖磊率第二十四师及第十九师远追入黔，经榕江、黎平至独山、都匀一带，目的仍在远拒红军，免他再由黔南、桂北进入广西境内。后因红军老在贵州、四川边境绕圈子，白崇禧于11月底，又把在兴安附近休整的第四十四师调到桂北的三江县，并以其他部队增强黔桂边境防务，以防红军回师入桂，并防蒋介石的部队乘机南侵，直到中央红军离黔入滇后，形势才缓和下来。

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为时约两星期左右。除在灌阳的新圩和马堤街附近有较大战斗外，其余多系地方团队小部队的行动。

白崇禧为了抵赖蒋介石责备广西堵击不力起见，大肆夸张战斗激烈程度，并谎报俘虏红军战士七千余人，阵亡数以万计，还拍了一部电影从事扩大宣传，吹嘘广西部队的战斗力，用以压低中央军的威风。目的无非是为了恐吓蒋介石不要轻于向广西进攻而已。

第二十四师追堵红军简记

黄 炳 钿

1934年秋间，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探悉萧克率领红六军团万人，由江西出发，经湘、粤边区前进，已经到达湖南的道县，接近广西。李、白深恐红军进入广西境内，遂急电驻柳州第七军军长廖磊派兵驰往桂东防守。灌阳边界，由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派出一部向道县警戒。惟富川及贺县一带空虚，遂加派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长江玉珊率所部由柳州出发，经荔浦、平乐，向富川前进。当第七十团到达钟山县时，知道萧克所部红军已由道县到达蒋家岭，与守蒋家岭的桂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吕汉营激战数小时，后红军避开正面，绕道清水关，进入灌阳县的文市，经石塘，界首向唐家司前进。廖以全州震动，兴安危急，遂急调第七十团由钟山星夜兼程驰赴阳朔，由阳朔乘汽车输送兴安。部队日行一百余里，马不停蹄，兵弃装具，夜以继日地行动。一到阳朔，随即上车，飞奔兴安。

第七十团只有一营先到兴安，立即赶到唐家司附近警戒。后到者不按次序，也陆续开往唐家司布防。当全部到唐家司时，红军全部已通过界首，向资源前进。第七十团于次日也向资源前进，在鲁塘地方与红军的后卫部队接触，激战数小时后，红军二百余人撤至鲁塘通西延的要隘阻击。第七十团以数倍之众，几次进攻，均无法通过要隘。到了黄昏，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陈与参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附。

营长率领该营到达鲁塘，同在该处彻夜警戒。第三日，红军已向大埠头前进。第七十团跟追到枫树坪时，我方飞机三架，在上空盘旋，企图轰炸红军，但飞行人员技术低劣，认识不清，发生误会，所投炸弹，多落在第七十团行军路上，妨碍行进，反使第七十团迟滞不前。后在枫树坪山谷中的梯田地带，发现我方飞机一架，倒栽地上，只剩飞机残骸，飞行员残尸二具，身体弯曲，手脚支离破碎，狼藉地上。红军到大埠头后由车田出城步经通道县进入贵州，向黎平、锦屏、镇远方面前进。第七十团暂归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指挥，沿红军长征路线，随后追击。及到达湘、桂交界处的梅溪口要隘，在隘口旁边发现红军插有一块木牌，上写：“有劳远送”的标语。我部进入城步、通道，旋经黎平、锦屏、天柱、三穗而到镇远，沿途没有与红军接触。第七军军长廖磊率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四师、独立团也到镇远。适湘军师长李觉的部队，亦同时到达镇远集中。这时，红军仍在施秉和余庆地区。廖磊率第七十团及第七十一团，向余庆前进；第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率第七十二团、独立团及第五十七团陈与参营，先行出发，向施秉搜索前进，在大广与红军遭遇。覃师正在红军左侧占领阵地，截击红军。廖磊在行军途中遥闻左侧方向有枪声，知部队与红军接触。廖即率两团兵力，依枪声方向急进支援，未几即与覃联芳所部相会，据覃说：“我师与红军遭遇，截断红军去路，激战甚烈，红军不支，向我左侧小路退去，当命第五十七团陈与参营长率领所部赶速占领左侧的高地，拦截红军。但陈营长怕死，不敢前进，以致红军得以从容退去。”廖磊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就率两团由小路向红军追击。可是山高路隘，林密草茂，行动十分迟滞。红军又在沿途设置地雷和集束手榴弹，非经搜索排除不能前进，加以红军行动神速，顷刻间就转移别处，难以捉住红军动向。在追击途中，曾捡到红军传单一张，大意谓日前在某处与湘军师长李觉部激战，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湘军一营，缴获步枪四百支，重机枪数挺，俘获营长一人，及全营官兵四百余人云

云。廖磊所部到了大地方（地名）之后，四面派人侦察。次日向石阡方面前进，以第七十一团团长张光珪率部为前卫，第七十团团附黄炳钊带领该团（汪玉珊于鲁塘已被缴职）随军长廖磊之后为本队。行抵甘溪圩附近的狭长道路，第七十一团与红军遭遇，迎头阻击，争夺该处制高点，展开激战。第七十团跑步向前加入战斗，以第三营由右翼高地包抄，协助第七十一团的正面攻击，争夺甘溪圩背后高地，短兵相接，激战甚烈。黄炳钊乘红军与第七十一团第三营交锋之际，即率第一营和第二营，连续冲锋，把红军部队分成两段，首尾不能联络，以致红军遭受损失。可是红军避实击虚，乘夜绕道向我军留守处袭击，把军校毕业生百余人击溃，并击毙学生多名。廖磊复率第七十团、第七十一团企图拦截。次晨分途搜索前进，适逢大雾弥漫，咫尺不能辨人，在山岗上遥闻隔岗人声嘈杂，认为系红军部队接近，第七十团即与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发生冲突，对击约两小时之久。廖还在大地方布防，择要构筑防御工事，生怕红军奇袭。过了几日，才知红军已向石阡前进。廖磊企图再行追击红军，又率第七十和第七十一两团向石阡追去。当出发时，第七十团第二营营长李瑞金曾对黄炳钊说：“昨晚奉军长面谕，甘溪圩俘获共军，内有20余人，非常调皮，是属正货，应解至山坳僻静地方，以脱逃为名，一律枪杀，你知道否？”我答：“未奉军长命令，不敢负此责任，且敌我相斗，规定不能残杀俘虏。你奉军长命令，你自己负责吧！”后来行了十余里，即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相会，廖磊就把缴获红军的步枪及俘虏红军数十名，交王家烈处理。我军到了石阡之后，红军已进入黔、川边界，在石阡住了二天，即拔队转回镇远。

第七军全部集中镇远之后，闻说中央红军全部由江西倾巢出发，取道湘、粤边区西进，第七军在镇远休息一天，处理伤兵后运。同时覃联芳派黄炳钊到第七军临时医院，颁发犒赏第二十四师伤兵费500元，准备回桂。镇远城市，商场较为热闹，特别是贵州地方，遍种罂粟，鸦片烟土公开贩卖，没有限制贩运。第七军的

官兵看到市面摆卖的烟土，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于是把公款、私款都掏出来做本钱，连行军零用小钱也拿出争购鸦片烟土（每两大洋二角）。官佐利用衣箱及弹药箱，士兵则利用杂囊袋及水壶，满载而归。第十九师先行出发，到了三穗宿营，一夜之间，把该处鸦片烟土抢购一空。第二十四师到三穗的时候，市面已无存货，于是派兵沿途搜查前进，所经城市，都争先恐后地抢购烟土。计经天拉、锦屏、黎平，进入广西的古宜、龙胜回到桂林。第七十团团长汪玉珊，贪生怕死，被撤职，以颜仁毅接充团长。

1934年冬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经湘粤边区，在进入广西的灌阳时，蒋介石派遣周浑元指挥中央军及湘军十余万，已到零陵、东安，迫近广西边界。李宗仁、白崇禧既畏红军勇敢善战，又怕蒋介石中央军借追击红军为名，乘机侵占广西。遂调第七军及第十五军，先集中桂林、平乐，进入恭城、兴安一带，避开正面战斗，只占领侧面阵地，拒止红军进入桂林。第二十四师由桂林出发，开到灌阳，列为总预备队，归第十五军军长夏威指挥。行抵灌阳属永安关附近，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曾与中央军发生误会，激战一小时始行停火。第十五军在全州石塘圩与红军后卫部队接触，发生激战。第二十四师经兴安向龙胜前进，在龙胜瓢里北端的青龙界，曾与红军的左侧卫部队接触，但不敢从正面拦截红军，只在隔岗放了迫击炮十余发，便收队到古宜休息。迨红军深入贵州境内，第七军军长廖磊亲率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始向贵州的从江、下江、榕江，经三都、丹寨到都匀停止。这条路线不是红军长征的道路，没有与红军接触。不久，由薛岳指挥的中央军进入贵阳。而红军经镇远、涪潭，亦已到达遵义。廖磊深恐薛岳所部南下，借追击红军的机会，乘势侵入广西。当即把第二十四师和第十九师移至都匀的西北端，在文德一带地区布防，构筑防御工事，名为“防共”，实则“防薛”。后来红军经贵定及麻江之间，通过贵都公路，经惠水而至

安顺。廖磊仍恐红军向桂北进发，复把第二十四师由都匀调到独山，再沿平塘、平丹、通州而到罗甸，转移到广西的乐业、天峨布防。后闻红军入滇，第二十四师奉调回桂、黔边界的六寨、麻尾驻防；第十九师驻防独山，一直驻了数月之久，直到1935年夏间，第七军全部始由贵州调回柳州。

尾追红六军团 阻击中央红军

覃 琦

对红六军团追击战

在1934年10月间一个晚上，驻柳州第二十四师师长覃联芳，召集各团团长及参谋人员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覃宣称：“红军萧克部队约万余人，由江西向湖南江华、永明一带前进，有侵犯广西边境模样，我第十九师及地方团队在龙虎关、清水关、黄沙河之线警戒，本师明日开始行动，第七十团先用汽车输送到平乐待命，师部率第七十一团陈营及第七十二团，都用汽车运输，限3天内到达桂林集中，第七十一团（欠陈营）担任柳州警备任务，师部参谋长廖庆祥、参谋处主任甘如斌留守柳州，前方指挥所参谋事务由参谋覃琦负责。”会议完毕，星夜下达命令，各部队遵照指示行动。指挥所人员第三天乘车到桂林，即晚接军长廖磊的命令，大意是：“萧克部队已突入清水关警戒线，向文市急进中，第十九师正从后追击，第七十团乘车迅速经桂林到唐家司（今塘市）占领阵地，向界首方向搜索警戒，师率其余部队并指挥独立团到兴安集结。”本师遵令行动，次日中午，都赶到兴安及唐家司地区配合警戒。当日黄昏时，在界首西北松林内，已发现红军便衣队出没，第二天拂晓，萧克主力到达界首，将我搜索队驱逐后，即越过公路（桂全公路）占领鲁塘。覃联芳闻报，命第七十团向鲁塘红军攻击，并派陈营向界首搜索担任第七十团右翼之掩护，师部率第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参谋。

七十二团及独立团向唐家司推进，准备会同第十九师夹击红军于鲁塘地区。当第七十团向鲁塘攻击前进时，红军正在鲁塘晚餐，闻我军到来，即以一部在西南端高地占领阵地，阻止我军前进，其主力部队都向大埠头（今资源）方向退走。廖磊率第十九师赶到，见红军走脱，认为第七十团进攻不力，将该团团长江玉珊撤职，派该团第二营营长李瑞金代理团长。为防止红军向三江或长安方面侵入，命覃联芳率领第七十二团（团长程树芬）、独立团（团长谢鼎新，此时，由谭光球代理）及陈营向龙胜方向截击，廖磊率领第七十团、第五十七团（团长张光玮）向大埠头方向追击前进。萧克部队行动迅速敏捷，廖追至大埠头，红军已转入湘西向通道县退去，廖扑了空未能追上。覃联芳率队由龙胜取捷径，直奔通道县截击。到达时，红军已通过该县城一天，又转向黔东剑河方面前进，覃师又扑了空。当时，湘军（何健的部队）成铁侠旅，驻防武冈县城，探知红军侵入通道县，由武冈前来堵截。次日拂晓，该旅行抵通道县东端隘口，因雾很大，看不清人，成铁侠旅尖兵排与我陈营排哨发生误会，互相开枪射击，该旅前卫营与陈营在隘口东西高地展开战斗，覃联芳闻枪声，即令第七十二团先以一营占领南端两个制高点，其余部队都到南端空旷地集结，并叫我亲到陈营察明情况。我匹马奔到前面会见该营营长陈与参，我问：“前面情况如何？”他答：“红军大部队向我进攻。”我说：“这是通武冈的大路，据谍报人员昨晚汇报，红军已向西北退入黔境，武冈现有湘军成铁侠旅驻防，为什么这条路有红军？莫非同友军误会，必须问明。”陈与参听了即叫司号军士吹连络号音，连吹三追，对方回答号音符合，证实是友军，彼此停止射击，互派军官联络，成铁侠亲来向覃联芳道歉，一场误会战斗结束，各轻伤士兵数名。中午，覃师集队向黔东追击前进。入夜在梁上宿营，接军长廖磊电报，知他率队在我师左侧向黄平、镇远方向堵截。次日覃师继续追踪。我们跟踪追了四五天，离剑河约半天路程，赶上红军殿后部队，红军百余人，占领进路一个山

坳，凭险拒止我部前进，掩护其主力部队渡河。山坳两侧都是悬崖绝壁，不易攀登，第七十二团（前卫）用迫击炮轰击坳口，掩护攻击部队由正面逼近，红军退走，我追至剑河渡口，红军已完全渡过剑河。并将船只破坏，剑河水势甚急，不能徒涉，我们就南岸露营，派小部队在上游搜得民船数只。次日中午，我部队渡河完毕，探知红军由黄平、镇远间越过公路，向大地方（地名）方向前进，廖磊率截击部队在红军通过两天后，始到达镇远。覃师进抵黄平，廖磊同覃联芳通了电话，交换情报。廖命覃率所部经施秉、余庆向大小广（地名）截击，廖自率原部向大地方追击。覃师以急行军在三天到达大、小广，当晚第七十二团（前卫）在大广宿营，师部率独立团及陈营在小广宿营，两地相距约十华里。次日拂晓，大广方面机关枪声甚密，判定是前卫团发生战斗，我们即发紧急号令集合部队向大广急进。到达时，从程团报告中，获知萧克部队行抵大地方附近，被廖磊率队尾追甚急，不敢向北直进，改道向大广再入石阡，其前卫尖兵到达大广东端，被我第七十二团（即程团）连哨发现，开枪射击，展开战斗。红军先以约一个营兵力，向该连哨攻击，连续冲锋两次，都被该连轻机关枪火力压制。当时我军每个步兵连有捷克轻机关枪九挺，模范式七九步枪七十余枝，弹药充足，装备上比红军优越，故红军每次冲锋，都伤亡较多。这时团长程树芬已派出一个营占领大广东南后背山，用重机关枪向红军左翼侧射，并遮断红军后续部队向前线增援，另一个营由正面以步机枪协同迫击炮向当面红军猛射，红军不能支持，向后撤退。该营追击前进，刚越过山背，对面山树林内红军重机关枪向我扫射，打伤士兵数名，前进受阻。覃联芳率后续部队赶到，见状，即命陈营向山地红军阵地攻击。该营营长陈与参作战不力，部队到达山脚，便停止不前，覃大怒，立将陈与参撤职，派参谋刘肇骏接充营长，并令迅速攻占红军阵地。在迫击炮火力协同进攻下，刘营冲到半山腰，红军向山后退去，该营占领了阵地。此时程团一营乘势冲出前面坳口，发现红军密集部队正

由前面山坳向北撤退，与我隔一山沟，相距约数百公尺，即以重机关枪连续扫射，红军纷纷仆倒，但仍前仆后继，冒着弹雨奋勇通过。我们派出独立团从右边山脚越过山沟，欲截断红军退路，该团尚未到达，红军已脱离战场向石阡方面退去。这役红军伤亡约数百人，阵内道路两边以及山沟边缘，都遗下不少尸体，从尸体上搜获的文件，才知道萧克部队的政委是任弼时。覃师伤亡约十余人，下午四时许，战斗结束，我正集合部队时，廖磊率张、李两团赶到，闻红军已走脱，深悔来迟，失去歼敌良机。当晚各部队都在大广附近露营。次日派李瑞金团向石阡追击，廖磊率张光玮团向镇远，覃联芳率所部向施秉集结，并电报白崇禧请示行动。覃师抵施秉第二天，接廖磊密电云：“据报现有大批烟土集中黄平，准备经剑河运湘，希设法使该烟土回转都匀经独山入桂，以利税收。”覃联芳叫我约程树芬同来商量，商量结果决定如下：（一）由程在该团选湘、鄂籍排长二员士兵二十名，编为两组，佩带短枪，化装为红军游动部队，星夜潜往黄平、剑河间路上活动，截断电话线，写红军标语，检查往来客商，没收烟土，并扬言红军大部队不日即将到来，使客商不敢往来。（二）派刘营开到黄平县城，扬言红军数千现到剑河附近，将向黄平侵犯，并在城外构筑工事，准备作战模样。黄平烟商闻此消息，都将烟土运回都匀，廖磊便派人在都匀、独山活动，闻这些烟土都陆续运入广西转粤。李瑞金团向石阡追击，在石阡附近与红军殿后部队略有接触，红军向北退走，该团撤回镇远，休息数日，接白崇禧电令全军开回桂林待命。

桂黔边区对中央红军的截击

1934年11月间，覃师在桂林休息，接军长廖磊命令：“（1）江西红军约十万人突围向湘南前进，其先头已到嘉禾附近，将沿萧克部经过的路，向我省境侵扰；（2）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各纵队衔

尾追击中；(3)各师即补充弹药准备行动。”覃师星仅将弹药补充完毕，这时夏威军（第十五军）两个师也开到桂林、兴安集中。白崇禧亲到桂林指挥作战，作战计划是自己策定的，他的计划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防共，一是防蒋。为了达到以上两个目的，他的作战指导方针是放开湘桂边境西进道路，以主力占领恭城、灌阳、兴安、义宁、龙胜侧面阵地，拒止敌人向腹地深入，俟红军通过省境后，向其后续部队截击。另于适当位置控制有力部队，对追入省境之中央军迎头痛击。基于这个方案，其军队部署概要如下：“(1)廖磊军第七军以周祖晃师第十九师一部及地方团队占领龙虎关、清水关之线担任警戒，主力在恭城；覃联芳师（第二十四师）控制于灌阳为机动部队，尔后随战况变化将该军转移于义宁、龙胜方面；(2)夏威军（第十五军）黄慎国师（第四十三师）韦云淞师（第四十五师）在兴安界首唐家司地区占领阵地；(3)将桂林、平乐两区民团分配归廖、夏指挥，配合正规军作战，担任守卡、把劫、联络、运输各项任务；(4)桂北边境各县实行疏散粮食，“坚壁清野。”

大约在11月下旬，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先攻龙虎关^①，未能攻取，再向清水关攻击，该地守备部队系周祖晃师一个营及地方民团，不能支持，向后撤退。红军一部占领关口附近要点，主力直入关内向文市、界首方面前进，在红军完全通过文市之后，覃师由灌阳赶到文市附近，正遇周浑元纵队由清水关进入，其先头与我前卫团相距约2000公尺，彼此停止前进，用信号联络，认明系中央军，前卫团长程树芬派传骑驰来本队报告，覃联芳闻报，带我快马赶到程团位置，他用望远镜略一探望，即对程树芬说：“那是共军，立即攻击前进。”我鉴于过去同湘军成铁侠部队发生误会的教训，再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后，我说：“确属中央军服装颜色，不要发生误会。”覃坚定地说：“即使是中央军，也不能放过。”程树芬马上派出一营向当面中央军攻击前进，覃联芳再令第七十团团附

^① 刘斐文中说，红军没有进攻龙虎关。

黄炳钊率一个营向西南方包围攻击。中央军不意之间，遭覃师两面袭击，伤亡十余人，向关外急退，其先头一部约一连被黄炳钊部截断退路，就地缴械。覃联芳令将人枪放回，并写信一封，派人送与周浑元道歉，表示实因误会所致。周浑元明知系覃有意造成事故，不敢进入广西，率队向东安、武冈方面绕道前进。事后我问覃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是白崇禧面授的机宜。白崇禧闻知这个消息，非常满意。此时红军已到达界首，将夏威警戒部队击退后，越过公路向鲁塘、西延方面前进，其掩护部队在鲁塘附近与夏威部队战斗中。廖磊率周、覃两师经灵川向义宁、龙胜方向截击，覃师先赶到龙胜，中央红军到达马堤（龙胜东）时，夏威军随后追击，白崇禧由桂林派飞机数架沿途投弹轰炸；当时我曾向覃建议：“本师应即攻占马堤北坳（在马堤北20华里，为入黔孔道，仅有红军百数十人防守），截断红军去路，将其包围于马堤凹地而歼灭之。”理由是马堤地区由南向北是狭长的隘路，东西两侧是重叠的高山无路攀登，北路若为覃师截断，南路有夏威部队追击，红军无攻坚兵器欲突破两头封锁据点，实不容易，况粮食缺乏，又受飞机不断轰炸，数日之间，不战自灭。程树芬很赞成这个意见，并自告奋勇负责攻占该坳，覃却不采纳，他说：“总部的作战计划（白崇禧计划）是放开入黔去路，使红军迅速离开桂境，堵塞中央军入桂“剿共”的借口。本军进出义宁、龙胜，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向三江方面侵入。依你的意见，纵能将红军围困一时，他这样大的兵力，岂能立即歼灭？倘逼老虎跳墙回头同我硬碰，造成鹬蚌相持，给中央军入桂之机，获渔人之利，这与总部的作战计划相违背的，断不能行。”因此覃师暂以防守的态势，监视红军通过。第三天拂晓覃师始向马堤北坳攻击，约一小时，即将该坳占领，截获红军后续部队400余人，枪300余枝，所俘获的人，身体很瘦弱，枪枝也很复杂，子弹很少，都解送桂林总部行营处理。中央红军入黔后，向三合、黄平、马场坪方向前进，蒋介石命令薛岳、周浑元各纵队由湘西入黔截击。

白崇禧部队堵截红军经过

蓝 香 山

1933年粤桂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消极反蒋积极割据的姿态，参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粤军第一、二、三军和桂军第四十四师王纘斌部由陈济棠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在江西南部赣州、信丰、安远、寻乌至福建武平上杭一线，派少数部队进攻根据地，主要阻击红军向南发展，达到敷衍蒋介石，保全实力的目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雩都、信丰一带突围，冲破蒋介石所谓强固封锁线，沿大庾岭、骑田岭，湘粤边界向西转进。当时蒋介石命湘军在衡（阳）保（庆）之线布防，桂军在桂北兴安（安）全（州）灌（阳）地区布防，进行堵截。红军的行动使白崇禧大受震撼，急命驻梧州第十五军军部移驻桂林，命第四十四师王纘斌部由三南兼程回桂，归还第十五军建制，驻百色；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黄镇国部向兴安，驻龙州；第四十五师韦云淞部向灌阳集中；命第七军廖磊之第十九师周祖晃部，第二十四师覃联芳部向平乐、恭城集中；命第十五军参谋长蓝香山，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自都庞岭北麓由四关（清水关、永安关、中关、北关、每关间相距仅二公里），经黄牛岭脚下沿黄沙河设置前进阵地，并沿湘桂边区瑶山至沙子墟（黄沙河全州之间）构筑主阵地；命第十五军军长夏威，沿兴安北咸水、石塘墟、新墟至文市构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桂系军第十五军参谋长。

筑预备阵地。并命陈恩元编组民团一个团，以秦开明为团长，守全州。堵截任务以第十五军为主，第七军担任策应。

当时红军武装部队有8万人，桂军有5个师及新编民团武装，不过3万人，众寡悬殊，不能不使白崇禧忧虑。当时白崇禧判断红军的进军路线：一由湖南江华入龙虎关，通过广西腹地柳州向贵州西进；一由湖南兰山经道县入四关，由桂北西进。如果红军入龙虎关，白崇禧一怕红军入桂动摇割据老巢，唯一希望红军一兵一卒不入桂境，沿湘桂边境从黄沙河出湖南通道至贵州。二怕尾追红军的蒋介石部队乘机入桂。白崇禧和刘斐到兴安第十五军对夏威和我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虽是试探性的笑谈，倒是他的衷心话。

白崇禧和刘斐商定的作战方针：如红军入四关而进，则尽全力拦阻红军，不让向桂林方面进展；如红军入龙虎关，则尽全力攻击，阻止红军向腹地进展。刘斐在第十五军军部酒后很高兴地说：“四关是头部，龙虎关是尾部，我们将主力集结灌阳、恭城地区，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较为稳妥。”

红军将到骑田岭地区，白崇禧率刘斐等由南宁进驻桂林，第十五军军部进驻兴安，第七军军部进驻恭城，首先以道县的蒋家岭、全州的黄沙河为前进阵地。从四关沿灌水至全州为主阵地，加紧构筑碉堡工事。红军将到嘉禾、兰山时，白崇禧认为红军不会沿黄沙河西进，势必通过桂北，按原定防线设防，兵力不足，遂改咸水、石塘圩、新圩、文市、四关为主阵地。同时令兴(安)全(州)灌(阳)各县民团全部动员，约十五万人参加构筑碉堡，并令各县筹集构筑碉堡的砖瓦木料，星夜运到防地。碉堡均系圆形，墙厚约五十公分，可抵抗枪弹，多数是两层射击设备，少数为低堡，每一碉堡由民团一班守备，各碉堡间相距300至500公尺，互相侧防，在11月上旬全线碉堡基本构筑完毕。红军入四关时，碉堡的守兵都弃而逃跑，一个多月劳民伤财的碉堡，成了废物。

白崇禧为防红军入龙虎关，命第十五军军部派灌阳民团从龙

虎关至四关间，沿都庞岭脚下的所有村庄，遍插不同番号的旗帜，虚张声势，让红军知道这方面有重兵扼守，不进龙虎关。同时率刘斐和廖磊进驻恭城，第十五军军部即进驻灌阳，第十五军所属3个师在灌阳南北地区集结。第七军紧靠龙虎关集结。

11月下旬初，红军到达道县，停留四五日未西进，白崇禧极为忧虑，深恐红军入龙虎关，于是由恭城发来译申给夏威：“着将四关工事昼夜挖去，让红军通过。”我们当即照令执行。红军由11月23日夜入清水关，首尾衔接向西挺进。红军为避蒋介石侦察，白昼休息，夜间行军，我们计算红军须经过5夜才能通过完毕。由于时间急促，白崇禧不能亲自召集师长以上干部会议，责成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灌阳召集师长黄镇国、王纘斌、韦云淞开会，由我拟定堵截方案两个，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四日夜，由新圩至石塘圩间将第十五军3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后尾。理由：（一）由于红军每日行军一个多月很疲劳，其目的在于西进，可乘其危，占领了掩护阵地，攻击红军后卫；（二）桂军在红军进路的侧面新圩、石塘圩之间展开，红军地处平坦，桂军居高临下，红军前有滴水、后有灌水，处于不利地位。（三）湘军第十九师李觉部和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已推进到全州，居红军右侧背，桂军居红军左侧背，中央军薛岳所率领的追击纵队紧跟红军后尾，红军受夹击如入口袋中，形势不利。第二案：于红军通过第五日夜，在新圩展开一个师，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师长王纘斌赞成第一案，韦云淞主张第二案，黄镇国未发言，夏威采用第一案，于是用电话向白崇禧请示，廖磊先接电话反对第一案，他说：“正面过大，须使用全部兵力，如果红军反攻，桂军要作出很大牺牲，若蒋介石继红军后图广西，我将束手自缚，应保存实力，不可存奢望。”白崇禧接着说：“在新圩用一个师打红军后尾就得。”27日晚，第四十四师师长王纘斌以莫德宏团在新圩展开，与红军侧面掩护部队接触，由于桂军在隘路中不能向两翼展开，只能用步枪、机枪火力与红军对峙。白崇禧频频用电话询问情况，我说：“红军有戒

备，我军不能出隘路，正在激战中。”白说：“不要猛进，等待红军过去。”28日拂晓，红军全部过完，其掩护部队也全部撤走。当日第十五军向兴安前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覃联芳部已进到新圩以北地区，却遇到中央军，覃部误认为红军，立即展开一个营将其先头部队一连缴械，我和夏威在其附近瞭望，知是误会，才吹联络号停战，随即将所缴枪械发还。不耀焯不但不抗议，反亲到桂林向白崇禧道歉。当夜，第十五军军部驻兴安，白崇禧恐中央军另有企图，派我到戍水与湘军师长李觉会晤，询问中央军动静。李觉说：“薛岳部队已沿黄沙河向湖南靖县前进。”我向白报告，白看到中央军没有进入广西，如释重负。

28日深夜，夏威在兴安接白崇禧自桂林来电话：“接何应钦电，蒋介石指责我们将共军放走了，第十五军应派一个师西追，务期有战果。”29日，夏威和我率领第四十三师黄镇国部梁津、史蔚馥、苏新民3个团，每团以每一个营为纵队，共分9个纵队，向西追击。正午，史蔚馥团颜僧武纵队在山地收容红军病员伤兵掉队的六百余名，近黄昏各纵队又收容伤病掉队红军共五百余名，共计千余名。白崇禧接夏威报告非常欢喜。营长颜僧武从此为白崇禧宠爱，不久升为团长，抗日战争时升至旅长。当日深夜，第十五军紧蹙红军主力进路，由农民作向导，打着火把，翻越兴安、龙胜交界的大山，向龙胜追击前进。这些地区是瑶人居住，他们说：“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进民房，不拉夫，吃了人民粮食给现洋……”我们在山谷中看到红军前进联络方法，系用白粉笔以代字将部队的番号、进路、目标，写在壁立路旁的山石上，一路连续不断。沿途用白粉笔写大标语“勿劳远送”。第十五军抵龙胜时，红军已全部出桂境，桂军就停止追击。

我们在龙胜停留一星期奉令复员，仍回驻桂林，所属各师开回左右江地区驻扎。白崇禧和参谋长叶琪在桂林大摆筵宴唱戏三日，慰劳堵截将领，并将收容在兴安的红军拍摄电影，自吹俘虏七千，向蒋介石夸耀胜利。

刘斐献策 机动阻击

梁 津

桂系阻击红军的目的是，首在巩固其所割据的地盘，惟恐红军一旦入境，动摇它的统治，故最初的计划是分兵固守湘桂边沿，不让红军入境。后因刘斐献策，乃撤退灌阳、道县间的守兵专加强龙虎关的防御，让红军由灌阳入境而中途截击。

1934年10月，李宗仁、白崇禧闻红军由赣南突围西进之讯后，即令第十五军参谋长蓝香山同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视察兴、全、灌各县，凡属交通要隘地区，即插签标志之，以示建筑碉堡的地点。并命各区乡村长征调民工，运砖瓦、石灰和各项材料，兴筑碉堡，以备团队阻击红军之用，一切费用皆责诸人民负担，政府不给分文。各农村所存的粮食，亦强迫农民预先搬到山岩或偏僻隐蔽处收藏起来。使红军入境时不易觅食，作到“坚壁清野”，并企图乘红军的困乏而加以袭击。

当红军通过桂境之前，我奉命率部（时我充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九团上校团长）到湘桂境上灌阳、道县交界处文市，见各区乡村长催征伕役，运粮秣和材料，忙碌至彻夜不能休息。

1934年初冬，当我在湘桂境上灌阳、道县交界处的雷口、永平、清水、永安等四个关口构筑防御工事时，第四集团军总部经电我“要与阵地同存亡。”桂省主席黄旭初亦电我“勿使红军越雷池半步”。故我那时决心死守阵地。除土工外，还运取残砖，累积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九团团团长。

顽石，构筑掩体四十余个。主阵地前的副防御物鹿砦，采伐山上的木柴构之不足，曾纵士兵滥伐农民所种的油茶树数百株以补充之。工事构筑既竟，乃仅开一缺口，方便自己部队的交通联络。至于民众的来往，则只许进来，不准出去，以封锁消息。离主阵地面前约八百公尺处有独立的小石山一峰，半山上有一洞穴，我派出轻重机关枪数挺占领之，并构筑掩体，转向主阵地作射击设备。悬想红军如来攻击我主阵地时，则此机关枪群从背后出其不意，可以袭击来攻者之背，而予以重大的损害。

既而风闻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从江西方面紧压红军之后，湘南也驻有重兵阻遏红军的北上。务逼红军进入广西，使其与桂系部队作战而相互对消，中央军乃乘其惫而闯进广西。如此则对红军形成前后被夹击的态势，而达到扑灭的目的，又可乘桂系力竭之际，而将它消灭，铲除其割据独立的局面，是一举而两得，坐收渔人之利。

时刘斐（湘籍醴陵人，1921年春到广西进讲武堂，后在白崇禧连部充司务长，白在桂得势后，送他到日本留学）适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归来，充李、白总部高参。他衡量当时的形势，乃对李、白献策说：“广西正规部队仅有16个团，而沿湘桂边境处处布防，则兵力分散而力量单薄。闻红军近十万众，倘集中兵力，攻击任何一点，皆有被其突破之可能，而最可担心者，是龙虎关方面。红军如由该方突进，则可经平乐、荔浦直捣柳州腹心之地。则大势去而难挽回矣。为今之计，只有撤退灌阳、道县间的守兵，让红军由该处入境，而转移兵力加强龙虎关的防御。主力则控制富有弹性地区的平乐和阳朔之间。盖主力在此地区，既可作龙虎关的后盾，又可以捍卫柳州腹心之地，复可以北向应援桂林之急。进出皆甚便利。俟红军由灌阳入境后，用少数的部队，中途设伏截击。如此则实力不损。而有余力可以对付中央军的闯入了。如此部署则兵力虽寡，自可应付裕如，不虞顾此失彼之患了。”（刘斐此项献策是我于1935年春在南宁军校高级班作旁听学员时，他讲授

战术引作战例的自述。)李、白采纳其策，遂由第四十三、第四十五等师各团中，抽出一营的兵力，混编于民团各联队之内，而另定某师某团的番号，与少数的正规部队联合以截击红军。盖如此编配，在内则可以加强民团的战斗力，对外则可以虚张声势。

截击结果，据说共俘红军落伍的战士病号及挑夫6000余人(我团收容得的1300余人在内)，派员送回赣南原籍(雷冠南当时即系护送员之一)。时我团(第一二九团)第一营梁达升部被抽调出去混编于高山(高仰如、广西宁明人，抗日时充旅长，沪郊之战，因部队溃散，被廖磊枪毙)所率领的民团联队内，另路作战，我不知其情况。我仅率第二营韦健生部及第三营黄玉超部(两人在抗日时期皆升团长，已阵亡)参加截击过境的红军。

1934年冬一个阴雨天，将近黄昏时，我第一二九团正在灌阳、道县交界处的阵地上，第四十三师师长黄镇国忽自文市来电话，命我放弃阵地，向南面120里的黄牛镇撤退，执行刘斐的计划。因我当时不知其情，抗不奉命。他闻我不肯撤退，乃在电话中用慨叹的口气对我说：“难道我的话你还信不过吗？”我回答他道：“数日前总部电命我与阵地同存亡，省主席亦电我勿使红军越雷池半步，因何师长忽命我撤退呢？”他说：“计划变更了。”我说：“那末师长须有书面命令与我，使有所凭据，我才撤退，否则绝不敢从命。”他说：“好吧，我派人送去。”晚上七时，师部的命令文件到达，我才开始向黄牛镇撤退。翌日到达。闻当夜红军即用广正面的纵队迅速通过四关。我到达黄牛镇后，休息一日，忽又奉命转回原路追击红军。但一去一回之间，已费时四五天，红军行军迅速敏捷，已不见踪影了，只得由文市出界首，沿途跟踪追击。

次日上午8时许，追击将近王家隘，遇第十五军军长夏威于途中，他命令我说：“王家隘有配备重机枪四挺之红军六百余人据守，昨日第一三二团粟廷勋部及第一二七团之颜憎武营追至即向之攻击，现仍在激战中。据探报，离该地约18里之千家寺，约有5000余之红军在休止，据守王家隘之部，似属其后卫。你团即从小路绕过

瑶山之西面，迂回进攻千家寺，现有瑶人一名在此作向导，即时出发为要。”我即命第二营长韦健生派兵一连作前卫，随向导之瑶人前进，所经之地，险阻陡峻，简直无路可循，只盲目地随向导前进。至凹陷狭隘之谷地，则令前卫连占领制高点，向四周警戒作掩护，再另派出一连作前卫，依次搜索前进，俟部队安全通过后，原来之前卫连，即改作后卫。如此更翻轮流搜索前进，约走五十里之遥，始到达能瞭望千家寺的山谷阵地，其时已黄昏矣。用望远镜窥视，则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围坐而休息者，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我乃命迫击炮连长赖其铨，安置迫击炮一门于山谷隙地中（其地仅容一炮作开始攻击时发射信号弹之用。而命令第二营营长韦健生率其所部两连，潜行于山麓下之溪涧中，隐蔽地向千家寺前进，其余两连，除留一连作预备队外，其他一连则配合机关枪连扼守通香岗之山腰鞍部。因闻离千家寺15里的香岗尚有数千红军部队，时我团第三营黄玉超部，因道路险阻，尚未到达。但可能乘未暮之前，以少数兵力进行袭击扰乱，因已近黄昏，对方不能探知我兵力多少。迨韦健生率其所部两连进至离千家寺约800公尺之涧中时（该涧即横对千家寺可以构成火线），我乃令发号炮，开始攻击。休息中的红军部队骤闻枪炮声，即迅速地跑到枪架，拆取枪械，分头占领阵地作掩护抵抗，大队则集合向北撤退。转瞬之间，见火把万炬，绵延数里之长，沿山中隘路，徐徐前去。韦健生所率的两连，始敢进入千家寺村内，得红军遗留下来未及牵走的骡马五匹。锅中之饭已熟，也未及进食。

进攻千家寺的韦健生两连，当构成火线时，因溪边之堤过高，且有生篱阻碍，又已黄昏，故射击未有效。千家寺四周，未见有死伤痕迹。

第三日续行追击前进，无所遇。惟就宿营地后，忽接我团第三营营长黄玉超来电话报告称：据瑶人密告，某处岩洞中躲藏有溃散的红军30余人，请示如何处理，我狙于昨日不战而诱致红军

落伍战士千余，此区区30余人，亦当可用软语劝之来归。乃飭他率兵两连至该处岩洞附近停止，而派员至洞口用好言劝之出来，不须动武。黄玉超乃派姓吴的连附率士兵数名至洞口劝他们出来，岂知红军的指导员竟发令开枪射击，当场将连附吴某击毙，并伤士兵3名，黄玉超乃挥兵围攻之，此30余名红军战士，至弹尽始降。事后我因连附吴某之劝降被击毙命，而将红军的指导员枪杀抵偿。

第四日，我部追击至大风坳的峡口时，忽见山下平地，散开一系列的士兵，持枪向我前进之路作战斗准备的姿态，但服装颜色与我团相同，我心内怀疑，为何转向后方作如此戒备呢？乃命部队暂行停止，而派出传达一名，前去问明原因。始知昨日下午第一三二团粟廷勋部追击至此地时，遭到红军伏击，损失颇大，除官兵有相当的伤亡外，其团的卫生药品及金柜尽行丢掉。红军阻击得手后，即行撤退，而粟团的警戒兵，迄今未敢撤收。我明了情况后，即率部前进。至山下由一独立房屋面前经过，见第十五军军长夏威正向粟廷勋大加申斥。夏乃命我团作前卫，继续前进。我乃与第三营营长黄玉超先行，适一转弯向沿山麓一小溪岸边行进时，忽闻机关枪声，我急向右边山脚一巨石后面躲藏，回头看到黄玉超的棉大衣已被击穿数洞，其背后号目所携的号筒，也被射穿，但幸未伤亡一人。我即命特务排徒涉过小溪的对岸，往山下的竹林搜索前进，则红军后卫的重机枪两挺已撤走。再前进数里，抵一村，见路边搭有棚厂一座，并贴有标语多张，当是红军战士所搭作临时开会之用，并见有穿普通服装病卧道旁的十余人，问之则皆紧闭其目与口不作声。我心乃大生疑窦，回想粟廷勋团之遭到袭击而受损失，岂不是因此类人物装病重不能言，使人不介意，待探知我的部队情况后，乃乘间溜去，以状告红军，来进行袭击吗？我因疑而生惧畏之心，为防患未然计，乃决心命士兵枪杀之。

既而再前进数里，据当地人来报告，红军部队约二千余，正

在前面某村进食。时我团第三营因在隘路中单行行进，而溪边小径，又已被红军战士挖断多处，以迟滞追击部队的前来，故行进阻滞，尚未到达。我只得派特务排排长伍绍宣率少数兵前往探视，忽闻前面高地两丘之间，重机关枪射击声，知系红军后卫的掩护阵地。我乃命我团机关枪连向右侧高地占领阵地，向之射击，以掩护我团第三营之攻击前进。既而见前面高地背后大部队的红军成行军纵队，循山上道路攀登瑶山，向北而去。其后卫的掩护阵地，选择甚佳，逐次层层抵抗，不易接近。及我团两营全部到达时，红军部队已从容北撤，进入黔境。次日我团即奉命转调回桂林。

千家寺阻击战

颜 僧 武

1934年冬，红军从江西湘南经过桂北，桂系为了维持其在广西割据的地盘，阻止红军进入广西，调集了全部的正规部队和桂北地区的民团阻击红军。我当时在桂系部队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七团第一营充任营长，参加这次作战。对于桂系部队这次在桂北阻击红军的整个作战部署和经过，因我当时在部队的地位低微，知道不多，而且因为这次作战不是集中全力在正面阻挡红军，在一地与红军决战，而是在红军通过桂北的时候，从侧面和后面分路攻击和追击，并且多是在高山密林的地区作战，分散使用兵力，因此即使同属一个师甚至同属一个团亦无从知道全部情况，其他各部的作战情况更难知道。因此，我这篇资料是很不够全面的。

当红军突破赣南封锁线到达湘南的时候，桂系即调集了仅有的全部力量5个师的正规军队，并配合桂北地区的民团，共约四万人，沿着湘桂边界布防，这条防线东起富川，经恭城、灌阳、全州等县，西至龙胜，正规部队的主力置于恭城的龙虎关和灌阳、全州之间。

第四十三师最初开到灌阳县，沿湘桂边界布防，并构筑工事，当时该师所属的3个团番号和团长姓名是：第一二七团史蔚馥，第一二八团漆道微，第一二九团梁津。我是第一二七团第一营的营长。此外，第二营的营长是黄廷材，第三营的营长是杨

* 作者当时系第四集团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七团第一营营长。

露。我这一营到灌阳后，派在清水关一带构筑工事，在当地斩伐了大量的树木构筑防御工事的掩蔽部和障碍物。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第四十三师即全部撤到恭城县属的黄牛镇，住两三天，又从小路越过山区撤到兴安县城附近，派我这一营到距离兴安县城约30里的唐家司担任警戒。当时红军的大部队已经进入灌阳和全州，源源通过兴安县城以北不远的地区，向西进发，此时已经听到前方不断有枪声，但不知道是何部队与红军接触。

我在唐家司附近的一天下午，接到团长史蔚馥由兴安县城打来的电话，派我这一营即时出发，向灌阳县属的文市进行威力搜索，侦查红军的情况，并说是总指挥部指派的，而且要我拿回几个红军战士，以了解红军的情况。我这一营连夜出发，到距离文市约20里的山地，天还没有亮，远远看到文市和附近的乡村都有不少火光，红军部队还没有离开文市。我即派兵一连向文市搜索前进，到达文市时，已经天亮，红军部队已经离开文市，只拿到因病落伍走在后面的红军徒手战士3名。我以任务已经达到，即开回唐家司附近，并将拿到的红军战士送往兴安县城第一二七团团部转第四十三师师部，送桂林交白崇禧的前敌总指挥部。

第四十三师于次日向兴安县城西北的千家寺出发，走在先头的是第一二七团第二营，到千家寺附近与红军接触。千家寺一带都是山林浓密，极易荫蔽的地区，我到达千家寺附近时，已是下午3、4点钟，除听到前面一些断续的枪声外，没有见到红军的踪影，此时红军已经逐步向西撤走，仅有少数部队在后掩护。因为已将日暮，我这一营即在千家寺附近的山上占领阵地警戒，不再前进。此时的天气已是秋凉，部队都在山上和树下过夜，没有房屋住宿，次早第四十三师师部和第一二七团团部都到达千家寺附近，我在地图上研究了地形，向团长史蔚馥说，红军所走的都是高山峻岭，森林浓密的地区，道路崎岖险要，红军少数部队扼守，我军就很难通过，在这种地形追击，只有送行，没有什么作用。我并在地图上指出一条从千家寺迂回到山口的道路，请史蔚馥向

师长黄镇国报告，派我这一营迂回到山口地方截击红军。师长黄镇国同意我的意见，当即派我这一营出发。

从千家寺到山口，大约半天路程。到山口时，红军正从山口经过，我即指挥部队至距离山口约二百米的山上占领阵地，用火封锁山口，把红军部队截为两段。因为从山口再进便是一条狭长的隘路，两旁都是不能通行的高山密林，我封锁的正是隘路的进口处，使走在前面的红军不能顾及后面，走在后面的红军不能继续前进。因我当时所带的部队仅有3个连（有一连留在桂林看守仓库），人枪仅200多。为了提防受到红军的前后夹击和包围，不敢在山口的正面占领阵地，只在山口附近占领侧面阵地，用火封锁山口，使红军不能通过。当时我既不知道走在后面的红军还有多少，红军也不知道我的部队有多少，因彼此都在荫蔽的高山密林中。经过约一个小时的互相射击，红军不能通过山口，我的副营长魏自修即走到前头，叫喊红军缴械，走在先头的一些红军战士，看到不能通过山口，回答愿意缴械，魏自修即走到红军部队的面前，我并派兵通知魏自修，叫缴械的红军士兵下山时在半山放下武器，然后到山下的田里集合。陆续缴械集合的约500人，收缴步枪300多枝，还有许多步枪弹和手榴弹，同时并收缴红布白字的红军第十三师的旗帜一面。据魏自修说，他到红军队伍，曾遇到携带驳壳手枪的红军战士十多名，当叫这些战士缴枪时，即有好像是红军干部的人员回答说，俟见了你们的长官再缴。魏自修因没武装士兵跟随，不敢强迫缴枪，但后来不再看到这些携带手枪的红军战士，可能避匿山林里或另由其他道路追上红军主力部队。据被缴械的红军士兵说，被缴械的是属于董振堂的部队。随后我即派部队一排集合被缴械的红军士兵连同收缴的武器送往第一二七团团部。但为提防途中发生意外，将所有收缴的步枪机柄和手榴弹全部留下，由部队带走。

我在山口派部队将被缴械的红军士兵和武器向后送往第一二七团团部后，即复率部队沿红军去路追击前进。行到距离山口约

7、8里叫老山界的地方，又与红军接触。老山界是横亘去路的一排高山，上山的道路很陡，而且仅有一条道路上山，此外均不能通行，比山口还险要得多。红军在山上扼守，我的部队不易接近，无法攻上，只能利用荫蔽的森林和石山与红军对峙，互相射击。当天下午第一二七团团团长史蔚馥率领两营部队也到达老山界，但因老山界的地形限制，不能使用较多的部队向守着老山界山上的红军进攻，后到的两营部队没有参加战斗。到了差不多日落的时候，扼守老山界的红军部队向唐岗方面撤退，我的部队因不再听到红军的枪声，才发觉红军已经撤退，随即登上老山界，当夜在过老山界后的山脚露天宿营，次早向唐岗追击，到达唐岗时，红军早已离开唐岗。

从山口到老山界的战斗中我曾亲眼看到在战场上被击毙的红军战士的3具尸体。这次虽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但双方相互射击约有3、4点钟，被打死的红军战士确有多少，因在山林浓密的地区作战，没有时间去调查。就我这一营部队说没有伤亡。离开唐岗后的红军，经过大埠头和龙胜县境，进入湖南贵州交界的山区。第一二七团由唐岗沿着红军经过的道路到达龙胜县城，沿途没有与红军接触过。在由唐岗到龙胜的途中，我曾看到不少因病落伍的红军战士，有时是十个八个在一起，有时是三五成群，有的病卧路旁，情形很苦，此时经过的部队不再去过问，我在那时看到亦是无动于衷。我到龙胜县城以后，还曾派出一个连的部队向湖南的城步方面警戒。红军离开广西地界进入湘黔交界地区后，桂系在桂北阻击红军的战事结束。

桂系部队这次在桂北阻击长征红军，曾在红军经过的道路拾到不少红军遗弃的政治军事书籍，过几个月后桂系总部得知，为了提防部队官兵受共产党的影响，下令一律收缴，我当时得到红军遗弃的书籍好几十册，也都上缴，只有《侦探须知》一书，我认为写得很好，曾向桂系总部提议，稍加删改一些有关红军的词句后，印发部队作教材使用。

桂北堵截红军记

张 文 鸿

1934年8月间，红军萧克部约万余人通过广西北部境内西进后，李宗仁、白崇禧判断红军主力将要全部西进，深怕派出江西南部参加围攻红军的桂系部队第四十四师的四个团（第一三〇团莫德宏、第一三一团王振朝、第一三二团粟廷勋以及第四十五师派归第四十四师指挥的第一三四团凌压西）被红军主力吃掉，白崇禧遂于8月下旬，秘密潜赴江西安远第四十四师师部向王缙斌面授机宜。白叫王立即准备将该师各团集结于安远县城及其附近，等候粤军前来接防后，迅速率领所部兼程开回桂北兴安、全州、灌阳一带，参加广西各军对红军主力通过桂境的堵截。

约于9月初间，粤军余汉谋部派陈章独立旅前来安远接防（后闻红军西进经过安远时，陈章旅曾被击溃，损失甚重），第四十四师即由安远撤回，于9月24日分别到达广东英德集中休息两天。这时李宗仁曾由广州专程前来英德，对第四十四师全体官兵训话慰劳。随后第四十四师经由湘南开回桂北。第一三二团到兴安，第一三一团到全州，第一三〇团到灌阳，第一三四团到龙虎关。各部到达指定地点后，就地休息整理和补充。

这年10月间，闻中央红军已经开始行动，由江西南部西进，其前锋已进达湘境南部。此时桂军第七军尚远在贵州南部，正兼程赶回桂北途中；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和第四十五师亦由柳州、南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参谋主任。

宁、龙州等地陆续向桂北富川、恭城等地集中。

第四十四师在兴安、全州、灌阳等地休息数日后，即奉命侦察湘江上游由兴安至黄沙河湘江两岸沿岸的碉堡线。凡是可以徒涉的地方，都应建筑大碉堡，水深处虽不能徒涉，亦应设置中、小型碉堡；并指定师部参谋主任张文鸿率领必要人员沿河实地勘察，绘图上报。经过四天的实地选定，沿线总共拟设置大、中、小型碉堡约二百余处。后闻如拟批准，飭令由兴安、全州两县县政府负责赶紧构筑。但其构筑情形如何和派什么部队担任据守，因为第四十四师于11月中旬奉调前往石塘圩附近布防，我就无从得知了。第四十四师驻在龙虎关的第一三四团，亦令其就地构筑工事，一俟第四十五师派队接防后，移驻灌阳附近。

11月上旬，白崇禧和刘斐曾到全州视察，当面指示第四十四师驻全州城的第一三一团团团长王振朝担任守备全州县城及其附近高地，防止红军进占，并立即拟定防守计划，着手构筑坚固工事，但到了11月中旬，该团又奉命归还第四十四师建制开至石塘圩布防，留下全州城防，改由民团部队负责。

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和第四十五师各部，约于11月初先后到达恭城、富川和贺县等地集中。第四十五师派第一三三团至龙虎关接防，加紧构筑工事，担任堵截任务。第一三四团交防后到灌阳附近为第四十四师预备队。当时第十五军各师集中富川、贺县、恭城等县后，其部署情形如何不详。到了11月中旬，第七军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四师已经赶到桂林附近，第二十四师派归第十五军指挥，即奉命与第四十四师共同部署于石塘圩南北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准备堵截红军。

大约1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已到达道县附近，前锋迫近桂境。同时获悉中央军的进剿部队周浑元、薛岳等部，在红军后面跟踪而来。又传闻蒋介石有利用红军与桂军作战的时候乘机袭取广西的企图。李宗仁、白崇禧看到这种严重形势，既要抵御红军入境，又要防备中央军的入侵，势必两面作战，颇为恐慌。因此

李、白决定放弃堵截红军的计划，将原来已经部署于石塘圩南北地区的阵地变更，飭令第四十四师和第二十四师由石塘圩附近地区撤至灌阳、新圩附近东西地区之线(地名已忘)，占领侧面阵地，监视红军行动，对红军只采取截击其后卫部队和相机追击，对中央军的入侵则采取抗击。此时，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的一部则控置于兴安及大榕江附近地区，掩护桂林方面的安全，并归第七军军长廖磊指挥(廖率第十九师在桂林附近)。

约于11月底，中央红军开始进入桂境，沿永安关、文市、石塘圩、麻子渡，渡过湘江后分两路西进。红军一部在文市、石塘圩南北两侧高地占领阵地，担任侧卫和后卫。红军主力通过石塘圩后，第四十四师和第二十四师奉命向石塘圩和文市方面进攻。石塘圩和文市的北侧方面则由地方团队担任对沿途西进的红军进行袭扰，配合第四十四师和第二十四师的进攻(占领阵地线和进攻路线及到达线的地名皆已忘记)。

11月底某日拂晓，第四十四师进攻部队在杨柳井附近高地与红军侧卫部队发生接触，战斗约一个上午，几次进攻均无进展。直至中午，红军的侧卫和后卫部队开始逐次向石塘圩后撤，第四十四师和第二十四师部队到达石塘圩和文市西南侧各高地时已近黄昏，红军后卫部队已远离石塘圩向西急进。两师各部奉命就地宿营。翌日，第四十四师继续向麻子渡、界首方向追击；第二十四师亦继续向文市西侧前进，第二十四师进抵文市西侧附近时，其先头部队第七十团与中央军周浑元的先头部队发生遭遇。周部先头部队约一个营，战斗不到一小时，即被第七十团包围缴械。据被缴械的官兵说，误认桂军为红军，所以放下武器。于是我方随即将缴获的人枪全部退还。其后第二十四师又继续经石塘圩、麻子渡向西追击。当第四十四师部队追至界首时，红军已远离桂军西进，第四十四师即奉命到达兴安及其附近停止休息。尔后跟追任务则由控置在兴安及大榕江的第四十三师和第二十四师担任。第二十四师部队继续经界首向西经龙胜前进，并

归还第七军建制。这支队伍后又由贵州榕江、黎平西移驻于独山、都匀各地，防止中央军向桂省入侵（第七军的行动、所经地点和日期不详）。

第四十四师在兴安休息时，第一三四团则留置于灌阳归还第四十五师建制。到了12月底，第四十四师又奉命由兴安经龙胜、瓢里，向古宜、三江前进，就驻在各该地，担任防止红军由贵州回击，实则系防中央军入侵。直至1935年3月前后，才奉命移驻怀远、得胜等地整理训练。此时广西境内形势已见和缓，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和第四十三师分别调驻桂林、柳州一带整理训练。

这次中央红军通过桂北，为时一旬多，经过战斗，即胜利地西去了。桂军曾派空军参加战斗、侦察和轰炸，被红军击落飞机一架，机毁人亡。

桂北民团阻击红军纪实

虞世熙

1934年秋冬间，萧克所率的红六军团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央红军先后经过桂北时，桂系集团两次阻击红军，我都亲历其事。第一次阻击红六军团过境时，我任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第二次阻击中央红军过境时，我任全州县长兼县民团司令，因此，在阻击过程中只限于民团方面的部署，其他正规军方面的作战计划，仅知其概略。兹就回忆所得，将民团方面部署情形，分述于后。

一 抗击红六军团过境的概况

1934年9月初，萧克率领红军万人由赣南进入湘南。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深恐红军入侵广西，侵占他们的地盘，命令廖磊的第七军负责防守桂东北。廖奉命后，首先把周祖晃的第十九师派赴恭城的龙虎关和灌阳的永安关、清水关、雷公关一带布防。同时，派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赴兴(安)、全(州)、灌(阳)调集桂北各县的民团协助防守。民团指挥部共有三个民团常备大队(兵力约一团)。廖磊来电要我负责固守桂林的城防。当我正在计划布防时，廖又来电要我率领3个常备大队星夜兼程开赴全州，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广西省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后任全州县长兼县民团司令。

并在电中说桂林城由他率领部队车运来接防。当我率队到达兴安的唐家司，侦悉湘江在唐家司至界首之间有的渡河点可以徒涉，遂用电话请示陈恩元，要求留两个大队在唐家司布防，陈以全州城防重要，极不同意。随又用电话请示廖磊，得其许可留蒋鼎新大队驻守该地，监视渡河点，并策应兴安县城的防守，我随即率何清、秦廷柱两个大队继续向全州进发，当天赶到全州县城时，已是黄昏时候了。当我到县民团司令部去找陈恩元报告部队到达的情形时，陈就说，红军到达道县时，佯指向永州前进。周祖晃师派大部兵力在永州境内阻击红军，现红军已乘间突破清水关进入灌阳文市，并说业已转报桂林廖军长。他认为我过去曾充廖的参谋处长，和廖相熟一些，要我在民团司令部住宿，收听廖的电话。同时，他去县府和县长罗震南商量布防事宜。陈刚去不久，即接廖的电话，询问进入文市的红军动向。当时，我把已飭两河乡公所派人前往继续侦察，及部队到达和布防情形报告他。

当晚11时左右，据电话总机的人员说，两河乡的电话不通了。我当时的判断是：（一）可能被敌切断电话线了；（二）两河圩距文市不远（约二十多华里），乡所的人员被吓跑了。于是，我用电话通知罗震南，要他把上述情况转报陈恩元，并要他派员率武装兵数人携带电话机向通两河圩的道路上前进，侦察敌情，随时回报，一面要随来的参谋王宪藩和民团副司令蒋朝教（全州人）把地图拿出来研究敌人的动向；并问蒋朝教何处有险可守？湘、灌二水何处可以徒涉？正在研究之际，廖又用电话来询问敌人的动向。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他，他很武断地说，敌人的企图，不是南进灌阳城，就是北取全州。当时我不同意他这个看法，于是我就把我的判断对他说，敌人南进灌阳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即使拿下灌阳城，影响和作用都不大，况且灌阳城有周师的兵驻守，前被阻击，后有追兵，敌人不会出此下策。红军北取全州的企图，我认为可能性也小，因为湘江到全州附近水已渐深，沿途船只少，随处受袭击，渡河不容易。接着我又对他说，敌人

如果渡过湘、漓二水，无论向南向北或西进，机动性大，作用也不小。说到这里，我就把民团副司令蒋朝教所说湘水由唐家司到凤凰嘴一带，有几处渡河点可以徒涉告诉他。并建议两个方案，如下：

（一）把湘江上游的徒涉点守住，阻止敌人渡河，待周师赶到，在湘、灌两水之间聚歼红军。

（二）派一兵团通往大埠头的三千界布防，在洛江的山区地带聚歼红军。

廖认为第二个方案，运兵来不及，只能采取第一个方案。两人在电话上商定之后，他答应派第七军第二十四师汪玉珊团长率陈与参营即时车运至唐家司，并指挥蒋鼎新大队负责扼守唐家司至凤凰嘴一带的徒涉点，同时，要陈恩元调集该处民团协助防守。廖说完这些话后，陈刚巧由县府回来，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他，并建议加派秦廷柱大队去增强防守的兵力。陈仍认为全州城防紧要，失城罪大，不同意我的建议。

当晚在两河乡电话不通的情况下，我曾经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与文市相邻的白宝岭、石塘圩等处乡公所查问敌情，都得不到什么消息。次日上午九时左右，接石塘乡公所电话说：红军已逼近石塘圩。接到这个情报后，陈恩元就问我如何处置？我说：“广西民团早已吹得震天价响，如果不去拼一下，不但声誉扫地，而且责任负不起。”我说这席话之后，陈沉默不语。我体会他的意思，你既要去拼，你就带队去拼罢。于是，我就对他说：“我想率秦、何两个大队车运至赤兰堡，赶赴凤凰嘴增援。”陈立即同意这样办，并要我马上出发，他在后方负车运部队的责任。我当即偕同参谋王宪藩、副司令蒋朝教两人和四个手枪兵，乘坐一辆小轿车和两辆大卡车，载团兵两排先行出发。到达赤兰堡后，我就下达布防命令，要秦、何两大队长候部队到齐时，即向凤凰嘴进发，选择该处徒涉点，在西岸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渡河。命令下达后，我仍偕同王宪藩等乘车向咸水前进。到达咸水时，适遇恩德区区长梁翰藩率该区区公所人员和少数团兵向北撤退，我问他敌情如何？

他说，红军已由石塘圩经麻子渡到凤凰嘴渡河，并要我们赶快离开咸水。同时，我又询问了一个刚从凤凰嘴到咸水的老百姓，据说红军已逼近咸水了。于是，我们就急忙乘车回赤兰堡。候至下午4时左右部队到齐时，即循桂全公路向咸水搜索前进，抵距咸水十华里的白沙村时，天色已晚，即在该村布防警戒，并下令次日拂晓向咸水搜索前进。次日上午9时左右到达咸水，据报敌人已于昨晚五鼓时，向洛江方面去了。我深恐红军尚有后续部队，为慎重计，即在咸水警戒。大约11时左右周祖晃亲率所部陆续到达咸水。当时我就把上述情况告诉他，他要我率秦、何两个大队随后跟进。接着我就用携带的电话机和全州通话，陈恩元要我把秦廷柱大队遣回桂林，维持治安，只能率何、蒋两大队随周师前进。当晚我们到达洛江乡时，蒋鼎新大队也由唐家司经鲁塘到洛江。蒋把该大队和陈与参营在唐家司附近徒涉点与红军侧卫接触，及在鲁塘与红军后卫接战的情形逐一报告我，并说，团长汪玉珊在唐家司与敌接触时，他一听到枪声响即行逃跑了（汪因这次临阵退缩被撤职），同时，军队与民团的配合作战也不紧密协调，因此，被红军在该处强行渡河。次日清晨即由洛江经三千界、油榨坪向大埠头前进。及抵大埠头时，周师已全部向才喜界（今资源县属）及湖南城步县进发。我和蒋、何两大队长正在商量应否再随周师跟进之际，适廖磊率卫士两班也赶到大埠头。廖一见我就问：“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我笑着说：“只有欢送罢了。”同时，我把上述情况报告他后，他要我把湘、桂、黔边境地图拿出来，共同研究红军今后的动向和企图。研究的结果，大家认定红军的动向有三：（1）进入湘西，（2）进入贵州，（3）进入广西西北边境，吸引我大部兵力到西北边地，俾其后续部队易入侵广西，夺取广西的地盘。但我认为红军窜入湘西的可能性小，原因：蒋介石的中央军兵力优势，装备精良，红军要想在湘西建立一个根据地，殊不容易。同时，如果红军企图进湘西，其主力则应取道梅溪口（湘桂两省交界处），出新宁入湘西，比较便捷些，

如今红军行动不像进湘西的象征。关于红军窜扰广西西北边县的问题，廖认为广西的民团组织有相当基础，军队装备和训练也相当精良，红军想乘此占领广西，恐怕他还没有这个把握。研究的结果，认为红军向才喜界（今资源县属）出城步县，必定经通道县入贵州。因贵州的王家烈的兵力无多，兼之贵州崇山峻岭，最利于红军的游击战，所以红军进入贵州的可能性最大。

当我和廖磊研究红军动向之后，廖说要赶上前线指挥作战，我为了保护廖的安全，仍率何、蒋两个大队继续跟进。到了才喜界岭顶，廖要我率蒋鼎新大队回桂林，他说有何清一个大队护送足够了。廖遂尾随周师之后，出湖南城步经通道入贵州黎平。我率队回到桂林时，据说红军出了广西境后，桂军在追击途中发现有：“多劳桂军远迎远送！”的标语。这充分说明红军指挥的灵活和行动的敏捷，追击部队不但摸不着敌人，反而处处陷于被动，事实上成为“送行”。

二 桂军远追红军深入贵州的内幕

1931年春初，张（发奎）、桂军驱逐滇、粤军出境之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广西全省的统治地位又告恢复。由于连年混战，劳师动众，不但带给了人民极大的灾难，而且造成了生产萎缩、百业凋敝和税源枯竭，经济上陷于无法维持的困境。广西当时的财政收入，鸦片烟过境税将近占到岁入的一半——这是桂系集团经济上的命脉。蒋介石十分了解，他在不能用武力消灭桂系，而又不愿任其壮大，就转而在经济方面下桂系的毒手：严密封锁广西边境，不准云、贵两省的鸦片烟流入广西。李、白、黄当然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先后派何海筹、王文熙、陈雄等为使节，与云南省主席龙云、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吴忠信和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谈判，许以减低入口税、保证安全、简化入口手续等等优厚条件，使两省的鸦片烟流入广西；此外，还使用极为卑劣的

手段来迫使烟商就范。1933年，白崇禧密令第七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第一营营长明德（恭城人，是白在模范营当连长时的班长）率领武装兵两连到湘黔交通孔道的洪江，伪装土匪，劫掠由贵州运经洪江入湖南的鸦片烟，有时甚至还把烟商杀害，使他们不敢将鸦片烟运经洪江。而且还规定：劫获的鸦片烟，以六成归公，四成作赏，负责执行截劫烟商任务的官兵，每月薪饷还加倍发给（这是明德亲口和我说的）。

这次桂军的追赶红军，锲而不舍，有非将红军驱出贵州省境绝不罢休之势。这种醉翁之意，局外人了解是不多的。当我率领何、蒋两个大队随廖磊前进至才喜界岭脚时，遇着由城步来大埠头的两个小商贩，我就问他们：“红军走向哪里去了。”他们说：“红军已向通道县方向前进了。”我把所得情况报告廖磊后，我对他说：“红军既离开广西向贵州前进了，何必越境追击呢？这种做法，不但徒劳无功，还会惹起邻省的误会；而且万一敌人后续大队跟着来，那我军的处境和广西的安宁就不堪设想了。”廖沉默了许久才对我说：“云、贵两省的鸦片烟过境税，是我们一笔最大的财政收入，如果贵州被共产党盘据了，或者被蒋介石假途灭虢，把王家烈撵走了，我们这笔财源也就断绝了，而且直接受到威胁。”我听到他这席话之后，知道桂军要将红军驱出贵州的目的，原来是为了维持鸦片烟过境税的收入。

这次第七军一共出动了6个团，计周祖晃的第十九师有秦霖、苏祖馨、魏镇3个团；覃联芳师的汪玉珊和张光玮、程树芬3个团，一直跟踪至贵州的施秉、石阡等县以北地区，迨红军全部由江西开动时，才撤回桂北，再阻击红军长征北上抗日。

三 第二次抗拒中央红军过境的情形

1934年9月下旬，我率蒋鼎新大队由大埠头回到桂林。第三天即接总部（指第四集团军）来电要桂林、平乐、柳州等民团区

指挥官、副指挥官和参谋长出席总部召开的“防共”会议。我是和陈恩元、岑孟达(副指挥官)及参议黄堦(保定军校毕业)等4人由桂林乘车赶到南宁的。会议日程一共3天,主持会议的是白崇禧和李品仙,省府团务处长卢象荣也出席参加。第一天开会时,由陈恩元报告防御红军过境和调集桂北民团协助防堵的经过情形,其次,是讨论民团章则和桂东、桂北各县先行成立民团常备队,以及如何筹集常备队的枪枝、子弹、经费等问题,再次,是讨论构筑工事、碉堡和空室清野等办法。关于成立常备队问题的决定:甲等县成立两个联队,乙等县成立一个联队,丙等县成立一个或两个大队(一个联队辖3个大队,一个大队辖3个中队),所需枪枝由民间富户征借,弹药由总部酌予补给,经费由县预备费项下支给。关于构筑防御工事和碉堡等方面,决定在桂东北通湘省的要道和关隘,择其具有军事价值者,构筑临时防御工事(即简单散兵壕等),其余小路,则应阻塞或破坏。全州的灌水和湘江西岸的渡河点均须建筑碉堡,以利防守。至于空室清野,划定恭城、灌阳、全州、兴安等县先行举办。最后,白崇禧提出邻近湘、黔两省边境的县长,一律委派军人充任,以便计划防守和指挥作战。这一议题决定后,白崇禧首先要陈恩元推荐一个军人充任全州县长。为此,陈恩元曾两度和我商量人选问题,我前后建议调现任武鸣县县长陈良佐、黄堦充任,据谓,白均不同意。接着在白、陈两人商议下,决定要我去充当。

会毕,我就返回桂林,省府委我代理全州县长兼民团司令,委蒋鼎新为县民团副司令的电报也到达了,10月14日我就和蒋乘车赴全州,16日接理县篆。到任后,总部也把这次会议决议案随电附发到县府。接电后,我立刻派县民团司令部的人员分途到县属灌水和湘江西岸选择渡河点,飭各乡征调民工建筑碉堡,共计建筑大小碉堡140余个。接着委蒋余荪为全县民团常备队第一联队长,委刘遂谋为第二联队长。所需枪弹,飭各区乡公所向民间富户尽量征借,缺少的弹药,则派员向总部请领。至于空室清野,

也同时下令各乡做好准备工作。延至11月下旬，毛泽东和朱德所率的十万红军已逼近湘桂边境。于是我就派第一联队长蒋余荪指挥所部负守城和维持市面治安的责任；派第二联队长刘遂谋率该联队分驻钵盂山两个大碉堡和水南等处，向通往灌阳的白宝岭、两河圩、石塘圩等方向严密布防和警戒。这次过境红军，基本上是循着萧克部队所走的旧路，由灌阳永安关、雷口关入文市，经全州县属的两河圩、石塘圩、麻子渡，由凤凰嘴一带徒涉点过湘江，经咸水入洛江，西延入湖南的城步。

新桂系集团对待这次红军过境的方案，在“防共”会议上，白崇禧已明白地指出：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内地就行了。从白所说这些话，无疑地是：明则“反共”，暗则防蒋。他们深深地懂得，红军在江西反“围剿”，把蒋介石几十万新式装备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蹶不振，桂系全部兵力只有16个团人左右，比蒋介石差得多，和红军较量，不啻以卵击石；同时，这点本钱赌光了，政治生命也就完蛋了。因此，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桂系就把这十多个团的人摆在红军经过路线以南各地区，实行监视和夹击、侧击相结合的战术，他们既怕红军深入广西，更怕蒋介石“明取西川，暗夺荆州”。有这样一个例子可资说明：

当中央军进入广西边境时，第七军覃联芳师的第七十团在文市附近缴了中央军周浑元第三十六军的先头部队一连人的枪（缴枪后，说是误会，旋即退还）。这就是警告中央军不要打广西的主意。结果，周浑元、李觉、陶广、章亮基、萧致平、郭思演等部队，都不敢沿着红军所走的石塘圩、麻子渡、凤凰嘴、洛江、西延的路线尾追红军，而是由文市一路经两河圩，一路经白宝岭取道全州县城经黄沙河、庙头出湖南安东。

四 “七千俘虏”的真相

红军过境之后，新桂系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牛，说击溃红

军，俘获数千之众，甚至不惜伪造事实，制成“七千俘虏”影片来夸耀他的“战功”。所谓七千俘虏，原来是这样的：当红军大军过境后，沿途遣散一些病兵和因足痛不能行动的士兵或挑夫，当时好些乡公所曾打电话来问我对这些兵夫如何处置？我叫他们将这些落伍的兵夫送到县府来，同时报总部请示。各乡送来的落伍兵夫，我指定城北小学校为收容所，每天每人发给伙食费两角，共计收容了300人左右（兴安、灌阳两县也收容了一些，但数目不详）。在收容完毕之后，即接总部来电话，要县府把这批落伍兵夫送到桂林，交由桂林区民团指挥部转送南宁总部。由于人数无多，他们就厚颜无耻地雇请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制成“七千俘虏”的影片，并把这部影片运到各地去放映。白崇禧对群众演说时，都夸耀桂军击溃红军的“战绩”，并且责备中央军“剿共”不力。其中有两句最滑稽的讽刺话，如说：“蒋介石叫他们（指中央军）去‘剿共’，他们偏要‘抗日’（指晒太阳）。”

关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情况

周 游

红军开始长征，先是派萧克在1934年农历七月经过广西而去贵州。到了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主力部队，再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整个时间约十天左右，就顺利完成了这一通过，双方并无战斗。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少校处员。

房》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所有俘虏战利品等镜头，都是由民团扮演的，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

第三章 遵义战役及堵截 红军四渡赤水

黔军阻击中央红军经过

王家烈

阻击前的形势和布置

红军长征过贵州时，我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关于堵截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部队在贵州作战经过，属于对红军“围剿”阶段，是第一个战役，时间是1934年4月到10月。本文叙述我堵截中央红军长征通过贵州第二个战役的经过，时间是1934年10月到1935年5月。

先是1934年4月间，我协同湘、桂国民党军李觉、廖磊两部，对贺龙的红军第二军团作战，曾率第二十五军军部指挥所人员由贵阳出发，经平越（今福泉）到思南。是年10月，在红军贺龙（率第二军团）、萧克（率第六军团）部队离开贵州向秀（山）、酉（阳）、黔（江）、彭（水）去后，我正在部署追击时期，于思南途中接蒋介石由牯岭来电，大意说：中央红军已离开瑞金西进，其先头已到大庾县属之聂都山附近，有沿萧克（红六军团）部队的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

路线进入贵州模样，命我率领部队择要堵击。我接电后，由思南转回贵阳，重新考虑全盘计划。

当时贵州内部，因争夺权力，混战了两年才告结束。名义上我是军长兼省主席，实际上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我口头上表示拥护听命，实际上我不能直接调动其部队。我能直接调遣作战的有以下兵力：第一团（团长江荣华）、第二团（团长戴玉堂）、第三团（团长周相魁）、第四团（团长蒋德铭）、第五团（团长先是郑金鏞、郑死后是李维亚）、第六团（团长刘鹤鸣）、第七团（团长周芳仁兼）、第八团（团长万式炯）、第九团（团长杨昭焯兼）、第十团（团长宋肇奎）、第十一团（团长钟立纲）、第十二团（团长吴光全）、第十三团（缺）、第十四团（先是皮光泽，后因他拖走，暂缺）、第十五团（团长金祖典）、第十六团（团长宋华轩）、特务团（团长赵兴鉴）、山炮团（团长李念荪）。以上各团，归何知重（第一师）、柏辉章（第二师）、两个师及李成章（第一旅）、杜肇华（第二旅）、犹禹九（第三旅）、周芳仁（第四旅）、杨昭焯（第五旅）5个旅长分别节制指挥。

听说中央红军有四五万之众，我感觉自己力量单薄，无法对付，遂与两广取联系。联系结果：广西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同意派他第七军（军长廖磊）率覃联芳、周祖晃两师开到贵州都匀、榕江策应；广东第一集团军陈济棠同意派其第二军（军长张达）推进到广西浔州（桂平），必要时进到柳州策应。他们说，若再远离其各自的省境，就感觉自己后防空虚，无法办到了。

我在思南接蒋介石的上述电报后的想法是：红军主力到贵州来了，共产党要占据我的地盘。要阻挡他们，我无力办到。蒋介石对我又不怀好意，我自己明白：自我主黔政以来，由于犹国才、蒋在珍作乱，蒋介石不调他二人离开贵州。我为保持地位，只好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因此，曾

经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后来，这个密约被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盗出去，向蒋告密。从此，蒋视我为眼中钉。他早就想攫取贵州，从而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追击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想拒绝他，也不可能。前思后想，心绪非常烦乱。在当前形势下，我只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阻击红军，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

我初步计划是：将黔北（乌江以北）的防务交与侯之坦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我和犹国才负责。我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到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

1934年10月末，我由思南回省，经过遵义时，为了便于尔后和黔北侯之坦等部取联系，遂在遵义设立一个临时机构——第二十五军军部行营，派江国璠为遵义行营主任。

11月上旬，我由遵义到贵阳，召集第二十五军和贵州省府高级人员开会，由于大家的根本利害一致，犹国才、侯之坦、何知重等均来省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对红军协力防堵。具体部署是：侯之坦部担任防守乌江以北，原驻湄潭王家烈部第八团归其统一指挥。犹国才部开到乌江以南，犹本人同我先到马场坪，他任东路的左翼指挥，负责平越、瓮安之线；我指挥所部，担任东路的右翼作战，便于接近广西。尔后看情况发展，相机推进。

除我直接指挥的上述15个团外，侯之坦有4个团，犹国才抽出两个团，共计贵州动员21个团的兵力。

阻击的第一阶段

11月中旬，我同犹国才率军部指挥所人员，由贵阳出发，到马场坪后得知：中央红军沿萧克部队经过的路线，取道湘西进入贵州黎平、剑河一带，有经镇远、施秉、黄平向北行进模

样。蒋介石的中央军尾随其后。我命令杜肇华（旅长）指挥第五、第六两团在黄平附近布防，该部与红军一度接触。时原驻镇远的东路行营主任黄烈侯，让出了镇远大道，已退到清溪。又接杜肇华电话报称：“红军来势很锐，我想避开正面，撤到重安江以西，占领阵地。”我不准他退得太远，命令他撤到马站街、老木哨一带，避开正面，相机侧击。同时，我深深感觉，红军从江西出发以来，所过地方，都是长驱直入，锐不可当。他们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拼呢？因此，我于11月20日同犹国才转身回贵阳，取观望态度。到贵阳后，得知蒋介石派薛岳带8个师兵力跟追，其先头已达湘西洪江。并接薛岳来电，约我在平越县马场坪会面。

1935年元月初，我由贵阳再到马场坪等待薛岳。当时我的脑子里又萦回着上述在思南的一些想法：若与红军硬打，自己部队打光了，补充怎么办？心情异常苦恼！迨与薛岳会见后，他对我甜言蜜语，在武器装备方面，答应给我补充；在政治方面，表示关怀。他暗示我说：“你的政治上敌人是何敬之（应钦），今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诚）的路线。”薛同我摆谈了一般形势后，又介绍我和他带的几个师长见面。见面后，我即返贵阳。薛岳率队也向贵阳开拔。随薛岳后来的，还有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不过两月，薛岳在贵阳告诉我说：蒋介石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新任命的“剿匪”官衔：任命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吴奇伟为第一纵队司令，周浑元为第二纵队司令，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犹国才为副司令。

先是，我同犹国才、侯之担商定，乌江北岸前线江防，由侯之担部负责，我拨原驻湄潭之第八团归其统一指挥。湄潭县境乌江各渡口，由第八团担任守备；湄潭县以西，遵义县境乌江各渡口，由侯之担部刘翰吾（旅长）率罗振武等两团担任守备；侯之担的指挥所位置于遵义城。

1935年元月底，我在贵阳得知红军分两路已经渡过乌江，其一路由瓮安、孙家渡附近到遵义；另一路由余庆经箐口、湄潭到遵义。

红军在遵义县境渡江时，侯之担部刘翰吾旅罗振武团曾与激烈战斗，战败后向赤水、土城方向退走。侯本人就丢掉部队，只身逃往重庆。红军在湄潭县境渡江时，万式炯团以一个营（营长李仲春）据守湄潭，以两个营（营长吴子云、刘彬如）守江边各渡口，战败后退到凤冈。红军两路长驱直入地到达遵义。

红军占领遵义约半月后，薛岳已派郭思演接管贵阳城防，发表郭为贵阳警备司令，中央军反客为主，我出城进城均受他们盘查，处境异常难堪。当时我的想法是：贵阳已被中央军占据，我不能立足了；遵义已被红军占领，未见行动，遵义的资源比较富裕，倘被红军占领太久，若将地方民团的枪枝搜尽了，以后想恢复就更不容易了。我认为黔北是我的桑梓之地，应该恢复黔北。到不得已时，再向西北、路川、滇、黔三省交界找地盘，求生存。我当时对贵州的地盘还有些留恋。

为了想达到上述的目的，我向薛岳建议，即日恢复遵义。我说：“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薛岳没有同意，他说：“目前部队少了，不会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功。”

遵义攻守战的经过

1935年2月中旬，我召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在贵阳商议。我说：“贵阳已为中央军掌握一切，没有我们的地位了，唯一办法，是即日恢复遵义桑梓地方。如果你们愿意去攻遵义，我负责筹备伙食。”他二人都表示同意，随即率领部队，取道修文，由黄沙河渡河，目标先攻刀靶水。此时，红军已主动地离开遵义，何知重、柏辉章率部到达刀靶水时，仅仅同红军彭德怀部的后尾

接触。

当时，我在贵阳得知红军离开遵义的消息，即由贵阳出发赴遵义。到遵义时，何知重已率李成章旅之戴玉堂团及周相魁团、犹国才旅之魏金荣团共3个团，开往桐梓方向追击去了。据报：红军一部由桐梓下温水、东皇殿、枫村坝与川军郭勋祺部打了一仗。又据报：红军经四川之古蔺、太平渡，云南之威信向川滇两省边界而去。当时我估计，可能是川南、长江的江防布置严密，不容易渡江。我即由遵义转回贵阳。

2月21日，我在贵阳接蒋介石来电，大意说，红军回师东下，已到贵州赤水之土城附近，似有取道川、黔边界往酉阳、秀山与贺龙红二、六军团汇合模样，命你亲率所部，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此电是薛岳转交给我的。我接电后，即由贵阳出发，到刀靶水时，遇见遵义的来说：“共产党的军队又回来了，娄山关地方，前两天在打仗。”我遂乘车赶紧赴遵义。

2月22日，我在遵义得知情况是：红军从茅台镇以下二合树过河，经高桥到达桐梓。

此时，蒋介石的办法是：一面追击红军；一面乘机攫取贵州政权。因面薛岳既断绝了我的财税收入，又不发给我部队的伙饷。同时，他直接调动我的队伍，不让我集中部队（防我另打主意）。因此，我身边只有第一团第五团、第八团3个团的兵力。

我估计红军力量，不下四、五万人，回攻遵义，势在必得。要硬打吗，众寡悬殊；不打吗？我身边又有蒋介石派的督察专员——路邦道和潘壮飞监视我，内心惶惑不安。我暗中对遵义的乡亲们说：“红军力量大，我的力量单薄，我打算离开遵义，你们为了安全，赶快疏散。”

基于这个打算，2月24日，我对遵义的守城战作如下的布置：命第八团开赴遵义城北十华里之董公寺一带构筑阵地，准备迎击红军，并掩护由娄山关退下来的第六团；命第一团在董公寺以西飞来石一带构筑阵地，准备抵抗；第五团刚由金沙开来，其

后尾尚未到齐，命该团迅速在遵义城垣集结待命。

2月27日拂晓，城北之董公寺、飞来石一带，各团均已展开激烈战斗。我同犹国才亲到凤朝门郊外观察情势，得知杜肇华旅长和第一团团长江荣华都负了伤，第八团营长以下干部伤亡不少，全线已经动摇。同时，得知薛岳派吴奇伟带第四军已从贵阳开来增援，计程明天（28日）可到。

由于当前情势迫切，命第一、五、六共3个团退入遵义城垣，归刘鹤鸣指挥守城；命万式炯第八团继续与红军保持接触，必要时退守南门关附近高地，我自己带手枪兵一排，出南郊往忠庄铺，预期与吴奇伟见面，商量如何协同动作。我遂于是日下午3时出城。

我出城后，由于红军攻势猛烈，各团受到很大伤亡，第一团由飞来石现地向遵义西郊之马坎退却；第六团因在娄山关打了两天一夜，也过分疲乏，即向西郊之牛蹄场退却；第五团除留几个兵在红花岗作瞭望哨外，全团向西郊牛蹄场方向退却；第八团于黄昏后退到南门关高地警戒。

红军知城内空虚，乘夜进城，并将红花岗险要占据。

次日上午九时，我在忠庄铺见吴奇伟，交谈了遵义作战情况后，吴说：“我带的第四军（两个师）正在行进途中，大约再有一两个小时可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反攻遵义，应协力作战。”我说：“何知重师长已带3个团追击未回，第一、五、六团现在马坎集结；身边只第八团。”吴说：“现有两师零一团兵力足够反攻。你的意见，看怎样打法？”我说：“当前地形，我们的主力应由西侧隐蔽地向桃溪寺前进，首先将红花岗占领。”最后商定：川黔公路（不含）以西由中央军担任向红花岗攻击前进；川黔公路（含）以东一带高地，由第二十五军（第八团）担任坚守。指挥所（吴奇伟、王家烈）位置于忠庄铺北端。

是日上午11时，攻击开始。红军昨夜已入据遵义城，并已占了红花岗险要阵地。红花岗屏障着老城，居高临下，瞰制各方，

是历来用兵争夺的关键。中央军仰攻该地，在红军的大力瞰制下，伤亡很大，进展极难。公路以东各高地，筑有工事，双方拉锯争夺，无多大变化。全线经过6小时的激烈战斗，蒋介石派飞机两架来向阵地投弹助威，红花岗的红军仍屹立未动。正当中央军沿红花岗山麓冒死钻进谷地，大受伤亡之际，红军另一路由公路以东之甘堰塘、南公山向我右后方（忠庄铺的后方）迂回；又一部由官田垭抄出公路，直射指挥所，同时向阵地较薄弱的方面——第二十五军第八团进行侧面进攻，与该团短兵相接，反复肉搏，以致全线动摇。首先是我和吴奇伟所在的指挥所站不住脚，若不及时撤退，就有被活捉的危险。吴奇伟急乘小汽车向南（贵阳）夺路逃走，我带手枪排向西——金沙方向退走，接着，第二十五军第八团溃退到公路以西小高地收容。更狼狈的是吴奇伟的两个师（韩汉英、唐云山）大部分已经钻进口袋——红花岗山麓谷地，即将逼近老城的城垣之际，忽受红军由右翼包围，想退又退不出来。此时，红花岗的红军，俯瞰着全局情势，同时由正面出击，将韩、唐两师歼灭大半，接着衔尾追击，一直追到乌江边。该两师在溃不成军的败逃下，自己把乌江浮桥砍断了，以致许多退不及的人马溺死江中。

当我在忠庄铺与吴奇伟分手时，经费异常困难，我向吴借得5000元“中央券”，维持伙食。这天夜晚，我宿乐民城，次日，我在鸭溪接贵阳糜君牧（第二十五军留贵阳之电务处长）无线电话说：“中央军已退过河，败得很惨。”后我到金沙，江荣华、李维亚、刘鹤鸣各团，相继开向金沙，万式炯于第二天也到了金沙。

第五、六两团由遵义西郊撤退时，红军罗炳辉部乘胜追至白腊坎、马蹄面，然后舍去原来追击目标，径西向大定县（今大方）之九龙山、六龙、双山、猫场方向前进。此时，蒋介石直接命令柏辉章率队转向罗炳辉部急追。柏接命令后，即率李、刘两团跟踪红军罗炳辉部的路线急进，追到大定之南——猫场，曾与红军罗部接触3小时，罗部向纳雍方向而去。柏辉章率李、刘两

团开赴毕节、威宁驻防。遵义的攻守城战，到此结束。

我在金沙驻一星期后，何知重率戴玉堂、周相魁两团由赤水方面开到金沙集合。

3月7日，我带军部指挥所人员由金沙到黔西，留行营主任江国璠在金沙与黔北有关各部保持联系。

蒋介石逼我交出军权和政权

3月15日，我在黔西接到贵阳李仲公来电，约我到贵阳面叙。接电后，除留参谋长张奎（号铁丞）在黔西主持军部日常事务外，我从黔西到贵阳。李仲公对我说：“蒋先生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对贵州的政治和军事专搞一样，你愿意主军还是愿意主政？”我回答说：“政治非我所长，我愿专搞军事。”不几天，蒋介石派他的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由渝来黔，与我商谈贵州问题。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即明令免去我贵州省主席兼职，另派吴忠信接替。同时，发表我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我接到这个新任命后，由贵阳重返大定军部。

不意蒋介石不以我交出政权为满足，还要我交出军队。他用内外夹攻的手法：一面进一步扼制我的军饷，分文不给；一面收买我的部下，逼我下台。于是寻找空隙，制造纠纷。

适逢川军的部队在黔西同黔军因军队驻扎房子的问题，发生冲突。蒋介石闻讯，遂借调查为名，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赴黔西、大定，鬼鬼祟祟地对我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进行封官许愿。（解放后，据何知重自己说，他过去瞒着王家烈受蒋介石贿赂过5万元大洋。一次许给柏辉章3万元大洋，此款是预约部队出省开到四川忠县才兑现。又据别人说，当时晏道刚许何升军长。）因之，何、柏两人，当时对我软攻硬逼，公然提出劝我下台。他二人又虚情假意地说将来决不负我，并请我同他们二人到城隍庙发誓，表明他们二人的心迹。晏道刚亲自导演这些把戏。

同时，柏辉章唆使个别营长——周相魁团之营长令狐作宾，煽动该营士兵，当着客人晏道刚的面，特意做出姿态，向我闹饷。晏道刚就抓住这些事实，乘机向我进言，他转弯抹角地作比喻说：“杨虎城在某个时期，转不过弯子，就自动让开一下。可是后来，蒋先生还是请他回西安了。”

另外，蒋给我一个难题：要我将原来两师5旅15个团，缩编为两个师，辖6个团（废旅）。当时各旅、团长分驻各县，蒋不让我集中。要整编吗？部队不集中，人事不好安排；不整编吧，蒋介石又不发伙饷。眼看就临到“一日无粮千兵散”的边缘，处境异常危险。

我即愤然由大定到贵阳向蒋介石面请辞职。此时，红军已分两路西进云南，贵州境内无战事了。我向蒋介石说：“我要求解除兵柄，出外考察。”蒋介石假惺惺地说：“辜负你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得了。”次日，他就由报上公布：“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又疑我久在贵州，恐生枝节。凑巧，行营主任张学良，由汉口乘飞机到贵阳，蒋就告诉张学良，约我搭他的飞机，于1935年5月3日，偕同张学良飞往汉口。

总计，此次危害红军长征的作战，全部时间为6个月，即1934年10月到1935年4月。前后调动兵力计有，蒋介石的中央军8个师，贵州军5个师（何知重、柏辉章、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广西军两个师（军长廖磊带来覃联芳、周祖晃），四川军刘湘派来两个师（郭勋祺、廖海涛），又杨森两个师，云南4个旅（归孙渡率领），共计兵力15万人以上，红军经过大小战役，除在遵义攻守城战、娄山关作战、乌江渡口作战面外，与川军郭勋祺在赤水枫村坝打一仗，又在坛厂、鲁班场与中央军周浑元、万耀煌部打两仗；出永安寺到西安寨与黔军犹禹九旅一度接触。此后红军一路由六广河渡乌江后，经息烽、黑神庙到开阳，由开阳向南越过黔湘公路，在谷脚与滇军孙渡部打一仗。尔后经孟关、花溪、长顺、紫云渡过花江河，经盘县西进云南，北上抗日。

我离贵州后，原属直接指挥的 2 师 5 旅 15 个团，被蒋介石改编为所谓中央直辖第一〇二、一〇三两个师，每师辖 3 团，由柏辉章、何知重分任师长。在改编时，周芳仁（旅长）带第七团，江荣华（副旅长）带第一团拖向广西找李（宗仁）、白（崇禧）收编。其他旅团长，有的回家，有的随队出省。另外，犹国才师改编为第一二一师，参谋长吴剑平任师长；蒋在珍改编为新八师，仍任师长；侯之坦师改编为第一四〇师，沈久成任师长。蒋介石命令以上五个师限期离开贵州，分散驻扎省外。从此，第二十五军就告结束。

黔军阻击红军纪要

万 式 炯

1934年到1935年，红军有几支队伍在贵州活动，受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黔军的围追和堵截。当时，我在第二十五军任第八团团长，我亲自参加了阻击红军的活动；又因王家烈是我的姑丈，我受到他的培植重用，我团不仅武器装备较为精良，还配有当时部队少有的电台一部，我和军部参谋处联系方便，他们也对我另眼看待，经常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因此，我对当时的战况了解较为清楚。

一 军阀混战和红三军、红六军团入黔

1930年，湘鄂西根据地组成红军第二军团，由贺龙将军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1933年秋，红三军转移到湘鄂川黔边界，在贵州沿河进行游击战争。1934年6月红三军创立了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红三军能够立足于黔东，是与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分不开的。当时，贵州王家烈与湘西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交哄，双方迭次兵戎相见，王家烈派廖怀忠师长及中将参军王天锡率部往铜仁将陈击溃；陈渠珍又联合驻铜仁反王家烈的师长车鸣骥，在黔东作乱，王家烈派柏辉章师长率兵3个团（即第四、五、八团）开赴玉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直属第八团团长。

屏、铜仁，双方决战于猫猫岩。同时王家烈的后顾之忧是犹国才。前此王家烈曾想“助桂反蒋”，蒋介石就策划“以犹倒王”，王家烈、犹国才之战，虽已由王胜犹败而暂告平息，但王家烈对蒋、犹的戒心并未稍减。王家烈若要全力向黔东红军用兵，又恐犹国才从西路乘虚进袭，因此王死守地盘，一直不敢妄动。王家烈在1934年底一次省民众大会上说：“红军贺龙初到沿河时，人约4000，枪约2000余。那时我曾派李成章旅长率部到湄潭防堵。廖怀忠师不明真相，出于误会，将李部拖往松桃。因此延误时日，红军得此良机，发展壮大，势力蔓延于思南、石阡、印江、沿河一带。我军‘追剿’之时，每苦于顾此失彼，难得寻获红军主力。”

红三军在黔东根据地内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同时建立了地方武装。尽管黔东根据地仅纵横300里，人口十万余，但是使红三军渡过了建军以来的最困难的时刻，为与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贵州地方势力王家烈的统治是一个强烈的震撼。

二 湘桂滇黔军协商围剿红军对策

贺龙将军在湘西黔东建立了红色政权，使王家烈及贵州军政人员，诚惶诚恐，王家烈欲挽回危局，必先协调内部冲突，解除后顾之忧。通过黄道彬、何知重从中调和，于1934年秋，王家烈和犹国才举行关岭会议。王、犹在会上要大家和平协作，对抗红军。商谈结果是：犹部兵力交王率领，开赴黔东、湘西，“防剿”红军；王则以省主席一职畀犹代理。王家烈随即将原部置在西部天险花江河，由我率领准备随时对付犹军的第八团撤走，以加强对红军的攻击力量。

1934年9月，正当王家烈集中兵力“围剿”红军的时候，任弼时和萧克率领红六军团自赣西征，经湘桂而逼近我省黎平、锦

屏一带。湘桂黔等省都为之震惊，如何联合起来阻击和歼灭西进的红军，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这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派代表路邦道、潘壮飞两人来黔，与王家烈协商“会剿”办法。他们转达何键的意见，愿出四个团兵力，会同黔省“剿灭”红军。

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张蕴良来贵阳，向王家烈表示，愿出4个团兵力“会剿”红军。并说：“李、白接上海密电，红军主力将离开江西，通过西南，北上抗日。蒋介石必然借‘追剿’红军的机会，派中央军进入西南控制各省。”张蕴良又说：“李、白建议，滇黔桂三省出兵，在湘桂边境的黄河一带防堵，压迫红军主力向湖北秭归、巴东方面渡江北上，以免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阴谋得逞。”

王家烈同意李、白的建议，后与滇省联系，希望出兵“会剿”。因龙云不愿将部队调离云南省境，这项计划未得实现。

此时，萧克率领的红军第六军团已近逼黔境，王家烈慌忙调兵遣将，围堵红军。

三 王家烈部与红六军团作战经过

1934年9月中旬，红六军团由湘桂边境经城步、靖县到达贵州锦屏。湖南何键派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广西李、白派军长廖磊率部尾追至锦屏。

何键与王家烈在锦屏虽然设有湘黔边区剿共司令部（由黔军第一师师长何知重兼任司令，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兼任副司令），而实际上，何知重同师部驻安顺，李觉同师部驻长沙，该司令部的日常工作，由参谋长王伯勋代行，全部兵力为湘军一个团、黔军两个营。当时王伯勋在清江左岸沿锦屏、黔阳之线构筑工事，防堵红六军团。

王家烈判断入黔红六军团旨在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合，扩大红

色区域，就决定联合湘桂军队，妄图在贵定以东，乌江以南，将红六军团摧垮，逐出贵州，遏制红军在贵州的发展。

王家烈的具体作战部署是：1. 命原驻榕江之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部开赴黎平防堵；2. 命省公安局长王天锡为前敌指挥，率第一团（团长江荣华）、第六团（团长刘鹤鸣）由贵阳出发，开赴施秉防堵，并伺机准备向镇远、施秉之间的文德关、镇雄关、刘家庄、甘溪坪一带迎击；3. 命我率驻湘潭的第八团在乌江北岸箐口一带严密扼守，防萧克率红军渡过乌江；4. 命驻铜仁之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及驻思南之第一旅旅长李成章两部，协力对印江、沿河方面之贺龙红军进行封锁，截断其南进接应萧克之路线。为了加强军部实力并利于直接督师作战，王家烈将作战指挥所设于平越马场坪，任命刘民杰（号继炎）为参谋长，他自己则亲临马场坪督战。

9月20日，红六军团进至黎平以南之潭溪，与周芳仁旅发生战斗。周旅有10连兵力，以两个连留守榕江，8个连投入战斗。红军以强大的攻势一举击溃这个防线，乘胜向北，取道瑶光、南加堡，北渡清江河，又迂回向东前进。当红军进军到剑河县的大广时，遭桂军廖磊部阻击，红军遂掉头向西，经南洞司、良上、平兆，直指黄平、旧州。当红军进至黄平县属的翁谷垅地区时，湘桂两军也追赶而来，集结于镇远、施秉一带。

王家烈看到湘桂黔军合围之势已成，遂令前敌指挥王天锡同湘、桂两军面商“会剿”的具体办法。经商议决定：北面为乌江天险，水深流急，由我率第八团严密防堵，红军势难飞渡，预料红六军团的进军目标是与红三军会合，派湘军即由镇远直赴石阡县城，桂军亦由施秉向石阡县属的路腊、大地方（地名）跟进，以湘桂重兵集结石阡县境，断红军去路，以便迎头阻击；王天锡率黔军迅速进军黄平，跟踪追击。随即三方配合作战，缩小包围圈，妄图将红六军团压缩在乌江右岸的狭小地区，一举歼灭。

红军至余庆县的龙溪后，曾在回龙场、箐口一带，侦察乌江

渡口，但水势湍急，且防守严密，红军无法过江。这时，王天锡部已追至黄平、旧州一带，虽然王天锡慑于红军的声威不敢猛追，但已切断了红军的退路。红军转攻占瓮安猴场，东向石阡进发，在石阡的甘溪与桂军发生激战，红军被截成3段，一部分掩护大部队转移；一部分在李达率领下突围北上，在沿河境内与红三军会合；主力红军转战于石阡、镇远、施秉一带，经过10多天的艰苦战斗，摆脱了湘桂军的追堵。当进至石阡的白沙时，又遇王家烈部的皮光泽率领第十四团进行阻击，经过奋力冲杀，红军终于抢在湘桂黔各军形成合围之前，突破湘军成铁侠部防线，直奔印江。

当湘桂黔军构成包围圈，试图一举歼灭红六军团的时候，王家烈将其军部指挥所由马场坪移到余庆，继又推进思南。他获悉红军已经突进印江后，慌忙饬令王天锡并带李成章部向印江追击。当时王天锡率本部3个团直取沙坪，李成章率两个团径指火烧桥，企图截断两部红军会师。然而，由于红六军团行动神速，甩脱了黔军的堵截，经火烧桥、沙坪，在木黄、石梁一带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当王、李两部追到预定地点时，会师后的红军已经南腰界向四川的酉阳进军了。这时，红三军改为红二军团。10月25日，王天锡、李成章两部在火烧桥集结。王天锡重新作了部署：李成章率部向四川龙潭追击，王本人率部进军四川酉阳。王至酉阳时，红军已奔向湖南的龙山根据地去了。

四 阻击中央红军入黔

（一）王家烈的部署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采取重点进攻，“堡垒主义”新战略，向中央根据地发起了的大规模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的错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放弃

中央苏区，向西突围，企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为了阻挡红军会师，即速发出电令，进行新的部署：

命西路军何键部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继续“清剿”，主力悉调湖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追堵，并以一部分兵力部署在粤湘边境截击，总部移驻衡阳；

命南路军陈济棠部留李扬敬纵队在赣边继续“清剿”，主力进至粤湘边境的乐昌、仁化地区阻击，总部移驻韶关；

命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集中桂北防堵，总部移驻桂林；

命北路军顾祝同，以第六路薛岳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为了确保截住红军西进，蒋介石精心筹划，层层布防：以余汉谋部在赣南设置第一道封锁线，以陈济棠出兵汝城、桂东、仁化、宜章一带，设置第二道封锁线；并分兵沿粤汉线设置第三道封锁线；以何键在湘江以东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开始西进，一路破关突防，势如破竹，首先在江西的安远、信丰间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北部；继在湘南的桂东、汝城间，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占领宜章，进而突破了粤汉沿线的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等县；11月底，红军到达湘江东岸，强渡向西，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接着于11月底沿广西西延山脉直指贵州。蒋介石布置的四道封锁线被突破之后，他就接连电令湘桂黔军加强协作，共击红军。当时围绕着贵州为中心战场，湘桂黔军各作如下布置：

湘军何键命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飭陈光中、王东原两师尾追，李云杰、李韞珩等部会同西进。补充总队主任何平、副主任成铁侠，负责建筑碉堡。又命第二路“追剿”军薛岳（中央军）率第二、第三纵队向黔推进。

桂军白崇禧命廖磊，率覃联芳师由湖南长安堡转进牙堡，蹊

红军尾追，周祖晃师由广西古宜经下皮林进榕江，助黔防堵。

黔军是以王家烈为首的第二十五军，分属四个派系，指挥不统一，即以军长王家烈、副军长侯之担、总指挥犹国才、师长蒋在珍各成一系。

王家烈直接指挥的部队有：第一师，师长何知重（兼“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副师长张銮。飞机队队长周一平，下属各旅为：第一旅，旅长李成章；第二旅，旅长杜肇华；第三旅，旅长犹禹九；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第五旅，旅长杨昭焯，副旅长蒋德铭，下属各团，第一团，团长江荣华；第二团，团长戴玉堂；第三团，团长周相魁；第四团，团长蒋德铭；第五团，团长李维亚；第六团，团长刘鹤鸣；第七团，团长周芳仁（兼）；第八团，团长万式炯；第九团，团长罗熠斌（前任是杨昭焯）；第十团，团长宋肇奎；第十一团，团长钟立纲；第十二团，团长袁景文（继任是皮德沛）；第十四团（皮光泽）；第十五团，团长金祖典；第十六团，团长宋华轩；特务团，团长赵兴鉴、副团长欧阳牲成；山炮团，团长李念荪；特科训练处，主任陈永思。

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直接指挥的有：教导师，下属第一旅，旅长刘汉吾，辖第一团，团长刘安祺，第二团，团长娄利贞；第二旅，旅长林秀生，辖第三团，团长罗玉春（号振武）；又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侯之玺辖第四团，团长王一（号承绪），第五团，团长郑廷芳；第三旅，旅长易少荃，辖第六团，团长欧阳文，第七团，团长周仁溥；又教导师直属团长侯相儒，机炮营长赵宪辉。

犹国才直接指挥的有：第一旅，旅长罗霄鹏，辖第一团，团长周文彬，第二团，团长魏锡麟，第三团，团长罗霄鹏（兼）；第二旅辖第四团，团长常和笙，第五团，团长宋永真，第六团，团长李少模。

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蒋在珍，下属第一旅，旅长傅衡中，

辖第一团，团长袁炳衡，第二团，团长彭镇汉；第二旅，旅长李昌荣，辖第三团，团长刘萌培，第四团，团长黄福安。除王家烈、犹国才、侯汉佑及蒋在珍的部队之外，贵州各地的民团有：清江河保安大队大队长王道帜，锦（屏）、柱（天柱）、剑（河）、台（江）民团指挥龙德高，都（匀）、独（山）、荔（波）、平（塘）民团指挥何干群，榕（江）、下（司）、黎（平）、永（从）民团指挥何韬，湘黔边区第二路清乡司令罗秉堃。

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和红军进迫黔省的紧急状况，王家烈作如下部署：

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十五两团，并指挥都（匀）、独（山）、荔（波）、平（塘）民团和榕（江）、下（江）、黎（平）、永（从）、民团，开赴永从、黎平、老锦屏之线，严密防堵；

第二旅旅长杜肇华，率第五、六两团进驻天柱，协同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部参谋长王伯勋，并指挥黎、锦民团，于瓮洞、远口、天柱、锦屏之线，严密布防，清江河“清剿”指挥部陈叔武，民团指挥王道帜，负责清江河防务；

第一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三、九各团由思南、印江开赴施秉集中待命。

王家烈部署完毕，于11月13日亲赴马场坪督战，并任命犹国才为贵州全省“剿匪”总指挥，令其出兵三个团，向黎平、永从增防。犹部第一团团团长周文彬，于12月4日始由兴仁出发，其余各团按程东进。

（二）中央红军进迫乌江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黎平县境，在平茶击败周芳仁旅之赵瑜营。15日红军进逼县城，与周芳仁部激烈战斗约两小时，红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施行包围。周芳仁被迫弃城退至大坡顶，固守待援。王家烈闻首战失利，即飭第二旅旅长杜肇华率第五、六两团向黎平增援；又命李成章旅率第二、

三、九团推进剑河策应；再命何韬率民团增防榕江，以解黎平之危。

杜肇华的作战方案是：若红军突过靖（县）会（同）、远口之线，他就配合湘军向红军夹击；若红军突进锦屏，他就以主力固守；若红军进逼黎平、榕江，他就向红军左翼袭击。正当杜肇华奉命出兵增援黎平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四千余众进攻老锦屏防线。15日，黔军第十五团金祖典战败，撤退到清水江右岸。这样，杜肇华就自顾不暇，只能全力固守茅贡、岔处防线了。彭德怀部进至綉洞后，侦知此线工事强固，且有碉堡十余座，故折回与主力红军自南加堡、平兆、瑶光、鳌鱼嘴等处渡清水江。

16日，红军分两路发起猛攻，强渡清水江，黔军凭借河防固守顽抗。激战半日，红军以排炮向敌岸猛轰，碉堡多被摧毁，黔军死亡二百余人，终于突破河防，强渡成功。这时，王家烈慌了手脚，感到形势危急，乃大声疾呼：红军号称十万，若令日久蔓延，不仅黔省可被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他恳请蒋介石飞令川湘各军西移黔境，桂省各部越省出击，以挽救黔难。

红军渡过清江河之后，挥师挺进，18日克剑河县城，随即直取台拱，22日占领台拱。王家烈估计红军将向施秉、黄平、镇远、余庆突进，乃令李成章率旅赴炉山、台拱、丹江，杜肇华率旅到麻江、台拱，犹国才率部到马场坪，何知重率部扼守东坡、黄平之线，第二师副师长张奎率部陈兵于重安江、黄平之线，并集结黔军主力于炉山，共御红军之北进。23日，桂军周祖晃师至榕江，湘军主力入黔境，中央军薛岳部已分头抵达天柱、锦屏，国民党企图合围，以歼红军。

25日，红三军团攻占镇远县城，民团大队长陈庸战死。26日，红军占施秉县城。27、28日，红军与黔军李成章和杜肇华两旅激战于黄平。29日，红军攻克余庆县城。30日，红军主力集结于余庆、石阡一带，31日，红军胜利地进至乌江南岸。

(三)江防溃败及遵义失守

蒋介石和王家烈都把乌江天险视为遏止红军北上，并夹击歼灭红军的天然屏障，王家烈早就责成副军长侯之坦负责乌江以北的防务，并派我率领较精锐的第八团协同固守江防。

1935年1月1日，王家烈应薛岳电约由贵阳赴马场坪与薛会晤，参谋长谢汝霖、副官长胡德渊随行。薛岳讲了当时形势，又假惺惺地对王家烈说：“你今后应靠拢陈诚派，不要靠拢何应钦派，将会给你补充军实。”商谈的宗旨，是要同心协力，坚守乌江，共歼红军。

随后，薛岳偕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和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陪同王家烈回贵阳。首先，传达了蒋介石新作出的几项任命：龙云为第一路总司令，薛岳为第一路前敌总指挥，吴奇伟为第一纵队司令，周浑元为第二纵队司令，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犹国才为副司令。

在薛岳、王家烈密切会商之际，乌江两岸，黔军阵地堡垒林立，副军长侯之坦命刘翰吾旅长任右路指挥，担任白尚稽至茶山关段的江防；命易少荃旅长任中路指挥，带欧阳文、周仁溥两团，担任羊岩关至孙家渡段的江防；命林秀生旅长为左路指挥，率罗玉春团、机炮营担任江界河至岩门段的江防，并与我率领的第八团取得联系；我团则奉命担任湄潭县境箐口至红岩段的江防；命副师长侯汉佑为前敌指挥，带特务营长党圣征扼守于岩坑和珠藏；命侯之奎旅长带郑廷芳、王一两团，由川南、赤水开赴遵义，作总预备队；副军长侯之坦率教导师直属团（团长侯相儒），设指挥部于遵义城直接指挥作战。

1934年12月28日，侯之坦接到报告：由老黄平北进之红军，在江界河一带搜索竹木编制渡河工具。30日接易少荃报告：由瓮安北进之红军，在茶山关一带搜集竹木。

1935年1月2日，江界河岸的红军在火力掩护下，开始强渡乌

江。渡河工具是当地农民献策献力扎成的竹木筏，红军用粗绳将筏子系于岸上的树干、木桩或岩石上，顺次下放江中，使筏子互相靠拢衔接，自然形成一座活动的斜形浮桥，筏上还筑有工事，构成人字掩体。但是由于黔军火力强大，红军首次强渡没有成功。

当天夜间，红军十余人冒着严寒和急流，在老虎洞悄悄泅水过江，潜伏于罗玉春团防线内岩脚下。第二天，红军主力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进行强渡，当红军逼近北岸，黔军正在阻击时，突然发现在自己阵地岩脚下埋有伏兵，红军就像神兵天将，冲到黔军阵地上，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黔军惊慌失措，纷纷溃逃。这些红军占领了阵地，接应红军主力登岸。黔军的机炮营营长赵宪辉督队拚死反扑，当场被红军击毙，一时间黔军兵败如山崩，乱作一团，罗玉春指挥失灵，急得嘶声嚎叫：“我不走，我要死在这里！”他的卫兵只好拖着他逃跑。

罗玉春团的崩溃，震动了林秀生旅的整个右侧阵地。3日下午，林秀生旅纷纷溃退，其残部至珠藏为副师长侯汉佑收容，经遵义、鸭溪向长干山退却。

中路易少荃旅惊闻江界河失守，即率欧阳文、刘安祺两团仓皇撤退到龙坪、深溪水设防堵击，与红军交战数小时后惨败，伤亡及被俘者甚众。易少荃率残部绕过遵义城，向桐梓退却，在桐梓附近，易少荃既恼且怒，无处发泄，即假借“向红军投降”的罪名，枪毙了一个排长，后狼狈逃跑，其残部由刘翰吾收容。

正当另一路红军向右面的马场和茶山关进发，准备由此强渡乌江的时候，扼守茶山关的右路指挥刘翰吾，被江界河、孙家渡相继失守，林秀生、易少荃两旅相继惨败的消息吓得失魂落魄，慌忙往桐梓退却。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夺取茶山关，渡过马江，占领了尚稽。

在上述两路红军在江界河与茶山关飞渡乌江的同时，第三支红军部队也向箐口进发，准备强渡乌江。我率领的第八团正扼守

箐口一带江防，我命第三营营长刘彬如进入箐口江边阵地第一营营长吴子荣配置于江边的后场和老渡口，第二营营长李仲春率重机枪连、炮兵连驻守湄潭作预备队。

12月31日，红军由回龙场强渡乌江，首先向北岸炮击，刘彬如营在江边构筑的工事被击毁。在火力掩护下，红军从鱼塘子渡河，待其将抵对岸之际，我全团按预定计划撤退，经凤冈至思南。1月4日，红军进驻湄潭。

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的战斗全部告捷后，就乘胜直捣侯之担部所驻扎的黔北重镇——遵义。

红军向遵义进发途中，在龙坪、深溪水战败易少荃旅，抓获许多战俘，红军换上这些战俘的衣帽，伪装成侯部士兵，于半夜来到遵义城下，由俘虏喊开城门，红军一涌而入，不费一枪一弹，轻取遵义。侯相儒从梦中惊醒，急忙率领部队向桐梓逃跑。

1月7日凌晨，红军占领遵义城。

1月8日，红军进一步击溃退守于娄山关的刘翰吾，易少荃残部和新从赤水开来接应的侯之玺旅，一鼓作气追击了40里。败军拟退据桐梓城，不料已被迂回速进的红军抢先占领。刘翰吾只好从猴子溪、下坝向赤水仓皇撤退。侯之玺则沿川黔公路至新站，企图与川军刘湘部汇合。其时，红军早从夜郎坝小路迂回到侯军的前面，截断了侯军与川境涪陵川军的联络。正当侯之玺在新站公路两侧山上构筑工事，准备抵抗红军时，忽然听到后路响起枪声，才惊悉退路已被红军截断，川军不能前来增援，陷入了被红军腹背夹击的困境，侯旅全线崩溃，夺路向温水、良村败退。

1月9日，红军占领了川黔交界的松坎。

五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使蒋介石、王家烈惶恐不安，他们又重新策划调动兵力，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时而进军川南，佯作“渡长江入川”之势，时而班师回黔，甩掉尾追之军，乘隙西进，于是，乃有“四渡赤水”之战。

（一）红军一渡赤水，川黔两军受创

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连遭败绩之后，蒋介石乘机削弱王家烈的统治势力，一面指使重庆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以“作战不力，迭失要隘，潜来渝城”的罪名，将副军长侯之担扣押查办；一面派第一路前敌总指挥薛岳进入贵阳，薛令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接管贵阳城防，取王天锡的职权而代之。王家烈出入城门，均受盘查，处境异常难堪。薛岳还调散第二十五军，使之不得集中，并断绝王的财税收入，不发军饷等。王家烈焦急万状，从违两难，他预感末日来临，就试图把部队拖到川南边界，以求幸存，遂向薛岳表示：“黔北是我桑梓之地，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薛岳同意，即令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率第二、四、五、六、九、十一共6个团，加上犹国才部的两个团由鸭池河渡江，向遵义进发。薛岳还指派督察专员路邦道和潘壮飞同行，从中监视。

这时，薛岳调周浑元纵队北上遵、桐；又调在川的中央军上官云相、郝梦龄等部及川军刘湘部南向遵、桐，配合周、吴纵队夹击红军。

遵义会议结束后，1月19日中央红军即向赤水、川南进军。红军分数路并进。右路红军从桐梓出发，在习水境内击败川军郭勋祺师的刘兆黎旅，占据习水县城。退守习水的刘翰吾、侯之玺两部望风披靡，继续退向官渡、土城，并在土城抢先占据山上的制高点，准备迎战。但部署尚未就绪，红军突然出现于山脚，该旅像一群惊弓之鸟，急忙丢掉阵地，砍断浮桥，向赤水河左岸狼狈逃窜，红军占领土城。

红军从土城经元厚继续向赤水推进。其一部在旺隆场再败侯之玺旅，另一部在七里坎黄陂洞与川军章安平旅遭遇。由于川军

占据高地进行火力封锁，红军处于不利地形，伤亡较大。红军不能取胜，旋即退去。

1月28日，红军由旺隆场返回元厚，在枫溪口等处渡过赤水河，成为入川南的右路。

左路红军从仁怀县的回龙场经赤水县之临江场至土城时，候汉佑的罗玉春团、师部直属营及川军刘兆藜旅已先集结于土城布防，在土城右侧的青杠坡发生激战。1月27日，川军潘佐旅赶来增援，战况更趋激烈，红军后续部队赶到，击溃川军。29日，红军乘胜在潭溪口渡过赤水河，经桃溪场，越拖枪岭，进军四川，成为红军入川南的左路。至此，红军首次渡过了赤水河。

(二)红军二渡赤水，中央军和黔军受挫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行抵云南镇雄之威信时，突然改变进军路线，掉头回师川南再入贵州。

在黔境被红军打败的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喘息过来，又慌忙投入战斗准备。

中央军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在贵阳及其以西集结待命。

王家烈为母祝寿，正住在桐梓小水老家。2月21日，接到贵阳薛岳转蒋介石由重庆来电：“红军回师东渡赤水，似有取道川黔边界往酉阳、秀山与贺龙、萧克汇合模样。”命王家烈率部在松坎以北的赶水之线堵击。

王家烈立即戎装奔赴遵义指挥督战，将其兵力部署在桐梓、娄山关及遵义一线。

2月23日，红军东进至遵义、仁怀、桐梓、习水交界之花楸坪，向高桥急进。滇军一个旅尾追至古蔺县以东的镇龙山、石宝寨。

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突袭桐梓县城，守城的蒋德铭旅正与川军交防，措手不及，当被击溃，红军轻取桐梓县城，继

续挥师南进，顺利到达红花园。杜肇华率第六、十五两团迎戢于娄山关。激战两昼夜，红军越来越多，战火蔓延到红花园、黑神庙、小箐、观音阁等地。杜部失利，陷入重围，伤亡达六百余人。2月26日，娄山关被红军攻占。娄山关失守，遵义危急，王家烈身边只有一、八两团及五团一个营。面对红军主力，倘若死守，众寡悬殊，势必败北；倘若不守，蒋介石的督察专员监视左右，侯之担的下场，前车可鉴！是守是走，进退维谷。出于利害考虑，王家烈决定还是死守。他一面十万火急地电令何知重率师星夜驰援，一面又向薛岳告急求救，贵阳薛岳电告吴奇伟率两师前来增援。王家烈有了一线希望，迅速作出守城部署；命我率领的第八团赴距城十余里的董公寺，构筑阵地，准备抵抗，并掩护由娄山关撤退的刘鹤鸣团；命江荣华率第一团在董公寺之西飞来石一带修壕建垒，配合第八团作战；命李维亚集结第五团于遵义待命；王家烈、犹国才亲临城北风朝门督战。

2月27日拂晓，在董公寺、飞来石一带黔军与红军展开激战。第八团与红军争夺高地，几进儿出。这时黔军第一团团长江荣华在飞来石被红军打伤，阵地为之动摇。红军乘隙包抄第八团之左侧，战斗更趋激烈，是时副旅长杜肇华在第八团阵地负伤。由于第八团地势有利，红军屡攻不下，阵地才得守住。

王家烈见红军两翼逼近城边，而吴奇伟部又须次日才能赶到，就急忙命第一、五、六团退守城内，归第六团刘鹤鸣指挥；命我率领的第八团继续与红军保持接触，必要时退至南关高地，扼守遵义至贵阳的交通要道，策应来遵之吴奇伟部，王家烈带卫兵一排，出南郊忠庄铺，待吴奇伟前来会商作战事宜。王家烈希望争得时间，固守待援，保住遵义。

然而，由于红军攻势猛烈，迫使第一团由飞来石向马坎退却；第六团因从娄山关至遵义连续奔命，十分疲惫，一触即溃，被迫向西部之牛蹄场退却；第五团除留少数控制红花岗的制高点外，也纷纷向牛蹄场退却；第八团于黄昏后也转移到南关高地，

保持与红军对峙。

红军很快夺取了红花岗要地，2月27日深夜，红军再次占领遵义。

28日上午8时，王家烈在忠庄铺会晤吴奇伟。吴说：“我带的第四军两个师正在兼程前进，大约再过一小时可到。我们的任务是反攻遵义，协同作战。”王说：“何知重师追敌未回，柏辉章师尚在马坎集结，准备反攻，身边只有第八团还在与红军对垒。”吴说：“现在两师一团，足够反攻。看你的意见如何打法？”王说：“我们的主力应从西侧的桃溪寺前进，首先夺取红花岗；另派一部从右侧迂回到敌人背后，造成红军腹背受敌。”

作战方案既定，分工如下：中央军主力攻取遵义老城制高点红花岗；黔军第八团一个营在公路正面筑工事坚守，以两营由团长率领迂回红军之后，配合中央军反攻遵义，指挥所设在忠庄铺。上午十时许，中央军吴奇伟部韩、唐两师赶到。

第八团受命后，我以第一营配置在川黔公路的正面阵地，专守交通要道，我亲率第二营营长李仲春，第三营营长刘彬如及重机枪连、迫击炮连取道铜锣井，从东门攻击遵义新城。当天上午战斗打响后，我率部冲到车站附近；韩、唐两师也从红花岗桃溪寺东面向老城逼近，据守在红花岗的红军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力击溃中央军的进攻，中央军伤亡人数很大。

正当此关键时刻，一支红军神出鬼没地由东迂回，经甘堰塘、南官山直捣忠庄铺指挥所，坐镇指挥的吴、王两人这才知道部队已钻进红军设置的口袋中，弄不好将要成瓮中之鳖，就慌忙下达全军撤退的命令。吴奇伟急忙跳上汽车逃奔贵阳；王家烈也迅速纵身上马，夺路逃向金沙。

这时红军已团团包围了吴、王的部队，中央军的两个师，接到后撤的命令时，已欲进无门，欲退无路了。据守在红花岗上的红军，正面出击。韩、唐两师狼狈溃退，被红军消灭过半，红军穷追猛打，直至乌江边。一部分中央军的残兵败将过江后，为了

摆脱追兵，即把浮桥砍断，不得过江者，一部分溺死江中，一部分作了红军的俘虏。

我率领的第八团奉命撤退时，官兵摸不着头脑，都感到惊惶失措。为了稳定军心，我大声疾呼：“不要惊慌，我们是本乡本土的人，到处都有路走！”我慌忙将部队聚集拢来，派一个连掩护重机枪、追击炮连先行。再派李、刘两营长各带两连，交互掩护撤退。至忠庄铺，始知已被红军扼守，而后面追兵逼近，我下令猛攻公路守军，夺路而逃。过公路时，我右腿负了伤。

原来扼守公路的第一营，已被红军消灭过半，余部撤到公路两边的小高地。我率第八团退经此地，将其收容，同向金沙撤退，第三天才与王家烈会合。

经此遵义大战，王家烈部损失惨重。王家烈既痛心，更忧虑，担心蒋介石会以军事失利为借口加以罪名。他含泪电呈蒋介石云：“共军回窜，黔当其冲，家烈守土之责既疏，追击之任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道？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

（三）红军三渡赤水，蒋介石围歼落空

红军取得遵义大捷后，迅速在鸭溪集结，随即北上经长干山而至茅台。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河，向四川省的古蔺进发。

在蒋介石看来，红军从江西出发，经过他的四道封锁线“追剿”，减员甚多，现虽再次入川，也不过是强弩之末，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歼灭。出乎他的意料，红军纵横驰骋于赣、湘、桂、黔、川诸省，防不胜防，堵不胜堵，追之莫及。更料不到遵义一战，吴奇伟部竟遭如此惨败。蒋介石看清了红军的强大力量，确实不可轻视；他也痛切感到，如不乘此歼灭红军，必定后患无穷。因此他由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指挥战斗。

蒋介石亲自审察战报战电，全面了解战局。他日夜派出飞机，飞临前线，追逐红军，进行侦察，掌握前线动态。部队的调配，作战方案的制定，具体战斗的部署，都一一由他审定。红军三渡赤水

时，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就制定了所谓“以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为目的”的军事计划。蒋介石调集了薛岳带领入黔的两个纵队及川滇黔的有关部队投入战阵，以图实现“聚歼红军”的目的。在具体战斗部署上，他分令各部担负不同的“进剿”、“堵剿”和游击任务。

负担“进剿”任务的部队是：周浑元纵队和吴奇伟纵队负责从鄢家渡、瓢儿井至古蔺“追剿”红军；川军郭勋祺师“由两路口直向仁怀、古蔺尾敌进剿”。

负担“堵剿”任务的部队是：滇军孙渡纵队“主力集结毕节附近，向敌防剿”。川军刘湘的一个旅“赴土城防堵”。川军陈万仞师部署于江津、叙永、赤水镇一线，“该部任务，重在防堵”。黔军王家烈纵队，在小河口、大河口、仙家渡、赤水河镇之线防堵。侯汉佑师于土城、蒋德铭旅于茅台防堵。

蒋介石推行“碉堡政策”，作为堵截红军的主要手段。他严令“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善”；“各主要渡河点，星夜赶筑工事。俟筑成后，并于两碉之间预筑子碉，连点成线，使两碉间能以目力、火力交叉相及为度，统限三日完成”；还要各部将“筑碉地点、数目，立即电告，并绘图补报。”

负担游击的部队有：川南边防军第二路司令魏楷部，在古蔺“坚守固阵，并多派小组游击，四出活动，迟滞敌之行动”。我率领的黔军第八团奉命在金沙以北游击。

正当蒋介石精心安排“聚歼红军”的作战部署时，红军突然由古蔺折回，再进贵州。把薛岳、周浑元、吴奇伟、刘湘、孙渡、王家烈等部全抛在后面。红军神出鬼没的运动战，弄得蒋介石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四）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惊慌失措

1935年3月21日，红军自古蔺回师至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淋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河，进入贵州赤水县境。24日，红

军东进，先头部队至习水县境的良村，主力折向兴隆场。

蒋介石“聚歼红军”的计划落空后，他扬言要与红军决一雌雄。他于3月24日下午4时，自渝乘专机飞抵清镇机场。何成浚、李仲公、王家烈等至机场迎接。蒋介石乘车至贵阳，行辕设于贵州省绥靖公署（六广门毛光翔住宅）。

随同蒋介石来筑的有宋美龄、美国顾问端纳、陈诚、晏道刚、吴稚晖、陈布雷。蒋介石向贵州的军政人员发表演讲说：“红军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口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已陷于走投无路的处境。”之后，又表明誓与红军决一雌雄。他希望“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这时，红军主力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右翼分路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九军团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红军主力继续南进，28日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红军南渡乌江，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当时驻守贵阳的只有郭思演第九十师的4个团，而且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实际不足两团。距贵阳较近的部队是防守息烽及乌江南岸的唐云山和韩汉英两师，但都是在遵义之役中的溃败之师，如惊弓之鸟，根本没有战斗力。只有驻在黔西的陈金城团尚属精锐，可供急用。

根据这种情况，蒋介石作出决定，先调部队保卫贵阳；调黔西陈金城团星夜兼程赶到贵阳警卫；又调大定孙渡纵队东进，集结贵阳待命。其次，严令下属各部对红军衔尾追击；命遵义李韫珩纵队迅速南行至息烽堵击；命湘军刘建绪、第四十八师徐源泉等部在黄平防堵；命桂军廖磊部在黔南阻击。

4月4日，蒋介石接李韫珩电告：该纵队在乌江南岸的息烽县黑神庙与红军遭遇，坚持抵抗。蒋介石为了鼓励士气，特传令嘉奖李韫珩，并予犒赏。但这时红军仅距贵阳百里，而贵阳兵少城虚，援军尚需两三日方到，当时形势非常紧急。蒋介石强作镇

静，亲自督促严密布防。他派清镇空军第三队日夜更番侦察红军的情况，探明追击和增援的各军位置。他又走出行辕，亲临城区墙垣，察看城防工事及军事部署，蒋介石视察之后表示不满，当面斥责贵阳警备司令郭思演督责下属不力，玩忽职守。实际上，蒋介石内心非常惶恐，他深知红军用兵神速和擅长奇袭，担心神兵天降，城破军覆。特别是在4月5日晚间，风闻贵阳外围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介石更是彻夜不安。他连连询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大小关的工事及城防兵备。他尤其关注业已加强警戒的清镇机场的情况，准备在危急之时，乘机远逸。

4月7日，孙渡纵队经过三天四百里的急行军，如期抵达贵阳。“勤王之师”及时驰赴救驾，使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顿时喜出望外，特意褒奖该纵队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凡旅长以上均受犒赏。孙渡在贵阳周旋一日，即奉命率部向龙里前进。途经距贵阳三十里的黄泥哨，与红军便衣队接触。至观音山，与红军遭遇，激战竟日。蒋介石为此特电龙云：嘉奖孙部忠勇作战，乃龙云总司令平素训练之功。

其时，红军已进至贵阳三四十里处，转向西南突进，把所有东追的国民党军甩在龙里以东，更利用蒋介石调开了云南堵军的有利条件，大踏步地向云南西进。

(五)红九军团留战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留罗炳辉带领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钳制国民党部队，掩护红军渡江。

蒋介石判断红九军团也将东进，便电令何知重离开原驻地金沙，东进湄潭截击；这是蒋介石自以为是地弄巧成拙，恰好给红九军团让开了西进之路。

红九军团掩护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之后，于4月3日从狗场折回，与黔军魏金镛部战于大寨，红军处于不利地形，乃边战边退，至老木孔，与魏金镛隔河对战。半夜，红军佯败，退至菜子坳，

布下伏兵，严阵以待。次晨，魏军尾追而来，至红军伏击圈内，正面骤然回击，后侧伏兵跃起杀出，将魏军截为两段，首尾不能相顾。红军乘胜痛歼魏军之后，仍回老木孔宿营。4月6日，红军至泮水，沿金沙大路到石桥，复抄小路，经里毛、石仵佬，西向大定。

4月7日，红九军团进袭食盐集散地瓢儿井，盐防军缴械。红军打开盐仓，将食盐分给穷人。周围二三十里内的贫苦农民，纷纷前来领盐。8日，红军宿营于猫场。蒋介石急电令柏辉章派队阻击，第六团团长刘鹤鸣奉命率部并配合江家寨民团武装围击红军，因猫场红军所占地形不利，红军受挫，旋以急行军退往鼠冲，经鸡场、大兔场、马宗岭、米洛到米角宿营。刘鹤鸣团见红军退走，即停止追击，转向大定。

黔西军部行营参谋长张奎，也奉蒋介石命率领第八团“追剿”红军。我们于4月7日由黔西三重堰出发，8日到长石，9日到瓢儿井，红军已过境两日，10日起在毕节屯军3日。又接蒋介石电，说红军已从纳雍到水城之立火竿，命张奎率领第八团取道七星关，南击纳雍一带的红军。张奎因要回黔西会见晏道刚，共商王家烈下台事，即命我率领队伍前去追击。14日自毕节出发，18日到七星关。19日到赫章，20日到水城，侦知红九军团已于19日通过茨冲，过北盘江上游的顺从，出盘县之普古，进入云南，与红军主力汇合去了。我追之莫及，即率部返回水城。

黔军第一师追堵红军经过

何 知 重

1934年秋，黔军得知红军长征的消息后，王家烈即召集犹国才、侯之担和我等开会，共筹决策。大家的基本意见是：以保存地盘及军政大权为目的；红军若来，即采取防而不打、堵而不追的方式，尽量避免冲突；不能避免时，则“退避三舍”，让其通过；以保存实力为原则；对邻省竭尽亲善，密取联系；对蒋介石采取电报政策。

当时我们想，红军可能不来，既使来，也不会来得这样快；更料不到中央军尾追红军，薛岳竟先占据贵阳地盘，进而夺取贵州政权。

1934年冬，边警频传，红军接着已进入贵州黎平、锦屏，向贵州腹地前进。12月，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率部由铜仁撤到镇远，我率第一师正集中于马场坪、炉山一带。第一师甫经开进，第二师先头之第六团即于黄平县后山与红军接触，战斗经过及战斗情形，均不明晰。经此堵截，红军就折向余庆、瓮安、平越地区而去。

黔军第二师于黄平与红军作战之次日，薛岳、吴奇伟率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第九十师欧震、第九十二师梁华盛、第九十三师唐云山、第九十九师郭思演、第十三师万耀煌各部，沿大道而来，不尾追红军，而直趋贵阳。1935年1月初王家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一师师长。

烈率部赶回贵阳部署，拱卫省会。薛岳到省，控制各要点，派郭思演为城防司令，王家烈出入，颇受限制。王家烈感到，贵阳地盘既失，遵（义）、桐（梓）是其家乡，未便坐视。种种情况，如芒在背，寝馈难安。王遂改变大计，请求出兵，恢复遵义，脱离虎口，别图生存。派犹国才为前敌总指挥，我为副指挥。这段时间，正是红军飞渡乌江，进驻遵义城，从容开会，决策大计的重要关头。

1935年1月中旬，犹国才同我由贵阳出发，取道修文渡黄沙河。柏辉章率第二师各旅团渡六广河在先头前进。我们进驻遇母洞之夜，柏辉章即袭击刀靶水红军后卫部队而占领之。柏师续于懒板凳（南白镇）、黄土坎，稍与红军接触。该师进驻遵义城后，又于城郊洗马滩附近与红军接触。我到达遵义，后于柏师两日，这几次战役经过情形，柏辉章直报薛岳及王家烈，犹国才与我均不知道。

1935年1月×日，我奉王家烈令率李成章旅第二团（团长戴玉堂）、第十一团（团长钟立纲）、第五旅长杨昭焯之第九团（团长罗熠斌）及犹国才部魏金荣旅的周文彬、罗霄鹏两团，由遵义出发到桐梓，筹备给养。休息两日，即分兵一部令杨昭焯带第九团沿川黔大道至新站、松坎，一面安抚民心，一面注意红军动向。

2月4日，我率李成章、魏金荣两旅，由桐梓出发，沿红军经过路线高桥、花秋坝、风水堰、桑树坝、火石岗、二郎坝、土豪坝、东皇殿追击。休息半天后，令魏金荣旅向习水进发，除注意红军动态外，并与新站、松坎之杨旅联系及相机接收行政、财政，以济军食。我认为红军过境已过一周，就食为重，仅率李旅经风村坝、青杠坡至土城，沿途听说：前几天川军与红军在青杠坡打仗，炮火连天，打了几天几夜，死伤很多。这就是川军刘湘教导师郭勋祺、刘兆藜两旅，遇红军作战的地方。

我到土城后，适侯汉佑（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由乌江败退下来，在此收容溃兵，我们彼此交换意见，各方情况，较为

了解。我认为红军远去，早入川境，追堵任务，至此可告一段落。当即打电报给王家烈，为避免与红军冲突，拟赴赤水，相机收复地盘，接收其行、财政。我还劝说侯汉佑拥王(家烈)，即所以救乃兄(侯之担)，救兄必须拥王，二者皆图存之道。图存就要团结，我们携手团结起来。汉佑深以为然。我随即偕汉佑赴赤水，经猴猴宿葫芦老，侯之担驻赤水负责人邹瑾派人前来挡驾。经汉佑转环，我仅带师直属营入城，李成章驻复兴场待命。

我到赤水后，民心安堵，惟侯氏内部，非常恐慌。因侯之担到渝，被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以侯放弃乌江，防守失职扣押。赤水一隅的军政，陷入紊乱状态。各方拉队伍，掠兵源者，都云集于此，如吴厚安、沈久成等，我亦竭尽活动之能事。

驻赤水旬日，传说红军回来，已过土城。接着王家烈令调我兼程驰援桐梓。我离赤水，经土城、二郎滩、三合土到遵(义)、桐(梓)、仁(怀)交界之新场地区，又接王电取捷径到金沙集中。此系红军二次胜利的进驻遵义。王家烈第二十五军于娄山关、凉风垭、董公寺，连战皆北，才撤退遵义城，到忠庄铺后，中央军各部亦到达，即与红军激战终日，第二十五军被击溃逃到金沙。中央军惨败，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溃不成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其伤亡仅次于唐师。此为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有名战役。

我奉令改道集中金沙，是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冲突，取捷径由大坝、长干山、泮水路线背进。派赴习水的魏金荣旅，好几天联络不上。到金沙后，我才知道犹国才于红军回来时，先已调走，直到安顺，事前事后，没有通知。这说明王、犹芥蒂之深，与我的矛盾亦尖锐了。

2月底，我率部过长干山到西安寨之日的薄暮，据前卫钟立纲团报称，泮水附近，似有红军，情况不明，半夜曾听见枪声，但未闻还击，天明后，钟团已到泮水。李成章旅继续长驱到金沙，午后3时左右，行到距金沙十余里之大桥一带，四川刘湘的飞

机即临上空，往复盘旋，误为红军，盲目轰炸，第二团正当其冲，伤亡数十人。飞机待识别符号后，才向北飞去。我师到达金沙，时已黄昏，第二十五军各部，均皆到达。遵照王家烈指示，编整部队。第一师属李成章旅，吴崑、戴玉堂两团属之；杨昭焯旅，周相魁、罗熠斌两团属之。第二师属杜肇华旅，刘鹤鸣、李维亚两团属之；蒋德明旅，金祖典、钟立纲两团属之；万式炯团直属军部。其余第十、十二两团，以兵员较少，拨补各团。旅团番号，一仍其旧。编竣后，略加整理。

甫经编整，蒋介石即电委柏辉章为第一〇二师师长，我为第一〇三师师长。师经费，规定月给4万元，自1935年3月份起由贵阳行营核发。以后师之行动，由蒋介石在贵阳直接指挥。

1935年3月，国民党中央军第三十六军周浑元部驻仁怀县坛厂、鲁班场一带，派员来金沙与我师联络，相互策应。我亦派人借来员诣第三十六军。去员回称，他到第三十六军，恰是他们与红军激战后，打了几个昼夜，战斗非常剧烈，伤亡惨重，要不是第十三师万耀煌驰来救援，第三十六军即将覆没。这段时间，红军回旋于遵义、仁怀、金沙及乌江南北两岸地区，非常主动，中央军各部，皆成了被动。蒋介石电令频传，朝令东行，夕令西往。在周浑元军被红军围困时，曾调我师驰援，开拔一天，又令回守金沙。

我在金沙正部署的时候，即奉命到乌江北岸固守某某据点一线，限期到达。部队刚到袁村、沙土一带，又接到兼程赶到湄潭的命令。经过两天一夜的跋涉，到湄潭不及三个小时，电台刚架好通电，又限令两日到黔西三重堰待命。这十余日来，不分昼夜，都在赶路，莫说还要顾虑敌情，连走路都行不动了，官兵疲惫，落伍极多。三重堰与湄潭相距在300华里以上，寻直径，走小路，经虾子场、老蒲场、忠庄铺、鸭溪、遇母洞的捷径，亦无法赶到，结果走了三天一夜，才到达三重堰。这时乌江两岸，已无红军踪影。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不顾官兵死活呢？当时有的幕

僚说，一是他在贵阳被红军围困，惊慌了头脑，二是在试探我们归编后，能否服从他的调遣。

我师到三重堰，时间是在4月，官兵疲惫之余，得了几天休息，也就恢复了正常。又接奉王家烈电令，调赴大定集中待命。我师追堵红军长征的经过，至此即告结束。

黔军第二师娄山关阻击战

刘 鹤 鸣

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进驻遵义时，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柏辉章所部的杜肇华旅（辖第五、六两团）先在平越县（今福泉县）之马场坪构筑工事，企图阻击红军进入贵阳。中央军第二路军薛岳所部尾随红军而来，即乘机入据贵阳市，转而改派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尾追红军向遵义进发。王家烈在接受这一任务后，遂命其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率部取道福泉、修文，经修文的六广渡河向金沙县境前进，再经沙土、沿村向遵义地界推进。至沿村后，柏辉章下令命第二旅旅长杜肇华率领第一、六两团向遵义县的三合镇附近设伏，以阻红军向刀靶水、老君观等地增援。柏辉章亲率第五团夜袭刀靶水、老君观两地的红军，以打通贵阳、遵义交通线。因红军仅有少数部队作掩护，柏辉章夜袭得逞，红军遂向遵义撤走，仅与柏部在刀靶水和三合镇两地有零星接触。柏部由刀靶水转经三合镇集合第一、五、六三个团向遵义前进。斯时红军已向桐梓方向撤去。柏乃命杜肇华率领第六团进驻距遵义六十华里的虾子场，以防湘鄂川黔边境红军由思南、湄潭来袭遵义，其余部队随柏本人驻防遵义。我当时任该师第六团团团长。

黔军所部在娄山关阻击红军之战役，开始于1935年2月25日下午4时，于26日下午8时结束。先是在是年2月22日柏辉章由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第六团团团长。

遵义来令，限杜肇华于23日率第六团到达遵义集中待命，杜遵命到达。24日杜率我团向桐梓出发，宿泗渡。25日续向桐梓前进，下午4时至红花园，与由赤水回师的红军遭遇。因地形不利，杜命我退守娄山关，旅部退驻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我与红军接触后，且战且退，至南溪口，即以闭之杨国舟第二营占据入关隘口两翼高地，主力置于我右翼，左翼仅以兵一连扼山拒守，以阻红军由正面进攻，并掩护一、三两营速撤至娄山关构筑工事，以阻击红军的前进。到达娄山关时，已夜幕低垂，即在关上与杜肇华研究，都感到红军回师，兵众势猛。看来不仅娄山关不能据守，而遵义亦不能保。几经筹商，我乃促杜速到黑神庙用电话机（团旅只有一部电话机）挂在有线电话线上向遵义之王家烈、柏辉章请示。我则在关上指挥一、三两营构筑阵地，并派至小箐方向（南溪口右侧高地）与杨营联络，告知我指挥位置。杨函告红军对娄山关隘路正面已不猛攻，其主力均向南溪我右翼高地急进，其兵力约两团，尚有后续部队。我右翼由小箐可通牛王屯抄至板桥，请速增兵一、二团于此线上，方能防守。我接信后展开军用地图研究，判断红军既不向正面进攻，可能抄我后路，包围我于黑神庙、娄山关之间而歼灭之。当以此意转告杜肇华。杜于夜10时复我信，谓柏有电话来，命我固守娄山关3日，以掩护中央军吴奇伟部队过乌江。并谓已派宋华轩的第十团由板桥出发，向我右翼牛王屯小箐等地增援，希与之联络。

26日拂晓红军向我第一线上的杨国舟营猛攻，杨不能支，逐步撤退。至9时，杨营有被围歼的危险，我乃亲率杨仁瑞的第三营去接应。10时在我右翼关上制高点金山，已发现了第十团宋华轩部与红军接触，因此我救出了被围的杨营。3个连逐步抵抗，进入预构阵地，阵线稍形稳定。但金山因宋团立足未稳，被红军猛冲夺占，于是娄山关口就暴露在红军眼前。金山高地可以瞰制各方，因之也就成为我方与红军争夺之地。宋团曾三次反击均未得手。我派两个连增援宋团，抢夺此制高点，战斗中，连长二人阵

亡，伤亡士兵三十余人，宋团伤亡亦大，士气已馁。至午后4时，红军组织火力掩护，向我猛攻，连续攻占十多个山头，将我与宋团的防线突破，我与宋团联络遂告中断。红军乃以主力向东猛追宋团。宋团溃退后，我右翼已空，受了严重的威胁，除加强右翼防守外，拟乘黄昏以后撤退。正值此时，板桥炊事人员来报，该地已被红军占领，旋闻箐垭口枪声颇烈，知后路已被截断，更增加撤退的决心。经向旅长杜肇华请示，同意撤守。时已薄暮，视线不明，暗中抽出两个连，由第三营营长杨仁瑞率领出黑神庙隘口，向板桥公路上设伏，以防红军夜来包围，我组织了两个连，一个重机枪排向右翼红军作佯攻状。阵地上除留少数沉着士兵应战外，其余部队乘天色黑尽的时候，由第二营营长杨国舟率领悄悄撤退，向黑神庙而去。另组两个狙击班设伏于黑神庙至娄山关以南之关口之间，如红军追击，以迟滞其行动。红军似有察觉，由正面和右翼向我猛攻，我部以机枪扫射。稍停，我乘机指挥佯攻队伍立即撤出阵地急退。甫下山，红军又向我压迫猛击，我部有少数殿后兵士应战，随即陆续退出，午后8时，黔北要隘之娄山关，遂为红军所夺占，战斗遂告结束。所幸夜黑难行，红军未予猛追，杨国舟营随杜肇华出黑神庙隘口后，沿娄山山脉小道向遵义方向退去。我出隘口后，通知设伏的杨营沿杜等所经之小径至高坪会合，再沿公路退走。

娄山关战败后，继续溃退

27日拂晓，我到高坪，拟煮饭再行退却，适遇金祖典第十五团伤兵一名，询该团情况，答已于昨（26）日在垭口被红军包围击退，不知撤向何地。据此我判断红军必然急进。未及进餐，又集合迅速退向遵义城附近的董公寺。11时到达该地，正拟稍行休息，而红军已猛追而来。仓卒应战，旅长杜肇华负伤，去省就医，王家烈、桡辉章乃亲率第二十五军第一、五、八3个团，到

董公寺应战，我幸免被歼灭。

红军进至董公寺附近后，采取大包围急进，王、柏见势不利，不能抵抗。午后4时左右，命各团向遵义城撤退。我到遵义城凤朝门，王、柏命我率第六团和第一团之张吉安营共守遵义新、老城，并云第五团已去占领黄花岗，以掩护我们守城部队，柏、王随即撤走。此后一日间，我与旅、师、军部均失掉联络。27日下午5时吴奇伟的部队已到忠庄铺，派有一百多人至遵义设营。我与该营指挥官相商，认为军队混驻不便指挥，建议新城由吴部驻防，该营指挥官同意，我集中兵力移防老城。此时城内居民，家家闭户，青壮逃走，仅有少数老弱在家。库无存粮，4个营一天食粮均难筹出；且经3日战斗，子弹平均每枪不过十粒。我召集4个营长会议，研究守撤去留问题，一致认为：（一）中央军有假手红军消灭黔军，以达蒋介石统一西南的目的；（二）遵城守亦失、不守亦失，与其困难而作牺牲，不如撤走寻找主力再图反攻。因此，决心于夜半撤走。会议完毕后，于10时派人至黄花岗联络，第五团不在该地，已发现有少数红军在该高地上，又派人至新城向中央军驻守营联络，悉该营亦已撤走。夜半，乃以第一团之张营为前卫，第六团为本队，向黄花岗冲出，严令禁止士兵射击，临阵只许白刃交锋。幸岗上仅有红军十余人，乃突围向金沙方向遁去，至泮水方追上王、柏和黔军主力。

蒋在珍部追堵红军经过

朱 振 民

红军过贵州省时，蒋在珍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驻在黔北正安、婺川（现务川）等县，先是奉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之命追堵中央红军，后受贵州绥靖公署的指挥追堵红二、六军团。虽然两次都是跟在红军之后，走过两段路，只有一个背在绥阳县蒲老场附近同红军一小队遭遇，但蒋在珍部却在这段时期，造过几次虚假的战报，邀功受赏。

一

1934年11月初，贵州得到红军突破蒋介石的层层封锁而西进到了湘、桂境内，有进入贵州之势。王家烈奉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电令，积极地调兵遣将，布置防堵。这才促使破裂将近三年的贵州地方势力王家烈、犹国才、蒋在珍、何知重、侯之担等约集在马场坪（贵阳、镇远间的一个公路交点）会议，共谋对策。蒋在珍在镇安接到以黄丕漠（当时是民政厅长）名义发来的电报：大祸已迫近眉睫，目前几万红军快到黔边，后有十多万国民党中央军跟踪而来，大家都应放弃前嫌，群策群力，共谋应付，希速到省会晤……。同时犹国才亦由兴仁来电，约蒋在珍去省会商。蒋在珍接电后，一面复电表示同意，一面召集他的旅团长兼程到正安开会。他说马上要去贵阳同王、犹会晤，商量如何应付红军入黔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参谋长。

后的黔局变化，他走后由旅长傅衡中代行师长职权，沿河县的黄福安团调米正安，婺川县只留李昌荣旅带一个营驻守，其余部队集结正安、绥阳沿线各场村，轻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次日，我们带卫队28个人出发，两天半赶到遵义。驻遵义的是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蒋、侯二人以往矛盾很大，过去王家烈和蒋在珍混战时，侯之担曾乘蒋失败袭占桐梓、松坎。我们这次过遵义，原计划中午赶到，即搭汽车去乌江，不在遵义停留；因侯之担亲到城郊迎接，蒋只好变更行程，当天住下，先去访侯，侯设宴招待，杯酒言欢，互道歉意。侯为我们备有客车一辆，送我们到乌江转车到贵阳。我同蒋在珍于第二天傍晚到第二十五军军部，谢沛生（军参谋长）和万稚青（省府秘书长）接待，不久，黄丕谟也来到，即住军部，次晨专车去马场坪。

蒋在珍到马场坪那天，就是红军进入贵州黎平县境的前一天。犹国才、何知重、柏辉章等已先到了。蒋下车即同王家烈见面，寒暄一阵，彼此都未提往事。蒋辞出后，邀我一道去访问了犹、何、柏，然后又到王家烈处共进午餐，约定晚间正式开会。

会场设在马场坪一家院落的厢房，何知重、柏辉章等住在那里，床上都摆有鸦片烟具。出席人是：王家烈、犹国才、蒋在珍、何知重、柏辉章等（柏是带部队到镇远路过马场坪留下来的）。我同宋质坚（第二十五军军部参谋处长）、李念荪（第二十五军军部副官长）等是列席人员。王家烈首先讲话，他说：“共军突围西进，已到湘黔边线，很可能就在日内侵入黔境。我军守土有责，应尽力消除这场灾祸。军委会电令本军要竭力拒堵和围击，不让共军西进或北上。我军有一部分已胶着在沿河、松桃方面防堵萧（克）、贺（龙）部。现在只有团结对敌，共同保护桑梓。特邀各位来此共商商量，制定良策。”接着他让宋质坚汇报红军行进的情况和薛岳部队的跟踪态势。宋把当时收到的红军西进到达地区和薛岳兵团的尾追情况汇报后，继续说，黔军已动员的有第一师（何）、第二师（柏）、教导师（侯），并略述3个师的活动状况。这

时犹国才抢着说，保护桑梓是应有的责任，会前大家已经交换过意见，一致表示绝对服从军部的统一计划，还是请宋先把军部作战计划方案说说。宋接着说：红军号称十万，要北上抗日，江西、湖南、广西三省有雄厚的兵力和强固的封锁线，但是没有堵得了；贵州素无准备，人心异常恐慌，怎样才能招架得住，这是一方面。军委会和薛岳转来的电报，命令黔军要防堵，要追击，要围歼……，势不能不妥谋应付。军部初步计划是：把全省区划为四个作战地区，任命四位指挥官，在军部统一指挥下，实行分区负责，执行坚壁清野，统筹使用该地区的一切力量。犹国才的部队远在盘江以西，建议速开到安顺集结，将来看情况使用；蒋在珍的部队迅速推进到绥阳、湄潭，策应侯师封锁乌江和守卫遵义；柏师已开镇远，阻止红军西进；何师为总预备队，位于贵阳、马场坪间；其余部队就地准备待命。蒋在珍发表意见说，一切悉听军部指挥，地方行、财政应即交还省府，今后一切补给，请军部、省府统筹配发。分区负责，统筹使用地方一切力量，已成过去，不应再行。蒋在珍又说：蒋介石对非嫡系统治下的部队，是采取“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的手段，我们今后应怎样应付？以后大家东拉西扯地各说一阵，不外是对红军不要硬打，得让路就让路，保存实力为上。说到终场，没有结论而散。

我们在回军部的汽车上，蒋在珍说：“军部划分作战地区，叫各路各行筹划补给，其目的是要犹、我两部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我们抱的是隔岸观火态度，以为一经明令划分作战地区，就把追、堵的责任加在我们头上了。我坚决反对这个诡计，你任命我当指挥我不推，以后不能打仗那是军部不补给的责任。薛岳部队一入黔，就不会轻易离开，那才是个心腹之患。”

在马场坪的第二天早餐时间，黎平县的电报来了，说红军先头部队已进入县境。犹国才、蒋在珍等人向王家烈重申今后遵照统一计划的作战命令行动，就各自告别赶回原防。蒋在珍同我当天下午到贵阳，第二十五军部送来一封任命状，任命蒋在珍为第

三路剿共指挥宫和一颗木质锡包皮的“关防”，路费一千元，我们就专车回遵义转正安了。

二

蒋在珍从马场坪到遵义，当晚侯之担邀他和我到侯部会商防守乌江及遵义城的计划。与会人有：侯之担、余季光（侯部参谋长）、黄先差（侯部参谋处长）、林秀生（侯部旅长）、徐道纬（遵义县长）、蒋和我等人。会上先听了余季光谈了本师对乌江的防守计划，林季生的防御措施和兵力情况，黄先差的“遵义城守御计划”，徐道纬的“坚壁清野”意见和粮食集中情况之后，侯以很谦逊的口气请蒋审查他们的计划，并提出指正意见。蒋也很客气地称赞他们的计划和措施，提出他的建议。他建议侯作好绝对固守遵义城十天到半月的充分准备，乌江的防御不必摆重兵，但须把船只和渡口两岸道路彻底破坏；他的部队决定三天推进到绥阳、湄潭之线，以牵制红军渡江后的右翼，估计红军主力既向遵义、马场坪方面前进，那情况就松了，何妨向军部先提出：“如红军主力已趋向瓮安，乌江终难防守，何师或柏师能由修文、息烽间渡乌江以威胁红军左翼，就可减少红军对遵义的攻势。”侯表示同意蒋的看法和建议，面嘱他的幕僚们考虑方案。最后，两师制定今后联络策应等规定，侯希望蒋立即进驻绥阳、湄潭两县，顺送一个过路人情，请蒋委派人员接管两县行、财政大权。这是蒋、侯在遵义的一次“防共”会谈，也是他二人最终一次见面。我们于次晨兼程转正安。

蒋在珍离开马场坪的时候，已电傅衡中旅进驻到土坪（距绥阳城90华里）。我们经土坪住了一宿，当晚同傅旅团、营、连长会见，蒋谈了马场坪会议情况及本师奉命集结绥阳、湄潭策应侯师守御乌江和遵义城的任务，并介绍侯部的兵力部署。最后，他向傅旅下达了口述命令：旅立即进驻绥阳城；第三团一个营由副团

长李治国率领进驻湄潭，密切注意侯部江防守御和遵义城防动态。他最后向傅、李说：如侯部转移，该旅以避免同红军接触为要，务必掌握机动，红军进就退，红军走就跟，相机行动。并将小型无线电台交傅，叫他每天三次时间同正安电台联络。

蒋在珍回正安，将到1935年元旦，第二十五军军部同在重庆的参谋团天天都有电报来往，这时红军主力向瓮安前进，有在湄潭、遵义间强渡乌江之势。第二十五军部担心侯师的乌江防线过长，怕难于控制，电令蒋部推进遵义、绥阳间策应侯部，固守遵义城。来电说：薛岳到镇远的部队，有丢掉红军而指向贵阳的趨勢，柏部已调到贵阳、息烽方面，既巩固贵阳外围，也伺机策应遵义侯部。蒋在珍接电后，即命李治国营回到遵义火烧舟（距绥阳郑场很近），傅旅派部队到四面山附近巡逻，表示他的部队到了遵绥之间。蒋部黄福安团已由沿河回到正安，包括留在正安的直属部队大约不到两千人。这些饥寒交加的穷军队，背的是杂牌步枪（赤水造的占多数），子弹也不多。而黄团又在沿河同贺龙曾在湘黔边境的游击队较量过，是受过教训的，一听到要去和红军打仗，大多惶惶不安。正安的老百姓也是非常惊恐，有的地主已在暗中把财物送到乡下找岩洞藏起。蒋在珍看到这种情况，又不便公开道出他的应付策略，于是同营、连长个别谈话，悄悄同他们说些红军来我们就退进山区，红军退我们就跟进的秘诀。

1935年元旦，在正安算是比较安静地度过，蒋部黄团也开到土坪。但是侯部的情况一次比一次紧，刚接到红军突破乌江的消息，傅旅跟着的电报是：遵义情况混乱，侯部打抢商店。第二天的电报说，遵义侯部弃城溃逃，红军占领遵义城，大部向桐梓前进。第三天电告：有一部红军向绥阳而来的警耗。蒋即命傅旅立即退到土坪，避免接触，留少数部队于旺草、龙洞关地区，观察红军动静，并派便衣侦探进出遵义，搜集情报；黄福安团由土坪移驻正安东部的高塘乡。进入绥阳城的红军，大约是一个团，没有向正安推进，在绥阳住了十来天，就向桐梓方向去了。红军早

上出城，傅旅一个营下午就进城，还发出所谓“收复”绥阳的“捷报”。

后来知道侯部防守乌江几个主要渡口，如江界河、茶山关、箐口等都是未到五天就被红军攻破，最先突破是江界河渡口，其他渡口也就相继在一二天内先后丢掉。侯之担一听到红军过洋岩到了张王坝（距遵城九十五华里），乌江几处渡口的守军全线崩溃，防守遵义城的部队很动摇，原来拟定的“防江守城”计划，仍是纸上计划，个人逃命要紧。他早先命副师长侯汉佑为遵义守备司令，临走时，侯汉佑已先离遵义，临时授命林秀生为遵义守备司令，满以为林秀生曾在侯之担、蒋在珍会晤的时候，表示可以替他卖命。殊不知彼此都是丧家之犬，这个被龙云赶出来的云南人，有他自己的打算，等侯一离开遵城，垮下来的部队打抢了几家较大的商店，看到大势已去，也就于第二天溜之大吉。红军遂于1月7日胜利进入遵义城。

侯离遵义时，曾电话告蒋在珍说，他是移到桐梓去，加强娄山关的防线，依靠娄山关天险拒止红军，遵义防守已命林秀生负责，希竭力支援。其实是红军英勇善战的先声，早已吓破了“双枪”（步枪加烟枪）部队的胆，平时长于欺压人民的军队，这一下就像羊群遇虎，只有望风而逃。

红军在遵义、桐梓、绥阳休息十多天后，向赤水方面行进。蒋部先退土坪，预计是如红军再进，就退婺川（现务川）、后坪（原是一个县，现合并）。那两个县都是大山区，可以龟缩一时，让红军到四川去了以后再伸出头来。后来看见红军只到绥阳城没有继进，而向桐梓去了，蒋部仍又按照红军退就进的老方法活动而进驻绥阳城。

侯部自乌江一破，一直没有敢抵抗，所谓天险的娄山关，也是红军一到就开跑。侯之担命他的部队向松坎、赤水两路撤退，他本人乘汽车逃重庆，打算是转船经合江回赤水老窝；不料一到重庆，就被参谋团的别动总队抓去扣留。他的残部由副师长侯汉

佑（侯的堂弟）收集拢来，躲在赤、习边区。这些惊弓之鸟，听说“老板”被押，内部更形涣散，在红军折回经二郎滩时，曾配合犹国才的魏金营旅，勉强打过一仗，结果被歼灭一个欧阳文团。后来，红军西进到云南，过了金沙江，薛岳把侯部改编为新编第二十五师，委贵州人沈九成去当师长，侯家弟兄（侯汉佑、侯之玺等）被挤掉而各自回家，侯之担被军法总监部拘留后开释。

三

红军在遵义城休息十多天，王家烈的柏辉章师慢慢向遵义压迫，王家烈并电令蒋在珍部向绥阳进攻。蒋在珍部为应付上级，确是作了些虚假姿态，曾向第二十五军部谎报说：红军进攻绥阳城，激战几小时，追击到唐家店，打死红军多少人。其实蒋部与红军相距还有90里。红军在1月20日左右全部离遵义，向桐梓、仁怀方向开去。柏师进遵义后，继续向红军后尾亦步亦趋作为追击，没有什么大的激战。据老百姓说，红军掩护部队的最后一部，撤到老城东门外万寿桥（今改名新华桥）边没有走，柏部的前兵就在泗子桥扁岩子停着，彼此相距约200米，柏部有个营长冒失前进到观音阁附近，被红军一枪打倒，柏部又退回泗子桥。

这时的第二十五军部，似已失去主动指挥部队能力。部队是听命于薛岳的指挥。既有这位“监军”在上，第二十五军各部已到了不得不改变“应付”方针的时候，就是对红军不追不行，不打不行，但又不敢硬打的尴尬境地。红军退出遵义、桐梓之后，王家烈部的主力何知重师就不能不向习水方面尾追。王家烈本人亲到遵义设指挥部，并命蒋在珍师由绥阳开桐梓待命，蒋在珍命其旅长傅衡中带一个营回驻正安，看守老家，命在庙塘乡的黄团推进松坎，其余部队开往桐梓，他本人绕道去遵义见王家烈

请示方略，要求补给。

为了解王家烈、蒋在珍的矛盾，对蒋在珍部的编制和实力情况，作简单的概述。第三师师部一个警卫营，营长邓伯勋（营辖一个驳壳枪连和手提冲锋枪连，一个德国造马枪连，一个三十节式机关枪连，一个迫击炮连）。第一旅旅长傅衡中，第一团团团长周全山，第二团团团长彭镇璞；第二旅旅长李昌荣，第三团团团长袁炳麟（袁因事软扣在师部，由副团长李治国代理，直归师部指挥），第四团团团长黄福安（该团只有两个营，一个独立连）。号称两旅四团的第三师实际兵员约5000左右，赤水枪占60%，子弹只有随枪携带的，手榴弹也很少，每连约五六十颗不等，每个连都有少数徒手兵。加入战时序列的还要除掉留在婺川、正安的两个营。

蒋在珍部在正安、婺川两年多的光景，全靠四川盐商运进少量的食盐，征收每月不过四五千元的盐税来维持五千左右的人马。每人一天几分钱的菜金，粮食是强取当地劳动者的血汗果实。蒋在珍到遵义会见王家烈，不得要领，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到桐梓，虽不敢硬性施为，但却按兵不动，把部队摆在桐梓、松坎间，他借口祖母病重，回到距城八十华里的小水田家中去了。王家烈回新站，预先派一个亲信营到桐梓戒备，王过桐梓未停，小汽车直开新站。我怀疑王对蒋部戒心很大，如转来仍从城外公路驶过，那我们就无法向他要求粮饷补给。将这个意见写信请蒋在珍来城商量，蒋由乡返城，亲眼看到沿途有的仓房被第三路指挥部封了，搞的军队背谷子碾米，有的地主拦着他求情。他把这些情况都集中到对王家烈的怨恨上，亲自写了一封信，星夜送到新站，请王转来时向部队训话，对他的饥军打打气。当晚，蒋在珍决定间道秘密去重庆见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这是已先有电话托刘湘疏通，得到同意的。他的目的，是想：（一）走通贺国光这条路；（二）想把侯之担残部合编到第三师；（三）先入为主，预防王家烈控告他按兵不动，不听指挥。我当时乘机煽动蒋，待王回来过桐梓时，出其不意地把他扣留，通电话他一向同广西李宗仁、广东陈济棠

勾结，这次防共意存观望，曾面示各师长佯为追堵，暗保实力，等待机会袭击中央入黔部队。蒋迟疑一阵，不肯这样做。他于次日拂晓取道温水去重庆，仍扬言祖母病笃在家侍奉。

蒋在珍走后的第三天，王到了桐梓，我向他报告了蒋部的困难情况。王答复我三句话：部队暂驻待命；把蒋接来城中养病；叫我赶到遵义同参谋长张铁丞商量补给问题。我第二天下午就到遵义城，会见了王家烈、张铁丞，结果是：(1)军粮由县政府照需要供应；只给收据，以后转帐；(2)现款暂拨二千元，待后山总金库按规定拨付；(3)子弹俟运到后补充；(4)部队维持娄山关到松坎的交通。我看见府衙大堂上堆有很多军毯，请王家烈发给每名士兵一条。他当即批准发了一千五百条给我，这算是意外的收获。我会见王的时候，适何知重在习水良村来电话，听王的答话也是谈的沿途给养困难，只听王指示何部从哪条路到哪条路，逐步移近毕节方面，既应付了追击，又避免了硬打。何师遵照他的指挥，避重就轻地躲开了红军主力。后来，何师改编为陆军第一〇三师时，人员、武器是最完整的一个师。我转桐梓不几天，传红军折转来的消息，我命各团加紧准备好干粮，每人须背五天的储备，并备草鞋、电筒等物。接着军部转来军委会电：命蒋在珍部返回绥阳，固守正安、绥阳之线，阻止红军东进。蒋在珍部就急忙循来路——板桥、唐家店回绥阳城，在松坎的黄团仍回正安土坪。这一回的“出师追捕”，始终没有听到红军的枪声和见到红军的背影，却捡到侯部溃散的两个残营，约有多枝赤水造步枪，把他并编入黄团所缺的一营，也算增加了资本。

蒋部回到绥阳日夜不停地修筑土碉堡，挖散兵壕，军心惶惶。当时军委会来电，分析红军转来是有东向沿河、思南与贺龙、萧克所率的红军会合之势，故正安、绥阳线上的情况就异常紧张。红军再占桐梓县，攻下娄山关，再进遵义城。接着去遵义的侦探报告：红军主力进遵义后大部向鸭溪方面前去，中央军和王家烈部在遵义以西同红军有接触，但都是一打就溃败。接到贵

阳电报，也说红军主力西进到长沙，有强渡鸭池河之势。蒋在珍部感到转危为安，正在庆幸之际，突然由泗渡站方面来一小部红军，向我蒲老场的一个营进攻。一直没有领教过红军的这个营，也是一接触就放弃蒲老场，退到只距绥阳城十华里的牛星山垭口，慌忙钻进土碉堡，不见红军动静，派去侦察，才知这部分红军已向遵绥边界的火烧舟方向去了。一场虚惊的蒋部，在这一次“应付”围堵红军的战役中，仅是嗅到红军的一点火药味。

川军郭勋祺部到遵义城后，来电说他暂留遵城维持秩序，要蒋在珍部速到遵义，接受城防。郭知道蒋在珍同刘湘的关系，满以为把遵义城交给蒋在珍部，也是关照的意思。我代蒋在珍去电致谢，并说明我师是“固守正绥之线”。其实就是不愿到遵义去，免得被卷入追击序列。

在蒲老场进攻蒋在珍部的小队红军，后来才知道是派到湄潭县杨家山、鱼泉沟区去的“红色种子”。据说其中有几个是湄潭、遵义的进步青年，他们刚到杨家山，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这些地主、区团来信请蒋在珍派兵围击，蒋在珍的谢树华营到鱼泉沟时，这些红军已被地主武装冲散，有十来个红军把枪支埋藏逃走，以言语不通，被谢营截获带回绥阳。当时蒋在珍向重庆参谋团和薛岳“告捷”。

蒋在珍在重庆待了一个多月，经由南川、正安回到绥阳师部，他带来军委会任命他为“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命令，按丙种编制限一个月就绥阳驻地编整为3个步兵团，特务、通讯、运输3个直属连，机枪、迫击炮编入团内。编整就绪后，军政部派兵役司朱为珍等人来点验人员、武器、马匹、器材，花了一笔馈送，勉强应付过去了。这是刘湘帮了大忙，刘湘送蒋在珍的两万元就此花光，好在从此换来每月由军政部拨款包干的待遇。

四

蒋在珍部在绥阳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八师后，直接受贵州绥靖公署指挥，在绥阳集中整顿四个月左右，已经是1936年的秋末冬初了。绥靖主任顾祝同电约他到贵阳见面，蒋去了回来说：我师将移驻铜仁，可能是围击萧、贺共军。不几天正式命令到达，新八师即取道思南、印江到铜仁，根据绥署电示，在城郊构筑工事，并作出“铜仁守卫计划”送绥署。计划内容表示坚守铜城遏止红军西进。嗣又派第二团驻距城七十华里的田线坪，注意湖南辰溪方面的共军活动情况。

早在1934年五、六月间，蒋部驻在沿河县的傅旅和黄团都先后挨过红二、六军团游击队的打，沿河曾一度为红军占领。现在驻田线坪的李团，半数官兵就是当年挨过打的黄团官兵，他们对当前的萧、贺大军，仍是存在着恐惧心理。这回不比以往可以相机应付，而是硬着头皮要挨这一刀，所以惶恐的心情更加沉重。那时师内已有政治训练处的设立，政工人员们都是蒋中央派来的，处长李其实据说是共产党员变节的，他们天天到连队打气。

1935年11月间，红二、六军团两三万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的消息，已由绥署电报到师，并命新八师固守铜仁。红军从桑植出发，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强渡横贯湖南的沅水，进到湖南的中部，战争活动大约已二十来天。这段时期的蒋部天天在加强工事，练习打靶，锻炼跑步。约在12月下旬，已活动到湖南中部的红军，突然掉转来向沅陵、晃县急进，1936年元月初进到黔边龙溪口，驻田线坪李昌荣团的侦探报告：红军前头部队已到龙溪向黔边前进中。新八师立即下令第三团进入城郊阵地，第一团作总预备队，如红军向田线坪进攻，第二团逐步转移到铜仁城外通松桃县方面的某地区牵制红军攻城。那些时已临近旧历春节，铜仁城内居民十分惊惶，新八师通告戒严，不许放鞭炮，不许搞祭

灶、供年饭等旧习俗，以免发生意外，但红军进入黔边并未向铜仁方面前进，在田线坪的李团，虽距红军大队很近，红军始终未向他的阵地攻击，他也不敢妄动，只是提心吊胆地严密戒备了两三天。后来证实红军已从玉屏进占江口县继续向石阡县前进，方知真是一场虚惊。接着绥署来电，命新八师归郭汝栋纵队指挥，跟踪追击，于是新八师离开铜仁，随郭汝栋纵队走江口、过石阡，到余庆，还是没有看见红军的背影，看到的是些“红军是北上抗日”、“白军弟兄掉转枪口打倒军阀”这一类的标语。行到瓮安，接贵阳来电，命新八师转到黔北，“清剿”正安县之敌。于是又脱离郭纵队，取道珠场渡过乌江经遵义去正安。蒋在珍部就此结束了他奉命追击红军的任务。

犹国才被红军牵着鼻子走

张 适 南

1934年12月前后，中央红军长征快要进入贵州的时候，犹国才因与王家烈争夺贵州省主席失败，退守盘江八县，与王为敌。王、犹两人各搞各的，绝无往来。红军一入贵州省境，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等也跟踪追来。犹、王感觉形势逼人，不能不捐弃前嫌，重归于好，经过彼此同意，犹国才的部队加入战斗序列，统归王家烈指挥。

我在犹与王争夺权势时，任犹部第五旅刘明庠部副官主任。这时随同刘部由盘县驻地于12月出发，经遵义、桐梓等地，到1935年4月回到安顺，前后约半年。我所见闻的犹部截击红军的情况如下。

一

刘明庠第五旅于1934年12月3日由盘县出发，向安顺集中。当时犹部分驻盘江八县，刘旅没有建制部队，他经常指挥的就是一个营。刘旅由盘县经普安、安南（今晴隆）过铁索桥，到永宁时，忽接到命令要开往募役。在距城约二十里处停止待命。停了两三天，奉命仍到安顺集中，到安顺已是12月中旬了。

犹国才在安顺集中的部队，共有4个团：第五团（团长周文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独立第一师第五旅副官主任。

彬)、第六团(团长魏锡龄)、第七团(团长李绍穆)和特务团(团长罗霄鹏)。另外还有师部、旅部的直属队,总的人数连同非战斗员,不超过3500人。

部队在安顺集中完毕,驻了两三天就经石板房、平坝、清镇到达贵阳。犹国才、吴剑平和旅长何绍卿都没有去。部队由副师长魏金荣与旅长刘明岸带领;每天的行军、宿营以及后来的作战,都由魏金荣以副师长的名义下达命令。拨给旅部指挥的部队,并无一定。

犹部抵达贵阳时,薛岳、吴奇伟的前锋已经到了贵阳。这时已在12月底。在贵阳驻了两三天,就经龙里、贵定、马场坪,由西向南行进。突然接到命令,转北向平越(今福泉)前进。到了平越,听说红军已由孙家渡过了乌江,三四万人的大部队,一夜之间全部渡江,在贵州军队心目中,认为确实神通广大、意想不到。因此在官兵精神上,先受了一次威慑。

红军渡乌江后,犹部奉命由平越开到马场,接着又由开阳、马场开到札佐、修文、由六广河渡过乌江。这时红军早已到了遵义。等到犹部再经白腊坎、鸭溪、倒马关到达遵义时红军已奔遵义好几天了。

二

犹部奉令由遵义出发,经董公寺、娄山关到板桥宿营。娄山关山势矗立,绵延数百里,经挖掘道路,由关口通过。从山下到关口,尚蜿蜒十余里,曲折而行。关口北而,对桐梓方向红军,构筑有临时简单防御工事,都是就地取大小碎石筑成,异常坚固。沿路一带的有线电话线杆,由娄山至板桥大约20里,都被从根锯断,使截击军队通讯中断,恢复亦不容易。

犹部到达桐梓,红军已离开数日,听说已入四川边境。部队就在桐梓休息。这个县,是贵州军阀的家乡,从周西成起家,其

他如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蒋丕绪、黄丕谟、侯之坦等，主席、军长、师长、厅长大大小小数十人，都生于桐梓城乡，形成了“桐梓系”。桐梓城乡建起了一座座洋楼。红军未到桐梓以前，桐梓军阀眷属已将贵重物品收拾一空，逃往重庆或乡间，只剩了一座座空楼。犹、王部队到达，师旅部都住在洋楼里面，正准备休息几天，突然听到红军又由四川古宋、古蔺折回贵州消息，空气又紧张起来。这天下午4时接到出发命令，立刻就走，不许迟延。我们已经下锅的菜，因为路上买菜困难，只好用勺子捞起带着走。

出发时太阳已经落山。走不上十里，天就黑下来。到了一个山坡，因前面一段路被红军挖断，行李辘重转运困难，只好绕路上山另找道路。贵州山高雨多，野树丛生，上山下山都是穿林面过。于是满山火把、电筒像龙蛇一样，绵延十余里。一夜行军，仅仅走了不足30里路。接着经官店、吼滩，进抵东皇场，已接近四川省境。这天是旧历三十夜（1935年2月3日），东皇场有一条小街，小商铺面都已关闭，街上满是川军病员。一问情况，他们说，这个地方，川军来了，中央军也来了，川军走了，中央军也走了，不几天，来来去去前后七八次，啥都吃光了，啥都买不到，困难得很。我们没法，只好将剩下的米煮稀饭吃。第二天旧历年初一，我用一块银元，托老乡在离东皇场十五里地才买来四五斤米。

从遵义到桐梓，又到东皇场，约走了500多华里的路程，都是沿着红军经过的道路行军。沿途看见他们所作的工事和所破坏的通讯设备、交通道路，还有红军在土墙或石岩上用黑炭写的宣传口号：“白军弟兄们不打红军弟兄”、“白军弟兄们也要北上抗日去”，令人触目惊心。

到东皇场后，又奉令到习水，沿途要走一条河沟，经过100多华里，又通过一条大河。听说红军由此经过，没有走河沟，是走两侧高山，沿山梁而行的。

习水城是依山筑成，一半临河，一半傍山。城内估计不过几百户人家，但有席姓大地主的四个大公馆，都由山脚傍山建屋，石级直达山顶，并建有碉楼。犹部在此驻了一天，听说红军又折回仁怀、赤水方向，于是我们又由习水向仁怀出发，沿途道路崎岖，傍河岸山岩而行。到了二合树，听说红军又到桐梓，于是又赶回桐梓。

次日走到距桐梓城20华里处，据当地土劣报告，红军一部分尚在城内。因为刘明庠是桐梓九坝沟人，对于附近地形非常熟悉，乃指挥部队，从侧面绕过桐梓南门东侧面树林荫蔽的小高地，展开约一营的部队，向桐梓至遵义大道上撤退的红军射击。红军因大部已经撤走，仅剩后卫部队，不过一二百人，且道路附近均系开阔地，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形，所以与刘旅接触，大约半小时，即脱离战场。刘旅随即进入桐梓。据当时报告，红军没有伤亡，亦无被俘的。

犹部再次进入桐梓，暂在桐梓停止待命。听人传说：红军对穷人好得很，把在土劣家里没收来的财物抬在街上，送给穷人。红军两次经过桐梓，穷人都得到了好处。凡平日作恶的或者地主，当时很怕穷人密报，以致遭到搜索、没收和逮捕。穷人地位骤然提高，所以非常喜欢红军到来。

红军的宣传艺术也特别令人钦服。譬如，他们在一个大恶霸地主家的大门上，写上斗大“此土豪家”四个字；又在门上两旁写“进门分谷子”“出门分田地”。红军离开后，他们私相告诉：“哪天红军再来就好了。”有的说：“我们这一辈子要翻身，只有等红军来。”

犹部从盘江出发，路上感觉最困难的就是粮食。起初，红军快要入境的时候，王家烈就下命令给各县，进行两项紧急措施，一是要普遍修筑碉堡，一是要把粮食窖藏。犹部到达县城，还有地方所办的兵站可以领取粮食。一到乡间情况大变，居民大部逃走，找到一两人出来领到各家各户现要现收，因此整天派人去找粮

食，有时甚至找不到或找到一点不敷分配。这使大家都很发愁。有些地主官僚家有较多数量的粮食，但没有人敢去摊派，只有向小户摊派或搜索，几个月来粮食很紧张。

犹部从桐梓城移到遵义大道的红花园，第一愁的还是食粮。当时刘明庠回家了，我负责筹办粮食。我想桐梓城一定有粮食，遂与刘明庠堂叔刘副官商讨，他告诉我马厅长（毛光翔的财政厅长马空凡）、第二十五军特务团王团长、何知重师长、王家烈军长等都有大批粮食存在乡间仓库，并告我仓库地点。于是我通知第五、六、七团团长，请他们派人去挑，挑了一天就挑完了。当时我觉得这事办得很痛快。后来部队回到安顺，听刘明庠说王家烈对犹国才表示不满说：“你的部队把我的粮食都挑光了。”

三

犹部在桐梓红花园驻了四五天，听说红军又攻下遵义，犹军震动。这时官兵都感到拖乏了。当时贵州天气很冷，有时老百姓走光了，连柴也寻不着，我们甚至要背起柴行军。犹部奉令向遵义前进，这次走的凉风垭山口。一路同向遵义前进的是川军郭勋祺旅。至距遵义城还有四五十里地方，据报红军于先一日已离开遵义，不知何往。川军听说遵义已无红军，即拼命赶路，比黔军稍先一点进入遵义，即电蒋介石称“收复遵义”，真是一个笑话。

犹部在遵义忠庄铺、懒板凳住了两天，听说白腊坎方面发现红军队伍，奉命速向鸭溪、白腊坎前进。第一天驻鸭溪，距白腊坎还有几十里路。红军就在白腊坎与鸭溪之间渡过乌江，正面不过二十五华里，部队迅速通过，把左右后面尾追的滇、川、黔和中央军抛在后面。白腊坎距贵阳约三百华里，红军渡过乌江，有向贵阳前进之势。闻蒋介石正在贵阳非常惊慌，急电驻卫上的滇军龚顺璧部进驻贵阳，由卫上到贵阳约120华里，限8小时（当日正午）赶到。龚部按预定时间轻装赶到，受到蒋的嘉奖。犹部

在白腊坎驻了几小时，奉令向黔西方向前进，当夜在一乡村宿营，约10时才到宿营地，满山都是火把。刘明庠派一见习生去到另一村找一人来问话，不到一小时此人回来，吓得连话也说不清，期期艾艾地说：“顺着村子出去，看见村子上面一个坡上，似乎有人。跑上去一看，见里面有几个红军烤火，吓得倒退出来，滚下山坡才跑回来。约距宿营地有三四里远。”半夜情况弄不明白，只好命令各部特别严密警戒，随时准备战斗。这夜无动静，第二日继续前进，约走十余里路，发现红军经过道路两旁，丢有熟黄豆、棍子、树枝编的帽子等等。由此判断，红军大部已渡过乌江南岸，还留一部分在乌江北岸游击，以掩护渡江部队。

当日继续前进，约距白腊坎五六十里属黔西地界，与红军侧卫遭遇。红军由行军纵队一变而为横队，队形与方向同时变换，自首至尾，展开向犹部猛攻，三小时内犹部即被击溃。红军停止追击，继续前进，脱离战场，犹部退到白腊坎整顿。

后来，红军未向贵阳前进，又经毕节入四川境。犹、王部队于红军入川后，即经黔西洪家渡渡过乌江，犹部经织金回到安顺，已是1935年4月。计由盘江出发至回到安顺，时间约半年，行军五六千里，堵截红军却毫无结果。

乌江战役和侯之担部的改编

侯 汉 佑

一 侯部防守乌江的部署

黔军侯之担部原为周西成的第二十五军第一旅，驻在赤水、习水或川南叙永、古蔺、古宋等县。周西成死后，毛光翔接主黔政，侯之担接任川南边防司令，仍驻原防。1931年王家烈赶走毛光翔，任侯之担为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并兼摄川南边防司令，仍驻黔北、川南各县。侯与王同属周西成旧部，不过王的地位比侯高，但不直接相隶属。

到1934年，侯部扩编为8个团，防区占有黔北赤水、习水、仁怀等县和遵义的一部分；川南方面仍有叙永、古蔺、古宋三县。部队番号和官长姓名如下：

川南边防司令、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司令部在赤水）；

川南边防副司令岑炯昌（司令部设在叙永）；

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驻遵义）；

教导师第一旅旅长刘翰吾，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第一团团长刘安楨，第二团团长娄利贞，第三团团长周仁溥，第五团团长罗振武，机炮营营长赵宪群，特务一营营长文树东，特务二营营长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

党圣征；

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第二旅旅长侯之玺，第四团团长王遗，第六团团长欧阳文，第七团团长侯相儒，第八团团长郑廷芳。

侯部虽号称8个团，但多属空架子，每团两三个营不等，总数约一万人左右。

武器除有部分汉阳枪外，余为川造、赤造等杂枪，一部分小迫击炮、轻机关枪和掷弹筒。

1934年红军长征到达湖南后，蒋介石电告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谓红军有向西南进攻的企图，令严加防堵。王电召侯之担及其他将领到贵阳开会，决定由侯部担任乌江河防，防线自茶山关起，包括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等重要渡口及其他大小渡口十余处，长约二百余华里。

当侯之担去贵阳时，即调驻川南、黔北的大部分兵力向遵义集中。侯回到遵义，召集团旅长开会。侯在会上说：“教导师奉令防守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如有玩忽职守，军法从事。”他又说：“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

会后，我与旅长林秀生、易少荃、刘翰吾等交换意见，都认为红军战斗力强，蒋介石数十万大军重重包围，尚不能阻挡，也不敢迎头截堵，乌江又何能阻止得住？况且河防战线过长，万一被突破一点，全线动摇，部队难以集中。我们当时估计红军约有十万人，教导师调集遵义担任守河的兵力不过五六千人，相差20倍，以此薄弱兵力守河，非常危险。同时，我们判断红军不会久留贵州，不如将部队分两路撤离遵义：一部分撤到赤水、仁怀，保住地盘，同时拱卫川南；一部分撤到绥阳、正安，以避红军之锋，俟红军走后，可就近收复遵义。这样既可保全实力，又可能收复防地。我和林秀生对上述措施主张最力。经向侯之担建议，他仍主张坚决守河，并立即命令各部星夜驰赴河防，严加防堵，

不得忽视军令。

侯之担决定守河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如下：(一) 教导师第一旅旅长刘翰吾率第一团（侯的基本队伍，认为是很可靠的部队）及第三团防守乌江的江界河一带渡口及河岸沿线，重点放在江界河。(二) 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及副旅长任骥率第六团防守袁家渡一带河岸（第六团原系二十五军第四独立旅宋醒所部改编，战斗力较强），并与防守湄潭的直属第八团万式炯团衔接。(三) 教导师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率第五团及机炮营防守孙家渡、茶山关一带，与第三团取联络，并派我率特务第二营进驻猪场指挥。这是因为猪场距孙家渡很近，侯之担判断红军可能由孙家渡进攻，所以将战斗力较强的第五团布置于此（第五团是林秀生原任滇军张汝骥部师长时所率的部队改编，在侯所属部队中是战斗力最强的）。(四) 川南各县留第二旅侯之玺部防守，由副司令岑炯昌指挥。(五) 赤水、仁怀留第二、七两团驻守，派邹瑾（号慎修，曾任侯部旅长）代侯在赤水坐镇。(六) 侯之担亲率特务第一营驻遵义指挥。

我到达猪场后，林秀生即将守河部署情况向我口头汇报。他说已令第五团团团长罗振武率第一营和机炮营防守孙家渡，第二营守茶山关，第三营随他暂驻猪场，以便策应等语。我当即转报侯之担，一面派人与易、刘两旅联络。

二 红军突破乌江 侯之担逃渝被扣

当侯之担由贵阳开会回到遵义后，首先得到贵阳转来情报，谓红军已到黔东之锦屏、天柱，王家烈命侯之担火速赶到乌江布置河防。随又接到情报说，红军先头部队已到马场坪，有向乌江渡河的态势。

侯之担分令所部于1934年12月下旬抵达乌江河防后，派便衣侦探过河侦察红军情况，得悉红军即将到达，确有渡江趋势。侯

之担着急起来，立即电令留在川南的侯之玺旅兼程开来遵义，准备加强乌江防务；同时电赤水将他的家小及可能搬走的财产迁往重庆。

我到达猪场的第一天，即得河防前线部队报告，到达马场坪、瓮安一带的红军有三四万人，子弹极缺乏，但是先头部队已将迫近乌江。

12月30日，我得第五团团长罗振武报告，谓红军已到江边，隐约看到对岸红军在构筑工事，并有一部在扎木排。1935年元旦又接罗的报告，谓红军已开始向孙家渡攻击，用木排和帆布船强渡，但经守兵猛烈射击，击沉木排一个，其余木排、帆船等均退回南岸，第五团守河士兵伤亡十余人。当天又接罗的报告，谓红军又用竹排和木排渡河，排上筑有掩体，冲至半渡，已被守兵击退。此次双方伤亡人数不详。

1月2日接罗报告，谓红军用木排作掩护，似想架设浮桥，但因水流过急未能成功；经此三次强渡未成，暂时不见动静，恐是另找渡口。我将上述情况先后转报侯之担，他回电叫严加注意防堵。在这同时，江界河、袁家渡、茶山关等对岸红军亦在准备木排，刘翰吾、易少荃两旅均径行将情况报给侯之担。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当时认为红军可能不再向孙家渡进攻，另寻地点强渡。侯之担令第三团团团长周仁溥率一个营到袁家渡增援第六团。

1月3日中午，我接罗振武报告，谓红军又在孙家渡强渡猛攻，拂晓时，已有一部红军在北岸登陆，守兵伤亡甚重，防御工事多被摧毁，机炮营营长赵宪群被打死，军心开始动摇。后又接罗振武报告说，离孙家渡约半华里的上游处，红军架有活动浮桥一座，形状类似蜈蚣（以若干木排连接而成，接头处用抓杠、绳索等绑住，预测稍长于河面，南岸紧绑着一头，另一头由上游放松拉绳，即随水流渐渐斜飘靠着北岸，便成了浮桥），南岸红军二三千人正猛烈攻击，分由木排强渡和跑向浮桥冲锋前进。最后，罗振

武说，情势危急，请速增援。我正要派林秀生率预备队增援，突然接侯之担来电，谓红军已由湄潭及江界河等处突破，令速撤退到遵义集中。我乃令林秀生在猪场掩护孙家渡、茶山关一带的守兵撤退。我率特务第二营撤退到团溪，遇见派去与易、刘两旅联络的人回报说，江界河方面红军强渡登陆，守兵已溃逃。我于是仓皇赶回遵义。侯之担得到前线一连串败讯，业已失魂落魄，正准备往桐梓方面逃跑，将上汽车时，我赶到向他请示撤退路线和集中地点。侯之担说：“我要去重庆会刘湘再转赤水。你赶快收容部队到仁怀、茅台一带集中听候命令。”正说话间，突闻遵义城内传来枪声，侯之担认为是红军已到，不及再交待任务，就匆忙上车往桐梓方面逃去（只带弁兵数人同车护卫）。特务一营第一连尾随掩护步行逃往桐梓。

城内枪声十余响后，未再继续。我立即派一副官带部分武装兵往查，并派特务第二营一个排去巡查市街，发现是第一团士兵数人所放的枪。这些士兵见有部队查街，乃停止放枪，诡称是士兵相互间口角引起的冲突所致。巡查队看到这些士兵似有不轨行为，但尚未酿成混乱，只叫收容归队，未再深究。当时遵义市民已纷向乡间逃避，人心惶恐，秩序已难维持。我恐溃兵于夜间在城内滋事，即令城中部队完全撤出城外，到忠庄铺、马鞍山一带驻扎，以便收容河防退下来的官兵。直到第二天下午2时左右，大约集中了五六百人，随即放弃遵义，开到柴溪宿营。第三日到长干山住宿一日，又收容二三百人，撤退到茅台暂驻。事后听说我们离开后第三天，红军才入遵义。

易少荃、刘翰吾指挥的各团撤退至遵义附近时，闻侯之担早已逃走，遵义已是空城，无法取得联络，乃率残部退往桐梓、习水。

我到茅台的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由无线电台听有侯之担在重庆被扣留的消息，内心甚为慌乱，佯作不知，即发一电与刘湘，说我部现已撤退到桐梓、仁怀一带集中，望转知侯之担早日回赤，以便统筹指挥。刘湘回电说，侯之担临阵脱逃，已被行营参

谋团扣留，川南边防司令的职务暂由侯汉佑代理。

侯之玺旅到达桐梓时，乌江已被红军突破，侯之担正经过桐梓逃往重庆，乃令侯之玺率部到娄山关一带防堵。

我在茅台驻三天，收容败兵约一个团，当时情况混乱，未能与退到桐梓方面的部队取得联络，感到进退维谷，只好暂退到仁怀，以避红军锋锐。到仁怀后，林秀生才率同第五团残兵三四百人赶到。

红军占领遵义后，继续西进。这时蒋介石命刘湘派川军第二十一军郭勋祺、刘兆藜两部由四川合江、江津开到赤水、土城一带防堵红军。郭部在离城十余里的青杠坡与红军遭遇，相持不久，即向赤水方面溃退。红军追击到距赤水四十华里的复兴场附近即暂停前进。是役川军伤亡极众。红军随即折回土城，经太平渡过河进至赤水河附近，突又折回遵义。这时，侯的残部退据仁怀、习水、桐梓一带，不敢与红军接触。川军郭、刘两部亦撤回四川。

在红军第一次离开遵义后，王家烈命柏辉章师迅即进驻遵义。这时，蒋在珍师亦由绥阳方面来到遵义附近，意欲不费一枪一弹夺取遵义，不料柏师已先进入。红军由赤水河回师遵义时，柏辉章部首先被击溃。薛岳派来两师增援，亦被红军击败，纷向贵阳方面溃逃。红军再度解放遵义后，稍事休整，即继续长征，经毕节方面进入云南。

综计侯之担部在乌江战役共伤亡官兵四百余人。溃败时军心涣散，兵无斗志，沿途逃亡三千余人。其中有一些被蒋在珍派人乘机收容，如第一、六两团退至桐梓乡间时，即曾有二三百人为蒋收编，后到赤水集中时，不过六七千人。

三 蒋介石派沈久成改编侯部

红军第一次放弃遵义进到赤水河后，王家烈派何知重师进迫

赤水，名是尾追红军，实际欲乘机夺取侯之担的老巢。何到达土城后，接赤水邹瑾（代理侯之担坐镇赤水）电报拒绝。邹致何的电报中有侯之担在渝被扣，部队尚未集中，请暂驻土城，勿来赤水，免生误会等语。邹同时电我速回赤水。我当即放弃仁怀，并分电桐梓、习水各部也向赤水集中。我到达土城与何知重会见时，何说系奉王家烈之命到赤水接防。当时我无法拒绝，但请何只率兵一营偕回到赤水，其余部队暂驻猿猴镇、复兴场一带。何到赤水后，与我等协商，尚未得结果，红军又由赤水河回师进攻遵义，何奉王家烈之命即率部离赤救援遵义去了。

在此时期，重庆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令我暂代教导师师长职务，并令全部集中赤水候命。刘湘则派吴传心到赤水准备改编侯部，但尚未明令发表。适于此时，蒋介石到达重庆，恐此部队被刘湘抓去，乃嘱参谋团电令我派人到渝洽商。我召集在赤水各官佐开会商讨，决定派侯之玺去渝，因他曾在庐山受训时与蒋介石见过面，同时与侯之担是弟兄关系，可能设法营救侯之担。侯之玺去渝见到蒋介石，蒋说：“侯之担临阵脱逃，尚在扣押查办中，师长职务派沈久成（原系薛岳部第四军第五十九师副师长，当时在南京陆大特别班）接任，部队暂时集中赤水整顿待命，师长以下的人员照常供职，番号改为新编第二十五师。”侯之玺败兴而归。沈久成未到前，我因病到渝就医，曾会见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希望恢复侯之担自由，但无结果。我病愈后，于1935年4月偕同沈久成回到赤水，办理交接手续。

沈久成到赤水后，就着手改编，将侯之担所部缩编为两旅四团。旅长保持侯之玺、林秀生两人，刘翰吾、易少荃降为副旅长。其余军官绝大部分降级、降职，被裁汰、请长假及自动离开者极多，士兵亦纷纷逃跑，共走了二千余人，整编后不过五千余人。沈久成手段毒辣，排除异己，由第四军调来大批军官，准备更换。我见大势已去，无心恋栈，适因母病，乃向沈久成请长假，从此即离开该部。部队于六七月间开往川北昭化、广元整训，改

为第一四〇师。沈又裁旅缩编为三个团，调第五十九师参谋长唐宇纵为第一四〇师副师长。营长以上军官，十之六七被更换为第四军人员，原有下级军官亦所存无几。

侯之担部防守乌江溃败经过

李 祖 明

1934年秋，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到达湖南，进入黔东。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惊恐起来，立即在贵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侯之担部防守黔北各县，特别是乌江北岸沿线。

会后，侯之担派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为江防司令，指挥部先设在遵义团溪，后移到瓮安境内之珠藏（猪场），以便接近第一线。特务第二营营长范如璋，也开到珠藏。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率第五团第三营营长冯耀先随侯驻在珠藏，作为预备队。侯之担并派他的精锐部队机炮营开赴珠藏受侯汉佑调遣。

侯汉佑派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率第五团团团长罗振武及总部机炮营和第三团两个连，防守乌江北岸茶山关、孙家渡等重要渡口。罗振武团指挥所设在孙家渡后山附近；林秀生旅指挥所设在瓮安之珠藏。侯之担江防司令部由遵义团溪推进到珠藏后，林的旅指挥所亦推进到距乌江前线较近的枫香林，并留有第五团的一个营准备策应。

侯之担还派第一旅旅长刘翰吾率第一团团团长刘安楨及第三团一个营和机炮营一个连，防守瓮安重要渡口江界河及其左翼与第六团、右翼与第五团衔接。刘安楨的团指挥所设在江界河后山，刘翰吾旅指挥所设在瓮安的桂花坪，并留第一团一个营及第三团两个连作为预备队。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川南边防军第一旅第六团中校团附。

侯之担派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全、副旅长任骧率第六团防守瓮安、余庆交界之袁家渡、李家渡、回龙场一带沿河防线，左翼与防守湄潭及余庆境内乌江北岸之守军万式炯部第八团衔接，右翼与防守江界河一带的第一团卸接。易少全旅长派我（第六团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率该营及第二营之一个连和临时拨归指挥的第三团两个连，集中防守袁家渡，右翼与第一团衔接。袁家渡位于瓮安、余庆、湄潭三县边境交界处，河面宽广，水流较缓，背面山势又不太陡峭，当时河防指挥部判断，袁家渡和孙家渡很可能是红军强渡的目标，所以派较精锐的、战斗力较强的第六团、第五团重点防守。

易少全的旅指挥所设在瓮安之牛场坝，欧阳文的团指挥所设在湄潭之石合水，留第二营随团部作预备队，并以一个连跟随旅部。易少全派副旅长任骧协助欧阳文作为巡视防务。

王家烈直属之第八团守湄潭与余庆境内乌江沿线河防，右翼与川南边防军第六团防线衔接，第八团划归江防司令侯汉佑指挥。

红军先头部队于1934年12月30日下午到达乌江河边，当晚及次日以后，乌江北岸各渡口——茶山关、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李家渡、回龙场等地区沿河守军，随时听到或看到对岸（南岸）红军，日夜砍伐竹、木并忙碌在编扎竹排、木筏，准备强渡乌江。守军则在沿河岸及后面山麓、山腰、山顶构筑梯形防御工事，准备抗击。

红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乌江南岸后，情势万分危急，守军江防司令黎判断：认为袁家渡、茶山关等河面较宽，水流较缓，两岸山势不高，可能为红军选择作强渡进攻重点；认为孙家渡、江界河等处河面较窄，水流湍急，且两岸坚壁陡峭，易守难攻，或不致在这险隘地带进攻。但红军不择较安全易渡的地带进攻，而是“冒险犯难”，选择地形险峻、水势汹涌的江界河及孙家渡为主攻目标。

1935年元旦下午，红军以木排、帆布船数只（木排上设有掩体），载少数战士向孙家渡强渡过江，均被第五团及机炮营守军击退。有二三只船筏被激流巨浪卷没，船筏上战士亦随波牺牲，其余船筏仍退回南岸。

元月2日红军仍用竹排、木筏向孙家渡及江界河强渡，茶山关对岸红军亦试图用船筏强渡，各渡口发生激战，又被守军击退，双方均有伤亡。红军暂不向北岸采取行动。黔军江防司令部误认为红军可能另寻其他渡口作进攻目标，并认为袁家渡极有可能被进攻，乃于2日下午派第三团团长周仁溥率一个营抵达袁家渡，增援第六团河防。

2日深夜，红军仍向孙家渡和江界河偷渡，少数突击队终于登上北岸，隐藏在守军防御工事死角下，并用信号向南岸联络。3日拂晓后，南岸红军派大批排、筏强渡，待继续渡江的另一批船筏将要抵拢北岸时，首批到者即向守军开火射击、投掷手榴弹，登岸者加入战斗，甚为激烈。侯之担总部直辖之机炮营营长赵宪群在孙家渡阵亡，该营及第五团伤亡惨重，防御工事大部被摧毁，部分官兵动摇后退，团长罗振武急得打滚，经该团预备队增援反攻，暂时稳住阵线。但南岸红军仍继续用排、筏渡河，增强进攻力量。第五团及机炮营在孙家渡、茶山关一带，虽企图顽抗待援，到元月3日的下午，江界河已被红军突破，该地守军第一团刘安楨部伤亡过重，不支后撤。旅长刘翰吾所率在桂花坪之预备队，来不及增援，红军大量涌渡，并在孙家渡与江界河之间，准备用木排、竹筏连接搭架简易浮桥，以大铁钉、抓钉扣住各段连接处，并以铁丝、竹条、绳索等加固绑扎，扎好后隐蔽于南岸河畔。红军突击部队已先后在孙家渡及江界河登上北岸，守军罗振武团及刘安楨团等部河防工事被摧毁，开始溃败。先过河的红军尾追溃兵，红军占领北岸高地，掩护红军大部队渡河。此时，红军预备好的“浮桥”立即下水，一头系在南岸的岩石孔、大树等上面，一头随水流靠北岸。部队随即由浮桥安全、迅速地过河。

其他渡口也用排、筏强渡，北岸已无守军踪影，红军胜利安全渡河。

在江界河、孙家渡被红军突破后，江防司令部又收到红军已在湄潭方面渡江的情报，江防司令侯汉佑由电话向坐镇遵义的侯之担请示处置。当时侯之担估计入黔红军可能在十万以上，强渡乌江者最少当有数万人，乌江及遵义一带守军不到万人，由川南调来增援的侯之玺旅尚未赶到，其他援军无望，在此人众我寡的情况下，若继续抵抗，必遭歼灭。于是侯不及向王家烈请示，即电话指示侯汉佑转令河防部队撤退，先到遵义集中，观察红军渡江后动向，再图第二步撤退计划。侯汉佑转令前线各部立即行动，乌江十余处大小渡口及百余华里沿线河防部队，均于元月3日下午、薄暮和翌晨，全线撤离河防后退。

侯汉佑仅率特务第二营先退到团溪，稍停，又立即退回遵义。他向侯之担建议放弃遵义，以避红军锐锋，若困守，可能全军覆没，不如撤回桐梓、仁怀、赤水、习水保老巢。侯之担早已惊惶失措，急图逃命，同意侯汉佑意见，命他率溃退部队后撤。侯之担则率少数卫队乘车退经桐梓、綦江到重庆。

侯汉佑此时得知川军刘湘所部之模范旅郭勋祺部，已由合江方面进驻赤水，刘兆藜旅由泸州、江安方面进驻叙永，侯部根据地“老营”已不保，乃令易少全、刘翰吾两旅长，率第六团、第一团和第三团之一部，先退到桐梓，再相机退到习水，并派少数军官在遵义附近收容溃散士兵。侯汉佑率特务第三营，经鸭溪、长干山退到仁怀；林秀生旅长率第五团、第一团、第三团之一部、机炮营等残部，麇集退到仁怀、茅台一带。侯并指示各部均不进入遵义城，尽可能绕道取捷径小路撤退，避免再与红军的追击部队接触，以保存残余实力。

乌江河防撤退时，袁家渡、李家渡、回龙场一带守军（第六团及第三团之一部），分两路撤退，一路经牛场坝、流水溪、天生桥、虾子场、龙溪场、板桥、娄山关到桐梓；另一路（防守回龙

场方面第六团之一部)经石冷水、茅草坪、三渡关、天生桥、虾子场,到板桥与旅部和前一路撤退的部队会合。

由江界河、孙家渡、茶山关等处溃退的守军第一团、第三团之一部、第五团、机炮营等,在河防战斗中,均受到很大伤亡,撤退又很匆促,无法集结便纷纷后退,溃退途中又多散失,以致损失较大。一路由教导师第一旅旅长刘翰吾指挥,经桂花坪、珠藏、鲤鱼塘、团溪、龙场坪到桐梓,一部分经老蒲场、高坪、板桥、娄山关到桐梓(此路主要为第一团和第三团之一部分残部)。到桐梓数日后,即由旅长刘翰吾率领退到习水城。

另一路(主要是第五团及机炮营的残部),退经枫香林、干田坝、龙场坪、苟江水、石板场、鸭溪、长冈山到仁怀,由第三旅林秀生旅长指挥和收容。

又一路(主要是第一团及第三团一个营的残部),退经三星场、合兴场、后坝场、枫香坝、中枢镇到仁怀、茅台。由第一团团长刘安楨指挥和收容。

第三师蒋在珍,趁机派出较精干人员及小部队到遵义、桐梓一带侯之退路上,运动、收容侯各部溃散士兵五六百人。

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占领桥头堡阵地后,为使后续大部队均能渡江,集中力量攻取遵义,因此,渡江后,只派先遣部队进占团溪及附近较重要通道,并不跟追溃退之侯之担部。相隔三四天才进占遵义县城。此时遵义已是空城,并无守军。红军占领遵义后,王家烈所派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才率所部第五团(团长李维亚)、第六团(团长刘鹤鸣)由息烽境内渡过乌江向遵义红军进攻;第八团万式炯部亦由凤冈、湄潭方向来会攻遵义。

当王家烈部在遵义附近及娄山关等地与红军激战时,黔军第三师蒋在珍部,停留在原防正安、道真、沿河一带,并不受王家烈调遣,蒋并乘机收容王、侯两部溃散士兵充实自身力量,企图在红军走后,扩大防区地盘。侯之担和侯汉佑也认为红军不会久据黔北,因前面有川军阻挡,后面有中央军追击,黔北又有王家烈

部在与红军周旋，中央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又由金沙方面渐向遵义逼近。因而侯部不听王家烈调遣。侯之担逃往重庆经过桐梓时，侯之玺旅两个团，已由川南开到桐梓，侯之担面令该旅据守桐梓，不再开往遵义。当柏辉章师刘鹤鸣等团在娄山关与红军激战情况最紧急时，王令侯旅速增援娄山关，侯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王部在娄山关失利，危及桐梓时，侯汉佑令侯之玺放弃桐梓，迅速退到习水。侯的企图是保全力量，在红军走后，复据黔北各县防地。

此时川军第二十一军（刘湘部）郭勋祺旅，已进驻赤水及土城一带；刘兆藜旅已进驻川南叙永、古蔺、古宋、兴文各县。侯部川南边防副司令岑炯昌看到在川南已不能立足，乃率同第八团的一个营（侯之玺旅离川时留下的）回到赤水。

红军在遵义近郊击溃王家烈部柏辉章师和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一纵队的两个师（第四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和第九十师欧震部，此两个师被红军歼灭过半），以后随主动放弃遵义，全部渡过赤水河，进入滇南之威信及川南之古蔺境内。红军接近赤水河之前，侯汉佑令驻在茅台、二郎滩等地的部队撤离，退往仁怀县城附近，避免与红军接火。

红军一部由桐梓经习水境内，向土城方面进军时，一个支队经过习水东皇殿时，与川南边防军第六团第三营驻该地的两个连小有接触，双方伤亡数人。第六团驻温水、良村一带的第一营部队，也是取监视态度，不向红军侧击；在习水附近的大部队，更无任何作战准备。

红军在土城与川军激战和进军到赤水附近的复兴场附近时，川军郭勋祺部伤亡极众，红军亦颇有损失，并有一团长阵亡。

红军进攻到复兴场，压迫川军郭旅向赤水城郊溃退，川军急调驻川南叙永方面防守之刘兆藜旅一部兵力，向赤水增援，并企图反攻。但红军大部已由土城附近之太平渡、醒觉溪（俗称“洗脚溪”）等处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境内前进，到达云南之威信。前进至复兴场的红军，主要任务为掩护侧翼，使主力安

全渡河，目的既达，便不再向赤水进攻，撤回土城后，随主力北进。

川军第二十一军郭勋祺部，先到土城布防时，以逸待劳，凭险据守，红军长途跋涉，且系掩护任务，兵力不多。在作战中，川军凭借防御工事掩护；红军是攻坚，目标暴露，致受到相当损失，不支稍事后退；川军也有很大伤亡。此役就是当时在重庆方面大肆宣传的“土城”大捷。刘湘向蒋介石邀功，向蒋保荐将模范旅升格为模范师，郭勋祺升任师长，并奖励该旅官兵。但不久红军的精锐部队陆续到来，即将土城防守之川军击溃，纷纷向赤水退却。红军目的在渡过赤水河北进，所以仅派一部追击川军到离赤水城东面三四十里之复兴场即行撤回土城。

侯氏弟兄的主导思想是：保存实力，待机收复防区。他们希望红军离开黔北后东山再起，所以集中在习水、仁怀一带的部队，都避免与红军接触。尽管王家烈一再电令代司令侯汉佑派兵，配合截堵和侧击红军，但侯并不理睬。同时川军亦退缩到赤水，不再向土城方面出击。由于侯部及川军的观望态度，所以红军四渡赤水，来去自如，没有受到多大阻挡。

江界河、土城战斗纪实

许俊陶

乌江江界河战斗

1934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团部转军部电令：红军出江西经湘西，向贵州前进，其先头部队已进至黔东南黎平县境，有进占贵州之意图。军部命令第五团立刻出发，星夜赶到猪场、袁家渡、孙家渡一带，沿江布防，构筑防御工事，巩固河防，堵击红军过江；并以小部队过河，活动于玉山镇附近，对瓮安、猴场（今草塘镇）方向监视，发现敌情即时电报。团部应位于猪场，到达后适时派出联络员与左翼第八团（万式炯团）切取联系。右翼目前无友军。该团奉命后，翌日从遵义新城出发，三天战备行军赶到猪场布防。

防御阵地部署时，以江界河为重点防御，延伸至孙家渡、袁家渡之线，以猪场附近一带高地为预备阵地，前后重叠、纵深配备，以第二营（营长王伯炎）守江界河，并以一个连推进江界河岸之山腹山顶，选择险要防守，其余部队配备在第二线。命第一营营长徐定远率该营四个连，分守孙家渡、袁家渡两个渡河点，必要时听通知向团部靠拢。第三营（营长刘开斌）为预备部队，在猪场附近一带高地，构筑防御工事，作为第二营的后备，必要时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川南边防军教导师第三旅第五团第一营第二连书记官。

增援第一线。团直属部队随团部驻在附近，并由特务排派出便衣组侦察敌情、联络友军。各营受领任务后，分头执行指示。我随第一营第二连守袁家渡，该连连长刘光华立即将部队带到现场，观察地形，构筑防御工事，严密布防，时刻准备迎战。由于红军攻击重点选择在江界河，故第二连始终未和红军交战。

全团布防就绪后，大概一星期左右，就得营部通知：红军已于12月下旬由黎平分兵两路，到达镇远、黄平、台江、施秉、瓮安等县，其先头部队已到达猴场，并派有侦察小部队，常活动于江对岸玉山镇一线，侦察我军江防情况。团长命令各守军严阵以待，准备战斗。元月1日上午，红军发起了对乌江江界河天险的进攻，首先对第五团第二营六连的前进阵地以试探性的火力攻击，隔河对战，然后红军在机枪火力掩护下，攻占了靠近江界河边的一座小横山，作为前进支点，准备掩护架设浮桥。这时只见红军战士们从各村各寨收集大量架桥器材，搬运到河边，准备架设浮桥。由于侯之担部队武器太差，不但没有重武器，步枪也全属赤水造，只有少数机动武器和部分枪榴弹筒，射程短，命中率低，对付英勇善战的红军，作用不大，无法以火力制止红军架桥。白天战况沉寂，入暮仍无大的变化。殊不知红军出其不意，乘黑夜派遣一些武装便衣泅水过河，潜伏在守军阵前以及团营部附近，钻入心脏，待机奇袭。守军没有察觉，以为有乌江天险，神兵也难飞渡。红军于3日拂晓发起总攻，集中火力掩护架设浮桥，此时过江潜伏之便衣部队，闻攻击枪声，里应外合，先袭击守军后方团营指挥部，团长罗振武惊慌失措。前线阵地被红军猛攻，第六连连长杨和贵阵亡，士兵伤亡惨重，情况非常紧急。红军越攻越猛，前仆后继，节节逼进，并在阵前喊话：“白军弟兄们，缴枪不杀！和我们北上抗日，收复东北！”守军处于腹背夹击的不利情况，阵地动摇，红军乘虚冲锋，占领了阵地。“猴子军”（侯之担军）如惊弓之鸟，溃不成军，只愿逃命。团部直属队和第二营残部退鸭溪；第一营从刀靶水退到枫香坝归建建制后，和团部一同

退经长干山下茅台；第三营退团溪进遵义新城时，第九连连长罗鹏举纵兵殃民，下令将丁字口顺昌百货店所有贵重商品全部抢光后，退桐梓、良村、温水一带，很久才在土城归队。团直和第一、二营也有不少违犯纪律的事：第一营第二连驻在茅台酒厂时，官兵胡作非为，乱拿酒喝，分文不给。还有一个排长鲍如舟，脱去衣裤，浸泡在大酒坛里，以酒洗澡，驱除风湿。官兵违犯纪律者，数不胜数。全团所有溃退官兵，于1935年元月中旬，先后在习水土城会合归建，重新整顿，征补粮饷。

土 城 战 斗

1935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早晨，我回家探亲度过元宵节后归队。我刚走进土城场口，就听到黄荆岩方向传来猛烈的枪声。不一会，就见营长徐定远骑着马，身后跟着几个我认识的卫士，慌慌张张地往团部跑。卫士班长安怀仁对我说：“红军已占领浑溪口小河对面的小高山，刚才营长在场口侦察地形时，黄福中副官已被红军一枪打死了。”我带着紧张的心情，立刻跑到连部报到销假，连长刘光华一见面就急忙对我说：“来得很好，刚才营部通知：我团在土城没有堵击红军的任务，此地堵击是川军刘湘部队的责任。目前川军教导师和模范师正在青杠坡附近与红军激战中，我团立即行动，沿公路向元厚、贝寨方向转移。”撤退时，按第二、三营，团部直属队，第一营的序列行进。命第一连为后卫，先占领公路右侧一带小高地，掩护全团安全撤退，必要时，各营、连交替掩护，阻止红军尾追。没想到部队后卫刚走出下场口，就发现红军从土城山后迂回包抄过来，意图全歼我部。掩护队边打边退，红军趁机猛打猛追，除一部牵制一连外，大部由公路尾击。红军战士把机枪端在手上边追边打，打得营长徐定远从马背上滚下鞍来，脸青面垢，步履艰难，叫服务员刘正国和我扶着他跑，侥幸脱离火网。好在各营、连逐段掩护，才甩开了尾追

的红军，然后由贝寨过浮桥，固守川风坳、天险关口一带。红军追至河岸时，我部已全部过了赤水河，倚山布阵，凭险抵抗。

这次战斗我团损失很大，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枪弹全被红军缴光。

蒋介石在贵阳

王 天 锡

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经过贵州时期，我任贵州省警务处长兼贵阳市公安局长。红军进入黔东南后，王家烈亲率部队阻截，又命我兼任贵阳警备司令。是年春，蒋介石亲到贵阳督战，随行者有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濬、晏道刚、吴忠信等人。蒋的行营设在乐会巷毛光翔的住宅（今中华北路贵阳市水利、林业局）里面。蒋与宋美龄住在二楼，警卫十分严密，二楼两端的楼口都站有双卫兵。除了顾祝同、陈诚、端纳、晏道刚、吴忠信等可以自由上下外，任何人不经蒋的呼唤都不许上去。开会时，走廊上还有武装兵巡回走动。

这时，第二十五军的高级军官除我之外，全部都带兵出去了。蒋介石初到贵阳，一切情况急待了解，因此仍然命我任贵阳警备司令，但派郭思演任副司令，各城门的卫兵都是蒋军。蒋为笼络人心，对我表示十分亲热，除向我了解贵州的军政、社会情况外，并问先兄（王天培）有无儿女。我把先兄死后的景况说了以后，他又装出很关心的神情对我说：“好！只要有人就好。”他又说：“贵阳你很熟悉，希望你辛苦一点，把了解到的情况随时告诉墨三（顾祝同）、辞修（陈诚）。你们都是熟人，不要拘束。你可以搬到行营住宿，便于联系。”当时我就跟着他一道走了。

这年3月，红军由遵义西进仁怀后，蒋介石三令五申地命薛岳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贵州省警务处长兼贵阳市公安局长。

迅速把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侦察清楚，并派飞机由空中侦察，但一连三天都得不到要领。蒋在电话里大骂薛岳，问他在前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连敌人的主力趋向何方都搞不清楚。据蒋的卫士说，蒋介石气得发昏，把电话机的听筒都扔在地板上，顿足大骂不止。

大约在4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有蒋介石、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濬、吴忠信、晏道刚、郭思演、王天锡等人。会上，顾祝同作了敌情报告。他说：“据息烽、开阳县长的电话，敌人的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部已过开阳县境，有进犯贵阳的企图。”接着他把拟好的防御计划宣读了一遍，令我指挥的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四百余人（均第二十五军部队）负城防责任，在三天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竣事；萧树经的别动队（约四百余人）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蒋并电令孙渡（云南龙云的部队，计3个旅）由安顺一带（此时孙部先头部队已到安顺）急行军到贵阳，加强守备。

会后，蒋介石问我：“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我说：“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蒋说：“不能草率啰！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我说：“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以修好，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蒋点头。当日，我强迫贵阳市民全力以赴，利用附近寺庙的砖、石、木板等，第二天午夜即将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竣事，去向蒋介石复命。

次日黎明，蒋与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亲到城上走了一遍，连声赞好。转来后，蒋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又极力给我灌了一阵“米汤”。正在谈话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走进来，向蒋行了一个室内礼，连帽子也忘却取下了。他说：“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蒋介石由沙发椅上站起来，望着我问道：“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我答：“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三十华里。”蒋把脑袋昂起，眼珠朝上翻，想了一下又问：“距清镇飞机场多远？”我正在计

算里程时，陈诚也跑进来了，说：“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第二十五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蒋介石默不作答，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沉思很久，两眼盯住我，问：“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我答：“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60多里了。”蒋说：“你去准备一下，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2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我出了蒋的办公室后，心里在想，老蒋准备逃跑了。

当我准备好向导、马、轿，10时左右去向蒋介石复命时，他喜形于色地对我说：“刚才郭思演由茶店来电话，说敌人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这时，顾祝同、陈诚、端纳、吴忠信等人都在座，蒋把军用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手里拿着一管红铅笔指着地图说：“廖磊的一个军驻在都匀、独山，敌人为避免消耗战，是不敢向南走的。我逆料他们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运出湘西回江西……”蒋正在指手划脚，大谈其判断时，晏道刚走进来报告说孙渡到了，蒋即命传见。蒋把红军的行进方向和他的判断又重复对孙说了一遍，并对孙说：“你看怎么样？”孙答：“整个情况不了解。委座的指示是不会错的。”蒋说：“你辛苦了，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但是这时的任务十分紧张，希望你再努一把力，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我已电薛伯陵由遵义东进石阡、余庆阻截，并电何键把重兵摆到湘西一带，你与薛伯陵从后追击。”又说：“官兵都辛苦了，这里拿几万元去慰劳他们。”蒋回头望着吴忠信说：“叫侍从室预备款子，送到孙司令那里去。”孙渡走后，蒋又望着我说：“城防还是不能疏忽，你去安排一下罢。”我辞蒋出来后，又加派武装兵巡查市街，并亲到城上走了一转，看到孙渡部队约有两个旅陆续出大南门、次南门而去。

第二天，约莫在早餐前后，突然听到南门近郊炮声隆隆，我正想出去看一下，蒋叫卫士找我。我走进蒋的办公室，看到他躺

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幅地图。看到我进来，蒋即把地图放下问：“你听到炮声吗？”我答：“听到的，大约在南门近郊，距城不过20里。”蒋说：“敌人未必会来攻城吧？”我未作答。蒋说：“你派人去侦察一下，即刻把情况回报。”我出来后，即派两人骑马到图云关一带侦察，约莫经过两小时，侦察人员转来回报，红军与滇军在黄泥哨（距贵阳约20华里）接触，现在已向花仡佬方向去了。我正想去向蒋介石报告时，陈诚笑嘻嘻地走进我的寝室来说：“好消息，敌人已被孙渡打跑了。”我说：“刚才侦察人员来回报，情况相同。委座知道了没有？”陈答：“是委座亲接的电话。孙渡已到龙里了。”下午陈诚又对我说：“敌人真狡猾，又从洗马河折转来，从花仡佬出青岩，走广顺方向去了。”我说：“现在怎么办？”陈答：“孙渡已回师追去了。”

贵州“防共委员会”的组成和活动

黄 乾 堃

1933年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来电，命令第二十五军特别党部发展军队党员，征求少校以上的军官加入国民党。我于1933年夏季赴遵义及赤水县，征求侯之担（第二十五军副军长）部少校以上的军官入党时，王家烈曾托我向侯之担转致团结对外之意。我到赤水，侯之担召集军队开会欢迎，旋对我说：“共产党快要离开江西了。”我问消息从何来。侯说是刘神仙由四川派人来通知的。（刘神仙，名从云，是四川刘湘崇拜的老师）他以左道惑众党徒遍布川省内外，消息极为灵通。侯当时兼任川南边防司令，亦属刘湘部属，故刘神仙派人传达于侯。侯又说：“蒋介石以‘剿共’为机会，想乘机宰割西南；王绍武（王家烈）也想借此机会来宰割我们。”

我由赤水返贵阳后，即奉南京中央党部来电，令我筹组贵州“防共委员会”。当即由军特别党部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推选黄乾堃（军特别党部常委）、许子斌（军特别党部书记长）、李仲明（贵州省党部书记长）、詹灵枢（第二十五军军法处长）、郑绍臣（省财政厅长）、刘民杰（省建设厅长）、黄烈候（军参谋长）、张鑫（军事训练主任）、谢薰陶（省高等法院院长）、李维伯（省教育厅长）和黄道彬（省民政厅长）等十一人为委员，我兼主任委员。

贵州省防共委员会成立后，其具体行动，据我回忆有下列四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贵州省防共委员会主任委员。

次：

1. 翻印蒋介石颁发的《防共须知》散发各机关、学校、团体、各县党务特派员及第二十五军各师、旅、团、营。

2. 根据《防共须知》制发传单标语，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并诬说共产党假借出兵抗日侵我省界。通知各县党务机关和第二十五军所属各师、旅、团、营长等加强反共宣传及加强防共工作。

3. 加强贵阳邮电检查(未成立防共委员会以前已开始工作)，指派专人(第二十五军军部参谋杜永祯，军特别党部科长吴升尧)负责。凡带有进步性质的刊物，及两广所出版的《西南周刊》(内容是反对蒋介石的)，一律没收。

4. 逮捕进步人士。防共委员会成立不久，即发现一张据认为内容有问题的传单，经张奎查实，是达德中学小学部教员曹儒森写的。达德中学过去在校长黄齐生和王若飞影响下，师生的思想都比较进步，曾被周西成初主持黔政时封闭。这次发现这张传单后，即将曹逮捕。

1934年秋，红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前一月，蒋介石派潘壮飞、路邦远为“督剿”专员，到贵州监督王家烈“剿共”。潘壮飞、路邦远到达贵阳后，曾将他们所负的使命告知我：①了解王家烈是否有“剿共”的决心；②防止王家烈与桂系勾结；③促进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合作，共同“剿共”。

当时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今兴仁、兴义、普安、贞丰、盘县、安龙、册亨、晴隆等县)，侯之担据遵义、桐梓、仁怀、绥阳、赤水、习水及四川之叙永、古蔺，蒋在珍割据正安、婺川、后坪、湄潭等县。他们与王家烈有的不合作，有的貌合神离。这些地区的县长及捐税局长，或自行委任，或向王保荐加委。所有防区内一切征税款项，王家烈不能过问。王家烈、犹国才的矛盾，本来是蒋介石制造出来的，但是这时蒋介石认为大敌当前，又改变策

略，企图促进他们合作，全力“剿共”。

在潘壮飞、路邦远未到贵州的前夕，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派张蕴良（贵州人）来贵阳（时间1934年8月）与王家烈面商截堵红军北上事宜。张把红军即将退出江西，全军北上，可能取道西南，蒋介石必然要派军追赶，乘机占据西南各省等事向王通报，张还把李、白的对策谈与王家烈：红军如取西南北上，必经黄河，如果桂、黔、滇三省集中兵力于黄河一带地区，构筑工事防堵，红军必然向秭归、巴东方向逸去，蒋介石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

潘壮飞是湖南黔阳县人，1919年周西成任黔军第十团二营副营长驻沅州（今湖南芷江），兼任沅州中学体育教员，遴选该校一批优秀学生，向旅长龔居仁请求保送入贵州陆军讲武学校（何应钦任校长）肄业，潘是被保送的学生之一，后在第二期毕业。这时，贵州的高级将领，如柏辉章、张霁、蒋在珍、杜少华等，都是潘壮飞的同期同学。侯之担系讲武学校第三期将校班毕业；犹国才、吴剑平是讲武第一期学生。蒋介石派潘壮飞来贵州，是为了便于活动。

路邦远是湖北人，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心腹。潘壮飞、路邦道两人都是少将“督剿”专员。

潘、路两人到贵阳，首先到军特党部会许子斌和我，了解贵州情况后，即去见王家烈，提出合作“剿共”的问题。王表示同意后，潘、路两人即分头去找犹国才和蒋在珍，以“剿共”专员身份，劝犹、蒋与王家烈合作，并促他们到贵阳与王家烈会面，商谈堵截红军北上事宜。犹国才、蒋在珍起程前，红六军团的部队已进入贵州，王家烈亲到马场坪设行营指挥截堵。军党部书记随行营作宣传工作。潘、路即促犹国才、蒋在珍到马场坪与王会面。商谈结果，王、犹、蒋都表示愿意合作，共同截堵红军。之后，侯之担亦赶到贵阳，洽商后旋即返防调遣部队作防堵准备工作。

贵州省各派地方势力概况

李 祖 明

红军未进入贵州时，贵州地方势力有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派系，现分述如下：

王家烈，1934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掌握着贵州省的军政大权，其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有十几个团。王家烈的嫡系部队除留必要兵力拱卫贵州首府贵阳（简称筑）外，其余分驻黔东之铜仁邻近各县、黔南之独山邻近各县、黔西之毕节邻近各县。第二十五军王家烈指挥的师、旅长，分别指定驻在外县防区，平时只指挥少数部队。王家烈部在湘西时，曾在武汉买得新式步枪及轻机枪等数千支（挺），入主黔政后，又在广东买得一批武器，实力较厚，拥兵有二至三万人。

犹国才（字用依），任第二十五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所部4个团及一些直属部队，长期驻扎在贵州西部安顺、镇宁、晴隆、关岭、普安、盘县、兴仁、兴义、安龙、贞丰、册亨、望谟等12县。1931至1932年，毛光翔和王家烈内江时，犹国才拥毛袭击王家烈部，王部退到黔南榕江一带，犹国才率部进入贵阳。蒋介石见王家烈已败走，乃顺手推舟，命令犹国才代理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不久，王家烈部反攻，复据贵阳。蒋介石又命王家烈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犹部退到滇黔边境之盘县、兴仁、兴义一带，余存七八千人，编为4个团。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川南边防军第一旅第六团中校团附。

侯之担（字铁肩），1934年任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并以川南边防总司令名义，坐镇赤水，所辖8个团、4个旅及直属队（教导队、机炮营、特务营等），兵力号称二万人，实际每团千余人，约一万二千余人。侯之担部驻守在黔北遵义、绥阳、桐梓、仁怀、习水、赤水等县，川南叙永、古蔺、古宋三县。直属队常驻在赤水、习水和古蔺地区，总部设在赤水。

蒋在珍（字丕绪），任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辖3个团，直接由蒋在珍掌握，驻扎在黔北正安、沿河、道真等县。由于防区地盘小，又较偏僻，财政收入少，不能多养兵，实力较弱，仅有五六千人。

贵州省各派地方势力，以王家烈部占地较广，多系交通要道和较富庶地区，这些地区的军、政、财权均由王家烈一人控制，所以实力比黔省其他各派较强。至于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各部，在其防区内，一切独立自主，实则割据，不听王家烈的号令，只空负其隶属关系，王也无力支配。红军入黔前，为各派利益计，始表面上达成联合作战协议。

吴奇伟部追剿红军溃败记

宋 少 华

1934年10月，第四军到江西兴国县的古龙岗后，大演京戏，庆祝“围剿胜利”，认为指日可攻下兴国，进入瑞金，红军的苏维埃各级政府马上可全部就“歼”。这是国民党军当时在江西的各级军官的一致想法。但是他们惧于红军勇敢善战，以及在前几次“围剿”中的失败，还是步步为营，不敢轻举妄动。

入黔“追剿”中央红军

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当时的建制部队，只有两个师，一个是第五十九师，一个是第九十师，每师下辖三个团。另外有第九十二师梁华盛部配属在第四军作战序列内，归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

当时国民党军的一切补给，完全由后方用汽车输送到前方，就是每日所必需的蔬菜等等，也根本买不到。十几万官兵猬集于一隅，日用必需品都要从后方运送，公路的修筑，就关系到所有国民党军的生存问题。

当时的公路，只由南昌修到永丰县的龙岗止，由龙岗到古龙岗将近70华里，当中耸立着一座天子岷大山，公路尚没有修筑。一切补给要用人力运输，既感运输力的不足，又怕在中途被红军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军第五十九师第三五一团第一营上尉营附。

游击队的截击，因此必须把公路修到古龙岗后才敢向兴国县城进犯。时我任第四军第五十九师第三五一团第一营上尉营附，正准备率领各连连长去分配担任修筑公路的地段，忽接团部通报停止修路，马上发出开赴吉安的命令。为什么这样紧急呢？必是后方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及至傍晚得到消息，所有被包围的红军，于一夜之间，分途突破封锁线，离开了江西，开始西征，其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湖南境地，后续部队正飞速向西推进。对此，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莫不感到万分震惊。

国民党军当时对红军作战是采取四面包围，稳扎稳打的战术，碉堡林立，但这个“铜墙铁壁”的封锁线，被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突而破，实为国民党军始料所不及。

第四军开到吉安，红军已全部到达湖南，并向西南前进，准备绕道北上。可是薛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率第四军尾衔在红军后面，继续向湖南追击。其追击的路线，是由江西莲花，到湖南茶陵、衡阳、东安、新宁、武冈、黔阳、芷江、晃县。在湖南境内，与红军仅在新宁县边区有过小接触，双方都没有什么大的伤亡。第四军到达晃县停止2日，再西走就进入贵州境内的玉屏县。当初入贵州境时，薛岳曾训令各军说，贵州苗族人多，向苗族人买东西，必须公平交易，或多给价，则以后要想买什么就很容易，否则将招致不可思议的困难云云。当时全军上下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一进入贵州境内，就遵照薛岳的指示去干。果然一时得到许多便利，一块银元可买到12斤肉，或3只大肥鸡。当时国民党军的副食是自由采购，就是主食也没有补给机构，都是自行采买。当我们进入贵州三穗县采买大米时，有个联保主任跑来对我们说：“你们的军粮我早已给你们准备好了，不要给钱。”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不要钱呢？认为这大概是苗人对我们的敬意。后来知道贵州王家烈的军队每到一处，其主食完全由人民无偿供应，习以为常，听说有中央军来，就由联保主任号召送米。我们当时还按价给了钱，一时得到很多的便利。可是时间久

了，狐狸尾巴露出来，人民尤其是苗族人民不愿再和我们接近发生交易。后来国民党军每到一处，人民往往逃避一空，因而在“追剿”当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如买不到主副食，找不到向导等等。而红军进入贵州，本着保护各族人民的政策，处处得到人民的拥护。

第四军由湖南进入贵州向镇远县“追剿”的那一天下午1时许，到达距镇远约5华里的一个高山上，发现红军在镇远城北布防。第九十师欧震部，不敢冒昧前进，躲躲闪闪地停止在路上东张西望。红军看清了国民党军有畏怯心理，即猛烈向第九十师第五三五团射击，因而发生激战。这天第五十九师为后卫，听到前方枪声大作，非常害怕，马上以团为单位，各自占领阵地，以防红军包抄袭击。其实红军仅派有少数兵力掩护其大部队前进，并没有与国民党军决战的企图。大约打了半小时，红军主动向湄潭方向撤走，第四军即进入镇远县城宿营，时已日暮西山，万家灯火了。

蒋介石早就想占有云、贵、川西南半壁河山，现在红军西征，进入贵州，他就乘机命薛岳指挥第四军两个师另外配属第三十六军周浑元以及第九十三师甘丽初^①、第九十九师郭思演、第十三师万耀煌等部“追剿”红军，分途进入黔境。当第四军追至镇远后，红军即由镇远向湄潭、遵义西北方向前进。可是第四军未跟在红军后面，而是转一个方向由镇远向西南经施秉县向黄平窜扰。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看到第四军不向西北去“追剿”红军，而转向贵阳方向前进，深感恐慌和不安。第四军到达黄平继续经炉山、贵定、龙里等县前进，3日后到达贵阳北30华里的观音山宿营。王家烈看到第四军逼近贵阳城，拒止其前进既不可能，就来一个大转弯，以笑面相迎，企图博得薛岳的欢心。于是，他派出代表送去四大卡车的茅台酒和麻草鞋到观

^① 一说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因该师在遵义附近被歼后撤职，改由甘丽初接任。

！音山犒赏第四军官兵，连长以上的官长每人领到茅台酒两瓶，营长以上的四五瓶不等，士兵每人麻草鞋一双。当晚我们喝得醉醺醺地打趣着说：“王家烈这个人还很懂事，知道我们都喜欢吃酒。”我们在观音山住了一夜，第二日早晨，即蜂涌到贵阳城。不久，王家烈贵州省主席的“宝座”就让给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来接替了。

第四军进占贵阳大约是1935年1月中旬，在城内住了3天，即行调出。军部和第九十师驻清镇，第五十九师调驻乌江西岸的黔江县。时红军在黔北湄潭、遵义一带活动，不时与国民党军有零星战斗，彼此均无大伤亡。但红军当时处境十分艰苦，前有阻击，后有追兵，且没有补给，弹药靠取给于敌人，粮食靠动员群众帮助。贵州是一个山区，不是产粮的地方，老百姓受军阀压迫，遍地都种的是鸦片烟，很少种谷麦，人民吃的粮食除苞谷外，多由外省输入，哪有多余的粮食给红军。国民党军看到红军这种情况，认为很快可以把红军消灭在贵州境内。

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在遵义溃败经过

1935年2月下旬，红军把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赶走，收复了遵义县城。薛岳得到这个消息，即命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率领第五十九师、第九十师、第九十三师共3个师开赴遵义，企图一下子把红军消灭于遵义地区。

第五十九师是军的前卫，由黔西县出发，于2月28日拂晓到达遵义东门外，即在公路南红花岗以北地区进行攻击部署，为左翼攻击部队；第九十三师在公路以北（含公路）占领阵地，为右翼攻击部队；第九十师随同军部行动，正向遵义前进中。

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到达遵义城附近，即命第三四九团团团长林贤察、第三五一团团团长张德能为攻击部队，林团在左、张团在右，第三五四团团团长黄道南为师的预备队。张德能接受命令

后，命第一、二两营为左右翼攻击部队，第二营为预备队，于上午6时开始攻击，第三营营长刘则名接连三次向红花岗红军阵地攻击，攻到山腰均被红军打退。时我已由营附调任第三连连长，营长李春农命我率领一、三两连支援第三营。我接命令后，即指挥两个连官兵疯狂地向红军阵地冲杀，但红军坚守阵地不退，双方对峙打到正午12时还在激烈战斗。到午后2时许，我指挥的两个连，官兵伤亡殆尽，我左肩胛也负伤，没有负伤的残余士兵，思想动摇，已呈现出不稳的情况。红军看到我们攻击顿挫，马上抓住机会发动反攻，我们不支即向后面撤退。这时，红军在后面喊边追：“不要跑，缴枪不杀。”我一面指挥士兵逃跑，一面命几个班长拚命抵抗，掩护退却。这时我站在一个石桥上指挥，红军从左右包围而来，我们就在石桥附近展开激战。忽左侧方有挺重机枪向我射击，我一惊慌，便倒在桥下。这时桥下已坐有一位腿负了伤的红军战士，大声喊“缴枪不杀”，我正犹豫之际，后面追兵赶到，我就把一支快慢机放下被俘了。后来我寻机逃跑，跑到通往贵阳公路南边的一个小高山上，望见红军正勇猛地向前反击。时已下午3时许，不仅第五十九师全部溃逃了，第九十三师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向贵阳方向溃退。吴奇伟率领第九十师走到中途，看见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败下阵来，命令把第九十师增援上去，但也难挽败局，只好退过乌江北岸，逃到息烽县城住下。红军已安全胜利地巩固了遵义县城。

我逃逃躲躲待了3天，才逃过乌江北岸，看到到处都是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的收容队，收容到的一些残兵败将，面目黧黑，形同乞丐。我到息烽见到军长吴奇伟，他问我遵义红军的情况怎样，有无向贵阳方向前进的企图？我答：在公路上曾看到红军约有五六百人退回遵义，另在公路南边看到约有两三千人向乌江方面前进，其企图如何不明。吴奇伟听到我说的情况后，就退回他的卧室去了。

第二日，我被送到贵阳苟立医院治伤。在医治中（大约是在

3月下旬)听说红军打到贵阳北的观音山,离贵阳仅30华里。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内指挥各军作战,听说红军到达观音山,惊恐万分。各机关怕红军进攻贵阳,都纷纷准备搬家逃避。后红军没有进攻贵阳,可是自蒋介石以下的各级军官,都饱受虚惊。

遵义地区防守战

李 骏

1933年九十月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时，薛岳充当第六路军总指挥，指挥第四军（第五十九师、第九十师）及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九等师，担任构筑永丰、古县、藤田、沙溪、龙岗、古龙岗至宁都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攻占宁都，歼灭红军。以后薛部追击红军长征期间，我始终跟随部队行动。

1934年10月下旬，第六路军正在古龙岗（宁都西约26公里）构筑碉堡封锁线的时候，红军主力突破了赣南第一道封锁线；11月上旬，相继突破汝城、仁化、乐昌第二道封锁线及郴州、宜章、临武第三道封锁线，向湘桂边境进军。蒋介石又以薛岳充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第九十师师长欧震）、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第四十五师师长萧致平^①、第五师师长谢溥福）及第九十二师（师长梁华盛）、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等部队（湘、粤、桂、黔、滇、川等省地方军队除外）担任衔尾追击任务。第四军取道吉安、安福、莲花、茶陵、耒阳、零陵、武冈、洪江、玉屏、镇远、黄平，于1935年1月上旬的一天，到达马场坪。第二天，薛岳总部也跟着到达。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携带大批茅台酒到马场坪迎接，薛将酒分送各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四军第九十师师部参谋处主任。

① 萧致平是第九十六师师长。第九十九师归薛岳总指挥部直辖。

部，官兵们喝得酩酊大醉，称赞茅台酒是世界名酒。第三天，第四军离开马场坪经贵定、龙里进驻贵阳，其他各部队亦陆续开到贵阳。

第四军由江西经湖南到贵阳，是“送客”式的追击，沿途不仅没有同红军发生过战斗，连红军掉队兵的影子也没见着。蒋介石原来妄想把红军主力“聚歼”于湘江东岸，作梦也没想到，红军竟顺利通过湘桂边境，进入黔北继续进行长征。

薛岳到贵阳后，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获悉，红军主力已渡过乌江北进，乃作如下的部署决定：（这个部署是当时第九十师师长欧震对我说的）

1. 以第三十六军沿贵（阳）遵（义）公路继续向北追击前进。
2. 抽调在贵阳的各师共十五个步兵团的侦探队（每个侦探队约有官兵九十人），编为一个追击先遣队，以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团中校团附罗醒尘（云南人）担任指挥，向黔西北搜索前进。
3. 其余各师在贵阳地区整训。以第九十九师担任贵阳城防警备，第五十九师驻南厂，第九十师驻清镇县城，第九十二、第九十三两师驻贵阳郊区。

追击先头部队到达黔西、金沙后，打给薛岳一个急电：“红军主力有回师模样”。薛不相信，他认为地瘠民贫的贵州，红军不会久留，回师的是红军小部队。2月间，东皇（今习水）地区黔军防线被红军主力突破时，薛才慌忙急令吴奇伟率领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不属第四军建制）沿贵遵公路，星夜兼程赶到遵义，协力黔军固守遵义，以堵击红军南下。

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吴奇伟率部抵达遵义南的忠庄铺时，正遇由遵义南逃的王家烈部队，得知防守遵义的黔军已被红军打败，弃城面逃，攻占遵义城的是红军主力。斯时，吴奇伟对于遵义打与不打，难于决定，乃召集师、团长开会，商议对策。通过讨论，都认为国民党军的装备武器，远远优于红军，红军主力到遵义是过路，只要国军发动攻势，红军就会撤离遵义，因而一致主张攻击。第二天上午，吴部开始攻击红花岗，红军予以迎头痛

击，激战至下午，红军出击部队向吴部左右两翼包围攻击，吴部不支，纷纷向南溃退。吴奇伟先向乌江夺路逃走，他到乌江北岸时，接到电话，得知由清镇赶来增援的第九十师已开到乌江南岸，吴要该师立即渡江增援，为该师师长欧震拒绝。欧说，乌江北岸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不利，只有占领南岸阵地，掩护收容败兵，才是上策。吴奇伟惊慌失措，卧地大哭说，我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军参谋长吴德泽（江西南康人）即令几个卫士将吴扶过乌江南岸（上述这一段话是当时军部参谋姚大年过江后对我说的）。随后败兵亦利用浮桥陆续过江，在修文地区整理。此役，第九十三师损失情况不详。第五十九师的黄道南第一七七团损失过半，便留在贵阳整训，不参加追击了。该师的第一七五、第一七六两团各损失三分之一。

4月初，红军主力在安底坝击败江防部队（番号不详），渡过乌江，经息烽、贵阳东南、龙里，转向西南入滇，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向川北挺进。薛岳率部向滇川两省继续追击。第四军经安顺、兴义、曲靖、昆明、会理、西昌、汉源、雅安、荃经追击前进。该军沿途与红军发生两次战斗：

1. 在1935年4月中旬的一天，第九十师进至兴义，与红军后卫部队发生战斗两小时，因天黑而停止，该师伤亡十余人。红军利用黑夜撤入云南境内。翌日该师继续向曲靖追击前进。

2. 1935年冬，红四方面军从草地回师，重占宝兴、芦山、名山、荃经、雅安一带地区。1936年2月间，蒋介石一面令川军进行堵截，一面令薛岳部从东向西逐次攻略而占领之。薛认为从东向西攻击，不能收歼敌之功，乃改用中央突破向两翼席卷的作战方针。2月下旬的一天凌晨，第四军为主攻，第五十九师在左，第九十师在右，指向雅安、荃经中间地区攻击前进。激战至午，红军放弃阵地，向川北转进。此役，第五十九师伤亡百余人，第九十师伤亡三四十人。第四军进至天全、名山地区时，奉命停止追击，以后经成都、重庆、遵义，返回贵阳整训。

第五十九、九十三师遵义被歼记

陈 金 成

一

1935年2月中旬，红军二渡赤水，挥师东进，约于2月26日进至娄山关歼灭黔军王家烈第二十五军侯之担师，直趋遵义，把中央军、川军主力甩在叙永、仁怀地区。驻贵阳国民党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感到十分恐慌，急派吴奇伟纵队（第四军）向遵义增援。当时第四军原驻贵阳以西之清镇附近，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驻贵阳。吴奇伟指挥增援遵义的部队，根据我亲自接触到的有韩汉英的第五十九师、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

二

1935年3月26日，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下令该师各部队向遵义进发，归第四军长吴奇伟指挥。27日，渡乌江进至刀靶水懒（滥）板凳（今南白镇）附近地区宿营。当时，遵义城内驻有黔军侯之担师部的留守部队，不允我部入城。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当即要求吴奇伟严令城内留守人员，开城让我军入城布防，这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九十三师第五五八团团长。

时吴奇伟、韩汉英等多已到达遵义南门外五里亭附近。

第九十三师到达遵义南门外五里亭附近，先作如下部署：

（一）第五五三团彭延祖团，担任团溪至川黔公路（不含）守备；

（二）第五五八团陈金成团，担任川黔公路（含）至西城守备与西城附近之第五十九师切取联系；

（三）第五五五团钟伟团，为师的预备队，随师部，位置于五里亭附近，并派一部守备乌江渡河点。

27日晚7时许，接师部通报：“红军已抵遵义城西门一带村庄，准备进城，各部队应加强工事，严密戒备。”

红军是夜12时攻城，并派有力部队，分向东门、西门出击我军。这时，我才知道第五十九师已经有一团进了城，被红军包围。此时，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要求吴奇伟指挥官，将邻接部队第九十三师一团归韩指挥，掩护进城部队转移。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即令我团将担任川黔公路守备之任务，交由彭、钟两团派队接替，我即将全团带到西门附近作掩护韩师转移的部署，对重伤人员的撤退，多取捷径。至28日第五十九师撤退过程中，我团多次派队掩护，均能完成任务。该师师长韩汉英、副师长沈久成二人对我团第三营营长张忠中特为赞许，沈说：“此次撤退，如果不是你团的掩护，第五十九师损失要在三分之二，今则损失只有三分之一。”实际上决不止此数。第四军主要干部多系粤籍，夜晚闲谈时，才晓得沈是贵州人，他告诉我，他们的大后方在广东，损失不必向中央报告，人员和弹药均能如数得到补充。撤退到打鼓新场附近时，沈久成热情地邀我团官兵到第五十九师师部休息一天。我因第九十三师战况不明无意久留。第五十九师后幸赶回贵阳归还建制，得到整补。约3月初，我率部由打鼓新场出发，渡鸭池河兼程赶回贵阳。部队到达扎佐时，驻在扎佐的第九十二师拒止我团前进，说是“非常时期，贵阳有最高统帅驻节，非得总指挥（指薛岳）亲自批准，任何部队不得进入贵阳”。我只得亲自打电话与

薛岳联系，首先汇报了掩护第五十九师作战经过，次及兼程赶回情况。薛对我慰勉有加，要我立即率队进城。是日6时许，我率队到达贵阳，就在原地休息，看来贵阳情况有些紧张。下午2时许，总部派一位参谋来团传达命令，要我即刻吃饭，随云南部队前进，归马旅长指挥。迨我团前进时，马旅长已不知去向，据报花溪镇已到红军主力部队，我决心不再前进，即在花溪北端高地露营。此地有公路通贵阳，瞰视花溪，一目了然，我自以为是阻击红军的有利地形。午夜约12时，花溪一带情况沉寂，仅沿河有红军炊事员来往汲水不停，还有少数人到北岸我军阵地前汲水，被我警戒兵击回。拂晓前4时，红军大部队向惠水、罗甸方向前进。拂晓后，忽接薛总指挥长途电话首先问我在什么地方。我报告昨晚未与云南马旅长联络上，现在花溪北端一带，已知红军大部已到花溪镇，我正在花溪北端高地一带露营，阻止红军向贵阳方向前进。红军前进后，我本拟派部队追击，随接到情报：“据飞机侦察报告，红军大部队行动，不要追击。”并要我团下午开回贵阳。

在我团回到贵阳的时候，总部参谋前来迎接。他首先将当天《贵阳日报》递给我看，在第一版载有“我陈团在花溪北端阻击敌人前进，敌大部已向东窜。”我看了以后，真是啼笑皆非，事实是我团龟缩在花溪北端高地，哪敢越雷池一步，只打搅炊事兵来河沿汲水而已。

三

我由花溪回贵阳，离开师的建制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对我第九十三师在遵义的作战经过，极为惦念。我询问我师主力在遵义的作战经过，总部告知我：“唐云山率部现驻开阳，担任飞机场的警戒。”当晚我即向唐云山师长汇报近周的作战经过，打算第二天早上就去师部面报一切，唐云山在电话里告知，明日胡素参谋长

率领军需人员、参谋副官等前来慰劳，要我暂时不必来开阳。唐又说：“我要胡参谋长当面说明师里的情况并鼓励部队加紧训练……”

第二天，胡素参谋长率领师部人员来团检阅及办理补给事宜。胡到团后，我即向他汇报我团奉命归第五十九师指挥后，一直担任该师撤退掩护任务，我团无大损失等情况。接着，我了解了我师在遵义附近作战经过。

2月27、28两日，守备团溪的川黔公路彭延祖团受到红军主力部队猛攻，该团鲁秉礼营长阵亡后，红军大部队由团溪以东向乌江渡口压迫。原在遵义南五里亭附近钟伟第五五五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部均于28日被红军突破，纷纷撤退。彭、钟两团混在一起，虽在懒板凳、刀靶水节节撤退，亦无法收容。韩汉英的第五十九师由遵义西门撤退时，也有一小部队由川黔公路乌江渡口撤退，钟伟团虽事先派一个营守备渡口，亦无法应付，由遵义撤退之国民党军，聚集渡口混成一团。吴奇伟、唐云山夺路渡过乌江后，乌江北岸相继陷入红军之手，渡口秩序大乱，吴奇伟的小汽车也弃置江边。第九十三师彭、钟两团大部官兵未及渡江，即受红军火力袭击，浮桥上下游，只见尸体横流，大部是第九十三师部队官兵。胡素参谋长懊丧地说：“这一仗，我第九十三师损失三分之二，没有过江的都被红军歼灭了。”

未久，唐云山被撤职，调到陆大十三期读书，遗缺由甘丽初接任。

红军主力在遵义地区歼灭吴奇伟纵队后，又由遵义以东地区渡乌江，向贵阳南进。以一部追击韩汉英师，由遵义向西追击至羊场附近。

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经过

李 清 献

1934年红军长征后，湘军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率部跟踪追击。第十六军是一个空头衔，实际只有第五十三师一个师，李自兼师长，军部和师部一起办公，不过每月可多领经费一千元。作战时，李每以军长名义，指挥临时隶属的部队。第五十三师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第二团，以善战著称。1934年追击红军时，何键任“追剿”军总司令，第五十三师归其指挥。我任该师第一五九旅旅长，率部经湘黔入川康，与红军有过多次接触。

一

1934年11月，第五十三师由江西永新县移驻遂川，旋奉令参加对红军的追击。部队经湘南辗转入晃县，沿途无战事，但闻王东原、郭思演等部曾在宁远与红军打过仗，下灌的战事还比较激烈。我过下灌时，当地还是一片战后景象。因长途行军，士兵落伍者甚多，部队遂在晃县休整。

1935年3月，全师由晃县向贵州进发，经玉屏到达石阡。某日，忽奉命限我旅于4天内由石阡赶到遵义解围。当我旅用三天半的时间赶到遵义时，红军已他去。我们遂在遵义构筑碉堡（第一五九旅担任构筑遵义以南30里处之工事），以防红军的突然袭击。自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九旅旅长。

从江西出发，我们每到一处必须修建工事，驻扎的时间略长，必须建筑碉堡。尔后直入川康都无例外。

4月上旬，当蒋介石与薛岳正坐镇贵阳指挥时，忽报红军主力向贵阳前进，驻守养龙站的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告急。养龙站位于息烽以北，乌江渡口以南50里处，距贵阳不到200华里。当时贵阳附近无大军驻守，因此人心惶惶，蒋介石也慌了手脚。大约是4月9日，第五十三师奉令南下，并令派一个旅于一天内先行赶到养龙站。电令中严格规定：先头旅如限期到达给予重赏，违者重罚。师部要我率第三一三、三一五两个团先行，并将师与军委会联络密码电本交我，以便到达目的地后，直接与蒋介石联系。遵义至养龙站150华里，我以急行军于当夜赶到，一面接防，一面分电向蒋介石与李韞珩报告到达目的地时间。次晨，畏敌如虎的唐云山交防完毕，将开息烽时，唐再三要求我，路上如听见枪声，希望我救他一救，我当时答应了。蒋、薛见我如期赶到，甚为满意。薛岳即在电话中亲交任务，要我迅速派兵占领黑神庙、盘脚营等处阵地，并嘱咐做好工事，沉着应战。李韞珩也派人送来画有三个十字的急信，我拆开一看，不是什么命令，而是抄的孙中山当年写给蒋介石的一副对联：“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乎仁义之中。”李书此联赠我，意在为我打气。

我与薛岳通话不久，与贵阳联系的电话线路就中断了，周围也开始响枪，枪声愈来愈密。旋据各防守部队报告，各处多与红军接触。距养龙站15里的黑神庙，且发生较激烈的争夺战，官兵颇有伤亡。午后，我侦知阵地前方山上尚有大队红军，电请贵阳派飞机来轰炸扫射，不久即见飞机飞来投弹。战斗至黄昏前，枪声渐稀，红军主动撤走，养龙站之战即此结束。蒋介石据报，要我派出小部队多组，手执火把，乘夜追击，“扰乱敌人，毋使远颺”。我以官兵通宵未眠，又作战一日，疲劳已极，没有照派。

黑神庙战事较为激烈，当时后方报纸称为“黑神庙之役”。养龙站之战，解除了红军对贵阳方面的威胁，当时报纸也大肆吹

嘘，说蒋介石躬亲指挥，“追剿”大捷等。我当时心中暗笑报纸过分夸张，但内心还是感到舒服，将错就错，把它当作表功的资本。蒋介石在嘉奖手令中，说我“忠勇敏捷”，并奖赏4000元。李韞珩高兴地说：“李旅长的考绩，不要我操心了，委员长已经考过，以后填李旅长的考绩表时，填‘忠勇敏捷’四字就是。”

养龙站战事结束的第二天，我奉令仍率两个团向息烽西北的潮水追击前进。傍晚到息烽附近稍有接触，待到次晨，发觉红军已向底寨方向撤退。当晚复奉令向底寨追击前进，到底寨又只随便打了一下，红军又撤走了。潮水和底寨之战，红军大概都是掩护性质的，所以都是小接触。但据李韞珩说，在息烽城内的唐云山听到底寨枪声，却已吓得面色惨白。由此可见当时一般国民党军官害怕红军的心理。

底寨战后，我旅开赴息烽南15里的阳朗坝与师部会合。蒋介石听说红军东进，怕危及湖南，又飞调第五十三师东开。我们日行百余里，到达黄平后，忽又奉命西进，还是每天走百余里，经都匀、贵定、龙里等地，于4月中旬到达贵阳。这段时间无战事，但路却跑够了，沿途官兵落伍的很多。特别是问路非常困难，因为贵州的集市，都以赶集的日期按干支取名，如未日赶集的便叫“羊场”（未属羊），戌日赶集的便叫“狗场”。这样，羊场、狗场、牛场、马场在地图上到处都有，究竟哪一个是我们行军的目的地呢？往往走错了。这更增加了部队的疲劳。

我们到贵阳后，蒋介石请李韞珩部将级军官吃饭，应邀前往的有李韞珩、军参谋长沈凤威、副师长周启锋、师参谋长陈维斌及我共五人。我们一去，他的假牙还没有安上，就快步出来接见，对我们慰勉有加。负责接待我们的柳际明（浙江人，与我是保定军校第八期同学）在入席前告诉我：蒋介石请客从来不备酒，但今天却破例用酒。我想大概他对我们这次的努力追逐是很满意的。席间，蒋说：“共军离了老巢，东流西窜，老百姓不附和们。这次的追剿，与国军在江西围剿时，情形大不相同。我们

一定可以解决他们，你们必须有信心。”他对红军尔后的动向也作了分析判断，说：“目前一般人判断共军的动向，第一，窜回老巢，我看公算不大。第二，北窜四川，那里山高水急，人烟稀少，石达开就没有成功，我看也值得研究。第三，盘据盘江八属（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安顺、盘江等八县），照目前情况看，也不可能。总之，共军已陷于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机会。”

蒋介石在贵州时，曾通令各部队研究孙子兵法“挂地篇”，其中说明在挂地被围时，要多方以误之，意在使自己由被动变为主动。但当时蒋介石却往往为红军所误。红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敏捷果敢的作战行动，常使国民党军手忙脚乱，莫知所措。所谓“蒋的嘴，我们的腿”，意思就是说，蒋介石一开口瞎指挥，我们官兵的两条腿就要吃苦头。

蒋介石见我们连日行军跑得太疲劳了，要我师在贵阳稍事休息。李韞珩对我们说：“委员长放了假，大家可以随便去玩玩。”于是，我们就大吃大赌了两天。

二

我们在贵阳休息了两三天，便沿安顺、盘江进入云南，开抵曲靖。这时已经是4月下旬了。某日，忽报红军率部由昆明方面北进。蒋介石电令堵击，李韞珩召集第五十三师和临时指挥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军官会议。会上，我主张派第十三师或本旅到曲靖西30里处的某镇（镇很大，为南北必经之路），堵击，重兵驻曲靖支援。李颇赞成，但万耀煌默不发言，似害怕与红军作战，会议遂无结果而散。不久，红军果由该镇附近经过，李韞珩闻讯，匆忙率兵去追，但已来不及了。当时我很恨万耀煌胆小，致坐失“立功”机会。

在曲靖停留了两天，全师即北开，经东川、蒙姑到达巧家。

沿途无战事，但气候变化很大，给行军带来困难。如未到东川时天气很热，官兵就把棉衣内的棉絮扯掉变成夹衣，但一到东川，气候骤变，都冻得发抖。我们到东川时，该县县长早已挂冠而去，县政府无人主持。我们感到有许多不便，想物色一个东川人出来负责，正好我们在某家打牌，房东是个读书人，对我们很客气，我们就请他出来当县长。后来龙云还真的委派了他。

巧家县位于金沙江东岸。我们部队开到时，红军罗炳辉部在对岸阻我过河，船只都被集中到西岸。师部临时造了一条船，令我旅强渡。我选择巧家北15里处偷渡成功，即向红军据守的山头进攻。红军对突然而来的攻击，稍事抵抗即且战且走。我正追击中，忽奉命限我旅几天内赶到会理，解川军刘元瑄旅之围。当时，本师部队已用西岸之船源源渡河，我遂率部向会理进发，巧家的军事情况，我就知道了。不久，李韞珩率另一旅也赶到了西昌。

我率部赶到会理，已无红军踪迹。据第三一七团先头营营长郑鼎报告，他前天黄昏到达时，与红军有小接触，是否属实，当时我未详察。刘元瑄听说我军赶到，喜形于色。但四城仍然紧闭，派人出城要我的军队驻在城外，要我从城头进去。因此，我是爬梯子进城的。刘为我设行辕，招待很客气。他告诉我，他在西门督战面部负伤，还说那里还有死人气味。但我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伤痕，也没有嗅到什么死人气味。特别是他为了扫清射界，将城外许多民房放火烧光，反诬蔑是红军杀人放火。当时我对刘元瑄这一派欺诳之词，总是含糊应答，认为只要解了合理之围，“功劳”就算不小，管他红军到底围城没有，到底打得怎么样干什么呢？后来，蒋介石通电全国，说刘元瑄挡住了红军，守住了会理，并晋升他为中将。我想，蒋介石不会不明白会理战事实况，可能是借此笼络川军为他卖命。

在会理稍停后，我部又奉令驰赴西昌，解刘元璋（他与刘元璜、元琮、元瑄等都是刘文辉的侄子，第二十四军的旅长）之围。

我到西昌后，始知红军根本未到西昌。当刘元璋出城迎接，陪我进城时，约有数百名老百姓跪在道旁，有的头顶状纸，有的手拿状纸。我不解何故，刘向我解释说：“西昌南门外的商场比较繁荣，可惜被红军烧光了，这些人就是告红军的。”他一面讲，一面叫人喊老百姓回去。我也远远地挥手叫他们回去，并说一定替他们伸冤。我心里很明白，红军是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绝不会烧老百姓的房屋，何况红军并未到西昌呢！我想起当年自己在江陵打红六军团、放火烧沙冈民房的往事，当时我也是上报说：共军焚沙冈而逃。所以我对刘元璋这一套鬼话心里有数：他是为了应付蒋介石。但刘元璋既请派兵解西昌之“围”，当然也要制造一些战后惨相以蒙蔽外人耳目。

三

1935年6月，我师由西昌出发，经礼州、泸沽到冕宁县后，即经彝族区到达安顺场。因长期的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隔阂，通过彝族地区是很困难的，但因川军早已捉了他们一个重要首领作人质，有问题就叫他下命令解决，所以我们能顺利通过彝族区。到安顺场后，李韫珩率另一旅赴康定；我旅则要过大渡河，再北出富林，开抵泸定县。当时听说有一部分红军在西康立足，蒋介石要我师暂留西康。我们的部署是：师部及第一五七旅驻康定；我旅所属第三一三团驻康定北大炮山，第三一七团驻瓦斯沟，我率第三一五团驻泸定。当时，川军有10个团驻丹巴，由旅长余某指挥。川军刘元璋旅驻金汤。这些川军临时划归李韫珩指挥。

我到泸定时，发觉这里也出现了会理、西昌同样的情况：房屋烧光了，只剩下一个县衙门，泸定桥的铁索也砍断了，两岸交通断绝；县长张纯嘏又把这罪过推在红军头上，说房屋是红军烧的，铁索是红军砍的。我也没有管这些事，只是征集竹子编成篾索，架起篾索桥，沟通了两岸交通。

10月，红军来攻丹巴一带（据说是由朱德指挥的）^①，川军10个团首先被击溃，金汤的刘元琮仅以身免。红军乘势继续南下，川康大震，蒋介石急调薛岳率部驰援。某日，红军先头部队与我第三一七团一部接触后转而进攻泸定，在泸定北15里处的九叉树与我旅第三一五团守兵接战。我一再派兵增援，经过几度冲击，终于稳住了阵地。红军主力经天全、芦山与薛岳部打了一仗后，分兵攻泸定，与我军相持至12月，红军始撤兵他去。同时，大炮山方面也屡有接触，我军都死力守住阵地。泸定解围时，我指挥3个团在泸定北的昂州激战，颇有俘获（大约俘获百余人，步枪二百余支，机枪二挺）。泸定战后，我旅集结康定附近，我兼任康定警备司令。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南下，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率红二、六军而（会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北上，西康大为震动。李韫珩令我旅西出雅江。我军经折多塘、索俄洛、高日寺山等地西进，在雅江城西60里处与红军接触，4月6日攻战雅江。此后即与红军对峙于雅砻江，直到6月13日（农历4月24日）我军强渡成功，红军他去，战事始结束。不久，我率部回驻康定。当年11月，部队离开西康，开驻重庆，追击任务即告结束。

^① 张国焘分裂红军，指挥红四方面军南下。此时，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行动。

第四章 堵截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

红军过云南时龙云的决策

孙 渡

红军长征部队进入湖南之初，蒋介石判断红军将继续西进，图谋在滇黔加以阻击，命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

龙云得令后于1934年冬在昆明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主要是云南部队旅长以上的部队长参加。开会中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云南部队应出省外作战，符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二是主张待红军进入云南，再行参战，符合保境安民的原则。主张出省作战的主要是安恩溥等人。龙云采纳了安派的意见，准备滇军进入黔川地区会同国民党中央部队堵击红军。

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进入黔川地境时，龙云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将滇军第二旅、第五旅、第七旅编为“剿匪”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派我为纵队司令，率部队向黔西和下川南一带出发，统归薛岳指挥。

1934年冬末，我率领滇军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鲁道源部、第七旅龚顺璧部在贵州威宁集中，随即由贵州赫章进入云南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追剿”军第三纵队指挥官。

镇雄、威信地区，复进至黔西和川南。此后即为薛岳直接指挥。

红军四渡赤水以后挥师向贵阳前进，蒋介石正在贵阳，其在贵阳的警卫部队仅有约一个团的兵力，只好电令远在黔西大定地区的滇军驰援。当时第三纵队全部都集结于黔西大定一带。龙云也用急电叫我率部向贵阳兼程前进。我即以第二旅为先头部队，向贵阳急进，照普通行程需要7天，我们是3日3夜就赶到。其他第五、第七两旅亦随后赶到。蒋介石为感谢龙云救驾之恩，特电龙云说：“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并对第三纵队大加犒赏。龙云认为蒋介石要拉他的部队，对蒋此举颇表不悦。其实红军向贵阳前进，目的是要把该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军东调，以便南向进军云南。

红军挥师向贵阳，由贵阳以北地区向东前进。我率全纵队向贵阳东出尾追。不料红军进至龙里地区，突然回头向贵阳前进。红军准备击破滇军，除去威胁以便南下，而我部队受到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搞得手忙脚乱，我在贵阳以东观音山黄泥哨跳车逃跑，几乎被活捉。我们部队向贵定方向一动，红军乘机南向，从容向云南前进，威胁昆明。

龙云、薛岳在滇川黔地区堵击红军失败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指挥权不统一。例如我们第三纵队的行动要由薛岳通知龙云，再由龙云下令给我，我才能行动。红军行动神速，灵活机动，我们无法掌握战机，不失败才是怪事。

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经过

安 恩 溥

一

红军长征开始时，龙云是不关心的，红军到达湘桂后，他才开始注意起来。贺国光的参谋团到重庆以后，来电向龙云建议派兵在边界截堵时，龙云幻想红军不会进入云南。当时龙的高级幕僚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周鍾嶽、丁兆冠、马伯安等省务委员说：红军现在已成为“流寇”，只有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才可抢吃抢用，来云南这些贫瘠地区，只有找苦吃，并且他们不会不知道石达开到大渡河钻牛角尖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参谋长孙渡、团务督练处第一副处长（处长卢汉）高荫槐等说：四川江面宽，渡江难，交通便利，“中央”调兵截堵容易，红军不可能在四川渡江，来云南渡江的可能性大。第一种说法迎合龙云的幻想，龙云极为赞许。第二种说法是龙云最怕的。红军一入云南，对其在云南的统治有很大威胁；他特别怕蒋介石的军队跟来抓走了云南半独立的大权。

1934年底，红军到达黔东时，龙云紧张起来，决定派兵出黔堵截，幻想不使红军入境。在省内想以坚壁清野对付红军，令各县市修葺城垣、加筑碉堡，先后筑碉堡四千余座。仅昆明市附廓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三纵队第二旅旅长。

就筑了二十多座。又严令各县长集中力量于县城，万一红军到了县境，必须尽守土之责，如果失守县城，军法从事。

红军入黔后，蒋介石来电要云南出兵追堵，龙云即以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渡为该路军行营主任，于1935年春率第二、五、七等3个整旅和第九旅的十八团、第三旅的第五团取道宣威、威宁出毕节。其余刘正富的第一旅、龙雨苍的第三旅（缺第五团）、张冲的第九旅（缺十八团）整備待命。出黔各旅先头为第二旅安恩溥部。龙云以飞机去昭通接我来昆面囑，大意是：红军入黔后判断进入四川渡江的成分为多，但也可能进入云南。如果进入云南，祸害很大。现决定派参谋长孙渡以行营主任名义率第二、五、七各旅出贵州堵截，务须堵截于川黔地区，勿使进入云南。第二旅各部即日由原驻地昭通、宣威，分向黔地威宁集中后为先头向毕节前进。行营直属部队即日由昆明出发到宣威集中随五、七两旅后向毕节跟进。龙要我不必回昭，用汽车送我到宣威率第四团到威宁，会合昭通来的部队后即向毕节前进。

1935年2月，龙云的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改为中央“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任第二路“剿匪”军前敌总指挥，下辖四个纵队：第一纵队吴奇伟、第二纵队周浑元、第三纵队孙渡、第四纵队王家烈。各纵队名义上统归龙云指挥。

当时编入第三纵队序列的部队除韦亮澈（后为杨毅）的警卫营以及拨归的山炮营、通讯连外，为第一、二、三、五、七、九各旅。

当时各旅的编制，大致相同，即：旅部直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特务连（大致同团属步兵连，任警卫及杂差），下属两个步兵团。团直属1个护旗排，1个机枪连，有哈其开斯重机枪6挺，分编为3排。下属3个营，营属4个连，每连有战斗兵125名，有轻机枪3挺（最初一挺），步枪80枝。全旅通讯方面由第十路总指挥部拨给一个通讯队，主要为无线电收发报工作，有线电话、被覆线很少。

1935年1月下旬，行营主任孙渡到宣威对第四团官兵训话后，纵队部和第五、七两旅陆续在宣威集中出发，第二旅分别由宣威、昭通向黔边的威宁集中。在集中期间，除令镇雄、威信等县侦察敌情报告外，旅派便衣侦察两组，一组经镇雄、威信出长官司向叙永、珙县方向侦察；并函告各边地的大户（即土豪），如果罗坝杨绪九家、水脑余景尖家、三口塘张家、大湾子陇家、花舂坝余家等各自派探侦察，汇报旅部。

2月1日，第二旅集中完毕，第四团由威宁出发，旅部和第三团2日由威宁出发追堵。由于冰雪很大，士兵负载重（除枪弹外，衣物、三日米、干粮、帐幕等约四十多斤）；初雇来的骡马、长伏须要将息，以及每日宿营练习构筑工事，7、8日才先后到达毕节。

在毕节过春节后，各团挑选精干官兵组成一个加强连为游击队。三团的队长为苏向文（原第八连连长），分队长为王正中、何永祥，徐占元；四团的队长为万华忠（第三营副营长），分队长为赵鑫翰、洪世杰、杨炳灿。规定今后各游击队按日轮流，以一个游击队在全旅先头作提前半日行程的活动，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分报先头营、先头团和旅部，掩护先头团作战部署；其次是保护旅部政治工作队进行反共宣传，联络地方土豪劣绅，为部队准备给养。

2月10日接到云南威信方面的侦察报告，红军已入威信境。当时孙渡的司令部和第五、七两旅尚在赫章途中。11日又得续报，红军已入威信县府所在地扎西，并向镇雄方向急进。二旅将情况上报，并即向镇雄急进截堵。是夜宿母享，龙云复电，据镇雄县长报，威信方面系土匪扰乱，着勿为不确情报所误。孙渡复电所报确实与否均须待鲁、龚两旅来到，以免不测。12日下午第二旅到达镇雄属大湾子，大湾子后山的警戒已与花舂坝红军警戒隔箐相望，但实际情况预计红军先头可能已到镇雄城。第二旅为保护镇雄城计，判断当面红军不会向大湾子方向来（但后来第五

旅到大湾子时与红军小有接触，鲁道源对安恩溥颇有烦言），一面电复实况，一面在大湾子陇家补充粮秣后，于13日转向镇雄城方向，前进至黄土坡（距镇雄城约30华里），得报红军尚在古芒部以下，于是14日转向古芒部前进。到古芒部，得报红军先头在两路口（距古芒部约30华里），为林彪所部，正在敷设电话线。第二旅在古芒部整备，定于次日晨向两路口攻击前进，将实况分报龙、孙。15日晨向两路口前进途中，得报红军已折向威信去了，遂跟追前进。经斑鸠沟深谷时，闻高山密林中吹箫声，认为是红军设伏信号，派队搜索，乃苗族牧童吹箫，遂转到横山陇家住宿，补充粮秣。是日经雨洒河宿三口塘。16日到达威信县城扎西，已不知红军踪迹。威信县长杨冠群前来面报：红军在威信县城街上（此县无城垣）进出有一个星期，曾开了几次群众大会，没收了平街口萧大户家财物分给穷人。县府固守在街头的岩上狮子营内，红军没有攻击，公物档案仓储，幸得保全。距城不远的果罗坝杨家、三口塘张家、花射坝余家、石坎子王家等土豪所在地，红军都派队去征发给养，但未围攻碉堡。

此时孙渡率鲁、龚两旅经大湾子到镇雄城放置山炮营的笨重武器和行李后向威信前进途中。

第二旅在威信只停半日补充粮秣，即继续跟追。总是距红军后尾半日或一日行程，追之不上。出威信界入川境经叙永属分水岭、营盘山、麻线堡、白沙，2月21日至古蔺属马蹄滩（即赤水河上游河处的一个镇），得报红军已由太平渡及茅台寻舟渡赤水河经仁怀向遵义方向去了。我们旅也就停下来休整几天。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几点：我除了忠实于龙云截堵红军于川、黔地区的指示外，还因自己是镇雄人，镇雄、威信地区的土豪非亲即友，有利害关系，所以拖起这个旅瞎冲。沿途得悉蒋介石中央军韩汉英、黔军侯之担等整师整旅地被红军消灭，有所警惕，不能冒险，感到前段脱离孙渡指挥甚为不当。现在孙率鲁、龚两旅，虽然顾虑二旅有失，不经扎西直出分水岭兼程追赶，又被七

旅副旅长耿金锡拖起误进永宁城绕了一个圈子，尚在永宁向毕节前进途中。龙、孙都来电责我冒进，应行等待。官兵被拖得已现疲困状态，须从事体整；所带银币用尽，川、黔边地乡村百姓拒用新滇币，除就近派员向余姓、杨姓等土司家换银币暂为维持外，电云南请送来银币，须行等待。

沿途见到红军伤病掉队人员，因赶路未处理。只有旅部特务连在威信途中俘获了一个姓张的运输兵（遵义人），让他在特务连挑伙食担；又俘获红军后勤部队中一个姓朱的病号排长，病愈后随旅部行动。

红军到镇雄、威信又折回川、黔。当时有人说，红军见到碉堡多、道路少的不利情况才折回的。因而有人传说龙云碉堡政策很成功。我所知道镇雄、威信碉堡之所以多，与龙云的命令无关，而是由于这两个县与川、黔有六七个县接壤，民国以来川滇黔三省都是在半独立状态中，争权火并，许多土匪在这些地区烧杀抢掠，居民为了防备，筑碉堡、蹲岩洞，逐年形成习惯；再就是这两县大地主很多，还有土司、头目，他们互相火并仇杀，各筑碉堡对付仇家。

二

2月25日，得悉以鲁旅、孙司令部、龚旅的次序过营盘山向雪山关、赤水河、清水铺入黔境后，第二旅也就由马蹄滩过河复入黔境，经龙昌营、瓢儿井至毕节。在那里接收云南派李崧团解送来的饷银后，奉令出毕节到毛鸡场、观音桥间向赤水河方向警戒。后又奉令去大定（现名大方）防备，住了几天，与孙渡见了面。孙说：“过去你在前面赶路，龚顺璧在后慢吞吞地拖，鲁道源我们在中间很作难。你要知道红军十分厉害，这回你两个团没有被吃掉，实属侥幸。现在蒋委员长来到贵阳，通令各部队由他直接指挥，更不能学过去那样随便。”我只好低头无语。

吴奇伟等在遵义失败，红军逼近乌江的消息传来，第三纵队也就动起来。各旅从此完全遵照孙渡的命令行动；而孙渡又完全照传蒋介石或薛岳的电令，指示团营应到的地点。有一次龚顺璧旅未到电令所指地点，被蒋介石直接打电话斥责。因此我们各旅毫无按实际情况处理情况的一点自由，很多时间在毕节、瓢儿井、大定这一地区急行军旋磨打圈。有时早晨得令兼程往东，夜间复奉令兼程往西。纵队司令部就往返瓢儿井三次之多。第二旅有一次奉令兼程去大定，追赶至双山，又奉令兼程往瓢儿井。4月1日在瓢儿井奉令去打鼓新场支援黔军。先头团已向打鼓新场方向出发一点多钟，复奉令急向大定集中待命，乃以后尾团为先头，派快马追回先头团在后尾跟进。先头团和旅部入夜才到达大定，后尾团只到距大定40华里的锅厂。这一阶段连红军的影子都未见着。

此时第三纵队司令部尚在毕节、大定途中。一日夜11时总指挥薛岳直接来电话告诉我说：“委员长（指蒋介石）要你率所部于4日前到达清镇确保飞机场，办不办得到？”我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竭尽全力为之。”

我在2日晚到达黔西。适由打鼓新场（今金沙县）败退下来的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也在黔西。我和团长万保邦去见王家烈，自我介绍后，王夸赞万保邦过去以一个团人打垮黔军3个团的勇猛和安旅从大定来到黔西的迅速。王问安恩溥今天由哪里来，安答从大定来。王说：“我不信！我不信！你们飞啊！”万说：

“我们后尾有个团还是从锅厂来，先头已到黔西了。”王说：“真是铁脚板滇军啊！”王又说：“我们滇黔是一家。”他将两个食指勾起来比着说：“弟兄！我们要勾起来，我们自己的事靠我们自己，靠人家靠不住，我的意见你们不要去鸭池河。”我听在座的有几个是下江口音，沉思一下说：“我们来到贵州，当然要服从王主席。我们由云南出发的时候，龙总司令告诉我们，你们此去绝对服从蒋委员长命令消灭‘共匪’。主席当然与龙总司令是一致的。”王说：“当然，当然。”

第二旅的游击队，由韩汉英部派汽车到鸭池河边接运，3日晚到达清镇。全旅过鸭池河，经卫城镇略休息，4日午到达清镇，受到韩汉英师残部的欢迎。韩告诉我说：“你们太辛苦了。以现在的情况看，我保证你们可以在此住一个星期。”

4日夜11时，薛岳又来电话，转达蒋介石命我率部于明日拂晓前到贵阳拱卫。我派员分组分头先到连部传达，即时叫伙夫起来煮饭，饭煮好再叫士兵起床吃饭，饭吃好之后连队即向旅部报告，听候旅部号音集合。传遍各连后再到营部、团部传达。我部于夜零点30分集合出发，5日晨5时到达贵阳城外头桥，警戒部队不许入城。经薛岳的总部派员来引导才全部入城。薛岳引我去见蒋介石，蒋说：“你们这个部队，可以算是国家的军队了。今天休息一下，了解了解贵阳的情况，由薛总指挥告诉你，好好部署。”我说：“绝对服从薛总指挥命令，誓死拱卫贵阳！”蒋连连点头说：“好，好。”

连日红军在贵阳附近盘旋，形成围攻贵阳之势。蒋介石极感不安，乃又急调已到清镇第三纵队全部入贵阳。适龙云电孙纵队退驻安顺，意在不要太被蒋介石抓紧，好机动掩护云南。孙渡权衡后，为有利于云南计，仍允遵蒋令全部去贵阳。部队方准备出发，蒋派汽车接孙渡，先到贵阳接见。孙渡6日到达贵阳见蒋后，蒋发给每旅1万元的补助费，即时交孙渡手领分发给安恩溥、鲁道源、龚顺璧等亲收。同时另发纵队部两万元。龚顺璧、鲁道源先后到达贵阳时，蒋也分别接见。

7日贵定告急（只有一连驻守）。蒋介石以贵定是湘黔公路接近贵阳的要点，若为红军占领作为据点，十分不利。午后2时由薛岳派汽车来接我去，告以蒋的意旨，要我率所部于今夜到达瓮城桥，明晨入贵定，确保贵定。

我驰告孙渡后即时集合第二旅出发，以四路纵队沿公路急行，薄暮通过龙里，趁月色（阴历三月初）急进，午夜到达瓮城桥才煮晚饭吃。经用电话与贵定联络，希有情况即时通知。

8日午进入贵定。据驻守贵定的连长说，今早西岸的老百姓讲，红军昨日来到独木河西岸的约二千余人，夜向西北方向去了，各村内尚有零星红军，该连已派队搜索侦察中。傍晚，第二旅派游击队过独木河西岸侦察，据报20里以内无红军踪迹。全旅即在贵定城内住宿一宵。

9日午后，第二旅营长以上人员正在侦察部署中，孙渡来电称：“贵定方面红军业已回转，现正与我纵队在观音山激战中，令你旅速回龙里与龚旅会合，共歼此敌。”第二旅即时又向龙里折回，入暮到达龙里。孙渡谈当日作战经过情况说，蒋介石当面告诉他，据飞机侦察，红军大部从清水两座浮桥上东渡，判断系向东折回，蒋要第三纵队（包括现在贵定的安旅）即日出发先到黄平后剑镇远截堵。因此8日晨以第七旅、纵队部的序列向龙里前进。第五旅通过贵阳到图云关后，即向左分路在纵队左侧前进。午后4时左右，第七旅大部已到龙里，后续部队尚在观音山附近时，孙渡所乘汽车行至谷脚附近，发现公路左侧高地上有红军百人举枪向汽车射击。车身已中多弹，仍继续前进约二三里，化装为农民在田间锄烟苗的红军，也持枪向汽车射击，汽车被击中。孙的卫士被击毙一名，伤两名。孙令驾驶员开足马力往前冲，开出数里，车身中弹更多，左轮中弹歪斜。除受伤者外，孙及其他人员下车步行，令车向龙里急驶，送手命给龚顺璧着速派队由公路前来接受命令。不久，龚旅派来的第十八团（暂归龚旅指挥）与孙在途中相遇，孙先将谷脚附近发生的情况，告知该团团长王炳章，后又说纵队部所带饷款甚多，尤其兑换滇币的现洋为数颇巨，行动迟缓，若遇战事，单警卫营之力势难兼顾，所以特调这一团前往接护，但若纵队部尚未通过谷脚时，则告其暂折回贵阳为安全。孙继续向龙里前进，至观音山附近，即闻断续的枪声，知道第七旅游击队亦与红军小有接触。薄暮始抵龙里。入夜孙得报，知是日午后第五旅和警卫营均与红军接触，纵队部行李及非战斗人员已退回图云关。因警卫营在黄泥哨的战斗颇为激

烈，当由纵队分别向贵阳薛岳和虎场第五旅请求派队增援。当时薛岳答，应令警卫营竭力抵抗，增援即可派出，并着纵队部速回贵阳，以便利用纵队部电台与孙和各旅联络。不久，又接第十八团团团长王炳章报告，该团在行进间，突与大部红军遭遇，展开战斗，公路已被红军截断，不能通过。第二日第七旅派第十四团团团长马继武率部到龙里城郊西北地区威力搜索，发现大部红军纷纷向南移动，该团以众寡悬殊，不敢大胆进攻，只能遥行射击。第十八团仍在原地继续战斗（该团系在观音山黄泥哨间作战）。至黄泥哨方面，本日早即由薛岳派来一个团，第五旅派来一个营支援，激战终日。守贵阳城的国民党军（此时蒋介石已调来周浑元纵队的几个师到贵阳）通知鲁道源派队增援，鲁道源谢绝。鲁旅单独作战，入夜始停，警线篝火相对。夜深后，只见火焰，不闻声响，派队搜索红军已拔队走了。次晨向东南跟踪前进，未遇红军大部队，只见少数红军和沿途伤病落伍人员，多数系江西人，间有川黔人。鲁旅只顾赶路，未予理睬。是时第七旅各团逐步回龙里集中，即日进行追击。警卫营到贵阳与纵队司令部一齐出发，经过广顺到紫云始与孙会合。第三纵队由云南出发两个多月，跑了几千里路。这是第一次与红军作战的概略情况。

当时各报大事宣传滇军打得很好。有人向蒋介石说，报上宣传的未免太夸大了。蒋说：“龙总司令迫切希望他的部队打一次好仗，孙渡又遭遇危险，提高一点宣传，对政治军事都只有好处。”

4月12日，孙渡除电令鲁道源继续跟踪向南追击，在定番附近会合外，召集在龙里的团长以上人员指示说，薛岳来电，大意谓红军攻入定番后，大部已奔向西南，三纵队应恢复定番，跟踪追击。第二旅由于没有参加贵阳、龙里间战斗，被派为先头。12日到青岩，据报定番仍为红军占领，即在青岩宿营准备。13日战备前进，至距定番约15里的土桥。据游击队报告，定番已无红军

踪迹，遂前进通过定番至三都场宿营。通过定番时，见到城内民居安然如堵，毫无残破现象。据报长寨（今长顺县）已无红军，次日通过长寨向紫云方向前进，至长寨、紫云间的板挡场，方才住下，即奉命向广顺方面追击。

第二旅15日至广顺，红军已向西走，判断红军系渡北盘江向云南去了。我决取道红军之北并进，企图先红军渡打帮河，北盘江截堵。16日至狼洞马场宿营，奉命折向紫云追击。当即电报孙渡，据确报紫云已无红军，判断红军已渡北盘江，请准许我旅由八十蛋渡打帮河北盘江截堵。孙司令复电“须遵照蒋委员长电令行动”。当时即告先头团团团长万保邦：“今天出去，明天一定是走回头路，走慢些，不必学往常快走。”但万保邦为找到宿营地，17日晚仍到距紫云很近的白石岩住宿。旅部及第三团在沙子沟住宿。果如所料，孙来电，红军已由保保树、白层渡北盘江，着速取捷径渡江截堵。18日第二旅复回狼洞马场，连夜赶至八十蛋，就江内石桥搭起便桥，于19日渡江完毕，骡马系涉水而过。

纵队部及鲁、龚两旅仍到定番，过长寨到紫云，也盘旋了数日。后得知红军已渡北盘江，甚为着急。他们速速赶到关岭铁索桥，过北盘江紧跟第二旅。

三

第二旅渡过北盘江后，经太平街、兴仁县城和猪场一直都是跟在薛岳部后，薛岳跟在红军后，也没有作战。

4月25日过了猪场接近黄泥河，才听着枪声，是欧震第九十师初与红军接触。欧部见着第二旅到达，即让在路旁。欧震指着黄泥河街向我说：“此去你们人地熟悉，请你们向前追击，我们向沿河追击，支援你们。”我表示同意，即命第三团团团长郭建臣率部冲过黄泥河街，直向山地仰攻而上。红军系后卫部队，据说是董振堂所属的一部，且战且通。我们追上山顶时，听着远方轰炸声

甚烈。旋空军队长张有谷投下信来说：右前方小羊场旁有千多红军干部正在集合讲话，盼速派队围剿歼灭。我指派团长万保邦率部去攻击，到小羊场附近与红军战斗，但不如张有谷所说的是红军干部，仍然是且战且退的后卫部队。全旅跟追至傅村又打了一下，入暮后对峙警戒。

次晨拂晓，当面已无红军，第四团万保邦部为先头向沙寨前进，到达村边才发现红军，游击队和第一营先后冲入村内混战。先是游击队长万华忠、苏向文等率部先进村口，见着昨日被飞机轰炸伤亡人员身旁还有枪弹、方捡拾间，村内红军边问什么人，边即射击。万等率部冲入村内后，见形势不利，即向村旁左翼小高地夺取制高点。占领高地后，听村口石峡处枪声甚密。万华忠知道这天早晨团长万保邦、团附范捷正等因雾大，为迅速了解情况带着团部传令兵等少数人员在游击队和团先头营的中间行进，判断村口石峡内的枪声系万保邦等与红军作战，遂请苏向文固守高地，自己率部冲下去。正值万保邦等被红军包围于许多乱石椿后面，幸而雾大，未被红军发觉。万华忠等冲到，第四团第一营营长王承福也率部到来，遂命王部向村右冲击。第四团后续部队陆续加入，全村山前山后进行混战。我率随身官兵也来到村口，还和红军少数人遭遇，传令兵姬正邦被击毙，徐兴朝负轻伤。我以特务连守住村口，命团长郭建臣率所部从村外上右翼高地。时雾散天明，红军已撤尽，第四团已追出村西。我通过村内前进，见各处都有大桶盛着米和豆类杂粮煮好的稀饭，桶旁丢下一碗半碗的稀饭和竹筷。看情况是红军正在吃饭中仓促应战的。据说这部分红军是由保全堡方面才来到的林彪军团所属的一部。

我们追至猫街，已寻不着红军踪迹，查知红军大部已向西北羊场营方向去了。由于粮秣又须补充和判断红军既系后尾与我们战斗，先头可能已到曲靖以上。是否尾追，抑另选道由旁超出截堵，须考虑商酌请示，即到窝铅厂住宿。

两日来的战斗，虽然红军系后尾掩护部队与我们作战，也有

若干伤亡，特别是飞机轰炸伤亡的有相当数目。我们自己的伤亡也只嘱咐地方负责收拾，部队亦未派专人处理。

当25、26两日第二旅在傅村、沙寨战斗时，纵队主力已到达黄泥河前后，第二旅宿窝铅厂夜，纵队也到达小羊场前后，随即由西北衔红军之尾，向羊场营追去。

李崧独立第二团，曾在羊场营堵击，与红军先头部队战斗后，退守曲靖。后改编为第十七团，王开宇升团长，加入纵队追来，一直到慕莲。

第二旅宿窝铅厂夜，接龙云来电说红军后尾少数部队牵制，应兼程经陆良至宜良乘火车来保卫昆明。

第二旅官兵乡土观念重，以两日一夜经陆良于28日夜到宜良上车，29日午到跑马山下车，进驻干海子。游击队在大板桥警戒，便衣侦察队在长坡与红军便衣队接触。次日游击队推进至长坡，另派队以大板桥为中心布置警戒线。旅主力在干海子筹备。

当时第三纵队留云南的刘正富第一旅，已被龙云派去罗平，出黄草坝堵截。第三旅旅长龙雨苍任昆明城防司令，仅有严家训第六团的一个建制团，其它只有警卫营、宪警和新兵队等零星部队。龙云对昆明的保卫很担心，因此，虽然第三纵队主力为策应保卫昆明急急跟踪，于30日经羊街夜晚到达嵩明，准备继续尾追，但龙云仍很谨慎地指示第二旅须一面掩护昆明，一面出富民县相机截堵。第二旅于5月1日令在长坡的游击队等进至兔儿关经黑龙潭北山地暂停后，向富民来迫本队。第二旅本队由干海子经昆明城北方山脚出北较场、王家桥向富民前进，是夜宿营2村。2日通过富民向武定前进宿者白。3日通过武定时，知红军在昨夜即全部离武定向元谋方面去了。第二旅连日急追，到马头山才与红军后尾稍有接触，即在马头山住宿。

第二旅5日由马头山前进，通过元谋，询知红军已进向永仁，即跟至午茂村，但无红军踪迹。次日沿牯茂河向永仁前进途

中，得姜驿县佐派人报告，红军正在金沙江街（龙街）准备渡江。旅折头急进至龙街，又听说红军并未渡江已沿江而下，第二旅也沿江跟踪。道路崎岖万状，骡马完全不能行走，乃改道向环州，慕连（万得）方向前进。我将情况电告元谋的孙渡。次日续进至慕连，纵队全部也陆续于5月10日前后到达慕连。接龙云电，红军已由皎平渡过江，第三纵队就地停止待命。

第三纵队跑了3个多月，至此才得休息几天。待薛岳部渡江去后，才奉命各旅部队，避免经过昆明，各取道暂回原防整顿待命。

四

1935年5月，入滇红军北渡金沙江后，滇军第三纵队各旅奉命各回原防休整。我率第二旅回防嵩明不久，龙云派员接我到昆明住在他家谈及红军罗炳辉部于4月底5月初由黔入滇的情况。原来红军罗炳辉部途经宣威、会泽无正规军防守，就进入了这两个县，然后由巧家方面渡江。当时龙云要我到会泽去办理善后。

红军在会泽进出3天，离开会泽，以为他们到巧家去了。实际到了蒙姑附近的汪家坪，在汪家坪、歹畔两个渡口过金沙江往宁南（披沙）去了。渡口上的船只本是装上石头沉在江底的，但是他们一到就找到水手从江底把船只捞起来，随即过渡，不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熟识。

县中的参议员和绅士们打听红军已渡金沙江，并且听到跟追的国民党军就要到来，他们又出来开会，讨论办理善后。当场推出朱文开（字运生，唐继尧的表弟，曾任过烟酒公卖局长、禁烟局会办）办理善后，准备欢迎国民党军。接着湘军李韫珩部来到会泽，停了几天。李部走后，我带的第二旅才到来。

6月中旬，据我由嵩明派出的查江组人员回会泽报告。江防

巩固，红军已不可能回转，第二旅第四团即回防昭通。我率旅部和第三团在会泽逗留一个时间，然后留第三团团长郭建臣和第一营驻守会泽，才率旅部及其余部队回昭通去。

滇黔边境追击红军记

刘 国 举

1934年冬，我任滇黔绥署步兵第二旅第四团第二营第八连上尉连长。先据传说，红军已进入贵州境，随后本团即奉命由原防地宣威出发，到滇黔边境镇雄、威信、威宁交界之线防堵，继而深入到威宁属之瓢儿井。这时红军已突破我们的防线向镇雄进发。本团又奉命折返镇雄，全旅部队集结阻止红军进入云南内地，时为旧历12月下旬某日上午9时左右，即在镇雄之斑鸠沟与红军遭遇。我连担任尖兵，与红军先头部队稍有接触后，红军即转向东北方面，经镇雄之大湾子街进入四川古蔺县属朱家箐、马蹄滩、银匠树而去。旅长安恩溥命令全旅部队跟踪追击，我连仍担任尖兵，直追到马蹄滩，忽奉命停止前进，我连又变为驻军警戒，对红军方面的警戒位置在马蹄滩北约20华里许之山腰上。我原想在斑鸠沟至马蹄滩途中，能抓住几个红军战士，至少是掉队的战士或病号，从他们口中弄清红军部队的番号、兵力、装备、企图等情况，但始终未能如愿。在担任警戒时，我就在警戒线附近找老百姓询问，欲探知一些有关红军的资料。但壮年的老百姓都已走光，只剩下几个老年人和一些妇女，都是一问三不知。妇女们只说我们夜间睡觉了，只听得有些过路人的脚步声，也不敢起来看，什么样的人不知道。结果关于红军的情况还是一无所获。我深感红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又强，不敢以国民党军官们宣

* 作者当时系滇军第二旅第四团第二营第八连连长。

传的“流寇”来看待红军，因此提高警惕，严加戒备。

部队到达马蹄滩时，龙云来电命本旅停止前进，原地待命，不能孤军深入。四五天后本旅又奉命折至贵州毕节，本团为前卫，本连为尖兵，兼程前进，每日约行150华里，经大定、黔西、卫城镇驰援贵阳。这时一般下级军官和士兵怨气冲天，都纷纷议论说：跑来跑去，对红军堵也堵不住，围也围不着，追也追不上，昼夜奔跑，把两脚都跑肿了，连红军什么样都没有看到。当本团到达卫城镇时，安恩溥就向驻在该地的中央军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借了三部卡车，由本团团附范捷正率领我连和第七连全部，乘卡车星夜赶到清镇，大肆宣传滇军到了。因当时传说红军中有一个口号：拖死中央军，吓死川黔军，血战滇军。安恩溥就想利用这种口号虚张声势，以解贵阳之危。随后全旅部队星夜赶到贵阳之西郊十余华里处停止，报知蒋介石，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人来看了一下，随后蒋介石传令嘉奖：“行动敏捷，士气饱满。”并特许安旅部队进驻贵阳。其他部队则严禁进入贵阳市区。这时安旅完全由蒋介石指挥控制，龙云也无法过问了。

在贵阳休息一天后，全旅开拔龙里，贵定之线布防。布防未稳之际，忽然传来命令，红军已于图云关至龙里之间，龙里与贵定之间的空隙穿过封锁线向西南进军，本旅又奉命跟踪追击。因本团为前卫，本连是尖兵，我发现红军足迹是几十路纵队行进，就认为行军纵深小，速度快，是红军的主力部队。我军一贯是一二路纵队行进，纵深长，速度慢。当追至兴义县进入云南平彝黄泥河西南高地时，蒋介石的侦察机就投下一个通信袋，内中通知说，红军距此500多公尺，速追击。团长万保邦即命我向红军衔尾追击。我即率全连官兵猛进200多公尺，红军后卫部队即用轻机枪向我射击，³³边射击边后退，我亦边射击边前进。进至白石岩村，红军凭一堤埂阻止我前进，我全连即投入战斗。战斗约半小时许，红军退走，我奉命停止追击。此次战斗，我连士兵负伤5名。红军有否伤亡不知道，只拾获汉阳造七九步枪2枝，中正式

步枪1枝。时已傍晚，全团部队即在白石岩宿营。

次晨，全团部队沿红军退路追击，但未与红军发生战斗。以后即改道陆良、宜良。到宜良后改乘火车至昆明，防止红军袭击昆明。迨红军由昆明以北退走后，全旅又向富民、禄劝、武定、元谋、金沙江跟随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前进。这时全纵队是在龙云直接指挥之下行动，每日行程仅十多里或20余里即宿营。龙云的企图是希望红军迅速退出云南境，免得中央军大量集结云南，造成对龙云政权的不利。迨红军渡金沙江后，全旅移驻会泽县休整。

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纪实

萧本元 卢浚泉 余建勋

1935年春，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国民党在赣、湘层层封锁，向贵州进军，活动于川、黔、滇边境，有进入云南的态势，云南大为震动。龙云为了维护其统治，先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抽调云南大部分部队编为“剿共”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归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参加截阻、尾追红军的战争。

一 增援贵阳

第三纵队编组后，所属第二、五、七3个旅约在1935年1月分别由原驻地^①向滇黔边境威宁附近集中。由于红军是灵活机动的战略部署，使第三纵队在镇雄、威信、威宁、毕节等地来回调动，疲于奔命。除第五旅的第九团警戒部队在镇雄大路与红军警戒部队有小接触外，没有发生其他战斗。

1935年4月初，第三纵队推进到黔西、大定一带时，红军由川南转向贵州，回师遵义，威逼贵阳。蒋介石正坐镇贵阳，手中无兵，急电调第三纵队增援贵阳。孙渡即率所属3个旅向贵阳急进。安恩溥旅首先赶到贵阳。3个旅均驻贵阳市郊外。蒋介石大加

* 作者萧本元当时系国民党第二路军第三纵队第三旅第五团团长的，卢浚泉当时系第三纵队补充第一大队大队长，余建勋当时系第三纵队第一旅第二团第×营营长。

① 第二旅原驻宣威，第五旅原驻曲靖附近，第七旅原驻昆明附近。

犒赏，命继续向东尾追。红军则早已离开贵阳，丢掉滇军，大举向西南挺进。

第三纵队在滇黔边境集结时，龙云原来打算是“拒红军于滇境之外”，部队行动是龙云用电台控制指挥的。因孙渡率3个旅深入黔境赶赴贵阳，造成云南边防空虚，龙云对孙渡极为不满，很长一段时间不同孙联系，而直接同各旅长联系。

二 纵队部及各旅的具体行动

安恩溥旅于1935年1、2月间在贵州威宁地区集结，两三个月期间都是来回调动，始终没有同红军接触。约在4月初推进到黔西、大定时，奉孙渡命令向贵阳急进，到贵阳第二日即奉命向东方龙里、贵定追击红军。到贵定后，才知道红军主力部队已由贵阳外侧的黄泥哨、红板桥附近越过公路向贵阳西南的惠水、广顺南进，原向龙里、贵定方向移动的仅是掩护侧翼、迷惑国民党军的一支小部队。此时安恩溥旅又折回龙里沿惠水、紫云、贞丰、兴义探索前进，直到滇黔交界的黄泥河（富源县一个村镇）才发现红军后方警戒部队。在小羊场附近，中央军一架飞机向安恩溥旅空投一通信袋，大意是：红军二三千人都在你们前方不远。安旅夜间即由小羊场出发，次日向沙寨前进（另一说法是黄泥河附近的白石岩）。行军途中，安恩溥身旁的一个警卫员被流弹击毙，吓得安恩溥脸色都变白了。第四团的先头部队尖兵连在夜色苍茫中刚进沙寨村口，答不上口令，枪就响了，第四团全部第三团一部随即展开占领阵地，双方对峙约5小时。安旅由行军纵队逐次展开，又由展开到集结的过程中，红军早已甩开西进。这是第二旅同时也是第三纵队与红军接触的第一次战斗，安旅伤亡约五六十人。在经过羊肠营时，得知由龙云直接派到羊肠营堵击的李崧独立团已被红军击溃，红军主力已向昆明附近挺进。全旅部队奉命经窝铅厂（属罗平）、陆良至宜良后，从铁路运输回昆明，继续向

禄劝、武定、元谋尾追。

第三纵队部及鲁道源旅、龚顺璧旅由黔西、大定赶到贵阳的次日，龚旅紧接安旅向龙里、贵定方向，鲁旅向贵阳东北侧的虎场方向尾追。孙渡乘汽车由贵阳赶往龙里，在离开贵阳仅30华里的黄泥哨附近，汽车突被侧方红军击中，车上一警卫员立即毙命，孙渡逃脱。纵队在行军途中才得知红军的东进部队，仅是一支掩护侧翼的小部队，主力已由贵阳东侧向西南经青岩、定番、广顺、紫云、贞丰、安隆毫无阻挡地渡过北盘江向云南进军。鲁道源旅由关岭、兴义、黄泥河徒步至昆明后，继续向武定、禄劝、元谋方向尾追。龚顺璧旅经罗平、陆良、宜良后，用火车运至昆明，继续向元谋方向尾追。

第三纵队自1935年初集结滇黔边境到由黔回滇约5个月时间，除鲁道源旅的第九团警戒部队在镇雄大洛，安恩溥旅在沙寨（或白石岩）与红军警卫部队接触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来回调动。原来挡在红军前面，后来匆匆赶到贵阳，等到由贵阳回滇已被红军远远甩在后面。第三纵队及刘正富旅先后到达禄劝、武定、元谋时，红军已由禄劝皎平渡全部渡江入川北上。第三纵队及刘正富旅即调回原驻防地整补。

三 龙云在昆明地区的部署

1935年4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经兴仁、兴义间大踏步进入云南后即分路进军，一路由宣威、东川、巧家，一路由曲靖、马龙、易隆、嵩明、寻甸逼近昆明时，龙云除电调第三纵队星夜回滇外，采取以下措施。

调原驻大理的第一旅（旅长刘正富）至昆明，并以个旧独立营、工兵营编为一个支队，统归刘正富指挥，开赴曲靖、富源一带堵截。当刘正富所率部队早晨离开富源县的黄泥河向兴义前进后，晚上红军即进入黄泥河。刘正富部又妄图走猫街、老厂捷

径，绕在红军之前，但坡陡路狭，前进缓慢，根本无法赶在前面，只好徒步沿罗平、陆良到宜良，改乘火车至昆明，继续向禄劝、武定方向尾追。到达元谋东山时，才知道离东山30里附近，仅有一点红军后尾部队。

李崧独立团赶到曲靖附近堵截，与红军在羊肠背遭遇，如螳臂挡车，不到1小时，就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向曲靖溃退。

在调派第一旅的同时，龙云派省务委员胡瑛为戒严司令，赵钟奇等为副司令，廖行超为参谋长。宣布滇中、滇东北各县戒严，并严令各县县长固守县城，失城者以军法论罪。据萧本元回忆，当时龙云为了保存实力，对红军北上每日只追数十里，尽可能避免接触。同时又按蒋介石的命令，派出滇黔绥靖公署的将校级军官数十人，分赴沿金沙江各县协助县长封锁江面，破坏船只。少将参军孟智仁就是被派到武定封江的。但是在蒋介石来昆明的前两天，龙云以孟智仁封江不力为名，逮捕枪决。

成立昆明城防司令部，调原驻建水的第三旅旅长龙雨苍为昆明城防司令，星夜率领该旅第六团（团长严家训）及滇越铁路路警大队赶到昆明，并由龙雨苍指挥驻昆明的补充第一大队（大队长卢浚泉）、补充第二大队（大队长杨运新）及昆明市宪兵、警察等单位，在昆明城郊赶筑工事，由北郊莲花池至东郊古幢公园沿金汁河构筑数十个主体碉堡。此外还调集近千名民团驻于西郊，一面日夜筑碉挖壕，一面进行防御演习，闹得鸡犬不宁。后来才知道，红军北上并不准备进入昆明。

滇军堵击中央红军简记

常绍群 王伯勤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离开福建、江西根据地，经湖南入贵州。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奉蒋介石命令出兵堵击。龙云调集滇军的3个旅由他的参谋长孙渡统率向贵州出发。每旅原来只有两个团，临时增加为3个团，3个旅共9个团，外有警卫营，机、炮、通讯等部，共约1万余人。

当时编入这支部队序列的是：第二旅（旅长安恩溥），下属3个团，第三团（团长郭建臣）、第四团（团长万保邦）、独立第二团（团长李崧），第五旅（旅长鲁道源），下属第五团（团长萧本元）、第九团（团长冯云）、第十团（团长侯镇邦），第七旅（旅长龚顺璧），下属第十三团（团长杨时彦）、第十四团（团长马继武）、第十八团（团长王炳章）、警卫营（营长韦银超）。

当时第二旅驻昭通，第五旅驻昆明，第七旅驻通海。规定各旅分头出发向贵州前进，按期到毕节集中。

滇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滇军编为第三纵队，以孙渡为纵队司令。

1935年2月初，孙渡的司令部到昭通后，即率第二旅由昭通出发，经威宁到毕节。第五旅由昆明出发，经沾益、宣威、淌塘，

* 作者常绍群当时系国民党滇军第五旅旅部参谋，王伯勤当时系滇军第七旅第十四团团部副官。

可渡河进入黔境，在威宁的混水塘过除夕，后经赫章、平山铺、野马川、七里关而到毕节。第七旅由通海出发，经濛江、罗平、沾益、宣威到毕节。此时黔军的旅长犹国才驻毕节，对滇军极表欢迎。据他说红军将抵威信，第三纵队即由毕节向镇雄出发，准备侧击红军。纵队部及第二旅先出发，途中据报红军将进入镇雄。于是第二旅赶去镇雄，但到了镇雄县附近的塘房黄土坡，知道红军并未逼进镇雄城，第二旅即向威信方向进发。到了古芒休息一日。此时红军已返威信，于是第二旅又紧跟红军，直到四川古蔺县的马蹄滩。

第五旅由毕节出发，取道黑楼庄、母亨到大湾子。大约1935年的2月12日、13日（正月初九、初十）前后的下午5时左右，前卫到大湾子街时发现红军数百人（据镇雄县调查，系红军右路军五军团的一个团，以少数兵力佯攻大湾，迷惑滇军），已到距大湾子街前面的老场坳口。滇军前卫的尖兵排即从江家湾子爬上制高点——大山梁子阻击红军，双方接火。不一会鲁道源旅长率队赶到，命第十团迎击。侯镇邦团长即命第十团分三路从干河、干沟等三条山湾爬上老场坳口，准备截断红军的退路。战斗约一小时，红军即撤退到水牛山一带高地。滇军亦不敢追赶。时将薄暮，滇军即在大湾一带宿营，双方对峙。是夜滇军惊恐不安（驻在仓房的那一部分队伍，夜间在天井里打枪）。次日第五旅为了要靠拢在镇雄的主力部队，即向镇雄县城前进。由大湾子出发时，附近的红军已走了。

到了镇雄县城，听说红军转入黔境，第五旅仍经白鸟、摩里两地重到大湾子。此次是第九团当前卫，并率领临时配属的镇雄独立营陇承尧部一同前进，由大湾子经花舂（láng）坝、石坎子入威信县境，再经两路口到四川叙永。第七旅则取道古芒部、两洒河、小落脚经威信县城扎西，亦到了四川的叙永。纵队司令部在第七旅之后，第二天才到叙永县城。

叙永为川南重镇，川军达凤岗旅驻在城内，几经交涉才准滇

军入城。滇军在叙永驻了几天，以后孙渡奉薛岳电，谓红军已击溃中央军韩汉英等师，渡乌江，破遵义，命滇军折回向贵州大定（今大方）前进。于是，取道营盘山，自雪山关之左下渡赤水河，开到黔境大定。不几日又说红军已折头，将入古宋、古蔺，五旅又取道毕节左侧斜插赤水河，在那里住了5天后，奉命重上雪山关；到关那边住了两天，不见红军到来，古宋、古蔺平静无事，仍折头取道瓢儿井，复入黔境。刚到大定，忽奉急令，谓红军将到打鼓新场，命滇军赶到黔西布防。第五旅连夜出发，第二日午到达黔西。住了大约一星期，即奉令增援贵阳。其原因是红军进入贵州后，战情紧急，蒋介石亲到贵阳坐镇，红军得此情报，佯攻贵阳，到了扎佐地方，虚晃一枪，蒋介石恐慌万状，遂分令各部驰援。为此，滇军兼程前进，第五旅由黔西下渡乌江，上卫城镇，到清镇。此时第二、第七两旅已先入贵阳。奉蒋介石命令，队伍不准进城，立即出发，限令当天拂晓前到达瓮城桥，次日增援贵定。第二旅到贵定布防了一天，不见红军，又奉命回到龙里。第七旅到龙里后，孙渡由贵阳去龙里，换坐一部大卡车，只带少数随从人员，但被红军侦知，车子开到观音山、仇儿关附近黄泥哨时，遭到红军游击队的阻击。孙的随从人员伤一人，后车轮被打坏左右各一个，该车子是四个后轮，还有两个未坏，尚能开动，因而孙渡未被活捉；但孙的警卫营在该地被阻，战斗了一场，略有伤亡。

第五旅在后赶到贵阳，宿了一夜，次日即奉令向虎场前进。到了水口寺途中，传来枪声，随即得知孙渡的车子被阻击，因而终止虎场之行，立即命令第十团开去观音山、仇儿关增援。旅部及第九团于次日到达仇儿关时，看到前头谷脚街左侧高地尚有少数红军；仇儿关大路上及其左方则无战斗了。

孙渡在车子被阻击后，立即令第七旅王炳章团到观音山保护。第五团到后虽与红军有所接触，但双方均无意作更大的战斗，伤亡不大，第五团占领高地遥望红军横穿公路而过。第七旅

在龙里时，由马继武的第十四团派出两个连（王绍尧的第六连和吴少明的相当于一个连的游击队）在城外警戒，曾与过路的红军彭德怀军团接触，滇军伤亡十余人，排长张学萃阵亡。过了一天以后，才知红军已向定番（今惠水）去了；过了定番又向哪里去，并不知道。滇军从此以后，一切行动都受薛岳控制，孙渡则唯命是从，使滇军在长寨、紫云、广顺地区打圈圈，不让滇军堵着红军的头。蒋介石想让红军进云南，以便他的势力有借口进入云南。此时明知红军已到北盘江附近去了，孙渡仍按薛岳的命令行事。滇军经玉母到定番、紫云，而红军已渡北盘江了。滇军回狼洞、马场取捷径渡江，赶到八十担渡江时，红军已把滇军甩在背后直向滇境前进了。滇军尾着红军到了滇黔交界的黄泥河（贵州兴义县属）才跟上红军的后卫。在黄泥河与付村之间，第二旅与红军接触，但红军是打掩护仗，随便打了一下就走了，双方没有什么伤亡。可是红军到了罗平县的羊肠驿时，即与滇军的独立第二团李崧部（原配属第二旅，但始终是单独行动）接触，激战半日，双方均有伤亡。这时昆明空虚，只有第三旅旅长龙雨苍率领该旅的第六团（新兵）守城，情况危急。所幸红军攻昆明是假，渡江北上是真。等到滇军先头部队第二旅赶到昆明，第五、第七两旅及纵队部相继赶到嵩明一带时，红军已抵金沙江畔。追滇军尾追至元谋县的白马口和禄劝县的鲁东渡时，红军已渡江几天了。红军后卫部队罗炳辉九军团则从容地入会泽县城，由巧家县的牛厂坪、树节（现属东川市）渡了江。

龙云既当上了总司令，取得了指挥薛岳之权，遂命第三纵队任江防，其余各纵队由薛岳率领继续对红军尾追前进。滇军仍归龙云掌握之后，在江边住了几月，又令各旅分驻滇、康、黔等边地。第二旅仍回昭通原防，第五旅驻贵州的盘江所属各县，旅部和第十团驻兴义、兴仁一带，第七旅驻西康的会理、西昌一带。

滇军尾追红军时，曾拾得红军的《前线》小报，上面说，主

要的劲敌滇军已由我们调动，被我们甩在背后去了，我们可以大踏步地前进。事实证明是这样，滇军这次堵击红军，确实无异是被红军调动的。

追堵红军过云南

萧 本 元

1935年春，红军进入黔境，政府龙云奉命阻击红军，以滇军3个旅组成第三纵队，派参谋长孙渡为司令。

第三纵队组成之后，安恩溥率第二旅由昭通防地出发，第五旅第九团由盘县防地出发，第五、十三、十四团由省内各防地出发，向毕节集中待命。尔后第三纵队即集结在大定、黔西县境布防。在这期间，红军进出于遵义、桐梓地区，突然间渡乌江，以一部佯攻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贵阳仅有少数警备部队，特急电第三纵队，星夜奔赴贵阳营救。安旅赶到贵阳时，红军又以一部佯向龙里、贵定移动，把安旅引向龙里，而以主力由黄泥哨（在贵阳与龙里之间）跨过公路向定方、广顺、贞丰前进，只有红军的后卫部队与孙渡的警卫营在观音山接触，红军击中孙渡的汽车，打死一个卫士，孙渡幸免。红军通过贞丰，沿着兴仁、兴义进入滇境黄泥河、羊场包与刘正富所属李崧团接触，李团被击溃。红军由大围（曲靖与宜良交界处）走马龙、寻甸、武定、元谋、慕莲由白马渡过金沙江，第三纵队到慕莲停止。

第二次红军过滇，龙云仍以第一次组成的部队阻击红军。这次第五团配属第七旅龚顺璧指挥，由昆明出发到威宁布防。龙云加派第一旅旅长刘正富，率第一团团团长袁存恩、第二团团团长布秉武，配属李崧团到宣威虎头山布防。由于红军用兵巧妙，以一部向彝良移动，而把威宁布防的第七旅诱向彝良之后，以主力突过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滇军第五旅第五团团团长。

威宁向宣威前进。这时第七旅行抵猫猫山地区，突然接到命令称，红军已突过威宁，立即向后转，另取道向宣威前进，当天下午5时左右，行抵虎头山地区，与李崧团取上联系，即在李团左翼展开与红军对战，到夜晚红军向海岱冲撤走，第七旅小有伤亡。红军转向沾益、马龙、寻甸、可郎移动，这时第七旅与红军行程只差一日。第五团由嵩明县城出发那天，行抵寻甸属七甲地区，经过两面有高山的一条箐，在行进中遇到送红军的老百姓，据说红军今早由可郎向禄劝方向去了。不料红军反而折回七八里埋伏在右侧高地。第五团先头刚接火，不久，右侧背突然响起枪声，据悉，已进入口袋了。碰巧抓着两个立足点，正当紧急的时候，第十四团及时赶到，顶住右侧背的红军，从上午10点多钟接触，直到天黑，红军开始撤退。次日查点人数，第五团阵亡七八人，轻重伤二百余人。第十四团阵亡八九十人。战斗结束后，第七旅折回嵩明，取道百邑村、撒旦向富民行动。红军由可郎行进中，在可渡河东岸与张冲部队接触。这个部队，是龙云在紧急中由昆明的后备部队调去堵击红军的。红军在罗次地区，分成两路：一路走禄丰、广通、楚雄、祥云、宾川；另一路由盐兴、牟定、姚安到宾川汇合，走鹤庆、丽江的石鼓渡过金沙江。第三纵队到达鹤庆、剑川、丽江停止。总计红军先后两次路过滇境，除虎头山、七甲、可渡河战斗以外，没有大的接触。

康南会理阻击战

吴 剑 洲

1935年春夏，我在驻防西康（现四川）会理县的川康边防军（即国民党第二十四军）第一旅第二十九团任炮兵连连长，亲身参加了阻击红军的战役，兹追忆当年实况如下：

畏惧红军由滇入康

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因在四川地方势力内战中被刘湘打败，于1933年退入地瘠民贫的西康，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沉，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璠原是川康边防军第六师师长，随部队缩编改任该军第一旅旅长，下辖四个步兵团和手枪营、工兵营各一个，驻防会理、西昌一带。

1935年3月，刘元璠奉军部指示，说进入滇东北的红军有渡金沙江入西康攻会理的企图，他自知本旅斗志脆弱，难敌红军而惊惶万状。当时川军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红军对白军的俘虏，士兵可以留用做苦役，军官一律残杀，家眷编为“慰劳队”用以慰劳有功人员。因之，刘元璠部的官兵存在很多顾虑，认为如果与红军硬拼，当了俘虏，要被杀戮和受苦；避战或败退，也要受军法制裁。真是进退两难！同时又听说，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自中央军追击红军到达贵州后，即被蒋介石撤职，部队也被蒋吞并，上层被贬，中层被斩，下层被遣。于是大

* 作者当时系四川康边防军第一旅第二十九团炮兵连连长。

家更感到惴惴不安，都在打听上级意图，究竟红军来了，是战还是退让？特别留心红军的动向。在旅部人员从马帮口中探得红军已回师贵州，将进攻贵阳时，大家才暂时松了一口气。上层人物也纷纷表示看法，说他们早就判断红军不可能渡金沙江走石达开覆灭的老路。一时乐观的情绪，弥漫军中。

金沙江边通安激战

到了4月下旬，刘元璠又奉军部命令，说红军已向金沙江挺进中，飭他迅速沿江布防。刘立即召集全旅少校以上军官开紧急会议，传达军部命令，大意是：1.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进，此刻，正与滇军在江南岸激战中，有向西康流窜的明显企图；2.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不能久支，只要我军据险阻击，待中央军到来，再转守为攻，可以夹击制胜；3.西康崇山峻岭，悬崖陡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运动，红军必蹈石达开覆灭的老路。

与会人员在会后议论纷纷，认为我军力量脆弱，编制太小（每连才120名，且多缺额），而会理幅员辽阔，纵横二三百里，江防线太长，如果被突破一点则全线崩溃，个个内心胆怯而不敢公开暴露。

刘元璠当即命令第二十八团团长毛国懋，率部位于会理东路拔沙（现宁南县）与大桥之间，沿金沙江西北岸防堵；第三十团（团长黄茂霖因犯罪被押旅部）位于会理南路姜驿、黎溪一带，由第二十九团团长胡槐堂指挥沿金沙江北岸布防；第二十九团（包括我的炮连）和旅直属手枪营（营长刘元军）与工兵营（营长陈炳森）都同旅部驻在城内，由旅长直接指挥。还有第三十一团张青苔部则驻防西昌。

当时刘元璠判断：红军主力可能由云南巧家县、会泽县渡江，绕过会理，直攻西昌。不可能走会理南面的通安渡江，因为

通安是川、滇的交通正道，国军必配备重兵堵击。但红军向来是避实就虚，兼之中央追击部队在薛岳率领下，正向正道而来。因此，刘对通安方面除令第二十九团第二营营长刘北海沿江防堵外，又委派熟悉两岸情况的地方武装江防大队长汪保卿防堵。

汪保卿系通安人，其队丁都是两岸的农民和部分船夫，他不知道红军的厉害，未加重视，奉到刘元璜叫他封锁渡口并检查行人的命令，还认为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他把两岸的渡船30多只拉到北岸，只留一只船在南岸密林崖下接洽生意，如有人要渡江，单客一位收银元一元，肩挑客商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连驮子就收两元，抬滑竿的轿夫和邮差都照收不误。

4月底5月初，听说红军要来，“逃难”民众剧增，商帮过境昼夜不停，税务所的纳税商人也增多了，客店、烟馆、茶馆都在接待客人。就在这时，红军先头侦察部队，也照样出过渡钱，由通安绞车渡混过江来了。

5月3日半夜，汪保卿的队丁大都在几个烟馆里睡觉，有的还在烧烟，忽见寄宿人群中站出几个人，手中端着长短枪支，喊了一声：“不准动！”遂把队丁的枪支夺了去，押着他们走了。几处烟馆的队丁，都同时被缴了枪。税务所的×师爷，也被红军押走了。此时，汪保卿正在家里睡觉，听说红军在烟馆里出现，立即率领几个心腹，跑到江边，只见被封的船只都载满了人，在江心划行。他回头往刘北海营（驻在离通安十几里的高地上）跑去，只走了几步，就听见刘营驻地枪声密集，只好回头往山林逃走。刘北海营与渡过江的红军激战了几小时，看见红军后续部队源源渡江，先头部队已冲上高地，乃下令本营往后撤退，到了望城坡，全营只剩残兵败将一百多人了。

刘元璜在电话上得知通安已失守，又侦察得知在绞车渡过江的是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的部队，估计该地水流急湍，只有几只渡船，大部队不可能一时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只是少数先遣部队。他乃率领第二十九团的第一、三两营、迫击炮连和旅部手枪营与

工兵营，向通安方向飞奔，想用猛烈火力压迫红军退回南岸。在中途遇到刘北海率领残兵败回，痛骂其一阵，即令一同反攻赎罪。刘元璜率部到达一把伞高地时，即与红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手枪二连与红军短兵相接，一度肉搏，连长熊联勋被刺死，排长庞云当场被俘。红军一部已冲到刘元璜身边，刘乃挥手后撤，部队争先恐后地向会理奔回。红军占领高地后，掩护其后续部队，没有再追击我们。

退守会理城

刘元璜率领残兵约400余人退回会理后，因已亲自领教过红军的战斗，认为会理绝难守住，开初准备向西昌逃跑，但又感到红军行军神速，怕被红军追歼；同时自己跑了，毛国懋团和胡槐堂团撤退不及也必被歼灭，家当丢光不说，还要受军法制裁。遂大哭起来，最后他下定决心，死守会理城待援。由于已在5月4日下午派人送走他的太太严容华、伍碧容，并各给以毒药一包，嘱咐她俩如被红军捉住，立刻服毒自杀，以免俘虏去当慰劳队。及至他下决心守城后，便又派人去追已经离城40华里的严、伍二女人转回县城。

刘元璜除派人调东、西两路的毛、胡两团兼程回会理集中守城外，同时电呈雅安第二十四军军部及西昌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表示全旅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并请求派兵增援。他还派遣部队在会理城郊将民间粮食搜运进城，作为守城部队的给养，并解释说是坚壁清野，以免资敌。

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直辖3个旅，除刘元璜旅驻防会理外，还有许剑霜旅、刘元璋旅（后来刘元璋旅亦拨归指挥），每旅两个团，原分驻宁属各县，此时已集中在西昌。刘元璋想保存实力，不愿同红军硬拚，决定只守点，不守面。为了支援刘元璜守点，立刻派聂秋涵团火速向会理开拔。同时又三心二意，在电话

上吩咐刘元瑄相机放弃会理。刘元瑄为了自身存亡和身家性命，被迫守城，接电话后，怕刘元璋对守城没有决心，又怕聂团畏缩不前，即派旅部副官徐中箴快马北上，迎接聂秋涵，²并叫徐严飭聂团在红军未到会理之前赶到，以增强守城力量。

5月8日，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会理城郊区，尚未形成包围，而聂团已到会理三元桥。刘元瑄亲自率兵两连，冲出北门，将聂团接入城内，聂本人腿部负伤。该团入城后，刚吃过饭，忽闻西北门外景庄庙埡口枪声密集。刘元瑄判断，一定是胡槐堂团归来，为红军所阻，立刻亲率聂团步兵两连和旅部手枪兵一连，前往接应。他把上衣脱光，只穿一条短裤，腰上拴着红缎裹肚（即钱囊），手提马刀，赤膊上阵，叫步兵连全上刺刀，手枪连个个子弹上膛，指挥大家一鼓气冲过景庄庙埡口，把胡团大部接进了城，就把城门关闭，堆上几层石条。对落伍和伤亡的士兵以及没有冲过埡口的后卫连（连长杨汉臣），则不予顾及了。

在聂团未到之前，曾（由刘元瑄率领）在一把伞与红军作战被俘去的手枪二连排长庞云带着十多个士兵回来了，庞头部负伤，有的士兵也包扎着绷带。各连官兵都以好奇的心情，围着他们问长问短，才知道是红军释放了他们，绷带是红军医务人员包扎的。庞云等说：“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在这以前，不知是哪里传来一副对联：

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

白军内，将、校、尉，阶级薪饷不同。

这副对联在部队中口耳相告，过去没人注意，现在大家听见庞云等一说，就引起了兴趣，于是转相传诵，很快就被刘元瑄知道。刘把这批被俘又放回来的人，都喊到旅部，竟一齐用马刀杀死。还继续清查这副对联是谁编的，又陆续残杀了十几个人。后来东追西究，追到一个道士身上，说他来历不明，竟将其师徒二人也

一齐杀掉，这徒弟是只有十一二岁的小道童。

城墙上的激烈战斗

5月8日，红军已将会理城包围，刘元塘旅除留手枪营和聂团的一营为预备队外，所有部队全部上城墙分段防守，每一垛口两个兵。因为士兵伸出头往下查看时，往往被红军击中头部，乃于夜间用松柴捆子浇满煤油，点然后用斑竹弹出城去，有的弹在树上挂起，有的弹在民房上或地面上，用以照明，守城的兵，则用城砖或铁板遮着头部，这样才减少了伤亡。我旅部、团部的人员，不断上城墙巡视，严禁士兵聚谈和耳语。

当日夜间，刘元塘为了扫清射界，派一连人出动，用煤油泼在东、西关（会理繁华的两条正街）接近城垣的民房上，再用柴草浸煤油点燃，丢在房上。这两条街全是木结构的铺房，着火就燃。老百姓哭哭啼啼，呼天号地，扶老携幼向北关乱跑，惨不忍闻。时值半夜，浓烟弥漫，火光冲天，直到第二天下午仍在蔓延。如此扫清射界后，又在城墙的每个垛口摆了装满石灰的瓦罐子若干，如红军用云梯或勾索爬上城墙时，立即投掷，使红军战士的眼睛被石灰刺伤，不能攀登。

5月9日，红军用步枪向西北角城墙垛口密射，似有用火力掩护部队强攻模样。刘元塘命各连在城墙上挖掘五尺深的土坑，用空坛子放下去，用以查听敌人在城脚挖洞口的声音和位置。果然听到了咚咚的声音，非常急促，我遂又按声音位置挖沟灌水，整天不停。由于这段土墙已经浸湿，到了10日半夜，忽然天崩地裂的轰隆一声巨响，西北角城垣倒塌下去成坡形，红军纷纷往上爬（这段守城部队是吴鸣恩连），震耳欲聋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刘元塘提着马刀，满脸是血地在阵地督战。少数红军已冲上城墙，同地主武装马云龙的便衣队及刘元塘身边的手枪兵展开肉搏，混在一块儿。由于红军的后续部队，因上湿泥

陷，无法跃进；城墙上吴鸣恩连又投下手榴弹和石灰罐子，致使红军士兵满头石灰，爬不上来，已上城的少数红军，全部被消灭。一场激烈战斗，天亮时才停下来，在缺口上下，双方阵亡大约七八十人（刘旅上报军部的呈文说红军伤亡二三百人）。

天亮后，蒋介石急派其空军第三队队长张有谷率飞机三架，在会理空中盘旋，投下联络信件，又向景庄庙高地密集扫射。刘元璜在昨夜战斗中负伤，此刻在空军掩护下，仍督饬部队拚命抢修塌下的缺口。午后，蒋介石曾乘飞机亲临会理上空视察，投下他的亲笔信，对刘元璜慰勉有加。嗣又奖励全旅官兵法币一万元，通令全国晋升刘为陆军中将。

这场激烈战斗，虽然侥幸度过，大家却在担心，要是再来两次城墙倒塌，怎么得了！第二天，街上人们竟纷纷口耳相传说什么：“昨夜城墙上很多人看见关公（关云长）全身披挂，手握关刀，坐在城墙上，身子有一丈多高。”很多人信以为真，认为昨晚的胜利，是由于有关圣人护城，所以红军冲不上城墙。于是接连几天，都有人拿着香蜡到关帝庙敬神。后来听说这是县政府传出来的，当时的会理县长是刘元璜的参谋长张肇南兼任。

事隔两天，刘元璜守城部队在空坛口上又听见红军挖城墙脚的声音，我们照样掘壕灌水。14日夜间，东关城墙又被红军爆崩。因为有前日的经验，城墙刚刚崩塌，就用手榴弹和石灰罐向红军大量投掷，还把迫击炮弹加上钢盖，不上药包，不进炮筒，用手投掷。因防堵周密，只激战1小时，红军就没有继续攻击了。

刘元璜自动加入追击红军行列

红军两度爆破城墙，没有把会理攻下，就放弃围城，只留下少数部队在城郊，以佯攻牵制刘部不敢出城，让中央红军大部队继续北上。又过了几天，薛岳才率领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各

部到达会理。李韞珩自兼第五十三师师长，该师副师长兼一五七旅旅长是周××，一五九旅旅长是李蕴山，师参谋长是周铎。他们每天和刘元璿宴饮酬酢，不断称羨刘元璿守城的功绩，得到委员长格外奖誉，晋升官阶并通令全国，认为这是颇不易得的光荣。刘元璿当即请求加入薛岳追击红军的行列，以图继续建立功绩，报效委座。他的请求当然得到蒋介石的嘉许。

红军第一军团强渡金沙江时，第九军团罗炳辉同时在巧家、会泽阻止薛岳的追击部队，用以掩护第一军团顺利渡江。这时刘元璿旅的毛国懋团正在披沙与大桥之间防守，毛预料薛岳部队渡江必然受阻，听见通安失守消息，判断会理不可能守住。所以，当毛得到刘元璿要他率部回会理的命令时，认为刘必死于敌，遂拒不从命，毅然率部由披沙退到西昌。毛国懋的避战行动虽是违令，但也符合刘元璋保存实力的意图。而德昌方面的守军，是许剑霜旅（许原名许颖，是刘伯承早在泸顺起义时的团长，因起义失败来投靠在熊克武讲武堂的同学刘元璋）。在红军攻会理时，许忽接到刘伯承的一封信，大意说：红军要北上，必需假道西康，没有争城夺地的要求，愿与贵部互不侵犯等语。许将此信专送西昌刘元璋，并主张接受信中意见。这主张本来符合刘元璋保存实力的意图，但又不便明白同意，便嘱许旅相机处理。许剑霜遂不战而放弃德昌。刘元璿同薛岳部队到了西昌，认为自己守城冒了风险，而毛、许却采取了避战的作法，非惩治不可。但毛是他的亲信，毛因是他的基本部队，不得不加以保护，满腔怒火只好在许剑霜身上发泄，想以通敌罪名把许杀掉，并吞其部队。经刘元璋极力劝阻，许才得幸免。

红军第一军团经会理过西昌北上，根本没有图西昌的打算，而刘元璋却效法会理守城的经验，先就扫清射界，把西昌城外最繁荣的西街一火而焚。殊红军竟绕过西昌，经礼州到泸沽，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在这对比之下，民众对红军遂由惧怕而产生好感。因为我是会理本地人，能够在亲朋口中知道一些官方听不到

的群众意见。

5月下旬以后，刘元瑭部到西昌，又沿着红军经过的道路，由冕宁县经拖乌开到安顺场。刘派毛国懋、胡槐堂、王级三这3个团，由毛统一指挥，再开到川康边境的崇化、绥靖、丹巴一线布防。在这一带地区，3个团除一度自相惊扰而外，没有再和中央红军接触，后又返回到汉源驻防。

1935年10月，蒋介石要在战地重新部署，先整编军队，规定给第二十四军以三个师的番号，升刘元瑭为第一三七师师长，直辖杨生武、刘元瑄两个旅；又拨来军直属邹善成一个团，统归刘元瑭指挥，在清溪（汉源县城所在地）布防，阻击南下的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次战斗后，红军占据大相岭的山腰史家坡，居高临下地把刘元瑭部围困在清溪城内，不敢出击。而且红军一部一度占领了汉源县的九襄、富林两个富庶的乡镇。后来红军又撤走，北上到天全、芦山一带。刘元瑭部不久也开往雅安驻防。

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

杨汉域 向廷瑞

两度阻击红军落空

1935年春，中央红军由贵州进入川南，蒋介石的重庆行营参谋团令调杨森速赴川南沿金沙江下游左岸阻击红军。杨森接到电令后，即以第三混成旅（杨汉域）驰向雷波，团务精练司令部（向廷瑞）驰向屏山，第六混成旅（罗润德）驰向安边、横江，限令星夜赶到。各旅于5月上旬分别到达指定位置，凭金沙江下游的江防和通往云南昭通的要道阻击红军。杨森的军部亦于5月上旬到达宜宾。当杨森正在部署江防时，红军已于5月8日在上游刘文辉部守备的正面渡过金沙江，下游防线全归无用。

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蒋介石严令川军凭大渡河天险堵击，配合中央军和滇军在大渡河右岸地区歼灭中央红军。重庆行营参谋团商得刘湘同意，以第二十一军第二师第六旅旅长王泽浚担任成都城防司令，所部星夜驰赴大渡河边的富林布防。这个旅辖3个团，人数约六千，配备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掷弹筒都比较新式。该旅5月中旬赶到富林，其河防配备，是以第十六团直接担任河岸守备，构筑阵地，并派一个连到右岸占领前进阵地，以主力第十七、十八团为机动阻击部队。

* 作者杨汉域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后任第二十军前敌总指挥；向廷瑞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军团务精练司令。

重庆行营参谋团和刘湘在派遣王泽浚旅的同时，并电调杨森全部（6个混成旅、一个团务精练司令部、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约2.4万人），兼程赶至金口河至乐山，沿大渡河左岸设防；并由杨森统一指挥王泽浚旅。大树堡上游的河防由刘文辉部负责，下游河防由杨森负责。

杨森立即电令第三混成旅迅速由雷波经沐川、犍为至大渡河左岸之金口河布防，右与上游临时拨归指挥的第二十一军王泽浚旅联接。电令团务精练司令部队由屏山经犍为至峨边所属之沙坪杨布防，右与第三混成旅连接。当各部进至犍为时，杨森亦由宜宾乘轮船抵犍为，他急令各部各派步兵一营，限一日一夜赶到指定地点。

第三混成旅到达金口河后，即向上游富林的友邻部队王泽浚旅联系。团务精练司令向廷瑞到达沙坪后，奉杨森电令加强左岸河防，并到右岸峨边县城及其附近化林坪与该县县长和彝旅头人瓦耳等联系，组织地主武装伏击红军。杨森抵乐山，除留一部兵力在乐山外，率其主力各旅移驻洪雅。

王泽浚旅在富林占领河防阵地不几天，派到对岸的前哨连，受到由越西方向前来的红军先头部队驱逐，但红军并未渡河攻击，继续向冕宁方向开去。5月25日，红军一个加强纵队，以出人意外的迅速行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天险，击溃刘文辉的防守部队，接着，沿两岸夹河向上游泸定桥挺进。这一来，杨森布置的下游防线全无用处。在这期间，杨森率部二万余，跋涉千多里，除临时指挥的王泽浚旅的一个连曾与红军一度接触外，根本没有阻击上红军。

荣经天全芦山阻击失败

红军在安顺场飞渡大渡河后，重庆行营参谋团和刘湘急电杨森派有力部队到荣经、天全、芦山防堵。杨森在洪雅即派第五

(杨汉忠)、第六(罗润德)混成旅到荣经地区堵击；第四混成旅(高德周)沿雅河到天全堵击；电令王泽浚旅经荣经到芦山堵击。

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再次粉碎刘文辉部署的桥头防守阵地，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河川堵击线。

杨森派到荣经地区堵击的第五、第六混成旅，6月初与红军右侧掩护部队小接触，第五混成旅长杨汉忠率第十三团守备荣经城，一度龟缩在城内与红军相持两日，红军完成右侧掩护任务后，于夜间主动撤去。

王泽浚旅到芦山后，以第十八团的第二、三营守备城西南河岸，团部与第一营守城。第十六、十七两团在城东北芦山岗高地构筑二线阵地。约在6月6日，杨森的第四混成旅在天全被红军击败，天全城内受了欺骗宣传的民众纷纷奔向芦山，红军化装掺杂其间。次日深夜，芦山城内周春岗高地被潜入的红军占领，枪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使王泽浚仓皇弃城退上芦山岗。红军占领城垣，掩护主力向灵关前进。第二日晨，城内居民大声高叫“红军走完了”，王泽浚才派队伍入城。向达维、懋功追击。

荣经、天全、芦山阻击失败后，杨森到雅安，其主力正逐渐在飞仙关和尧桥地区集结。

1935年6月7日，杨森在雅安接到刘湘电，飭令杨森亲率所部追击红军到达维和懋功。与此同时第四十五军(原为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也接到重庆行营参谋团和刘湘的命令，要该军速派两个旅驰赴名山附近受杨森指挥，追击红军。邓抽调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刘乃铸)、第六旅(旅长李树华)由该师副师长周世英率领从绵竹出发驰赴名山，向杨森报到。杨森奉命之初，以为距离不太远，可以一气呵成，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却形成了追击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杨森以第一、第二混成旅编成追击纵队，以第一混成旅长夏炯为纵队指挥，由飞仙关经芦山、宝兴向懋功发起攻

击，其他各旅和团务精练司令所率部队在追击纵队后梯次推进。第四十五军的两个旅集结百丈关，杨森令其沿芦山岗东侧向太平场推进。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将要在懋功会师之前，先头部队在夹金山曾发生误会，以为对方是敌军，发生战斗。红一方面军后卫部队在灵关和朱砂溪占领后卫阵地，卡住了川军追击。杨森的追击纵队，约在6月11日左右，先后攻击灵关、朱砂溪红军后卫阵地，发生激烈战斗。红军居高构筑工事扼守，川军仰攻，受地形限制，大的兵力展不开，一再被击退，伤亡颇重，陷于僵持。杨森急令太平场的第三师速派李树华旅取捷径翻越龙岗山，迂回宝兴侧背，抄袭红军，配合灵关本道方面的攻击。李树华旅当晚在太平场接受任务后，连夜作好轻装准备，于次晨出发，找了一个挖药的、一个烧碱的本地人作向导，派金团六团的岳自成营为前卫，附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各一排。其余金团的两个营和胡济民团及旅直属部队为本队，随后跟进。当时是伏天，山下天气很热，但山上雨后阴湿很冷，没有正规道路，森林茂密，不见天日。向导引部队沿挖药、烧碱走过的小路前进，在山下和山腹分开荆棘、杂草、毛竹，从老林中穿过，曲曲折折经过独木桥和陡坡，才于午后4时左右登上龙岗山脊梁，山脊上只有少数杂草，没有树木，已可望见山脚下的宝兴县城。

部队上山后休息。午餐吃干粮，水烧不开，喝冷水。山脊空气稀薄，同时臭气逼人。人员上山后，面色惨白，呼吸困难，一些人坐下休息，一会儿中了瘴气，昏闷心慌，呕吐不止，抢救无效，当即死去。各团乃严令官兵不准坐地休息，并令官兵强服金灵丹和在鼻孔搽清凉油才未继续出事。午饭后，前卫岳营下山袭击宝兴，金团全部跟进，旅部和胡团留置山脊和山腹作预备队。岳营于午后7时前后在宝兴城后一线山与红军警戒部队接触，进入战斗。岳营展开两连向红军阵地进攻，居高临下，利用机枪、迫击炮轰击红军阵地，夺得两个山头。红军退守二线

山头，曾由城内派出一部分红军增援反攻，但未能将岳营击退。红军即扼守二线山头阵地顽强地阻击进攻的川军，双方互有伤亡。岳营伤亡官兵50余人。战至黄昏，双方停止进攻。是夜，红军在灵关、朱砂溪本道作战的部队，放弃灵关和朱砂溪阵地，漏夜撤过宝兴，向硃磧方向引退。宝兴城后一线山与岳营对峙的红军，亦于黎明前撤走。岳营约在次日7时前后，下山占领宝兴县城，并向硃磧方向派出警戒。午前9时许，第二十军追击部队才到达宝兴。

第二阶段：约在7月16日，杨森由宝兴再度发起追击，分两个纵队：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到峨眉训练团受训，由第七团团长刘锡涵代理）、第四混成旅为右纵队，以第四混成旅长高德周为纵队指挥，经盐井坪向达维追击前进；第二混成旅及团务精练司令所率部队为左纵队，以第二混成旅长李朝信为纵队指挥，经木壳壳向懋功追击前进。两个纵队于7月19、20两日，先后到达达维、懋功附近。这时，达维已无红军，第四混成旅留驻达维；第三混成旅亦循官寨到懋功地区。杨森跟着到达维、懋功巡视，杨认为他所辖部队原定追击目标已完成，请求接替追击任务。1935年7月下旬，李树华旅长奉命率金晓六团，陈师（鼎勋）谭尚修团，杨师（秀春）瞿联丞团等三个团，由太平场经宝兴、达维前往抚边接替第二十军追击红军。李树华旅于8月4日在抚边接替追击任务后，即以金晓六团为前卫，谭、瞿两团为本队，同红军保持一定距离，在后面尾追，以不失踪迹为原则。沿途并无激战，只在抚边前方的两河口桥头与红军后卫部队打了三四小时，曾用机炮居高轰击。红军稍加阻击后即向大板昭撤走，李旅即占领了两河口。李旅在两河口防守，先后约月余，只遭两次红军小部队夜袭，都在黎明前撤走，并无激战。至9月中旬，又奉命把追击任务交还第二十军团务精练司令向廷瑞接替。李旅即由两河口翻虹桥山经芦杆桥、灌县撤回崇庆县整训。

规复懋、抚、绥、崇

当杨森由懋功回宝兴途中，行至盐井坪，接重庆行营参谋团贺国光在成都来的电话，传达蒋介石命令，要杨森规复懋（功）、抚（边）、绥（靖）、崇（化）四屯地区，以利“堵剿”。于是杨森电令第二混成旅长李朝信，略谓：“委座旨意，以懋、抚、绥、崇全归我军负责，入懋四部由李旅长统一指挥，首先规复抚边，打开进路。”适值第四十五军杨秀春（前为周世英）指挥之李树华旅来到达维，李朝信到了懋功。李朝信商得李树华同意，李树华旅由毕思沟向抚边前进，为右纵队；李朝信率第二混成旅主力和团务精练司令所率的曾彦臣团经凉水井、八脚、木坡向抚边前进，为左纵队。两纵队于8月3日分进合击，会攻抚边的红军。结果，只有左纵队与红军发生一度战斗，红军即向两河口撤退。8月4日复由李树华旅接替追击任务，跟追至两河口。红军退大板昭。9月中旬，邓部李树华旅调离山区，杨部团务精练司令之陈亮团推进至两河口。至此，抚边至两河口的“堵剿”全由团务精练司令部负责。

杨森电令李朝信以第四混成旅进占卓克基，团务精练司令所率部队进占绥靖、崇化。团务精练司令向廷瑞接电后，当即向杨森提出按当前形势断不能推进，只有调整配备，暂维现状，待机进取的建议，其大要如下：

1. 两河口当面的大板昭有红军，以北的地形是虹桥山向西绵亘的梦笔山脉，而卓克基是该山脉以北的大乡镇，红军不会轻易放弃。第四混成旅前进首先会被阻于大板昭，即使冲破大板昭红军阵地越过梦笔山，进到卓克基，倘红军由虹桥向西遮断梦笔山，第四混成旅将有被包围的可能。

2. 绥靖，在梦笔山、卓克基的西北，第四混成旅既不能进占卓克基，团务精练司令部更无由进至绥靖，而崇化隔离在长梁

子山脉以西，徒使兵力分散。

3. 就现驻位置调整兵力配备：团务精练司令两个团集中两河口；第二混成旅驻懋功，第三混成旅主力驻抚边，一部驻懋功，第四混成旅驻达维，派一个团驻抚边小金川东岸的火药坪，保证交通联络，首在巩固力量，再行相机进取。

杨森全盘接受向廷瑞的建议，所谓“规复”也就告吹。

（杨续云、奉伯常整理）

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

张伯言 杨学端 张怀猷

一 刘文辉部的兵力和部署

1935年5月，盘旋在黔滇的中央红军突然向金沙江挺进，蒋介石急电刘文辉布防堵截。第二十四军兵力部署，分为两道防御线，以金沙江为第一道防御线；大渡河为第二道防御线。

(一)以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指挥刘元塘旅(4个团)、刘元琮旅(2个团)、许剑霜旅(2个团)、邓秀廷旅(1个团)以及新由汉源调到西昌的刘元璋旅(2个团)和一些直属部队，共有兵力12个团以上，并发动地方势力，扼守金沙江，确保西昌地区防务。

(二)以新编第五师师长陈光藻(鸿文)指挥袁国瑞旅(3个团)，并发动大渡河沿河地方势力，确保大渡河河防。

(三)以驻在康定的余松琳旅之一部，由余松琳率领进驻瓦斯沟(泸定与康定间)，封锁大渡河的最上游。

(四)军部率同警卫旅和一些直属部队位于雅安，统一指挥军事行动，相机策应。

刘元璋在西昌、会理间的兵力部署是：

(一)改任刘元塘为川康边防副司令兼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率兵3个团(留第三十一团团张青岩驻西昌)位于会理。

* 作者张伯言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学端系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张怀猷系第二十四军第五旅参谋长。

并指挥地方团队负责金沙江防守任务。

(二) 改任许剑霜为川康边防第十六旅旅长，率兵一团又一个营位于德昌，负责西昌、会理正道上阻截红军。

(三) 刘元璋本人率领川康第十七旅(旅长刘元璋)和新由汉源开来的第十三旅(旅长刘元璋)以及刘元璋旅的张青岩团和一些零星部队位于西昌，作为后方主力部队，相机行动。

(四) 为了预防红军不走西(昌)会(理)正道，改由西面的盐源或东面的宁南前来，又在这两个地方摆了一些牵制部队，以许剑霜旅的一个营位于盐源，以彝务指挥官邓秀廷部队(正规军一个团及彝兵五千)位于宁南。

刘元璋不把重兵布于金沙江沿岸，而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并且前轻后重，目的在于分段迟滞红军，保存实力。他认为金沙江江岸线过长，不易防守，一处突破，全线崩溃，守江不如守城稳当。同时薛岳部队在红军后面紧追，只要守城能守住几天，追兵一到，红军自然离去。

二 会理守城战

1935年春，刘元璋奉令担任金沙江防务。当时刘元璋对红军的判断和兵力部署是：(一)红军主力可能由云南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遂决计把第二十八团毛国懋全团摆在会理东路，与宁南的部队配合，形成兵力重点。(二)红军可能以一部兵力由姜驿方面直攻会理，因此把第三十团摆在会理西路的姜驿、黎溪一带，并发动当地沙家、自家土司力量，协同防堵。当时第三十团团团长黄懋林因“办彝务不力”，押在会理，由第二十九团团团长胡怀堂前往指挥，团部住在姜驿。(三)对通安方面，刘元璋认为通安系通云南会理正道，估计红军不会从这方面来，乃将该地防务，交江防大队长汪保卿弟兄负责(汪等系地方武装，势力不小)。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并派第二十九团的刘北海营前往协

助，由旅部中校参谋汪保澄（汪保卿之弟）统一指挥。（四）旅部驻在会理，以第二十九团（缺一个营）及特务营（四个手枪连，营长刘元军）、工兵营（工兵两个连，营长陈炳森）为预备队。

红军主力经云南元谋，于5月4日在皎平渡渡江，随即直趋通安，完全出于刘元璿的预计之外。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刘北海营和红军对抗，伤亡过半，退到通安后方据险抵抗。刘元璿闻讯，即率会理所有部队向通安驰援，在通安北面一把伞附近与红军遭遇，激战了几个钟头，部队崩溃下来，残部逃回会理的大约只剩四百人。其时刘元璿急得大哭，准备逃跑，但又想到红军已经跟追前来，跑不了，把部队丢得一干二净，以后更不好办，不如收拾部队，守城待援。因此又将已经出城逃走十余里的老婆追回来，并作出如下决定：（一）立电西昌刘元璋告急，请速派兵增援；（二）分头飞调城外所有部队赶回会理集中，坚决守城；（三）收集城外民间粮食运进城内；（四）清扫射界。

红军在通安击败刘元璿后，暂未前进。刘元璿把由通安退下来的部队和城内的一些留守人员编为战斗部队，在城东的东山寺和城西南的西来寺等高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守。隔三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理外围，双方再度接触。红军陆续到达，城外防守部队不支，全部撤回城内。5月8日，红军便将会理围住。

刘元璋得到刘元璿告急电后，立派刘元琮旅的聂秋涵团驰援，但又在电话上主张放弃会理。刘元璿怕聂秋涵中途折回，派中校副官徐仲箴持刘元璿命令前往督促聂团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定以军法从事。徐仲箴到白果湾，正遇聂团准备返回西昌，乃告以刘元璿之命。聂踌躇良久，怕刘元璿将来问罪，才率部来会理。聂团到会理时，红军已逐渐包围会理，刘元璿胁迫士兵出城，始将聂团接进城内，聂膝部受伤。聂团进城仅半日，忽闻西门外万庄庙埡口至西来寺一线枪声很密，刘元璿判断是胡怀堂率部归来为红军所阻，乃胁迫聂团的两个连和手枪连上阵，将

胡团接进城内，但胡团后卫部队杨汉城连已被红军打掉。

第二天早晨杨汉城只身在城下喊城，刘元璿不准开城，杨藏在城外，直到红军离会理后才得进城。

当红军围城前两日，通安方面逃散的刘部士兵有陆续回到会理的，内中有特务营第二连排长庞云及士兵十余人为红军所俘，红军给他们在伤口处上好药，并给以路费遣回。他们在士兵中宣传红军很好，并不杀人。刘元璿竟将庞云及被俘过的士兵和逃散回队的士兵三四十人一律杀掉。还有一个道士，带一个小徒弟，随败兵入城，也被刘用马刀砍死。

聂、胡两团进城后即和原有部队，分担守城防务。刘元璿为了防止红军接近城垣，下令以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居民房上，把城外民房挨次烧光。夜间还将民房烧起来帮助照明，烧死妇孺甚多。为了防止红军用云梯攻城，沿着城墙雉堞，一路安设照明灯，灯光火光照亮了半边天。为了给自己壮胆，城墙上成千成百的士兵，日夜呼啸呐喊。为了防止兵变，刘元璿曾作士兵打扮，混迹在士兵行列中，巡视守城防务，遇有私议者，立刻引下城墙，予以杀害。

红军在攻城时，曾几度用爆破作业，进行强攻。聂秋涵向刘元璿建议，每连在城墙下掘土五尺，用空坛子放下去听取声音，果然在西北城角听出挖土声音。他们除派工兵挖沟灌水，浸湿土壤使红军爆破困难外，还集中兵力在西北角上防堵。

5月10日晚，忽闻爆炸巨响，西北城角坍塌下去。刘元璿督率部队向缺口堵击。这次战斗十分激烈，到了拂晓，才渐渐平息下去。在激战中，双方都有伤亡。天明后，蒋介石的空军第三队长张有谷率一队飞机来掩护抢修城墙，并扫射附城的民房，认为是红军的驻营地。

14日晚，东关城墙又为红军爆破一次，但由于守城部队早有发觉，灌了不少的水，爆破裂痕不大，激战的时间也没有上次那样长。

在第一次会理城西北角爆炸时，刘元璿在混战中面部受伤。

蒋介石曾飞到会理城上空巡视，并投下手令，晋升刘元瑄为陆军中将，同时投下钞票一万元，作为犒赏。会理城的攻守战经过了7天7夜，红军于5月16日撤围他去。在这7天中，被刘元瑄烧毁的民房，惨杀的士兵为数不少。刘元瑄本人因为加官晋爵，趾高气扬，又尽率所部，加入了薛岳追军行列，出力卖命。

三 德昌撤退

德昌原驻有许剑霜旅一个营。刘元璋初意不守德昌，以免分散兵力，后来又考虑到德昌比较富庶，对当地最有势力的封建大族张家也不便丢着不管，因此派旅长许剑霜带兵一个团前往加强防守力量。

红军到会理外围后，刘伯承派人送了一封信给许剑霜，希望不要阻击红军北上抗日。许得信后，将原信转送西昌交刘元璋，主张接受刘伯承意见。刘元璋接信后未予答复。红军于17日到德昌，许旅和红军刚一接触即撤退下来，退回西昌。刘元璋久有兼并许旅部队之意，想乘机杀许，拍桌大骂许剑霜“通敌”。但刘元璋素来感觉刘元瑄、刘元琮兄弟很难驾驭，许剑霜和自己又是四川讲武堂同学，要听指挥些，如果把许剑霜杀了，刘元璋把这两团部队一并吃掉，以后他对部队会完全失去掌握。因此，刘元璋不同意杀许，也不同意撤掉许的职务，驳斥刘元琮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后来刘元瑄由会理到了西昌，也想吃掉许剑霜的部队，再主张杀许，仍由于他们三弟兄的内在矛盾没有杀成。直到红四方面军二次南下时，刘元琮、许剑霜同在玉通河一带战败，刘元琮结果仍把许剑霜这一旅部队吃掉。

四 彝族部队的行动

彝务指挥官邓秀廷部，系西（昌）、冕（宁）地区土著部队，

是当地实力雄厚的地主武装。邓有正规部队两团，并能调集浅山彝兵近万人。邓本人熟悉彝情，常用“以彝制彝”策略，控制西昌地区各县彝族。邓奉到防守宁南任务后，即率其正规部队一个团（当时他有一个团驻在康定）及彝兵五千前往。他们行抵鱼水（宁南境内一个场镇，距西昌一百余里），即闻悉前方第二十四军部队已经溃退下来。刘元璋旅的第二十八团，由团长毛国懋率领驻在会东，担负控制巧家红军来路。当毛国懋听说红军已在上游通安前面渡江，即丢掉防守地面，拚命向西昌方面逃跑，刘元璋调他进会理城的命令他也不管。毛团过宁南县城到鱼水与邓秀廷部碰头时，仍是惊慌万状，连警戒都不敢派出去。当时刘元璋派有一个联络参谋驻在邓部，主张不准毛团拉跑。但邓见毛已成惊弓之鸟，怕影响自己部队，仍让他过去。

刘元璋推测红军将由西昌、会理正道北上，于5月13日急调邓秀廷部转移到西昌、会理道上，叫他相机增援德昌。邓部到达黄水塘时，德昌已被红军占领。刘伯承派人送给邓秀廷一函，大意说红军系北上抗日，彝兵打枪，他们不还枪，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自己考虑。邓在打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怕打不过；不打，又怕不见谅于刘氏弟兄。他召集部队军官开会，决计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最好是能乘机拣到一点枪弹。邓随即把彝兵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告诉大家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邓把部队摆在两边山上，眼看红军部队来往很密，不敢动。有一个彝兵，不听约束，打了一枪，引起别的彝兵也开枪，先后打了十几枪。邓用彝话制止住。红军未还击，只说“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飞机到来，彝兵想打一架下来看，连续又打了十几枪。因联络布忘记放在哪个马驮上，布标摆不出来，飞机遂向下投弹，炸死了邓部连长邓华钦和汉彝士兵儿十人。邓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转移到冕宁地区。

五 火烧西昌

西昌城的防务，是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刘元璋的部署是：第一步在西昌城外围“土城”做工事，凭工事据守；第二步退到安宁河做工事，凭河据守；第三步拆西昌城外西街（西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靠拢城墙下边，由西昌城南门外约一里多长）的房子，打通墙壁作掩体，但又怕红军轰城，准备烧掉这些房子。然而刘元璋究竟还有顾虑，怕引起民愤。刘元琮则主张非先烧不可，认为如不烧，红军利用民房，接近城墙，攻下西昌，自己性命都保不住了。刘元璋主张等红军接近时再烧，以便向外宣传说红军“杀人放火”。先烧后烧的问题，争执不决，乃电雅安军部请示。军部答应待红军接近时，再作考虑。刘元璋想了一个既达到烧毁民房的目的，又不致充当祸首的办法。他召集地方士绅开会，力言红军如何凶猛，要守住西昌，非亮城不可，要亮城，则人民损失很大。他问大家意见如何。可是，他又暗中主使商会会长何汉湘出面，向他上一书面请求，主张烧掉西街房屋。当红军先头部队刚到崩土坎（距西昌30里）时，刘元琮即下令放火。这时城门已用石条子封闭，即从城墙上向西街房泼下煤油，放火烧毁。他还由北门城墙上用绳索吊了一些士兵出城去，把接连西街蜿蜒到西北角的鱼市街一并烧掉。这两条街共约三里长，西昌精华顷刻付之一炬。当大火烧起来时，这两条街的人民，有的在城内有家（开“吊足铺子”的），有的要求入城暂住，都一律不许进城，弄得两街老百姓露宿城外，无家可归，惨痛到了极点。

最后，经会理过西昌北上的红军，根本没有到西昌城下，仅向西昌方面，派出了一点行军警戒部队，大队则由西昌西南角的马道子（距西昌15里）分路，越过西昌城取捷径直插西昌以北的小庙（距西昌15里），过礼州去泸沽。红军的一兵一卒都不到西昌城下，使得刘元璋、刘元琮十分尴尬。他们最初胆战心惊地怕红

军来攻，现在又深恨红军不来攻城，自己烧了那样多民房，弄得没法交待。后来薛岳到了西昌，人民沉痛控诉刘元璋。刘元璋把商会申请书拿出来搪塞过去了。

红军越过西昌北上后，刘元璋奉命担任第七纵队副司令，除留聂秋涵一团担任留守外，其余部队一并编入“追剿”军战斗序列，尾随红军北上，进到康定玉通河始行停止。

六 大渡河防堵失败

大渡河系长江的一道支流，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仅沿河有一条羊肠小道。河幅有些地方宽达一千多公尺，水深7—10公尺，水流湍急，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水，任何人不能泅渡，失足落水即有灭顶之祸。沿河渡口只有小木船（可容10人左右）作为来往行人横渡之用。由于流速太大，船横渡时不能直达对岸，必须先把船上划一二里再行放船，船工拚命划动船桨在波澜上闯击十多分钟，才能以斜线冲到对岸目的地。泸定铁索桥系在两岸悬崖绝壁间，凭空架设很长的铁索七八根，上面稀稀落落地铺设了一些木板，来往行人即在上面晃荡晃荡地走过去，这是大渡河的唯一交通枢纽。红军千军万马要在前有敌人、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安全渡过大渡河，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大渡河构成了红军长征中比较有名的两次战斗：十七勇士渡河和抢渡天险泸定铁索桥。

当红军渡过金沙江，直指刘文辉的第二道防线——大渡河时，刘文辉乃以第四、第五两旅，组成第五师，开赴大渡河布防。其中，第五旅在左，守富林至安顺场一带；第四旅在右，守泸定桥附近。原驻康定的余旅，由旅长余松琳率其一部分兵力，进驻瓦斯沟。军部和新成立的第五师师部，都先后进驻汉源城。惟第五旅系扼守大渡河上宁雅正道，出发在先，当时第五师师部尚未组织，因之第五旅始终和军部直接联系，不知第五师师部成立。下

面将战斗经过分作两个段落来叙述。

七 安顺场的溃退

1935年5月13日，第五旅旅长杨学瑞率领全旅部队(3个团)由荣经出发，经汉源到富林(当时汉源是县，富林是镇，都是通越西的要道)，随即部署防务，兵力分布如次：

(一)第七团团团长余味儒率领全团布防于安顺场(大渡河南岸的一个场镇，通冕宁要道)的北岸至大冲(距富林40华里)之间。团部位于安庆坝(一说：安靖坝)，并指定韩槐塔营担任最右翼(即安顺场对岸)防务。韩槐塔系四川名山百丈场哥老会首领，他这营是袍哥队伍。韩曾在安顺场流浪多年，酷好赌博，与当地豪绅恶霸混得最熟。团部将韩营布置在最右翼，是想借他这点关系，把当地地主武装组织起来，填补右翼空隙，与第四旅取上联系(第四、五两旅间，约有200余里空隙)。

(二)第二十八团(唐灼元团)的一个营接第七团左翼，布防于大冲至富林间。

以上四个营为守河固定部队。

(三)第二十一团团团长肖绍成率领全团，经汉源场(富林以北20华里)翻王岗坪高地，下到大渡河边挖角坝(安顺场上游)，游弋于第七团与第四旅间，作为机动部队。

(四)第二十八团(缺一营)及旅部特务连为预备队，随旅部驻富林，尔后进驻安庆坝。

当时大渡河沿岸有两大恶势力，为首的为富林的屯殖司令(空头衔)羊仁安，一为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羊仁安的势力范围在安顺场下游至富林一带，赖执中的势力范围是从安顺场起至上游河道七场，他们在这些地方，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根基，拚命和第五旅合作，把他们所能发动的力量都组织起来，办差办粮，安设哨所。大渡河每年雨

季冲刷出不少香杉（沉埋在地下千百年的杉木，经水土浸蚀变成坚硬木质，永不腐朽，为做棺木的上等材料，称为“建板”，价格很贵）；只有他两人才能享有，不管这些东西在谁的区域里发现，当地的居民均必须报缴他们，并且在未运走前，还有看守责任，损失要赔。当第五旅部队到达河防时，羊仁安天天大开筵席，招待过往军官，总是以石达开覆亡故事来鼓励军心。

5月21日，刘湘所属部队王泽浚旅到达富林。王泽浚系四川军阀王缙绪的儿子，跋扈专横，常以马鞭抽打部属，就是团长亦在所不免。王旅辖3个团，兵员武器都比第五旅部队充足。在商议分担河防任务时，王只肯承担大冲至富林一段（40华里），并允以少数部队游弋于富林下游。第五旅鉴于王泽浚旅是临时拨给第二十四军指挥的，乃是客军，又考虑到富林处于宁雅正道上，红军主力从这方面来的可能性较大，因之把这个地方作为重点来布防，同意让他担任这短短的一段。这旅部队在富林只驻了几天，当红军突破安顺场方面河防夹江而上后，即由富林向大渡河下游经金口河开去。

5月23日，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把富林防务交给王泽浚旅后，即率领旅部和预备队进至大冲，24日中午抵八排（距富林约80华里）。八排这个地方，系羊仁安老家所在。羊仁安所属美罗场（八排北面一个场镇）山防大队长裴敬一等亦到来，共同商议地方势力如何配合问题。这时，八排对岸纳耳坝场镇被杨学渊部队纵火焚烧，一时火光四起，哭声震天，惨不忍闻。因为部队进入河防时，蒋介石曾三令五申，为了确保河防，困厄红军，要求做到下面几点：（一）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二）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三）扫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毁。

正当纳耳坝火光炽烈的时候，右翼余团传来飞报，说红军已于早饭后渡河。该团官兵随即沿河岸羊肠小道三三两两向下游逃窜，有的气喘吁吁，折臂跛腿；有的歪戴帽、横挂枪、骂声不

绝，一概不听制止。

原来右翼韩槐塔营在安顺场对岸布防时，赖执中的地方部队应由安顺场向北岸撤退，但他不愿在红军未达到前即弃家园逃走。他认为红军来路有两条：一条是西越路线（由西昌经越西到富林，这是宁雅正道）；另一条是西冕路线（由西昌经冕宁到安顺场）。他认为万一红军走宁雅正道而不到安顺场，岂不是庸人自扰，白受损失。因而他商于韩槐塔营，允其率部留在安顺场，并留下木船两只，待红军快到时他才过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于断绝。赖还对韩说，他在安顺场通冕宁道上，已配备有十余哨所，红军远来路径不熟，只要远远发现红军，哨兵会由捷径向他飞报，他慢慢收拾过河都不会误事。殊不知红军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从战后拾得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来看，沿途大小路径里程多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注解得非常准确，好像未来以前，即派有人实地勘察过一样。同时红军一到，即得到汉、彝人民热情支援，担任向导，尤其是反动统治者一贯认为“不可理喻”的彝人，都能和红军打成一片，更是韩、赖等预料所不及。因之红军先头部队完全越过赖执中所安设的哨所，神不知鬼不觉地于5月25日拂晓进入了安顺场。赖执中此时还高卧未起，直到红军把他的公馆——也是他的营部门口的卫兵缴械，赖才由梦中惊醒翻墙逃走。他翻墙时把脚跌伤，由其卫士把他背往彝区隐匿起来。此时北岸韩营还不知道对岸情况。直到早饭后，红军找到了船工，才以机枪火力压制北岸韩营守兵，由十七勇士乘这两只船过河。韩营守在北岸阵地内的官兵，被红军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没有阻击能力，只好退却。大渡河北岸全是横断山脉，沿岸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右翼韩营一溃，全线动摇，国民党军部署的大渡河防一下就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根据当地地形和整个混乱局面，只得找一条比较险峻与河道成直角的横断山脉，另行布置防线。因此，杨同美罗场山防大队长裴敬一商量，决定溯流前进几里，由连坡湾

上野猪岗山顶，据险以守。该部到达连坡湾时已入暮，第七团团团长余味儒亦到来。这时余团官兵不断溃逃，谁也不敢出去制止。连尚未参加战斗的预备队中的营长董文权也丢掉部队，伙同余因溃兵向下游逃走。杨旅认为情况万分紧急，只有登上野猪岗山顶之一途，当由本地人陈俊安（裴敬一的中队长）领路上山，从傍晚一直走到天明（26日），才到达野猪岗山顶（小地名三梭窝）摆开阵势。这时红军到达对山山顶，相互射击。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部队由山下向野猪岗山顶仰攻。唐灼元团机枪连有一机枪手，用机枪俯射山下红军，但被对山红军一枪击倒。这时第五旅部队因枪枝射程有限，无法对付对山红军火力，只有向山下仰攻的红军射击。这时左侧临河边余团的余笑凡连不支，向山腰撤退；右侧高地唐团席营之一连，亦被红军压迫后撤，整个阵线动摇，旅部急忙下令向美罗场方向撤退。

第五旅败兵到达美罗场时，天已入暮，整天没有吃饭，官兵疲乏不堪，倒地即酣睡不起，无法布防。但红军在占领野猪岗后，已达到掩护主力部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的目的，因之全线停止前进。

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的部队，于5月21日由汉源场出发，翻上王岗坪高地，24日到达河边挖角坝部署防务。随即在每连抽出兵力一班，组成搬运粮食小组，到南岸搜索民间粮食，搬运过河。26日，红军猝然来到，以猛烈火力侧面袭击，肖团部队全部溃散，肖绍成随即在王岗坪山上收拾残破部队向荣经方向退去。过河运粮的一百多名官兵，也就没有回到北岸。

第五旅由野猪岗撤下的部队，于26日早晨在美罗场至和尚老之线（与野猪岗平行）部署防务。旅部位于宰羊溪。临时指挥所设在和尚老高地一小庙内，一直停了5天，不见红军来攻；地方人民亦断绝往来，前方消息完全阻绝。杨学端派兵试探，未见红军动静，次日始敢全线推进；第三天渡河至安顺场，才知道红军已在两日前过完。原来红军到达安顺场后，只以一小部兵力过河，

大部兵力在南岸夹江而上向泸定去讫。

这里要补叙一点，红军越过西昌县城北上，到了西昌县以北120华里的泸沽时，以主力部队经冕宁向安顺场前进，另以一小部兵力（估计约一连）向右手分道，经越西向富林前进。当时越西通富林道上，没有第二十四军正规部队。越西县县长彭灿（原系第二十四军参谋处长）、秘书胡梦弼，急率县府自卫队一个连偕同家属，向富林方向逃窜。他们行至海棠乡附近一个么店子上，彭鸦片烟瘾发作，休息吸烟。红军先头便衣队到达，将彭捕获，自卫队逃散。红军把彭带到晒经关（临大渡河边20华里）将彭镇压。大渡河南岸大树堡场上恶势力张金波，在红军未到达前，纠集了汉彝武力约200人，驻守在大树堡场上，红军到时，即退至山上彝人区域。红军到达大渡河边与富林守军王泽浚部队隔河相望，当地河面甚宽，又无渡船，没有发生战斗。

八 泸定桥边受重创

第四旅由雅安出发时，第二十四军军部的指示是：（一）固守泸定铁索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二）其余部队在泸定县城附近择要防守，必须严密控制泸定通汉源和泸定通天全两条要道，确保雅（安）属地区安全；（三）与左翼（安顺场下游）的杨学端切取联系，以免中间形成空隙。

第四旅到达前线后，根据第二十四军军部指示和当地情况，其兵力部署如次：

（一）以第三十八团（缺一营，这一营系肖守哲营，驻在芦山未来）由团长李全山率领为第一线右翼部队，兵力重点摆在泸定铁索桥；

（二）以第十一团（三个营）由团长杨开诚率领为第一线左翼部队，位于海子山、冷碛一带；

（三）以第十团（缺一营，这一营由营长黄朝吉率领担任后

方运输)由团长谢洪康率领,位于飞越岭,作为总预备队,

(四)旅部位于龙八步(飞越岭山下)。

第四旅到达龙八步附近时(大约是5月27日),知道安顺场早被红军突破,第五旅的肖绍成团已经溃退下来,自己的左翼和后方联络线都受到威胁,这时的任务是要阻止夹江而上的两路红军,遂决心仍按原定部署:以李全山团抢占泸定铁索桥,阻止对岸红军主力过河;以杨开诚团向下游摆开阵势阻止在安顺场过河后沿岸溯流而上的一部分红军。

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于5月28日派周桂三营跑步由冷碛进驻泸定桥。周营于午后7时出发,当即派兵一个连(连长饶杰,云南人,这连部队原系滇军)为先遣队。饶连选出身体健壮的士兵约一个排(二十多人)把全团连以上旗帜一并带上,跑步到泸定桥,傍晚到达,将旗帜插遍全城,以安人心,立即扼守泸定铁索桥的两端,并动手拆除桥板,构筑工事。但由于天雨,又是晚间,士兵疲劳不堪,有的鸦片烟瘾发作,拆除桥板进度极为缓慢。营长周桂三率领其余部队(内有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在泥泞道路上沿河北上。时已入夜,对岸也有部队打着火把急进,互相询问,对方答系退下来的友军(实为红军)。周营到达泸定桥时已二更,立即派兵参加拆除桥板、构筑工事。天明前,团长李全山率领李昭营到达。周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昭营接周营左翼进入阵地,并以机炮连一连位于桥头高地归周桂三指挥。李全山团部亦位于周营附近。29日天明后,对岸桥头已发现红军,因之拆除桥板工作未能彻底进行。双方开始射击,打了一天,互有伤亡。李团伤亡约五十人。红军时向守桥的饶连士兵喊话。晚饭后,枪声渐密,这时红军已大部到达。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同时说明泸定桥很难防守。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因而答复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袁国瑞随将电话机放下。这时从电话里可闻枪炮声,听到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遂告

中断。其时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饶连伤亡很大，李全山惊惶失措。大家认为既然龙八步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江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决定由周桂三营断后，李全山率领其余两营取捷径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周桂三决定饶连的虎班长带一班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饶连断后并放火烧桥。这时红军已开始夺桥，周桂三仓皇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饶连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为了掩护周营撤退，仍作顽强抵抗，经红军展开扫荡战，饶连伤亡更大，周营只剩下十儿人。

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率部到达河岸后，为了阻截已过河的红军继续向上游前进，把部队同大渡河摆成直角向下游防守。由于地形限制，只好把部队重叠摆开，占领阵地。曾子佩营位于海子山前面高地，吴岗陵营位于海子山及冷碛两地，余一个营作预备队。红军进攻杨开诚团，和对岸红军主力攻泸定桥的时间大致相同。红军先和曾子佩营激战由晨至午，曾营伤亡甚重，溃退下来，由海子山下面小道绕过吴营阵地退却。吴营及作预备队的一个营又接应上去，在海子山激战，伤亡仍大，双方兵力陷于胶着状态。吴营撤退不下来，营长吴岗陵急派营附黄振到龙八步向袁旅求援。袁国瑞加派手枪连上去，才把吴营收容下来。时已午后四五点钟，红军跟踪追击。杨团残部急通过飞越岭谢洪康团阵地，向汉源方向退却。旅部退进汉源城内，杨团残部在飞越岭后山进行整顿。

傍晚红军到达飞越岭谢洪康团阵地后，又进行猛烈攻击，先占领谢洪康团前哨一个据点。谢洪康见红军攻势猛烈，自己用手枪把左臂打了一枪，扮作伤员，用担架抬下，未经汉源城，由城外直向雅安方向逃走。袁国瑞急命新山河边退下来的杨团稍加整顿，又向飞越岭增援上去，两团部队概归杨开诚指挥。又激战一夜，谢团所属第一营营长陈子春负伤，连长孙治文等几人被击毙。次日天明开始肉搏，袁国瑞见兵员伤亡过半，阵线再也稳不

住，下令向汉源城撤退。红军翻过飞越岭追到泥头，即停止前进。以后红军即占领飞越岭，掩护主力部队由泸定桥向天全方向前进。

第二十四军军部这时回到雅安，把原驻宁雅两属部队，按国民党中央规定的番号整编为3个师：第一三六师师长陈光藻，旅长杨学端、袁国瑞；第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璿，旅长刘元瑄、杨生武；第一三八师师长唐英（永晖），旅长张伯言、刘元琮。每师两旅，每旅两团。

防守大渡河实况

杨学端

1933年，二刘之战（刘文辉与刘湘为争夺四川统治权而引起的大战），以刘文辉的失败而告结束。我随同刘文辉退到川南雅属地区，这时刘文辉残余部队约4个师，2万多人，分驻西昌、雅安、康定三地，苟延喘息。其分布情况如次：

西昌地区（所谓宁属）：刘文辉之侄刘元璋，以边防总司令名义，统率刘元璋、刘元璿两个师驻守，番号为第六师、第七师，刘元璿驻会理，刘元璋驻西昌、越西等地。

雅安地区（所谓雅属）：刘文辉以川康边防总指挥兼第二十四军军长统率直属3个旅驻守。其中，第四旅（旅长袁国瑞）驻雅安、芦山两县；第五旅（旅长杨学端）驻荥经、天全、雅安三地；第十三旅（旅长刘元璋）驻汉源。

康定地区（康属）：唐英以屯殖司令名义，统率邓蟠村旅和地方部队驻守。

这些部队大多数经过二刘（刘文辉、刘湘）大战，除刘元璋师和邓蟠村旅未参战比较完整外，刘元璿师、袁国瑞旅、杨学端旅、刘元璋旅都装备不齐，人员缺少。又加以雅、康两地，地瘠民贫，物产不丰，供应困难，军民之间矛盾重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突围，全军北上抗日。消息传来，已使我们胆战心惊。刘文辉的驻京代表又来电警告，必须作好抵抗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四军直属第五旅旅长。

准备。大势判明，红军北上抗日，可能经过川康地区，我们便首当其冲，如不抵抗，将被蒋介石消灭；如果抵抗，则以卵击石，会被红军消灭。1935年一开始，刘文辉和将领们彷徨无主，日夜忧虑。刘文辉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说：“共产党找上我这穷光蛋来了。拼也完，不拼也完，走着瞧吧！”可以想见他当时的焦急情态。

1935年3月前后，红军越过湘黔边境，向西挺进。刘元璿、刘元璋不断向其叔（文辉）呼吁求援。刘文辉立即命令驻汉源的刘元璿旅开赴西昌，协助刘元璋防堵红军。又不久，红军先头部队越过黔、滇渡金沙江，到达会理东区的通安，所向无前，势如破竹。刘文辉开始布置大渡河河防。

我所统率的第五旅有3个团（当时的甲种旅），第七团（团长余味儒）驻雅安，第十七团（团长萧绍成）驻天全，第二十八团（团长唐灼元）同旅部驻荣经。

1935年5月中旬，我令第七团和第十七团开往汉源；我自率第二十八团也出发到汉源的富林大渡河边。最初我以萧绍成团防守上游距汉源场约80华里的文风坪，以余味儒团防守安顺场至大冲。唐灼元团以一营防守富林附近。其余为机动队，归我直接指挥。

其后，蒋介石增派了杨森的杨天信旅和王缙绪的王泽浚旅来富林协防。我将富林防务交与王、杨两旅，自率唐团到安顺场督守。

当时的部署如下：

萧团防守文风坪沿河地区；余团防守安靖坝至大冲沿河地区；萧、余两团之间，山地隔绝不能交通，旅部及唐团最初在富林，尔后（杨天信旅到达后）移至八排附近（一度退至三梭阿附近）。这是战前的布置。及到红军先头突破河防，进占安靖坝，这个部署就被打乱，混战于八排与三梭阿之间。

5月下旬，我率第五旅的全部到达富林。经过四五天的布置，将3个团展开在河防线上。防线太长，地形复杂，交通困难，

通信不便，处处感到薄弱空虚，使我忧心忡忡，彷徨无主。

5月底某日晨，雅安总部（刘文辉的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这时直接受蒋介石、刘湘指挥）参谋长张伯言来电话说，红军已越过西昌，分向越西、冕宁两路急进，叫我立刻到安靖坝督战。富林防务交由杨天信旅接任（杨森的杨天信旅由四川内地开来，正在途中）。我当时留置唐团一个营在富林，以待杨旅到达交接，立率唐团（欠一营）和旅直属特务连炮兵连向安靖坝前进。当晚休止于八排，尚未入暮，地方绅士等前来旅部休止处表示欢迎，并愿出力相助。

正接谈间，接到防守安靖坝的团长余味儒报告：“红军已到安顺场，将地方武装赖执中部解决，夺得小船3只，已渡过河，向我河沿阵地猛冲，韩营不支已溃退下来。”（赖执中是刘元璋师邓秀廷旅的一个营长，由安顺场地主土豪武装改编属邓，随邓驻冕宁大桥。）我当时立率唐团两营乘夜向安靖坝增援，企图夺回已失阵地，将红军打回南岸，并把来见我的土劣拉在一起前进，叫他作向导协助。

夜半，进至距安靖坝约十余里的某地，即与余团会合，与过了河的红军在河边山地对战相持。至次日下午组织进攻无大进展，反遭红军反扑。我正面的唐团第五连连长孙某负伤，全连溃退下来，引起全线动摇，两翼纷纷后退，麇集在道路两侧狭小地区，形成混乱。我在正中央的机枪阵地督战，见此情况，知非后撤整理不能再战，乃率余、唐两团后撤至八排、三梭阿既设碉堡线上，再行抵抗。

红军渡河后第三日，我指挥余、唐两团在八排至三梭阿之线布置防线抵抗。一面调整败退后的队伍，一面准备反攻。是日红军未向我进攻，我才得以整顿休息（事后才了解，渡河的少数红军是为掩护主力北进的，故未向我进攻）。

第四日，红军因掩护主力北进的任务已完成，即向北撤走。我军发起攻势，未经过激烈战斗，即进至安靖坝，恢复了原防，

心中为之一松，想到这一下我可免于砍头了（失守河防有被拿办之虞）。

红军主力经过安顺场向泸定北进，中途遭到我防守文风坪萧团的阻击。红军派队扫荡，萧团也被击溃，兵力损失了一营之谱。

红军北进后，又强渡泸定桥，将防守桥头的刘文辉部第四旅（袁国瑞）击溃，该旅损失亦大。

我的第五旅除上述萧团在文风坪被击败损失一个营外，余团守河的第三营韩槐阶被击溃，整理后只存一连。唐团因参战较晚，损失较少。战事结束后，刘文辉令我撤回汉源整顿，将残破的队伍改编为每团两个营，原三个团缩编为两个团，团长萧绍成、唐灼元撤职。我也受到申斥，由三团制的旅改为两团制。

进攻懋功、抚边记

李 介 立

1935年7月下旬，杨森接到刘湘转来蒋介石的命令，主要内容：共军主力已通过懋功、抚边逃向青海方面，现懋功城仅有少数部队防守，第二十军应以主力部队于7月25日攻占懋功城，迫使其全部进入草地而围歼之。杨森接到上项命令后，制定了第二十军进攻懋功的作战计划。其部署是：以第三、四两混成旅由硃碛经夹金山达维向懋功城攻击前进；以第二混成旅及精练司令由宝兴左前方的羊村，取道夹金山的左侧，经大小药山、于海子向懋功城攻击。后方军部仍留住宝兴城内。

第二混成旅部队，于25日午后到达懋功城，仅旅的前卫第四团与红军发生战斗约一小时，即占领懋功城。各部亦陆续到达懋功城附近。次日杨森也到达懋功城，住了几天他令第二、第三混成旅及团务精练司令所率部队驻懋功城，向抚边方向警戒。令第四混成旅驻达维，担任维护前后方交通的任务。并将前线各部交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指挥，自己则回后方去了。

大约是8月4日，杨森在硃碛打电报给前方各旅说：委员长来电指示，要巩固懋功必须攻占抚边。我命令你们各部立即准备进攻抚边。当时防守抚边的红军约有一个师的兵力，其主力部队位于潘家山向南警戒。杨汉域接电后，即令第二、三、四混成旅各留一个团担任现驻地的防守任务外，其余部队及精练司令部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第六团团长。

队均于8月6日出发。并决定以第二混成旅及精练司令部担任潘家山的主攻任务。第三、四两混成旅由小金川的东岸向西为助攻部队。

第二混成旅以第四团留驻懋功，第五、六两团6日由懋功出发到达八角，7日推进到潘家山前面的河边。立即派人侦查，得知红军主力在山腰防守，沿河水浅都能徒涉。旅指挥部按第六、第五团及精练司令部的顺序，由右至左取大包围的态势，于8日拂晓向潘家山进攻。我团（第六团）到达河边后，我叫第二营先过河由山脚向山上进攻，叫第一营由本道向抚边城挺进，我率第三营过河后在山脚的本道上为预备队。8日拂晓，第二营开始进攻时比较顺利，可是进到半山间即受到红军反击，有十几名士兵被红军用大刀砍死，一部分队伍纷纷后退，后因左翼第五团向红军阵地进攻猛烈，我团当面又才稳定下来。正当我指挥第三营预备队向山上进攻没有进展时，第一营营长舒楚藩向我报告：一营进到距抚边只有5里的一个小高地即与红军发生战斗，红军占领高地居高临下，我军经过激烈战斗不但没有进展，感到是孤军深入，恐有被消灭的危险，要求从山上派部队增援，由高处对红军采取包围进攻。当时我派不出部队很着急。不久我听到左翼枪声浓密，知道全线都在对潘家山红军阵地发起猛攻，于是我决定把第二营撤下来，派其中一个连从半山间去增援第一营。直到黄昏，山上战斗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红军仍在山顶坚守阵地，这时我决定派第二营长李显宗率领现有部队向红军山顶阵地进攻，并对他说：“攻不下不要回来见我。”在这种逼迫的情况下，第二营部队开始攻击，很快就上去了，当时认为占领山顶后，战斗可算胜利了，可是在不久的时候，攻上去的部队，又被红军砍杀下来，李营长已被砍死。这时天快黑了，只好就地收容布置防守。我内心非常惶恐不安，认为不仅是进不了抚边城，万一夜间红军居高临下向我发起反攻，我部有被歼灭的危险。于是将这种情况向旅长报告，旅长的回复是：“舒楚藩营在抚边城附近已俘虏

红军战士50多名，并夺获有重机枪一挺，步枪30余枝，人枪已直接送到旅部，现该营部队已进到抚边城附近，估计红军今晚要撤离抚边城，望你在现有阵地进行固守。”这时我才安定下来，组织小部队向山顶搜索，拂晓前已占领山顶。第二天午前各部先后进到抚边城。

夹金山地区追堵红军纪实

陈 亲 民

1935年夏，蒋介石电令杨森部迅速开到叙府（宜宾），沿金沙江北岸扼守，以防红军北渡。杨森集中所有兵力22个团（每团约1100人）24000多人于南充，分两个纵队先后经内江、大足、隆昌县开到叙府，派第三混成旅疾驰屏山、雷波构筑工事封锁渡口，向江南设防；派第二混成旅分头向叙永西南监视红军情况。杨森本人控制主力于叙府，居中策应，以截堵西进北上的红军。结果红军不入叙南，不从雷屏渡金沙江，而向滇北前进。

蒋介石看红军西进云南，深入边地，以为这是歼灭红军于金沙江上游的好机会；一面令薛岳、周浑元等部跟踪追击，一面又令杨森部到大渡河以北截堵。

杨森原拟由雷波经马边直到富林（即大树堡），但彝族人民不准通过。刘湘虽派飞机一架到大凉山上空低飞示威，仍不得通过。杨部只好转集屏山、叙府，经五指山、孟获城、犍为县西、峨眉北、金口河，绕道到达富林。结果，第二十军尚差两日行程，红军已神速地飞渡了大渡河，顺利向北挺进。

杨森部在富林，经10日左右的四出侦察，据报红军确已北上，乃由富林出发，经汉源、大小相岭、荣经，到雅安南外集中待命。过了三天，中央军薛岳、周浑元等部也跟红军路线来到雅安。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军第三混成旅第九团团长。

杨森部到雅安休整后，于7月初向川康边境追击。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率第九团团长陈亲民从雅安经芦山到灵关，正拟向宝兴前进，忽接杨森电话暂停。杨派第二混成旅（旅长李朝信）从灵关渡河到天全攻击红军尾队。

第二混成旅到天全扑空折回宝兴，杨森又命令第二混成旅和精练司令（司令向廷瑞）为左翼队，由宝兴经两河口攻击懋功；第三混成旅为中央队，由宝兴经第一道、第二道牛棚翻夹金山直取懋功城；第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为右翼队，由宝兴沿进懋功的大道翻夹金山进占达维（达维是懋功县东区一个大镇，东通灌县、成都，北通抚边）。第二十军部及第一、五、六3个混成旅为预备队，暂留宝兴待命。

杨森部署完后即亲率其手枪团在第四混成旅高德周部后跟进，爬到夹金山山顶鞍部休息时，官兵初见6月间还是白雪皑皑的山景，哗然大叫大嚷。一个士兵开枪射击乘机逃跑的民夫，震动了空气，刚好大风大雹席卷而来。大家都卧倒地上，抓着树脚。这时有个民夫说：“翻此神山要特别静肃，否则神天震怒，其风不可当，向王母娘娘通禀，可以平安无事。”此话传到杨森耳里，杨森大怒，立将小石龕内所供的王母娘娘小石像抓住投到山坡下去，这个迁怒动作一时传遍全军。

进犯懋功时，杨部团营长毫不照顾身体瘦弱的士兵，而进行急行军，急爬海拔3000公尺的夹金山，强调要到山顶才能休息。以致士兵急往上爬，接近山顶空气稀薄处，呼吸不灵，死亡甚多。单就第三混成旅第九团（我团）就倒毙105人。

7月中旬某日，我团翻过夹金山向懋功进逼。中央红军最后小队退出懋功，正在北门外铁索桥北端掩护并撤除桥上木板时，我令先头部队向掩护的红军射击，红军伤亡战士约十余人，立即向北撤去。

杨森部占领懋功后，命令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杨森的侄儿）任第二十军前敌总指挥，督率懋功前线部队继续向崇化、抚

·边的红军追击。

7月下旬的一日，杨汉域在旅部会议上向我们宣布：军长说蒋介石电示，要你们守小金川至懋功一线，必须占领抚边，将红军迫远些。

当时杨汉域派我指挥本团和一个精军营（王朗清营）进犯崇化县城。我部于8月1日逼近崇化时，中央红军已通过草地；所留崇化一小部红军和工作队也自动向北撤去。我立即出城尾追，又伤红军战士七八人。当时以为红军没有力量，不堪一击。几天后，我就带部队回懋功集结待命。

同时，杨汉域又派第二混成旅，以主力进犯抚边。该旅旅长李朝信率第五团团长朱泰安、第六团团长李介立于8月1日出发进犯抚边。6日开始向守抚边南外山地的红军加强连攻击。攻到山腰，被山顶红军以轻重火器扫射，第六团第二营营长被击毙。所部溃下，经团长李介立增援收拾残部，守住阵地。同时该团第一营乘虚从山腰取捷径入城，攻击红军侧背，迫使红军伤亡数十人、被俘51人后，自动撤去。第二混成旅于8月8日进入抚边城。

杨汉域还派第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率步兵两团从达维向抚边县东南助攻。李旅入抚边后，高旅也相继入城。

杨汉域进入抚边后，即令精练司令向廷瑞率其两团出抚边城向北追击，抚边“防务”由李朝信负责。高德周旅保持达维到宝兴、抚边的交通线。向廷瑞部向北追击，其先头游击队曾到卓克基以南地区，但并无大的接触。

杨森在懋功停留半月，得悉中央红军已由崇化、抚边北上，红四方面军由川北转到川西，遂决心不再北进，将后续部队第一、第五、第六混成旅留置宝兴县，他自己在宝兴坐镇，并令第一、五两旅占领宝兴城东北十余里高地，赶筑碉堡工事扼守；第六混成旅担任宝兴城防。

9月，杨森部第七混成旅（即精练司令）向廷瑞部在抚边以

北和抚边城区先后受到红军的反击，溃不成军，退回懋功。杨汉域当即改变部署，企图扼守懋功、官庄、达维一线金川河以北高地，阻击红军，保持懋功、达维、宝兴间交通运输线路的安全，待机出击。令李朝信旅守懋功向西向北设防，高德周旅守达维向东向北设防，杨汉域旅集中策应，守官庄一线金川河以北高地。结果，红军派出一部先到懋功西南的丹巴后，再由抚边出击。不到两小时，周翰熙团和我团首被击溃，向金川以南逃命。官庄中间被打断，懋功、达维也就动摇，金川天险自然失去作用。这时杨汉域迫不及待地电令懋功李朝信旅破坏懋功北门外铁索桥，翻夹金山向宝兴撤退，电令达维高德周旅，待第二、三两旅离开懋功官庄后向宝兴撤退。杨汉域随即督率我团将官庄通抚边方面的铁索桥加以破坏。我率部将铁索桥上的桥板完全拔掉，投入金川激流中后，杨汉域认为破坏不够，亲自指挥工兵将铁索斩断投入河中，然后翻懋功以南的夹金山撤退。杨汉域并向各团长说：“金川水深流急，共军没有铁索桥，是追我们不上的。今明天可以平安渡过。”当天晚上，红军在少数民族的帮助下，一面修复铁索桥，一面用皮船木筏抢渡，杨汉域的破坏未能阻住红军过河向宝兴进逼。

9月下旬，红军向宝兴城东北山地杨森部第一、五、六等三个旅攻击，杨森部被歼过半。杨森垂头丧气地逃出宝兴，所部在灵关、芦山道上溃不成军，夺路逃跑。刘湘从大邑、雅安后方调来增援的部队受此影响，不敢前进。特别是杨国桢部在芦山道旁看见杨部的惨败现象，吓得面无人色，争先恐后地向杨部旅团营长问道：“情况怎样？情况怎样？”杨部旅团长回答说：“宝兴丢了，我们损失很大，连伤兵也没拖下来。”

杨森率残兵败将从宝兴逃出之后，既怕红军再追击，又怕刘湘乘危吞并他。正在惊惧无地立足之际，蒋介石来电，叫杨森到洪雅休整补充待命。

1935年10月底，蒋介石电令杨森将其所部7个混成旅改编为

3个陆军步兵师（师辖两个旅四个团），与其他中央陆军一样，受同等待遇，每月经费造预算向重庆行营参谋团洽领薪饷。

1936年春末，以贺龙、萧克为首的第二批红军，又将由黔滇康边境北上，蒋介石命令杨森率部3个师从洪雅出发，经嘉定、自流井，开到叙府以南，进入高县、珙县、庆符、筠连、兴文、叙永等县截堵红军。杨森部于夏初开到上述各县，督率各部向黔北设防。结果扑空，红军在沿途人民的支援下，钻隙乘虚，迅速通过川黔边境转入云南。

蒋介石又命令杨森率部从叙南、庆符集中出发，开入云南，经老鸦滩（盐津）、大关、昭通、鲁甸等滇北各县，向西跟踪红军。他命令各部务于红军渡江前及渡江中，“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杨森在鲁甸指示完毕，叫其侄杨汉域代行军长职务，即率其随从参副人员前往昆明。杨森到昆明前夕，曾要杨汉域督率各部于巧家附近金沙江以南歼灭红军，结果，部队兼程赶到巧家河边，红军业已全部安全渡江北上。

第五章 川西北堵截红军的战斗

堵截红四方面军过涪江 地区的几次战斗

邓锡侯 杨晒轩 田颂尧 张熙民

涪江、油江战斗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川军防线，击溃四川“剿匪”第二路军（以下简称“二路军”）总指挥田颂尧部主力。四川“剿匪”总部（以下简称“剿总”）总司令刘湘，惊惶失措。他一面要求四川“剿匪”第一路军总指挥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以后改编为第四十五军）主力，加强由绵阳、剑阁、昭化、广元沿川陕公路山区要隘，阻击红四方面军西进；一面准备以王缙绪接替刘邦俊充任四川“剿共”第六路军总指挥，由第二十一军抽调十个旅归入该路战斗序列。把十个旅分为两个纵队，其番号姓名如下：

* 作者邓锡侯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后改为第四十五军）军长；杨晒轩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八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田颂尧曾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张熙民当时系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原第二十九军）第一二二师第一旅旅长。

第一纵队司令王缙绪兼任，辖五个旅：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彭焕章、第三旅旅长佟毅、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王纯一、第五旅旅长陈基、某旅旅长邓和连（番号已忘了），这些旅由川东北的原五路军抽调编成。

第二纵队司令郭勋祺（但郭在川南未到职），辖五个旅：独立第一旅旅长张竭诚、独立第二旅旅长田钟毅（后改称独立第五旅）、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刘兆藜、教导师第一旅旅长章安平、第二旅旅长于渊，这些旅由原南岸军方面抽调编成。

第一纵队的彭焕章等五个旅在王缙绪指挥下，由南充向南部侧击，防止红军向川中盆地发展。但未料到红四方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于4月2、3两日迅速摧毁第一路军剑阁县剑门关、昭化一带的阻击阵地，歼灭邓军守兵约一个旅，把第一路军北道防线拦腰斩断，继续向彰明、江油以北涪江上游地区挺进。此时，刘湘、邓锡侯、孙震（田頌尧已撤职，孙继任）等对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一致判断是：可能放弃通、南、巴根据地，北出汉沔，沿川陕公路南下川西平原。因此，对红军向涪江上游挺进，不很重视，只认为是红军“转山”行动。而刘湘更怕红军声东击西，不敢把第六路军向罗江、安县以北转移，于是就近以新受损失和一部被隔离在广元的第一路军，及从嘉陵江溃败、尚在收容集结、未经整补的第二路军沿涪江右岸分据要点设防，阻止红军渡过涪江。另以许绍宗纵队和第六路军约8万兵力指向剑阁、梓潼。其目的，主要在于掩护川西，同时向北送走红军。

邓锡侯、孙震接受守备涪江任务后，两路军防务大体划分是：绵阳以上归第一路军负责；绵阳以下至三台归第二路军负责。第二路军既未整补，更兼番号变更（原第二十九军改为第四十一军）人事更动，内部极为混乱，只派了覃世科一个旅，在绵阳附近布防。邓锡侯认为绵阳以上涪江的江岸很长，只能扼要守备，以江油、中坝地当冲要，抽调第二十八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杨晒轩）以江油为据点；该军特科司令游广居率领的第四师第

十一旅（旅长孙礼）、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卢济清）以中坝为据点，沿涪江右岸构筑工事守备。并令江（油）、彰（明）、平（武）、北（川）、昭（化）、广（元）、剑（阁）、梓（潼）8县联军司令蹇幼樵率领地主武装3个大队（每大队一营）受第一旅旅长杨晒轩指挥，协助守备江油以上防务。实际白石铺以上至南坝江岸，并无军队守备。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4月7日前后占领中坝对岸的彰明城和江油对岸的窦圉山，即以大部渡过涪江。蹇幼樵率领的地主武装闻风逃往安县。4月9日红军在中坝附近开始攻击游广居所部的孙礼和卢济清两旅，激战至10日将该两旅击溃，该两旅退守青莲渡，扼北川河下游，收容整顿。杨晒轩在江油以第二团陈麟昌（缺3个连）守城，以第一团任建勋附三个连在城外观雾山、公子坪、陈塘观、塔子山各高地构筑工事防守。任团于4月11日拂晓受到优势红军的攻击，被红军一举击溃，向罗江方向逃走。江油城只有东、南、北3个城门，最初闭上东、南门，留北门与城外的任团联络，至此被迫闭上北门。杨晒轩率旅部、手枪连及步兵9个连在红军包围下，困守城内。邓锡侯用无线电报问杨晒轩能守多久，杨答最多只能守10天，要求救援。

邓锡侯了解江油之围后，妄图击退涪江右岸红军，亲率第二十八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龚渭清）、第五师第十三旅（旅长陶凯）、警卫第二团（团长李勋伯）和收容整顿后的任建勋团，于4月16日由绵阳向中坝、江油前进。行抵青莲渡会合游广居指挥的孙礼、卢济清两旅，探明中坝地形平坦，城内无红军，仅城外中江道上有少数红军警戒。邓锡侯于当日午后，派孙礼旅向中坝城外红军警戒阵地进攻，一经接触，红军即向塔子山方向引退。孙旅即在中坝场外占领掩护阵地。邓锡侯进驻中坝。当晚即以任建勋团担任守备。17日，川军进攻塔子山、鲁家梁山红军的部署是：以游广居指挥的孙礼旅（缺第二十二团）和卢济清旅为右翼队，展开于中坝北侧之涪江右岸地区，指定孙旅靠江岸，卢旅横跨中江

马路，以马路为前进中心线，向塔子山攻击。以龚渭清指挥该旅和陶凯旅为左翼队，指定龚旅在右、陶旅在左，右接卢旅巨官渡溪流之线展开，经白庙子、官渡向鲁家梁子攻击。警卫第二团和第二十二团（缺一营，营长道福桃）为预备队，在右翼队后。随战况进展沿马路向嘴头岩推进。两翼队务于17日拂晓前完成攻击准备，拂晓同时攻击前进，进至观雾山、公子坪之线。邓锡侯又电令江油杨晒轩，随攻击部队的进展，相机出击。

第一线各旅的具体部署如下：孙旅以第二十一团曾宗敏为第一线；第二十二团之一营和该旅警卫连为预备队；卢旅以第四团傅汝洲（缺一营）跨马路为右第一线团，特科第一团康伯岷（缺一营）为左第一线团，以两个营和该警卫连为预备队。龚旅以第七团赵云霖（缺一营）为右第一线团；第八团张南芳（缺一营）为左第一线团，以两个步兵营和该旅手枪营为预备队；陶旅以第二十五团孙燮林为第一线，第二十六团邓雨初和该旅警卫连为预备队。左翼沿官渡溪流，特别注意左侧掩护，并力求包围鲁家梁子西侧。

4月17日6时许，川军全线开始攻击，最初进展迅速，沿途只有红军少数部队抵抗，一经接触，即行引退。川军左翼队进展较快，14时到达白庙子、官渡之线，16时攻到鲁家梁子山腰以上，红军坚守山岭阵地。右翼队占领火风山后，仰攻塔子山，斜面较陡，一直受到红军居高临下的瞰制，伤亡迭增，进展缓慢，几经飞机、炮火掩护，多次进攻，但红军依托工事坚守，17时，右翼队攻至山腹，无法再进，形成相持。川军官兵从早经过11个小时战斗，未进一餐，饥疲交集，士气早馁。塔子山红军乘势以火力由正面猛射，以大部兵力由两翼包抄，一时手榴弹、机枪、步枪声和喊杀声响震河谷，以白刃相拚，战斗极为激烈。右第一线孙旅投入预备队反复冲杀，激战约一小时，伤亡过半，孙旅全线不支，率先向中坝溃退。红军乘势席卷，卢旅三面被攻不支，分两路溃退：傅团和旅部向中坝奔逃；康团向鲁家梁子龚旅后背溃

退。红军即向鲁家梁子包抄，龚、陶两旅背后被遮断。鲁家梁子高地的红军乘势猛烈反攻，两旅作困兽之斗，战斗激烈到了高峰。龚渭清率二十响驳壳枪营扫射，还是阻止不住红军的冲杀，龚本人受重伤，团长赵云霖、张南芳、营长龚应权亦先后负伤，连、排长伤亡十余人，士兵死伤过半。陶旅以预备队在右后占领斜面阵地，阻住包围红军，当面亦作拚死抵抗，才勉强稳住阵线，伤亡官兵达五六百人。此时已入暮，战斗渐趋缓和，红军就地警戒。龚、陶两旅残部得康团引路（康团一周前在此地吃过败仗），乘夜沿官渡河谷向中坝溃退。邓锡侯在嘴头岩目击孙、卢两旅溃下，官兵失掉掌握，红军又在尾追，又复包抄鲁家梁子，战况很不妙，乃以预备队就地占领阵地，掩护溃下部队。同时返回中坝，关闭城门，部署凭城守备和收容。前方溃下的部队都想挤进中坝城，一时埋怨、鼓噪，甚至鸣枪示愤，秩序大乱。

红军追到嘴头岩川军掩护阵地，一经抵抗，即未前进。警卫第二团长李勋伯乘机跑回中坝向邓锡侯报告红军的追击已停止下来。邓锡侯考虑：所率各旅被击破，非经收容整顿不能作战，手边剩下不足3个团，一到天明就无法应付当面红军。即用长途电话向绵阳的黄隐和孙震告急：要他们赶快增兵上来固守中坝。孙震不同意说：你们应乘夜退过香水河（即北川河）收容拒守。并表示愿派就近部队到蛮坡渡（即青莲场）掩护撤退，要邓快回绵阳再作研究。邓锡侯就放弃中坝，命败残各部退绵阳、罗江间沿公路线上整补。命第二十二团（缺一营）归还孙旅建制，该旅乘夜转移到北川河右岸，利用河川占领阵地收容各旅残部和溃兵，尔后扼守香水场上下各渡河点，加强工事，警戒和监视当面红军的行动。命任建勋团利用城垣掩护各部渡过北川河后，于拂晓前转移到绵、江公路上的青义场待命。电令杨晒轩继续固守江油城。

邓锡侯作完退却部署，即动身返回绵阳，是役邓部伤亡和逃散官兵达四千人以上。在涪江方面的先头红军不但完成围点打援的目的，而且在涪江左岸控制了彰明城和窦圉山两个据点；右岸

控制了中坝和江油城外的观雾山、公子坪、塔子山、鲁家梁子等高地，进一步把江油城围困得更紧，北川河与涪江汇合的三角地区全被红军掌握，为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涪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 门 战 斗

邓锡侯回到绵阳后，一面以防区空虚，连电蒋介石、刘湘呼援；一面约集所部师长黄隐及孙震和孙部的师长王铭章、曾宪栋等在绵阳开会，首先判断红四方面军的行动。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一）红军主力尚在昭化、剑门关、雁门坝地区往返移动，而重华堰亦有大部红军集结，似在调动白河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南下，以便乘机北出陇南或汉南，向西北行动，打通国际路线。这一行动是川军共同的愿望，应给红军以便利。

（二）但红军控制了江油、中坝以上的涪江，亦可能由安县、绵竹直趋川西平原，在这一人口集中、物资丰富地区扩军、补给。这一行动与川军各部矛盾较大，应全力阻击。邓锡侯多年来一直兼任松（潘）理（县）茂（县）懋（功）汶（川）屯殖督办，屯督署设茂县，现以督署参谋长刘铭吾代理督办职务。刘铭吾曾连电邓锡侯派兵封锁屯区门户——土门。会议讨论认为：屯区为藏族散处的高山荒寒地区，语言不通，风俗绝殊，少衣缺食，汉藏历代相仇，断定红军不会走此“绝路”。会议更预料不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在懋功会师。但以屯区为邓军防区的重要部分，有森林、金矿等财富，且土门易守难攻，封锁土门，亦可防止红四方面军由茂县南出彭（县）崇（宁）或汶（川）灌（县）直下平原。因而会议决定：以一部封锁土门隘路口。邓锡侯对第一、二路军作了如下具体处置：

一、由第二十八军抽调一部兵力封锁土门、干沟，第二十八军主力和第四十一军全部沿土门以下、北川河右岸构筑阵地，阻击红军直下川西平原。

二、电调隔离在广元受杨崇向指挥的第二十八军第七旅周世英、第十二旅林翼如、第十四旅冯鉴、第十五旅的第二十九团邹迪僧和第四十一军第二旅吕康，绕道南部、三台星夜驰返绵阳。一则撤离广元，开放红四方面军北出陕南的通路，同时增强北川河谷兵力，阻击当面红军南下川西平原。

三、邓锡侯在平原防区内设置守备司令。发表陈谷生为新都、广汉守备司令；黄时英为金堂守备司令；吴仁轩为灌县守备司令；周烈为崇宁守备司令。并发表各该县县长为副司令，统一指挥境内军队和民团，对红军进行多方面的防堵和牵制。

四、积极整补败残各旅、团。

五、邓锡侯、孙震除了有意开放广元这一点，说成是为了集中兵力阻击当面的红军外，把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的作战方案，正式向刘湘和蒋介石的参谋团呈报。而刘湘和参谋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表示加以支持。

刘湘此时对红四方面军的判断与邓、孙大体相同。此时刘湘已将省政府由重庆搬至成都，更需要屏蔽川西平原。即令许绍宗纵队尾随红军之后，不可逼得太近；向北不得超过剑阁、重华堰、江油以北地区，便利红军离川北上。第六路军王缙绪所部，逐次向罗江、绵竹转移，部署二线阵地，保存实力，让邓、孙在北川河谷与红军对消，待邓、孙支持不了的时候，以许绍宗部尽全力阻止红军下坝。

蒋介石的参谋团到4月下旬，也没有意识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在藏族的高山地区会师。对邓、孙的堵击方案作了如下答复：

一、命邓锡侯特别加强土门、干沟的封锁。邓、孙两部以全力扼守北川河谷，从土门至青莲渡构筑坚固阵地，指定由邓锡侯统一指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绵竹，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移驻安县。

二、以中央军胡宗南部攻击白河以南地区的红军，进出青

川、古城和平武之线，堵住红军，不让向甘南和陕南北上，务将红军抑留在川境。西则利用横断山脉，作成袋形阵势，以妄图消灭红军。

三、迫使刘湘主力由昭化、梓潼向南坝、中江正面，从袋口越过涪江，替其火中取栗，在涪江、北川河三角地区歼灭红军。

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横渡涪江上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王缙绪根据刘湘意图，于4月23日将由遂宁到盐亭的一部军队转向罗江。4月27日后，除以一部向彰明前进外，主力逐次向绵竹和安县以南转移，王缙绪的总部一度移驻绵阳丰谷升。而许绍宗所部，则尾随红军后，缓慢地由剑阁向重华堰接近。

邓锡侯和孙震部担任封锁土门和守备北川河谷的任务后。首先由孙震派其第十一旅旅长李炜如率该旅为先遣部队，驰赴北川河右岸墩上下游占领阵地，掩护第一、第二路军主力进出河岸；一面积极调动主力到这一防线。同时通过广汉袍哥头子侯少焯，拉拢川西袍哥土匪刘先、赖华山、罗金广、唐登域、谢用之、钟正华、冷开泰等地方恶势力，组成“剿共”自卫团，委刘先为团长，赖华山为前敌指挥，其余为大、中队长，指定口粮由安县、绵阳两县负担；经费由第二十八军邓部按月补助2千元，孙军补助1千元，共编人枪千余，在安县花街场集结，借以窥伺红军动向和偷袭红军，并通过这些地头蛇，搜罗炮灰，及时补充缺额。

其次是封锁土门：邓锡侯发表第二十八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三旅旅长陶凯为松、理、茂、懋、汶屯区“剿共”指挥，第五旅旅长黄绍猷为副指挥，从各处拼凑8个团到茂县土门、干沟封锁隘路口。这8个团的驻地，番号和团长姓名如下：在金堂抽第十旅的第十九团（团长陈畴九）、在绵阳抽第二旅的第三团（团长陈郁文）和第十三旅的第二十六团（团长邓雨初）、第二十五团的第三营（营长古友君）、在新繁整顿第十五旅的第三十团（团长钟应五）等4个团又一个营由陶凯率领，以睢水关为通过点，经观音梁子到土门。把江油作战损失最大的第四旅的两个团并编为第

七团（团长赵云霖），在第二师的警卫团抽出5个连（内一个迫击炮连）由营长张光斗率领充实第五旅的第十团（原只有两个营，团长陈永昌），在温江整补的第八旅的第十五团（团长郭洪典）等3个团，由黄绍猷率领，经灌县、茂县到土门。最后又在广汉抽担任城防的第二十五团（缺第三营），由该团长孙燮林率领，取道灌县、茂县向土门前进。另调藏族奴隶主的马队约600人到干沟受陶凯指挥。八个步兵团加上马队，共约12000余人。邓锡侯满以为有了这些人马，堵塞这样险隘的狭路，即使红军向土门、干沟攻击，也可负隅自固了。

涪江、北川河三角地区从江岸向西，一般是山谷交错的山区，山的高程，由东到西逐步增大，至河东山的标高已达2500公尺，不过是不连续的山岭，鞍部与河谷可以通行。再向西是徐师岭至龙溪堡、高山堡形成的横断东西绵亘不断的高连山脉，而且是荒山老林，呈现不少悬崖绝壁，大军无法通过；只有土门、干沟、土地岭才有一条长隘路通向茂县，进入岷江流域。时当夏初，江流水位增高，涪江自平武以下不能徒涉。北川河自墩上以下，官渡溪自桂溪以下都有相当障碍。北川河的土门、漩坪段之南，与该段平行，矗立着伏泉山、大堰口、千佛山、观音梁子（东）、老君山横断南北，绵亘约40公里的山脉，恰好是红四方面军打通土门，侧敌行动的良好屏障。这一山脉，以千佛山为最高，图根标高为2250公尺；其次如伏泉山、大堰口、观音梁子都达2000公尺以上。山脚至山顶的高程，一般在500公尺以上，山势陡峭，断崖很多。山内南北通路，只有：晓坝场—茶坪—白家林—大堰口—墩上道；白家林—回龙沟—青杠铺小道；大石坝—鹦哥嘴—横梁子—观音梁子—土门道；大坝—观音梁子等4条山间小道通行。道路旁一般是金竹丛生，就连展望联络也受到一定限制。伏泉山东侧，由安县—插鼓坪—曲山—漩坪有一条山脉外的南北通路，和中坝、江油有道路可通，但是，一经控制着伏泉山，则漩坪走廊就成了倚山阻水的要隘。

4月21日夜半23时，红军数百人经陈家坝到北川城郊，占领城外塔子山，攻占县城。该县县长李国祥率团队逃到对岸，烧毁大索桥，与红军隔河相峙。

4月底陶凯所部除了孙燮林率领的两个营外，已全部到达土门和土地岭附近，陶凯即着手占领土门封锁阵地。陶本人于5月1日就屯区“剿共”指挥职。其阵地采取纵深配备，大体如下：

右从观音梁子，横跨北川河谷的北茂大道，沿营盘沟西侧高地经赤土坡（可能在冷水坪正北的山腹）至老水洞为主阵地。这一阵地使用的兵力是：第三、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三十等五个团和第十团的第二营、第二十五团的第三营。重点在观音梁子，跨过大道巨道路北约三公里的高地至冷水坪南侧，占领连续阵地，为右地区队，由陶凯在土门亲自指挥。以左至老水洞是金竹丛生的荒山老林，以古友君营在右，张北斗营在左，分据要点，占领不连续的阵地为左地区队，利用地形，把守要隘，凭险构筑工事，阻击红军抄袭。由右区队分别派出一部到墩上占领前进阵地，和在佛字顶、桃坪及其北侧高地占领警戒阵地，同时构筑工事。

据守赤土坡的川军营长张北斗谈，赤土坡是右地区阵地最左的要点，当时在赤土坡的部署是我营附有八二迫击炮两门，以何龙章连在右，廖有伟连在左，占领阵地。迫击炮在廖连后占领阵地，营部也在附近，这是比较集结的一个独立据点。其余两连是采取梯次向左后配备，伍元青连在廖连左后，孙怀章连又在伍连左后之老水洞，分别扼住两条极其难走的采药小径。那一带崖势陡峭，荒僻无人，连与连相隔几十里，有的排甚至班都分散在一些点上。

由黄绍猷指挥第七团和第十团（缺第二营）占领土地岭、水茶店扼守道路两侧高地为第二阵地。马队控制在干沟附近。第一、二两阵地间沿本道两侧择要构筑工事。

先遣旅李炜如率3个团于4月底赶到北川城对岸，受到红军

迎头痛击，伤亡很大，退至漩坪东侧与红军相持。红军旋即（约在5月1日）占领伏泉山阵地。邓锡侯、孙震企图占领北川河谷，一开始就没有实现。

与此同时孙震派其纵队司令王铭章率第九旅（旅长张熙民率两个团）、第八旅（旅长李鏊洵，率3个团）、第二旅（旅长吕康，率3个团）于5月2日到达擂鼓坪。王铭章即以第九、第八、第二旅的顺序，展开于曹山坡、碱山、苏包沟之线，向伏泉山红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数日，至5月5日略推进至漩坪东侧、曹山坡、九倒拐、火烧坡之线。李炜如旋转到曲山以下，联系邓锡侯的孙礼旅担任河防。

5月2日红军不断由马槽向坝地铺以南和老水洞附近活动。3日红军数千人由马槽、坝地铺和石泉铺分两路攻击墩上陶凯部的前进阵地，驱逐陶部前进部队，占领墩上。陶凯急电向刘湘和邓锡侯呼援。

邓锡侯为了支援陶凯夺回墩上和协助第二路军王铭章纵队攻击伏泉山红军，达到进占北川河谷的任务，即派第十二旅旅长林翼如，该旅第二十三团（团长张元雅）、第二十四团（团长程联承）及第六旅第十一团（团长王含光）、警卫第三团（团长李硕）等4个团经茶坪、大堰口向墩上前进。邓锡侯面授林翼如的作战要旨是：主要防止红军南下川西平原；其次阻止红军通过土门西进与中央红军会师。林旅于5月6日行抵白家林与红军遭遇。而大堰口要点已先被红军占领，该旅即以第十一团为右翼队，第二十三团为左翼队，展开于白家林及其两侧之线；警卫第三团为预备队，随右翼队后跟进。第二十四团在茶坪占领二线阵地。10时双方展开激战，至14时，林旅伤亡三百余人，退至茶坪二线阵地防守，红军未予追击。同时红军即占领皇宫山、大坪山、白家林、大堰口、千佛山阵地，与伏泉山阵地连成一线。王铭章进攻伏泉山无进展。邓锡侯派的特科司令游广居率3个旅7个团，随林旅之后跟进。即：第十四旅（旅长程资民）的第二十七团（团长王激

熙)、第二十八团(团长周德汉)、第十五旅的第二十九团(团长邹迪德)、第二旅(旅长卢济清)的第四团(团长傅汝洲)和指挥的特科第一团(团长康伯峨)、第七旅(旅长周世英未到,钟开泽代)的第十三团(团长钟开泽)、第十四团(团长唐庶康)约在5月8日到达茶坪,而林旅已败守茶坪阵地。游广居即以第十四旅附第二十九团为右翼队,右与火烧坡王铭章的吕康旅连接,展开于火烧坡、水车坪、北三沟庙宇北侧之线,攻击红军皇宫山大坪阵地。第二旅为左翼队,连接右翼队展开于茶坪北两侧之线,攻击红军白家林、大堰口阵地。第七旅为预备队在茶坪占领预备阵地。至此邓锡侯已被迫放弃占领北川河谷的企图,名说攻击,实际是防止红军南下,等待第六路军支援。林翼如旅调绵竹整补。

5月上旬,红军主力开始渡江。同时分向小坝底、外白场、龙藏场、白什场、马槽等地活动。10日,红军先后在中坝、白石铺、煽铁沟、南坝等地渡过涪江。

5月7日第六路军王缙绪之一部进攻彰明城,受到守城红军的反击。王缙绪调游动于安县、绵阳的独立第二旅田钟毅部驰赴彰明。田旅9日午后,到达彰明城附近,在该地原有第四旅王纯一部之王团(未查到名字)受田统一指挥。田旅这时是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孟存仁,第二团团长谢崇文。红军工事筑在城的外围,以城为中心,西面依托涪江,形成半圆形阵地。田旅侦察地形后,其部署是:第二团为右翼队担任城北和城东的攻击,王团为左翼队担任城东南的攻击,保持重点在右翼队。以第一团为预备队,位置于右翼队后山梁上。

10日拂晓,先由左翼队王团发起攻击,最初进展较快,至城垣附近形成相持。7时,右翼队谢团开始进攻,中午攻至城下;此时,空军飞机两架临空助战,向城内红军投弹轰炸,由于威力不大,不发生多大影响。午后红军几次出击,傍晚时,战斗转趋激烈,谢团第一营营长杨澍源被击毙。当夜红军主动渡涪江撤退,拂晓前全部撤完。是役,川军被击毙营长一人,伤亡官兵

200余人。同日下午，该旅即奉王缙绪电调绵竹土门场（非茂县土门，距绵竹城30华里）集结整补。

5月12日约有红军3000余人，向佛字顶、桃坪川军警戒阵地攻击。将陶凯警戒部队驱逐，继续进攻观音梁子主阵地，经过半日激战，红军退回墩上，控制佛字顶。随着大量红军由东向青杠坡、蔡家嘴、石泉铺地区移动。陶凯经两度被攻，更感到当面红军压力很大，迭电呼援。刘湘即电调川北的第三路军李家钰率部移驻灌县，并要李派两个旅的兵力到茂县增援。李家钰即以驻遂宁的第二混成旅（旅长敖向荣），第五混成旅（旅长李注东）由敖向荣率领，经灌县到茂县增援。

由于邓锡侯向刘湘求援，约在5月12日，第六路军总指挥王缙绪派第三旅刘兆藜、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两部到达茶坪。经过协商，即以刘兆藜接替第一路军卢济清旅正面，卢旅靠右分担第十四旅正面之一部分。章旅控制在茶坪、牛奶坪之间。同时第六路军的独立第一旅张竭诚部到达晓坝场，教导师第二旅于渊部到达秀水场。刘湘一度在名义上拨四个旅给邓锡侯指挥，实际还是王缙绪直接掌握。

5月13日，第一路军游广居部侦知皇宫山、大坪红军守兵不多，于14日拂晓向两地攻击，经战斗，该军伤亡20余人，攻占了皇宫山和大坪，跟即赶筑工事据守。红军连续3天向两地反攻，该军凭借工事，利用“剿总”配拨的路易式机关枪密集火力斜射，3次打退红军，双方伤亡都在200人以上。第二路军在火烧坡方面亦同时发生激战。

5月15日上午，红军以2万余人的优势兵力，重点指向观音梁子，采用两翼包围和间歇突入分割包围的战术，在10时前后，全线展开激战，特别是观音梁子炮声、手榴弹声，机、步枪声响震山谷。红军伤亡虽大，但越打越猛。14时左右，红军夺占观音梁子。川军接连反扑，均被击溃，被迫后退。16时，红军由左地区古营正面间隙突入，翻过冷水坪，抄出大沟口，同时观音梁子

之红军超过（东）老君山直捣雨淋磴，形成两条铁臂，把包括土门在内的川军右地区队团团包围。川军右地区队一经击破，复被包围，各不相顾，分成小股乱窜奔逃。是日上午，红军同时攻击赤土坡，攻势很猛，但由于仰攻，山势陡峭，地面狭窄，川军张北斗营据工事射击，形成相持。至15时，红军攻势更猛，何、廖两连伤亡很大，又无预备队，看到满山遍野都是红旗，该营长丢下迫击炮，跳岩向茂县方向逃命。一直跑到威州附近的雁门关停下来收容，全营官兵不到20人。古友君营被歼灭。马队在隘路中伤亡很大，残存的乘夜逃散。红军乘胜于16日拂晓，攻击土地岭二线阵地，川军5个营全部被歼灭，第十四团第三营营长黄金瓯被击毙。

至此，红四方面军击破了川军土门封锁阵地，歼灭川军7个团，打通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进路，向西进发。

5月15日晚，川军第六路军张竭诚旅向月儿门移动，于渊旅向大坝场移动。

在同一晚蒋介石的参谋团严电刘湘飭第一、二、六各路军限5月17日总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进出漩坪、土门之线，重新封锁土门，截断红四方面军向岷江流域西进。经邓锡侯、孙震、王缙绪在安县会商，以变化太快，时间太促，决定推迟一日，在18日拂晓总攻，全线同时开始。第二路军王铭章纵队，以第一线3个旅攻击漩坪、伏泉山红军阵地。第一路军游广居原指挥7个团临时增加第二十二团（团长陈相楷）就皇宫山、大坪第一线位置，攻击2087高地和笔架山红军阵地。第六路军王缙绪以刘兆黎旅和教导师第一旅，攻击大堰口、千佛山红军阵地，但因千佛山斜面太急，仰攻不易，决定章安平旅为防守部队，于17日晚占领菜子堰北侧高地构筑工事，阻止红军出击。以第三旅为攻击部队，沿茶坪、白家林、大堰口攻击白家林、大堰口红军阵地。第三旅以第九团团王三友指挥第八（团长黄柏光）、第九两团为第一线，以第七团（团长徐国轩）为预备队，于

西二沟攻击前进后，随第一线推进。王缙绪又以独立第一旅旅长张竭诚由月儿门攻击大石坝、鸚哥嘴、高川坡、横梁子红军各处据点阵地。教导师第二旅于渊由老鹰岩、玉皇楼西北地区进出于干沟、水茶店间截击红军。第六路军其余各旅控制在安县和绵阳北境地区。

5月18日拂晓，川军全线发起总攻。白家林正面之第六路军第三旅第九团团团长王三友因正面狭窄，不能展开两个团，乃以第八团在前，第九团在后，采用纵深配备的轮番攻击，9时攻至白家林，在红军猛烈火力射击下，黄柏光第八团畏缩不前，第九团接替第八团，11时攻下白家林。第二营李遐举占领右前方元宝山，王三友率两营由正面继续攻击大堰口，约在14时接近大堰口鞍部。红军在侧射火力掩护下，进行反攻。第八团伤亡惨重，团长王三友先是腿部受伤，15时，王三友腹部中弹殒命，正面两营溃下，跳岩跌死跌伤不少。红军集中火力攻击李营，李营随之垮下。第九团除团长被击毙外，伤亡连长7人，官兵约900人以上。

第二路军王铭章正面的攻击并不激烈，也无进展。第一路军游广居所部因正面红军兵力大，而大坪、皇官山阵地突出，不敢再进，而对当面红军阵地放了一些枪，佯作攻击，基本上并未出动。只有卢济清指挥傅汝洲、陈相楷两个团攻击包箩山，当面金竹丛生，无路可行，一面砍竹开路，一面前进，进至山腹，面对悬崖，高不可攀，上面也无红军，落得隔山观战，一直见到刘兆黎的第九团溃败，才退回原阵地。第六路军张竭诚旅，经过半日战斗，攻下大石坝，推进至鸚哥嘴红军据点阵地前，就地相持。于渊旅钻山谷迂回，至次（19）日晚一度到干沟，受到红军由水茶店和土门的夹击，伤亡数百，狼狈退回。以后转由高山坡侧击红军据点阵地，张竭诚旅复乘势进攻鸚哥嘴，红军撤向横梁子，张、于两旅逼近横梁子南。

川军18日总攻，实际只有第六路军进攻，而拥有11个旅的第六路军（独立第二旅石照益新编入该路军序列）也只有3个旅进

攻，除张竭诚旅略有进展外，刘兆藜旅惨败，于渊旅在干沟被击退告终。

由于川军土门封锁阵地被击破，红四方面军主力长驱西进，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参谋团才发现南北红军在天、芦以北山区会师。于是命令邓锡侯所部离开茶坪，转移岷江流域追堵。约在5月23日前后，游广居部担任之皇宫山、大坪正面交由第六路军派队接替，香水河防交由第二路军派队接替。

第六路军第一线兵力部署从5月下旬起，大体是这样的：第一线摆了6个旅。皇宫山正面，第五旅陈良基部；水车坪、大坪正面，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部；西二沟道路两侧，第一师第一旅彭焕章部；菜子堰、龙洞沟正面，独立第二旅石照益部；横梁子南跨道路两侧，独立第一旅张竭诚和教导师第二旅于渊部。刘兆藜旅调绝竹汉旺场整补。第六路军控制在安县、绵竹境内的二线部队还有田钟毅、佟毅、王纯一、邓和连同刘兆藜5个旅。

在江油方面，川军许绍宗纵队的主力在5月8日前后到达重华堰，其一部进出茧市坝，两河口、新店子之线，数次攻击窦圉山红军据点未逞。约在5月13日晚，窦圉山红军主动撤过涪江右岸，许绍宗纵队于次日占领窦圉山，推进至阳亭坝作渡河准备。

5月21日拂晓许绍宗以暂编第二师彭韩部和杨晒轩旅之任建勋团，利用江中沙碛作跳板，在江油城的掩护下，由阳亭坝强渡。另一部利用三合场溪流作好渡河船筏准备，向中坝强渡。经一度战斗，红军主动撤退。8时左右，两渡河点的川军先后到达右岸。9时许红军主动撤江油之围，川军占领塔子山，困在城内41天的杨晒轩才与任建勋取得联络。江油、中坝的红军于5月上旬完成掩护主力渡过涪江的任务，放弃了塔子山以南的小三角洲，但江（油）、中（坝）道上和官渡、沙窝子尚留有小部队活动。并继续控制观雾山、陈塘观、公子坪、野猫城以北和青莲渡大三角洲。许绍宗在5月底才打通江油、中坝的道路。

伏泉山、千佛山的红军在完成掩护和牵制任务后，6月中

屯，开始逐次由东到西放弃阵地。6月17日，伏泉山的红军主动放弃伏泉山。久滞江油的暂编第二师周重生旅于6月24日以一部由邓家渡过河占领青竹坪高地。7月7日千佛山红军向三峰山第六路军第一旅青林团反击，占领三峰山；13日红军主动撤出千佛山，川军第一旅进占千佛山。同日第六路军独立第五旅田钟毅部在红军主动撤退后进占横梁子，14日占领观音梁子。红军阵地至此全部放弃。第二路军李炜如旅进入北川城。红军在北川河左岸地区的各据点也先后放弃。川军暂编第二师彭韩所部随之陆续推进至陈家坝、豆蔻寺、开平镇、马槽等地。

7月，第六路军王缙绪以第一、第三两旅发起追击，7月17日经墩上到土门，22日上午到茂县，即停止下来。

从5月1日红四方面军占领伏泉山起，到7月13、14两日主动撤出全部阵地止，共经历了70多天。在此期间，除邓锡侯部林翼如在大垭口战败的4个团，游广居在皇宫山、大坪8个团和香水河防3个团不计外。参加堵截的有：王缙绪部11个旅（计32个团）约6万人；孙震部有12个旅（计35个团）约5.3万人；许绍宗部5个旅（计13个团）约2.8万人。总计14.1万左右。

板桥沟、獐坪战斗

陶凯所部在土门被歼，陶本人逃至雁门关，仅收容到500至600人，编成一个营，临时指定营长何方璧率领。适孙燮林率第二十五团第一营张冠群、第二营赵直到达，即以何营拨交孙团统一指挥。同时接“剿总”电令飭即收集残部在汶、威道上，扼险拒止红军南出汶、灌，以掩护第三路军敖向荣率两旅到来。红军通过茂县继续前进，陶凯仓皇率孙燮林团到威州南约12公里汶、威道上之板桥沟南侧，命孙团占领阵地阻止红军。当决定从向阳坪北侧山腹横跨桥南大道，左翼依托岷江，而阻溪流，以何营在右，赵营在中、张营横跨大道，左至江岸，占领阵地，构筑工

事。几天后第三路军李注东旅的先遣部队耿伯萍营到达，暂归孙团指挥。孙燮林以耿营接替张营正面，抽下张营为预备队，位置在营后的向阳坪高地，构筑预备阵地。陶凯沿途又收容到溃散官兵约千人左右，在张营后占领二线阵地。

5月20日以后的一个拂晓，红军第二十七师以优势兵方向孙团进攻，激战半日双方伤亡很大，至13时，何营阵地被红军突破，张营派第一连增援，还未加入战斗，何营已斜向赵营右后溃走，而且张营第一连之一部也随之逃跑。孙燮林急命张营进入预备阵地抵抗。由于何营溃退，影响赵营阵地被突破，红军顺势横扫，抄至耿营右后，形成三面夹击，将耿营压迫在江岸全部歼灭，耿伯萍跳岷江溺毙。约在14时左右红军猛攻张营阵地，反复冲杀，该营一度出击，夺得红军连旗一面。红军大部兵力转向猛攻，终以伤亡重大，孙燮林亦负重伤，最后剩40余人向灌县逃走。陶凯新收容占领二线阵地的1000人，全是惊弓之鸟，在张营最后挣扎时，即已争先恐后向灌县逃跑。

陶凯到灌县二王庙，收集败残官兵仅1200余人。当初土门的8个团、一个马队共1.2万余人，经过3次惨败，伤亡、被俘、逃散，损失达1.1万余人，占全数90%以上。

陶凯所部被歼，第三路军敖向荣部接了上去。敖向荣率两个混成旅到灌县后，即以第五混成旅李注东所部在前，经汶川向茂县前进。跟着又派第二混成旅第五团（团长杨显铭）增强第五混成旅的战斗力量。到汶川时，耿伯萍营已被歼，第五混成旅驻汶川和棋盘（七贤）关附近，第五团推进至威州防堵。6月初，敖向荣奉命派第四团（团长龚彬）、第六团（团长汪仲瑜）由汶川城南索桥渡岷江越岭岗山到理番（现在的理县）追击红军。第六团进至獐坪，第四团到达岭岗山上，时值旧历端午，两团就地停止下来过节，红军乘其松懈，利用端午深夜，突将两团分别包围。岭岗山的第四团发觉被围时，红军已插入要害，仓皇应战。混战至晓，第一营营长罗华被击毙，全团官兵伤亡过半，团长龚彬和第

二、第三营营长分率残部，突围逃跑。在獐坪的第六团，混战至拂晓，团长汪仲瑜率少数官兵突围脱逃。两团大部分别被歼。在威州的第五团亦在同一时间，被红军包困于大尖山全部歼灭。

川西北防堵之役

奉 伯 常

嘉陵江涪江堵截红四方面军

1935年3月中、下旬，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军等部，在川北不断突破刘湘四川“剿匪”军第二路军（即川军第二十九军，总指挥田頌尧）何德隅部的嘉陵江河防，先在苍溪县境内，架起三个浮桥大部队渡河。第二十九军无法阻御，田頌尧在3日后才将战况电告国民党中央、四川“剿总”及友军。“剿总”刘湘闻讯后，即令第一路军（即川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兼总指挥邓锡侯）增兵固守川陕路，并协助第二路军合击渡江红军。邓锡侯当即亲率第一旅（旅长杨晒轩）、第四旅（旅长龚渭清）、第六旅（旅长黄整）、第九旅（旅长李树华）共8个团，直趋剑阁。并令其驻广元的前敌副指挥、第四师师长杨秀春，派得力部队进驻汉阳铺、剑门关一带，扼守川陕路绵阳以西至广元全段，阻止红军北上。

殊4月初，邓锡侯率部至梓潼县时，即闻第二路军守剑门之刘汉雄师，已弃城向西北逃跑。红军已攻占剑阁，并向剑门关进击。邓锡侯见控制川陕公路阻止红军的打算已不能实现，乃令黄整旅守卫梓潼，李树华旅守卫魏城，杨晒轩旅守卫江油，龚渭清

——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师第九旅副团长兼营长。

旅以一部守卫中坝，以另两个团及警卫团为预备队，随总指挥部驻绵阳策应；并令前方杨秀春师派总预备队、宪兵司令刁世杰部，死守剑门关隘阻击红军。

杨秀春奉令后，即令刁世杰率该部第二团（团长陈麟昌）、第三团（团长汪良），并指挥第五旅第九团（团长杨倬云）与第一师（师长陈鼎勋）的李建营，担负剑门关阻击任务。

剑门关地形是北险南平，由陕南到川北一段，是断崖绝壁的七十二峰，绵延达20余里，一般悬崖峭壁在20丈上下，最低的小吊岩也有十来丈高，素有剑门天下雄之称。两面高山中之小溪间设有关门，有一条通道约半华里可到达关门，大道也只有一条独路可供进出。在刀矛时代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从汉阳铺到剑门关，自南向北，从上到下并无险阻。从汉阳铺至剑门25里处名范家坡，缘此坡下山名范家沟，是一条由高到低的深沟，右为七十二峰大山，左是范家沟到姜维庙后山（相传三国时蜀将姜维战死于此）。范家沟口即为剑门驛场口。

刁世杰率队赶到剑门关后，即派杨倬云团防守范家坡至姜维庙后山；陈麟昌团的廖预章营防守姜维庙；汪良团防守汉阳铺；陈麟昌团（缺廖营布防）大木树至昭化天雄关一线，配合第二路军吕康旅防守。另有陈鼎勋师的李建营赶到为预备营驻关内。刁世杰之指挥部驻关外约5里，位于深沟内的自公寺（两面高岩，只一条独路通昭化之宝轮院）。

红军有3个团从黄金沟强渡过江，占领打鼓山、三座山一带，以两个团从沙坝河直攻剑门关，一个团进攻范家坡。

范家坡是邓部杨倬云团谢经武营防守，谢营与进攻红军激战后被击溃，谢率残部官兵80余人逃出关外。红军一直尾追谢营至关门将其占领，并用自动步枪及手榴弹控制关门，然后全力向姜维庙后山一带进攻。

另一团红军占领姜维庙的高山，同杨倬云团另外两营及廖预章营反复冲杀多次，拚刺刀和手榴弹，肉搏血战。杨团和廖营的

余部，被压迫退至姜维庙左侧一山沟内，李建营赶来增援。由于地小兵多，秩序混乱，失去战斗力，团长杨倬云和营长姜孝恩、廖预章、李建等以下五营官兵（除先逃出关外的谢经武营80余人和营长刘石甫外）全部被歼。杨团副团长张又巡，因逃入农家化装为农民而得免（这些情况是后来由张本人口述的）。

红军进攻姜维庙后山最激烈时，枪声及手榴弹声，从山谷中的回音震及自公寺，刁世杰以为红军已到达，便仓皇率卫兵从夹沟逃至昭化宝轮院，随即退过白河。邓锡侯第一路军在前方的14个团，在前敌副指挥杨秀春指挥下，两面设防，一面扼守白河左岸，一面扼守嘉陵江右岸。

另一团过江红军沿江向昭化横扫，在天雄关、牛滚荡一带，把田颂尧第二路军吕康旅打得溃不成军。第一路军陈麟昌团的何宣营长当时跳岩，藏入农民家中，化装成农民得免。陈团残部退过白河，在长岭岗收容整顿。红军追至白河停止。汪良团在汉阳铺闻知剑门守军全部被歼，剑阁县城早被红军主力占领，南北退走无路，被迫冒险从剑阁七十二峰中之小吊岩（在剑门关右翼），结绳、攀藤吊岩而下，逃过白河。坠岩时，官兵死伤多人。

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攻占剑阁、剑门关、昭化等地之后。一面从白河右岸搞些竹筏、木板，并喊话、打枪，表示要进攻隔在白河左岸之邓部的态势，实则按兵未动；一面以主力从川陕大道分路直攻梓潼、江油两县。4月中旬，红军一部在梓潼城外大庙山，击溃守军邓部黄鳌旅，占领了梓潼，但对魏城黑虎寨只进行佯攻，邓部李树华旅因而守住魏城。红军另一部则挥师西上，经崇化堰等地，直趋涪红上游，在江油以北地区渡江，占领江油城外大山，围困江油县城邓部守军，使川西和成都为之震恐。邓锡侯见战局如此发展，慌忙亲率龚渭清旅及警卫团等后方部队共8个团，由绵阳经中坝向江油增援进攻，企图解救守军杨晒轩旅之围。殊不知仰攻到江油后山（观雾山）的半山时，遭到红军大部队由山上及两侧组织的反击。经过14、15两天的激战，邓军大

败，被歼4个团，被俘众多，旅长龚渭清在撤退时腿部受重伤。因警卫团尽力掩护，红军才未穷追。是役，邓部还有从广元、三台调回之第十二旅（旅长林翼如）和第十三旅（旅长陶凯）参加。

第一路军随即奉令沿香水设防，阻止红军南下川西坝。4月中旬以后，红四方面军十万之众乃从涪江上游渡河，主力部队分别北上松潘、西向理县、懋功等地进军，其后卫掩护部队围困江油40余日，始行解围转移。第二路军吕康旅和张熙民旅，曾在北川山边擂鼓坪进行阻击，两次被红军击败。第一路军陶宗伯（即陶凯）旅，也曾以4个团在松懋道上岷江左岸土门地区进行堵截，亦被红军猛烈反击，伤亡千余人，团长孙燮林被击毙。红四方面军乘胜前进，直趋松、懋地区，同北上到达的中央红军会师。

翻越夹金山尾追中央红军

1935年5月，邓锡侯的第一路军撤回北道部队后，即奉令会同川军第二十军杨森部和刘湘“剿总”所属其余部队，在川西南天全、芦山、宝兴一带，防堵和追击正在北上的中共红军。邓锡侯派杨秀春为前敌指挥，负责指挥第四师林翼如旅，第一师卢济清旅、第二师黄整旅、第三师刘乃铸旅和李树华旅及特科司令游广居的第二旅（旅长刘万抚）和警卫司令谢无圻的第二团（团长李勋伯）、第四团（团长牛春浓）等部，前往川西南执行堵击和追击红军的任务。殊不知我军部队到达天全、宝兴境内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越过，因而只由李树华旅配合第二十军杨森部队会攻宝兴县城的红军后卫部队。杨森部从正面灵官进攻，李树华部则从太平场出发，翻宝兴后山（龙岗山）老林进行侧击。红军后卫部队在受到正、侧两面夹击的情况下，随即北进碓磑，翻过夹金山。杨森部继续翻夹金山进行追击。邓锡侯也派李树华旅的金晓六、谭尚修和林旅溇联承3个团配合追击。

7、8月，李树华旅在尾追当中，曾秘密传达红军朱德总司令给邓锡侯的密信，信中大意谓：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旨在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能，希望互不干扰等语。随后又奉到邓锡侯下达的密令，要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日距离，既不失红军行踪，也不认真阻击，只要能上报应付就算了事。因此在尾追途中，红军停我停，等红军走了又才前进。每日侦询土人和因伤病散失的红军，了解中央红军走向，上报应付蒋中央。结果，李旅只在小金川的两河口与后卫红军略有接触，双方均无伤亡，迨红军转移后再前进。当时，因道路十分险阻，10月大雪封山，邓部后方兵站粮食补给不上，背一袋米到达前线，民夫就要吃去2/3，生活异常艰苦，被服、医药更感困难。当地少数民族又纷纷逃入老林，本地无粮食可拨补，只得叫士兵寻找野菜充饥，以致中毒者不少。我军报告蒋中央之电文曾说：饥无食，寒无衣，病无药。

笔者注：我在追忆此资料时，曾向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师长黄隄和旅长杨晒轩、龚清涛、林翼如以及团级军官黄爵高、黎时蔚、刘登选、桑述观等，核对有关史实。

在川北松潘截击红军的经过

李 炳 藻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为了突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决定率领红军长征北上。国民党蒋介石，除派大军尾随追击，并严令湘、黔、云、贵、川、甘、青等地方部队堵击外，又纠集中央嫡系部队第一师胡宗南部，第二师补充旅钟松等部，分由徐州、上饶、北平等地出发。经郑州、西安、宝鸡、汉中、阳平关、平武向四川西北部松潘、漳腊营、黄胜关等地集中，截击北上抗日的红军。

我当时在第二师补充旅任参谋主任。该旅系1933年由军政部保定编练处所属的三个步兵团编成，拨归第二师建制。旅长钟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浙江东阳县人，和蒋介石既是师生关系，又系近同乡。第一团团团长杨文璋是黄埔二期毕业生，四川人。第二团团团长邓钟梅是黄埔第三期毕业，江西人。第三团团团长李杰亦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江苏涟水县人。都和蒋介石有师生关系。唯独我这个参谋主任，既非黄埔军校出身，又系北方人，并且从杂牌军转到中央军的时间不久，和师、旅、团长都没有派系关系。

一 从北平出发到西安

第二师补充旅于1933年古北口抗战以后即驻防北平黄寺大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参谋主任。

楼。在1935年2月中，接到第二师师长黄杰由保定转来蒋介石电令，拨归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指挥，参加川陕“剿共”。于2月底由北平出发，乘平汉铁路火车，经郑州转陇海铁路到西安，下车后，驻西安城内及车站附近待命。由于蒋介石一贯利用机会，消灭异己，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陕西主席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对胡宗南大军入陕明知对己不利，但不敢公然拒绝，只得在表面上敷衍周旋，内地里另外打算。因此，当补充旅到达西安之后，杨虎城将军虽也派员热烈招待，并在新城大楼省政府设宴为我旅团长以上官长洗尘接风，但宾主之间总有貌合神离之感。当时负责招待的是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王根僧。宴会开始时杨将军才来，从始至终主客之间虚伪寒暄，对主客军的关系和“剿共”作战问题，始终未曾谈及。补充旅在西安休息3天，又奉胡宗南电令，着我旅徒步经凤翔、千阳、陇县向甘肃天水前进。行抵陇县马鹿镇，又改令经宝鸡到凤县待命。

此次，胡宗南率3个整师、两个补充旅的4万余人的大军进入西北，既没有总司令总指挥的编组，也没有总司令总指挥的名义，窥其意向，似有隐藏实力，迷惑红军和西北将领之企图。

二 蒋杨矛盾 避道行军

第二师补充旅在凤县休整一月有余。于4月初奉胡宗南命令经陈仓古道向阳平关前进。胡宗南为什么不叫我旅走宝（宝鸡）汉（汉中）大道经褒城、沔县到阳平关，而反令走多年失修的陈仓古道呢？因为这时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冯钦哉师和杨将军在汉中的仓库银行，正由汉中向宝鸡、西安移动。为了避免途中相遇，发生冲突，故令我旅避道而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旅由凤县出发时，由第三团李团长先一日出发，当晚接李团长报告说：“陈仓古道，多年失修，栈道破坏，不能行走。”钟旅长接到报告以后，即将道路困难情形电胡请示，接胡复电云“无论如何困难必

须遵行”等语，我旅没有办法只得遵命行进。

陈仓古道多年失修，羊肠小道坎坷不平，上有抬头不见顶的高山茂林密蔽，下有望不见底深涧流水潺潺。单人行走，勉强可通过。乘马、驮骡寸步难行。出发的第一天第三团就摔死骡马四五匹。迫不得已，只得通知各团，把驮架、驮鞍、重武器、弹药箱以及给养、行李都卸下来，由士兵抬运。空马驮骡放入山涧行进，水浅的地方乱石如林，水深的地方溺水而过。又兼天雨连绵，夜间没有宿营之地，一路之上整箱的弹药、整袋的白面丢失无数。三天三夜的行军走垮了整个部队。到达阳平关时，官兵浑身泥污，有的丢了帽子光着头，有的走烂了鞋子赤着脚，真不像个队伍的样子。在阳平关整顿队伍之后，又进驻四川昭化县的金山寺、白水街一带待命。

三 青木川地主豪绅倒算报复之惨状

第二师补充旅在金山寺休整了20多天，又奉胡电令，经川甘交界的姚家渡、碧口镇向川北平武县前进。我旅到达四川青川县时，胡宗南和第一师、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三个部队已先到达。我随同钟旅长到第一师司令部见胡宗南，胡概略指示说：“共军四方面军主力已沿涪江南岸西上，平武附近留有小部队。你旅仍为先头部队向平武前进，行进时应特别注意搜索警戒。到达平武后，即在平武城构筑工事，进行防御。”我们从胡的司令部出来之后，仍继续西进。沿途经过青木川、黑水口许多村镇，都是红四方面军解放过的地方。红四方面军撤走了，地方民团团总、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又猖獗起来，倒算报复，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我们路过青木川时，寨门上还挂着几个红军地方干部的人头，区公所里还扣押着几十个参加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凡是参加过红军运动的人家，房屋都被烧成平地，残垣断壁惨不忍睹。听老乡们说，还有不少青壮年和民兵，躲在深山密箐（山上丛生之细

竹)不敢出头,无衣无食,只有饿死在深山老林之内。当我旅在青木川宿营时,有一当地张姓团总,带着几十条枪(几十个武装团兵),坐着滑竿,神气十足地到我们旅司令部来拜访钟旅长。情愿尽义务做“剿共”向导,并介绍了很多红军情况及当地山川形势,和钟松搞得十分亲密。我旅到达平武后张某始辞去。

四 平武对峙

平武城东、西、南三面环涪江,北面倚山构成,居高临下,形势险要。钟旅到达平武后,即凭借城内北山和城垣构筑工事,隔涪江与红军对峙。据侦悉涪江南岸红军人数不多,防御工事很简单,只有迫击炮一门,不时向城内射击。我们为了节省弹药未予还击,亦未发生过激烈战斗。我们到平武不久,胡宗南和第一师、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均经平武开向松潘。钟旅为驱逐对面的敌人,征集很多竹竿和篾匠,编制大批竹筏。在步机枪掩护下,以一个营的兵力,强渡涪江。未遇坚强的抵抗,红军就撤退了。我军占领了几个村庄,老百姓都逃入山中。占领时间不久,即自动撤回江北。在对峙中,沿江哨兵曾捕获一个赤身泅水渡江的农民,送交旅部。经少校参谋施毓讯问。该农民语言不清,只说住在北山里,问不出别的口供。我主张先把他扣押起来,探访他的家乡住处再行处理。施毓说,赤身偷渡,一定是红军的探子,不打哪能招认,便喝令卫兵把农民吊在屋梁上,亲持皮鞭抽打,只打得死去活来,结果什么也没有问出来。

五 松潘集中

第二师补充旅于驱逐涪江南岸红军之后,奉命向松潘集中。由平武到松潘,须经过雪宝顶(亦名小雪山),标高4578公尺,系四川北部的最高峰。据土人说:由小雪山东山脚下的姜精

铺到松潘上下约百里（上60里下40里），早晚不能行走，只有早8时到下午4时可以通过，在上山前须喝姜糖水暖暖肚子，不然上山遇到风雪，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到达姜糖铺也做了一些登山的准备。在登山的时候，并没有遇到风雪，只是空气稀薄喘不过气来，走上几十步就得停下来休息休息，若勉强行走就要头晕呕吐。爬到最高峰时，正值中午12时，远望西南方向的大雪山，雪天相接，白茫茫不分天地，日光照耀光华夺目。下山时山坡陡峻，脚不停趾就到了山下。到达松潘的次日，即奉命接收松潘西门外第一师防地，增筑碉堡加强防御。当时我旅司令部住城内第一中学。第一师部队担任城北城东防守任务，第四十九师担任漳腊营防守任务，（补充第一旅任务不详）。这是胡宗南布防的概要情况。

六 放午炮吃饭

松潘系番汉杂居，城内多为汉人，城外均系番族（自称西番）。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寒冷，盛产青稞和小麦。青稞性寒，外地人吃了多患腹泻之症。部队所需米面，必须由四川江油县用民夫挑运而来。由江油到松潘约四五百里。且山路崎岖，行走不便，壮夫挑粮每人可挑百斤，弱者只挑七八十斤。除沿途损耗一部分外，到达松潘每挑平均七八十斤。因此军食缺乏，士兵日不得一饱。胡宗南玩弄了一个欺骗官兵的花招，下命令说：“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而胡宗南本人，除每天放午炮陪着司令部官兵吃一顿午饭外，高等饼干罐头足吃足喝，另外还有地方士绅请酒请饭。我们旅司令部每天仍吃三餐，没有挨过一顿饿。只苦了一般下级军官和士兵而已。

说到挑米的民夫，更是苦不堪言。白天挑重爬山，食不饱腹，夜晚没有被盖御寒（穷苦旅店没有被盖，只有用山条编成的

山笆，在笆上铺一层小草作为被盖)，病倒者比比皆是。死了的扔到山涧喂狼，病重的脖颈和腿湾用麻绳兜住，像抬猪一样抬着走。这种惨状，真是亘古未闻。

另外第二师补充旅第一团步哨，曾查获红军逃兵一名，据供说：他是某副师长的勤务员，身穿很完整的布军服，图囊内装军用地图一张。该图系用毛笔绘制。图的内容系川、甘、青三省边区部分，图上所绘的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在国民党军军用地图上均没有记载。看了这份地图，对松潘以西草地情形了如指掌，在军事上有很大的价值。这份地图，绝非短时间仓促可以制成。据说是红军地下人员，在红军入川之前，扮做货郎深入草地画成的。在讯问之后，即将该勤务员和地图，转交第一师司令部。

七 毛儿盖和黄胜关的不战而溃

1935年8月，红军主力越过大雪山，行将接近松潘之时，胡宗南曾派第一师的一个步兵营（营长李日基），到毛儿盖（松潘正面约百里）布置防御。并令正在向松潘前进的第六十师，赶赴黄胜关（松潘以北约百里）一带布防。因恐第六十师不能及时赶到，临时改令第二师补充旅前往。我旅接到命令，正在交代防务准备出发的时候，第六十师赶到了，我旅仍担任原防。据闻红军接近毛儿盖时，胡宗南给防守毛儿盖的李营长去电报说：“电到后该营即刻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10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20元。”李营长将电报译到“并将电台砸毁”，就没往下译，砸了电台，仓皇撤退。回到松潘，司令部副官处通知他去领赏时，他还不知道领什么赏呢。又听说，第六十师于黄昏前到达黄胜关一带时，因人地生疏情况不明，仓促布防，甫与红军接触，就溃回漳腊营。

1935年10月，第二师补充旅接胡宗南命令说：“共军主力已越

草地北上，除派队向南坪（在川北甘肃交界）追击外，着该旅开回徐州，归还第二师建制。”我们回到河南郑州时，又奉第二师师长黄杰命令，令我旅开到商邱车站和商邱营房整训。我旅由北平出发时，正值1935年新春佳节，到达商邱时，又值年终腊月，1936年新春就要来临。征鞍甫卸，又过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

八 雪山脚下的冤魂

第二师补充旅，奉令回防之时，已到1935年10月换棉服的季节，而棉服尚未运到。又兼士兵们吃不饱饭，受不了西北高原冷风的袭击，病号非常的多。在出发前，我们旅也作了一些对病号的处理：（一）不能行动的重病号，移交师司令部野战医院医治；（二）能行动的轻病号一百余人，提前3日出发，并派人护送。按雪宝顶的坡度，身体健康的人爬起山来还很吃力，何况病号呢！仅爬了十几里，都筋疲力尽冻饿而死。经护送人员把尸体抬到断垣残壁之内，并排着用军毯盖起来。部队行抵此地，看到这种惨状，真令人伤心落泪。只有我的勤务兵，得到副官处的特别照顾，用担架抬过了雪山，侥幸保全了性命。

第一师参加松潘战斗简记

王 应 尊

1935年夏末秋初之际，红四方面军有西进迹象，同时中央红军亦已进至大西南地区，大有在川西会师的可能。蒋介石除派薛岳指挥大军随红军后面追击外，还下令胡宗南第一师在川北青川、平武一带集结，准备截击红军。同时又指派了几个师归胡指挥，计有第一补充旅王耀武、第六十师陈沛、第四十九师伍诚仁和第二师的补充旅钟松。以后得到中央红军由川西北上的消息，胡部立刻星夜向松潘急进。在胡部先头李文旅到达松潘时，红军一部也已到达，于是在松潘南方山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这一战斗持续了几天，由于胡部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占领了松潘城，并马上作了以下部署：第一师守备松潘，第六十师守备漳腊，第一补充旅守备南坪一带。并由第一师派李日基营挺进毛儿盖打算固守，以后又令第四十九师伍诚仁开往包座。这些部队为了把红军堵在草地，都就地构筑了深沟高垒的坚固工事。蒋介石满以为这一下可以把红军置之死地，没有想到伍诚仁师开往包座，还没有到达就被解决了。李日基在毛儿盖占据了一个坚固的大庙，但是被红军打得没有办法，请示胡宗南，胡要他把枪埋在地下，人设法逃回，结果人枪全部丢掉，李日基只身逃回松潘。在松潘附近，胡幻想向西出击，但派李铁军旅还没有走一天就被打回来了。胡在松潘不仅军事上束手无策，补给上也发生了很大困难。粮弹都是从碧口和绵阳一带，捉派民夫运送的。民夫运到松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师第三团代理团长。

潘，除去途中吃去的以外，剩下的一半还不到，更不用说民夫回去的食粮了。粮食这样困难，怎么办呢？只有就地筹购，但当地的出产主要是青稞，而青稞内地人吃不惯。因此，稀一餐，干一餐，饱一餐，饥一餐，结果不是饿病，就是胀病，设在松潘的野战医院，每天都要死亡二三十人。粮食如此困难，菜蔬更不用说了。胡部第三团（当时我代团长）有一个班，因为没有菜吃，跑到田野里挖野菜，吃后全班中毒而死。处在这种情况下，胡部官兵情绪十分消沉。这些部队摆在松潘一带，实在不堪一击。

是年冬，红军北进部队，在四川和甘肃交界的地方，突破了险要腊子口，击溃了鲁大昌的部队以后，继续北进。这时胡宗南又奉蒋介石的命令跟踪追击。到达甘肃省的甘谷以后，由于陕北红军一部由陕西渡黄河东进，山西形势紧张，于是命令胡部停止下来，准备东进。

第一师追堵红军的经过

彭 竹 林

1932年秋国民党军第一师由湖北黄陂汪洋店追击红军到汉中以南地区。我当时任第三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1933年夏在天水调为本团第二营上尉营附。1934年秋在成县调为本团少校团附。现将我亲身参加或者目睹耳闻的事实述写如下。

一 胡宗南乘机入西北

胡宗南驱使第一师于1932年12月追击红四方面军到汉中东南地区——牟家坝、巴峪关一带的时候，已届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不但给养困难，而且红军早已进入川境大巴山地区。紧追吧，恐怕步张辉瓒的后尘；向后转吧，跑了几个月，又一无所获。正在此时，又发生两件使他大伤脑筋的事情：（一）四川军阀田頌尧等派代表向胡宗南名为取联络实则拒绝的说：“小小几个红军，川军可以彻底消灭，毋庸中央大军进剿。”（这是田等怕蒋介石借“剿共”侵占四川地盘的手法）。（二）蒋介石派专机为第一师送款（据说是10万元法币），到汉中空投时（当时已有第一师部派有军需在地面上铺有联络布板符号），适驻军赵寿山部有一个营的部队在那里出操，见大批钞票从飞机上（散了包的）飘扬而下，落到他们的头上或脚下，即禁不住地乱抓乱抢，搞失了一两万元。后经多次交涉，部分交还，还有八千多元不对数。这事听说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师第三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后任第三团少校团附。

弄得赵寿山旅长很难过。结果在汉中监狱里提出一个死囚，冒作是那天抢钞票士兵的营长枪毙以了事。因此，胡宗南这时实有陷于前行川军拒绝，后有陕军为难，进退维谷之苦闷。

但是，胡宗南却乘此机会向蒋介石说：“汉中是危地，不可久留。”请求蒋介石下令把原甘肃天水杨虎城部孙蔚如军撤回陕西，让他把第一师带进甘肃，作为他阻击红军北上的根据地。胡宗南的这种请求，也是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早就想把嫡系部队渗入西北，只是一时不便冒昧从事，恐怕引起西北各方面的不安，特别是怕惹杨虎城部队的多心而发生意外。今在“追剿”共军，充实西北防堵力量的借口下，把第一师塞进甘肃，正适合蒋的意图。胡的请求因而获准。

1933年春，胡宗南带着第一师占据陇南后，以中央嫡系部队自居，威胁西北所有的杂牌——如杨虎城、邓宝珊、鲁大昌，特别是回族的马家部队。但是，人地生疏，孤军深入，既怕红军突然来袭，又恐杂牌部队与其为难，胡宗南不能不考虑对付这种环境的兵力部署。他除将原有第一、二两旅的六个团照旧不动外，又将原有暂编第一、二两个独立团，连同新由河南调来的一个补充团，合编为第一师独立旅。这就把全师变成三个旅九个团了。同时另以一个补充团和一个补充大队的名义，常驻在郑州，不断在河南和两湖招募新兵，随时补充部队的缺额。

当时他把第一旅李铁军部第一、二、三团，分驻徽县（旅部住此）、成县、康县、两当县和陕西之略阳县；第二旅袁朴部第四、五、六团主力驻天水，其余分驻甘谷、秦安、马鹿镇；独立旅丁德隆部暂编第一、二、三团分住碧口（旅部住碧口）、姚家渡。胡宗南师部和其直属部队——如炮兵营、工兵营、骑兵连、特务连、通信连、无线电排、童子军队（这个队的成分，主要是第一师在汉中时，胡宗南以招学兵的名义，骗来的一些高小毕业生和在初中肄业的学生；其次是在本师各连队中挑来的年龄太小的士兵，以及在沿途俘获来的几个红军幼年兵等一百多人合并编

成的，后来陆续转入西北军官训练班）驻天水。最大的辎重营，其中除有挑夫一千多名外，另有骡马队、骆驼队、大车队等，四季不停，风雨无阻，绵延不断地在咸阳与天水之间，担任军事物资的运输，故意炫耀第一师的兵力雄厚，军事充足。蒋介石还特予配备战斗机两架，经常停在水东门外飞机场，除专供胡宗南乘往南京或兰州外，并不时担任川陕甘边境的所谓“敌情侦察”。

全师9个团，在陇南分占十多个县和城镇，形成“攻势防御”的所谓犄角之势。并由各团加强武装便衣队（四五十人不等，携带各种短枪和手榴弹），在各团防地和其他广面积地搜索与游击。当时通讯联络的方法，是以无线电为主，有线电话只是用在短距离方面。

这时，我是单独一连住在甘肃两当县。这个县虽是个小县，但是它处于陕甘交界的要冲。主要任务是防止红军地下工作人员出此进入陇南地区活动，其次是监视杨虎城部的行动。我连住此不到两个月，我曾指使守城门士兵盘查往来行人，并会同县警察不时清查户口和巡查歇店等，前后共抓到红军地下工作人员12人。这些人都由我派兵押送徽县团部，后来大部分转解天水师部军法处关押或枪杀了。

二 广元堵截，处处挨打

1935年春，当中央红军由四川继续北上之际，蒋介石一面派薛岳、吴奇伟等军会同川军由南向北跟踪追击，一面令胡宗南在川陕甘边境上就近择要堵截。同时，红四方面军也有西渡嘉陵江作战的迹象。胡宗南当即先遣第一团李正先部由甘肃徽县驻地赶到广元，占据广元以西之乌龙堡，企图凭借嘉陵江险阻，使红军受到前后夹击，一举而歼灭之。第一团虽然得到乌龙堡先制之利，一再顽固抗拒，但没有阻止红军渡过嘉陵江，反被红军包围在乌龙堡里，被痛击了两天。胡宗南先后指派原先摆在阳平关、杨木

坝一带的两个独立营，就近驰援解围，但都遭到红军埋伏部队在中途分别拦击，大部分被缴械或打得四处逃散。后来当第六团李用章部赶来时，红军已全部过江，向西畅行无阻地继续前进了。胡宗南不但没有达到歼灭红军的目的，反使两个增援的独立营被歼殆尽，而第一团也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伤四五百人之多。

胡宗南盘踞陇南两年多，认为经过整军经武，械精粮足，人强马壮，可以战胜任何敌人。诨知一碰到红军，被打得东逃西散，损失大半。胡宗南再也不敢派遣一个团或一个营单独挺进深入了。因此，蒋介石命他由陇南向川西北中央红军追击时，他首先将原住碧口的独立旅丁德隆部先派一个团占据姚家渡，掩护师右翼开进，命原驻徽县的第一旅李铁军部第三团先占据略阳，掩护师左翼开进，迨全师部队集结于姚家渡与略阳之间地区后，才敢开始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

这时我在第三团当少校团附，负指挥团部武装便衣队在红军附近活动和收集本团各营情报向上汇报的专责。1935年3月，团部占据略阳仅20多天，由各营和便衣队抓来红军地下工作人员，我指使团部上尉副官陈政，用各种酷刑苦打成招，先后共枪杀了七位红军地下工作人员。第三团在略阳的掩护任务完毕，于4月开始向阳平关逃犯时，红军早已前进。追到宁强时，发现县城背后高地有堡垒几处和少数人活动，团长严明命第三营包围攻上，当时除伤亡数名和冲走一部分外，共俘获红军20余人。

三 追剿逞凶，又挨两棒

第一师在广元附近失利，使蒋介石也大吃一惊。因此，蒋介石很快地由各方面赶调几个师来西北同第一师合编为“西北追剿纵队”，以胡宗南为“追剿指挥官”。计有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第六十师陈沛部，第一补充旅王耀武部。这三部分各有9个团，加上第一师9个团，连同各师旅的直属部队，共约4万人。这些部

队的各级主官，十有八九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武器精良，装备充实。胡宗南首先拿第四十九师打先锋，抢先占据毛儿盖，企图迫使红军转向东南。另以第一补充旅和第六十师由碧口南坪向川西北之漳腊方向堵截，阻止红军北进。他自己驱着第一师在红军后尾追击。胡宗南这一部署的目的，是想迫使历经万里迢迢、精疲力竭的红军，在无法通过渺无人烟、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草地时，进入他的预定（毛儿盖与松潘之间）包围圈，一网打尽。胡宗南于1935年5月由广元开始，向川西北前进的红军追击，一路不停地经平武、青川、摩天岭、黑水沟，到达离松潘约四五十里之火焰山东麓时，忽由其先头部队传来报告，第一师追击的先头部队——第四团在松潘西南约十余里之深沟里，遭到预伏红军的夹击，无法脱逃。逾胡宗南派去的驰援部队赶到，红军已不知去向。第四团第×营营长刘兆鼎阵亡，第三营营长吴剑非负重伤，其余死伤连排长以下官兵300余人。第一师挨了这一棒后，胡宗南不敢追击了，只得暂在松潘停止，一面令各部就地赶筑防御工事，以防红军来攻；一面令各单位加紧准备粮草。正在喘息之际，忽又接到第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在毛儿盖被红军包围，无法冲出，请急救援的电报。据师部参谋处的人说，胡宗南得到这个急电后，急得在房子内乱打转。他对参谋长于达说：派部队救援吧，不但时间上来不及，徒劳无益，而且怕在半途被红军拦路吃掉；不去吧，又恐蒋介石责他坐视部队受危不救。延到第二天，派第一旅李铁军率领所属第一、二、三团去增援，凑巧白天下雨，晚上晴天，草原上的道路泥泞难行，走了两天，还不到百里路程（据说距毛儿盖还有一百多里，草原上渺无人烟，而且没有一块干地）。到晚上宿营时，李铁军接到胡宗南的急电：“四十九师在毛儿盖全部被红军缴械，该旅严加警戒，并限星夜赶回松潘原住地待命。”李铁军不敢稍迟，连夜向回转，回到松潘时，伍诚仁已只身脱逃回来了。

胡宗南当了指挥官不到5天，在松潘与毛儿盖两地，接连吃

了两次败仗，特别是第四十九师七八千人全部被歼灭，吓得他只得把剩下的各部队，集结在漳腊、松潘很狭小的地区，苟且偷安，暂取防势，以待命令。

四 麇集松潘，纵兵殃民

松潘的土地面积虽大，但是它毗连青藏高原，地广人稀，荒凉地多，产粮很少。靠近平坝地区虽然产点粮食，也是青稞、大麦、豌豆等杂粮居多，而且绝大部分被地主、土司作为地租夺去收藏起来。因此，当地90%的人民连杂粮也吃不饱。于今忽陡增军队人马四五万之多，更是造成粮草极其缺乏的灾难局面。胡宗南不顾当地人民的死活，利用藏族土司喜爱枪弹习性，给他们些步枪子弹，假他们的势力在藏族居民区搜刮粮草。但还是无补于事，又强迫松潘县长按乡保甲强派成百上千的民夫，到江油、绵阳等县去担运粮食和倒换银元（松潘老百姓不要法币），这不但时间上来不及，就是每个民夫所担运的粮，除他们往返20多天所吃的口粮外，实际运到松潘的所剩无几。到这时，不管胡宗南有多大本领，也解决不了每天需要6万斤粮食的困难，最后只得下令各团营连队，在自己住地附近采购。当地民间不但无粮可买，而且人民不信法币。这样一来，各单位只有纵使士兵到处搜抢。因抢粮夺草，到处枪声不绝于耳，吓得村民逃避一空。这些士兵还把地里尚未十分成熟的小麦、青稞、豌豆等，不问青红皂白，一根不留地扯尽吃光。有些穷苦的老汉和老大娘站在自己种的地头边哀求说：“好老爷们，扯一些，给留点吧！我们不吃不留种都没关系，但是今年对老板（指地主）、土司的佃租不能不交啊！”当时军队团长以下的部队长，还黑着良心，把每次领到1/3的银元，隐瞒起来，伙同各自的军需副官到漳腊（该处有人工开采的金矿）偷买金子，我当时已由少校团附调本团第二营当营长，也把领到的银元，指使营部副官买了一两多黄金，我分得8钱。本营连长也

各自买了三四两之多。同时我还召集各连长议定每连派武装兵一班，由特务长带班，统归营附陶金标率领，到较远的山区去搜粮。有一次除抢回粮食一千余斤，并抢来六头牦牛、绵羊七八只。

五 损兵折将，回师甘肃

胡宗南向红军围追堵截了半年之久，不但没有阻住红军北上，自己反而接连挨了两大棒，共损失人员1.2万以上，各种枪炮七千余枝。同时在松潘以西高原地区，因气候不正常，粮食缺乏，营养不够的影响，以致全师（仅第一师）生病死亡和送医院后逃跑的人数，总共有两团之多。当时有好多连队，一直没有参加作战，除病和死外，也只剩下五六十人，而且都拖得毫无战斗力。胡宗南受到这些损失后，感到既无法久留松潘，又不敢向草原深入，只有向蒋介石请准“调回甘肃整补，再图报效”。这才由松潘经漳腊、南坪、武山，于1935年10月底回到甘肃静宁集结。当时，胡宗南本想仍回到老巢——天水去，整补比较方便。但是陇南那块地盘，已由第三军王均部占据，第一师只有暂在甘谷、通渭、泰安等县乡镇呆着。当然，不管住在什么地方，“王牌”第一师为“追剿”共军所受到的损失，无不尽先、尽快、尽量地来补充。从1935年10月底集结，到1936年2月底，仅4个月的短时间里，在当时甘肃交通极为梗塞的情况下，所有损失的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等补充齐全。

六 潼关待命，阻挠东征

第一师集结在陇东之甘谷、通渭等县乡镇进行整训时，胡宗南又接到蒋介石的电令：“着第一师即日开到潼关集结待命。”第一师遂于1936年2月底由甘谷经泰安越关山，步行到达陕西之兴

平、咸阳等地，乘陇海路火车到潼关附近集结。未久，接太原“晋陕绥宁四省剿匪总指挥”陈诚给胡宗南的命令：“除派一个旅的兵力，进驻同蒲铁路南段各要点，担任维护铁路运输畅通，并竭力保持风陵渡的联络安全外，其余主力控置在潼关待命。”胡宗南当派第一旅李正先部第一、二、三团由风陵渡过黄河，在赵村搭乘同蒲路火车，分别到运城、闻喜（旅部和第三团住闻喜）、侯马等地下车。后因情况变化，第三团还到过洪洞和灵石，但不几天又倒回闻喜。在所谓维护铁路运输畅通的两个月的时间，所有同蒲南段的火车，除了日夜不停地载运士兵和军事物资的列车外，从未见过一辆客车和载运有关民生物资的车厢。陈诚当时在山西所指挥的军队，除晋绥军外，还从外省调进几个军，如他自己的基本部队第十八军和汤恩伯的第十三军等共约15万以上的兵力，都塞在同蒲路以西地区和晋绥的边境上，阻止红军东征抗日。所以陈诚把有关东西——平绥、正太线，南北——同蒲线等几条主要交通运输铁路线，都控制在“军事管制”下，视为他在晋绥的命脉。

七 回窜西北，继续反共

1936年夏，胡宗南接蒋介石电令在灵宝集中待命，后为威胁湖南何键和准备与两广部队作战而调长沙。在解决了两广李宗仁、陈济棠问题之后，1936年9月间，第一师又由湖南乘火车直达陕西咸阳、兴平等车站下车，不久赶到甘肃静宁附近集结。当时，胡宗南所统率的部队，除把原第一师分编成为第一师和第七十八师，两个师组成第一军外（第一师师长由胡宗南兼任，范汉杰任副军长，李文任副师长，丁德隆为第七十八师师长），还有第九十七师，共3个师合编为“追剿纵队”，仍以胡宗南为纵队司令官，直接归西北“剿共”总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指挥。

八 宁夏吃败仗，损失惨重

胡宗南把第一军部队集结在静宁附近，于1936年10月底开始由南向北前进，遭到刚抵宁夏地境的红军（据说是红四方面军）的“腰击”。当时派遣第二团（团长杨定南，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打前锋。第二团刚进入固原县境某高地，忽听到前面发生枪声两响，该团长即带着士兵两名，冲到尖兵连先头，打着望远镜，指挥尖兵连赶快追击。忽又从其侧面打来两枪，就把这个连敌人的方向都没摸清的团长的性命结果了。事后，胡宗南追查这种枪声到底从何而来，始终没有查出。他很惊奇地说：“双方部队尚未接触，一枪未发，竟把一个年轻的团长阵亡，可惜，可惜！”同时，他很气忿地大骂第一旅旅长李正先指挥无能，敌情尚未弄清，就把一个团长给断送了。并指责第二团营连长没有同仇敌忾的心情，看到直属长官阵亡，而不知追上去复仇雪恨等等。胡宗南恼羞成怒地向第一旅的官兵发了一通脾气之后，抱着要替杨团长“报仇”的决心，第二天把他的老基本——第二旅第三、四两团（他当过这旅旅长多年），调在前面打前锋，并召集全旅连长以上的军官训话说：“共军由南到北，已是精疲力竭，弹尽粮缺，而且人员损失大半，已成惊弓之鸟，没大力量了。由现在看起来，已是跑不动了。乘此他们跑得不远的机会，只要我们一刻不放松的穷追，一定把当面的这股共军消灭在黄河东南地区。”第三、四两团的官兵看到老旅长很相信第二旅的官兵，特地把第二旅调到前面打前锋，都认为很吃香，也就产生一种轻视红军的心理。1936年11月间的一天，第三团当前卫，团长刘超寰洋洋得意地赶到同心城之荫城地方。他接到尖兵连连长易定的报告称：“前方山口发现敌骑七八人，已向北跑去。”刘超寰认为红军赶路都来不及了，哪还有抵抗的力量，因而他就不顾一切骑着一头大骡子冲到尖兵连先头，一面带着尖兵连紧追，一面传令后面各营部队

跑步跟进。尖兵连刚要上山岭，全团部队完全进入一小形盆地内（方圆约20里），尖兵连首先遭到红军伏击溃散，连长当场毙命。团长刘超寰也被击伤腿部逃命。这时周围山岭上红军杀声四起，如潮水般地冲下山来，前卫第三营被冲溃散。第一营尚未展开，营长陈文杞已负重伤，部队拥挤在一堆挨打。我第二营被阻隔在一条深沟以南，窜不过去。当山中校团附陈鞠旅用旗语联络，一再要我冲过去。当时我驱使全营狼奔豕突地窜过沟去，和其他营靠拢在一块。但是红军的攻势越来越急，包围圈愈缩愈小，全团二千多人马，被套住像打疯狗样的挨打。这时，伤亡者遍地皆是，叫痛呼救之声不绝于耳，士气顿趋消沉，盼望第四团（因该团在第三团后约10华里）来救援。但第四团又被阻在出口之外，只听到山外枪声比自己这方面还要激烈。当时处在将要受缚之际，团附陈鞠旅传令各营速将各营的四挺重机关枪由各营长直接掌握，集中使用。各连的六挺轻机枪集结在各连长附近统一使用。步枪兵一律待机把刺刀上好，手榴弹准备好，准备白刃战。所有集结的轻重机关枪，不发现敌人密集部队冲来，也不许随便射击。同时他还写了几句口号：“第一师不打败仗；第一师不当俘虏；共军抓住第一师官兵要活埋。”并要各连官长领导叫喊，或指定班长带头叫喊，鼓动士兵“同仇敌愆”。这样，又继续挣扎抗拒到黄昏时分，等到红军自动撤走后，该团残部才于深夜逃出山口，爬到几个小山头上，爬在地下做了一整夜的工事。混到天明，探知红军已走远了，才由我统率到原阵地扫清战场，掩埋了阵亡官兵尸体200余具（其中也有少数红军士兵的遗骸）。

第三团在这次追击红军的战斗中，所受到的重创，是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全团阵亡和失踪的下级官兵将近300人，团长以下受伤的官兵也有300来人。第四团在这次所遭到的打击，虽然不及第三团那样厉害，但是死伤人数，据该团的战报，也有二三百人之多。

第一军这次在宁夏境内，不仅第二旅在萌城受到红军的反

击，同时第一旅和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在永安堡和惠安堡等处，所遭到痛击的损失，比第二旅更大。特别是第七十八师的第二三四旅几乎被打得溃不成军。

第一师在川西北与红军作战记略

石 德 安

1934年冬，驻天水的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恐川北门户广元为红军占领，派其独立旅丁德隆部进驻广元，以阻止巴中、旺苍的红军西进。红四方面军曾以少数部队数度围攻广元，终以丁部三团营长姚作均部的顽抗，均不得手。胡宗南曾先后派三团刘超寰部（欠一营）、补充旅第一团蒋志高部增援，均被红军击溃，败刘团于青木川、石门关；全歼蒋团于羊模坝，蒋团军官无一漏网。围攻广元之红军，于两次打援获胜后，便撤围沿白龙江西进，与北上红军会师。

蒋介石得悉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有在川西北会师的消息后，明令胡宗南率第一师全部入川西北截堵。1935年2月23日，胡率其第一旅李铁军部、第二旅李文部、补充旅廖昂部共8个团由天水出发。另外还编组了一个游击指挥部，以刘鸿勋为指挥，下属汪勇刚、张俊耀、朱冕群、谢襄渠四个支队约八百余人，随军行动。同年4月上旬胡部第六团与游击部队在阳平关与驻该地之红军发生战斗后，胡部即由略阳进驻阳平关。胡部在阳平关广布便探，并进行各种诬蔑宣传。我曾亲眼看见第六团一个少校政训员化装乞丐，以诱骗散留在当地的红军人员。与此同时，胡军又进至戴家坝，该处红军亦撤退未久，居民听见胡部到来，逃避一空，所需给养，都是沿门搜寻，居民被掠如洗。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师师部军需员。

同年4月4日晚，忽传宁羌、大安驿、朝天驿等地红军有向胡部进袭消息，胡军闻讯，手脚忙乱，惶惧已极，立即布置队伍，终夜警戒，结果是一场虚惊。时丁德隆旅已从广元撤至碧口，胡部亦决定进驻碧口。在戴家坝休息两天后，遂沿白龙江西上，经燕子砭、李子园、姚家渡前进。其游击部队曾在李子园被红军伏击，但损失不大。在沿途行军时，经常发现红军疑兵，尤其在白龙江南岸的山林中和青木川一带的森林里，随处能看到红旗飘扬，有时还听到清晰的进攻号音，当胡军准备迎击时，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了。一路上胡军小心翼翼，十分紧张。4月下旬，胡军师部始到达碧口，部队在碧口休整约一星期后，胡令其第一旅沿摩天岭穿原始森林西进，向平武方向的红军进击；第二旅和独立旅经大刀岭、蒿溪、三锅石之线向青川一带的红军搜索进击；补充旅第一团驻碧口担任警戒，第二团、第三团为第二旅和独立旅的接应部队。

当胡宗南未到碧口之先，由通、南、巴等地败退到碧口的地方团队和难民，约近万人，因此当地秩序十分混乱。胡到达后，虽稍见安定，但配属胡部作战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也要经过碧口向川西北前进。碧口为一山区城镇，一时粮荒十分严重，兵荒马乱，人民群众所遭受到的灾难，更是不言而喻了。

李文的第二旅于攻克青川县后，继续沿涪江、平武县、格达坝、水晶铺、三舍驿之线越宝雪顶向松潘前进。红军于胡军未到前即将辎重及伤病人员移驻涪江西岸，因此在青川、平武战斗中，红军毫无损失。胡宗南于获悉李文部“胜利西进”的报告后，于同年4月初率师部离开碧口向松潘进发，6月下旬始到达松潘。其所部据漳腊、校场坝、毛牛沟、哈密寺、邱吉寺等处与红军对峙，并时有接触。据同年8月初胡军前方战报：第一旅的第一、第二团在安顺关、北定关据守岷江东岸，第三团随旅部驻平武作第二梯队；第二旅第四、第五团在镇江关、镇平一带，隔岷江与红军对峙；第六团进攻金家崖沿江一带时，与红军发生激

烈战斗，第四、第五两团同时参加作战，第四团团长李友梅当场被击毙，三个营长中两个阵亡（刘和鼎、邓涤霖）；第五、第六两团伤亡亦大。据守岷江东岸之第二团团团长杨杰亦负伤。独立旅在校场坝、毛牛沟、上下包座与红军激战，双方均有伤亡。补充旅胡受谦的第三团先驻雪山麓下的三舍驿、小河营，后亦开到邱吉寺参加战斗。至8月下旬，胡部各线不支，向松潘溃退，曾在松潘南的白塔山发生两日夜的激烈争夺战。胡宗南在危急中，组织了人数约一个营的敢死队，以第四团副团长徐保为队长，才稳住了白塔山战斗。松潘四面皆山，白塔山最为险峻，此山一失，松潘即不能守，因此胡军以死争之。后来胡将指挥所移驻此山，城内只留师部、医院、兵站等。当时的情况极为紧张，尤其校场坝、毛牛沟丁德隆旅失利后，松潘最为危急。接着第四十九师全师被歼的消息传来；第二旅全线溃退；派赴毛儿盖的第一团加强营李日基部，也被红军围歼，李日基仅率百余人突围，直到李铁军旅及胡受谦团驰援时，这一线战事始趋缓和。当时不仅战事失利，且因给养困难，部分士兵又吃不惯青稞与牛肉，致发生严重的腹泻症，死亡很多。又兼气候已渐寒冷，而士兵仍着夏服，竟有整排被冻死情况发生。有个别部队连青稞燕麦都接济不到，有时靠掘野菜充饥。以此军心涣散，士气消沉，此种情况，直待中央驻四川参谋团调拨粮食运到后，才略有好转。同时，陈沛的第六十师、杨步飞的第六十一师、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和钟松的第二师补充旅援兵开到后，胡部才免于全军覆没。

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在邱吉寺与红军展开激战，经三口夜，该师即被击溃，人员损失达80%以上，装备损失殆尽。逃散之士兵，无衣无食，有的赤身跣足，仅用两张羊皮束蔽下体，沿途乞讨，后奉令在汉中收容。尤其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原系第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多为广东籍，对草地生活更不习惯；中央补充旅和第二师补充旅，又都是新近成立的部队，缺乏战斗经验。胡宗南鉴于第四十九师失败的惨状，不愿这些部队担任第一线任

务，仅令在漳腊、黄胜关、西宁关、哈密寺、上下包座一带的第二线上活动，后川西北战斗结束，即令开回成都附近。

胡宗南的部队在松潘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相持至同年12月，时已冰天雪地，士兵因饥寒已无力进行战斗。同时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率领于9月间通过黄胜关草地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与胡军对峙之红四方面军于12月亦陆续向四川、西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撤走，蒋介石又令薛岳、周浑元、梁华盛等部截击，仍着胡宗南回甘堵击北上红军。胡部遂经漳腊、哈密寺、弓刚岭一带的原始森林，进入甘肃的黑河流域，攀越西固大山经西固（今舟曲）、西和、马雾、鸳鸯嘴到达甘谷，此时胡宗南已惊恐成病，遂在甘谷西三十里铺的一座山寺中养病。他的部队即驻扎甘谷城乡一带。此时胡部真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且兵员损失数目很大（每连只剩四五十人），蒋介石令其暂驻整补。胡遂遣散游击部队，另募兵员补充；并将原留甘的训练单位，一律编并给部队，直至1936年3月，始又率部入陕。

天、芦、宝的堵截与大小金川的追击

李 介 立

1935年，以刘湘为总司令的四川“剿匪”军第四路军（即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兼总指挥），参加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战争。当初，我在第二十军第一混成旅第二团第二营当营长，不久升任第二混成旅第六团团长。

第二十军原驻防川北地区，共辖8个混成旅，一个精练司令（由川北民团组成）。每个混成旅有步兵3个团，并直属特务、通信两个连。精练司令辖两个团，其第二团只有两个连。全军共有兵力22个团，内有手枪、宪兵两个直属团，另有20个步兵团，每团3个营和一个直属连，每营3个连，每个连的编制额为126名，总人数约3万左右。

当时，第二十军的团长以上军官姓名如下：

军长杨森（别号子惠）

参谋长朱璧彩（别号联恒）

参谋处长邵陵（别号君甫）

副官处长范挺生（别号子奇）

第一混成旅旅长夏炯（别号斗枢）

副旅长杨干才

参谋长王渔藩（别号春陵）

第一团团团长范培基（别号烈勋）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军第一混成旅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后升任第二混成旅第六团团长。

第二团团团长赵嘉谟（别号幻吾）
第三团团团长杨干才（副旅长兼）
第二混成旅旅长李君实（别号朝信）
 参谋长陈文佐
第四团团团长吴建中（6月前是胡伯超）
第五团团团长朱泰安
第六团团团长李介立（6月前是文济川）
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别号继超）
 副旅长刘治国
 参谋长冉裔（别号季伯）
第七团团团长周翰熙
第八团团团长唐武城
第九团团团长陈亲民
第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
 副旅长祝云程
 参谋长×××
第十团团团长周炳文
第十一团团长徐香泉
第十二团团团长林伯苻
第五混成旅旅长杨汉忠
 参谋长郭大树（别号仲梁）
第十三团团团长李麟昭
第十四团团团长向文彬
第十五团团团长熊耀（别号玉成）
第六混成旅旅长罗润德
 参谋长张宴（别号海门）
第十六团团团长陈德高
第十七团团团长侯世光
第十八团团团长林相侯

精练司令向廷瑞（别号国琛）

参谋主任王联奎

第一团团长曾彦臣

第二团团长陈亮（别号宇辉）

军直属手枪团团长沙汉印

宪兵团团长蔡慎猷

1935年夏初，杨森奉蒋介石要他率领第二十军由川北开到川南分向叙永、大渡河堵截中央红军北上的命令后，毅然决定把驻防川北渠县、广安、岳池、营山、蓬安、南充等地的全军部队，集中在南充准备南移。当时，他向本军部队讲话说：“这次遵奉蒋委员长的命令南移，实行堵截红军的任务，是很光荣的。”接着，杨森命令其第一混成旅开到叙永，第三、第五两混成旅开到大渡河方向，其余部队均随军部向宜宾附近集中。5月底6月初，当第一混成旅到达叙永时，红军部队早已通过；第三、第五两混成旅到达富林、荣经时，红军部队亦已渡过了大渡河。这时，杨森的全军部队又奉命开赴雅安集结待命。

一 天（全）芦（山）宝（兴）堵截之役

1935年5月底6月初，薛岳率领的中央军部队，由贵州尾追长征红军至四川的天全停止。再由刘湘指挥的四川“剿共”军对红军进行围堵。第二十军奉命由雅安出发，赴天全、芦山、宝兴进行堵截战斗。杨森派第二混成旅（旅长李君实）向天全进军；其余部队由他亲自率领开往芦山，会同川军王缙绪部队的王泽浚师阻击红军。战斗一昼夜后，红军向宝兴、硃碛、懋功方面转进。第二十军和王泽浚师攻占芦山城后，继续向宝兴、硃碛追击红军后卫部队，在宝兴的铁索桥附近进行接触战斗。后因第二十军主力部队直攻宝兴城，红军部队逐渐由硃碛翻越夹金山，再向懋功、折边前进。这时王泽浚师留驻芦山城。第二十军军部率领第

三、第五、第六混成旅驻在宝兴附近，以第四混成旅进驻碓磑，向懋功方向警戒；以第一混成旅进驻宝兴左前方的羊村，向懋功方向警戒；以第二混成旅驻天全城，与红军部队成为相持态势。各部队均照国民党对红军作战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在防区内强征民工和建筑材料，构筑碉堡群，严禁行人往来，对小商小贩更为注意。这时，我正由第一混成旅第二团第二营营长调任第二混成旅第六团团长，由羊村到天全城担任新职。当我到宝兴军部面见杨森军长时，杨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他说：目前与红军成为相持状态，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碉堡封锁政策，不可麻痹大意。红军时常采用夜间奇袭方式，从我防线空隙的侧后偷袭，导致我军很大损失；尤其常用民间妇孺作小商小贩侦察我方军情，有时竟作为内应，必须严加防范检查。敌我相持是暂时的，还须积极准备对红军采取攻击作战。特别今后进军时，要翻越夹金山和大小凉山。由于山的标高甚大，气候恶劣，是有不少困难的。据报：红军翻越夹金山、大小凉山的情况，死亡不少人和马。同时，他还谈到本军兵源补充和经费来源都有困难。我向军长提问了一句：经费怎么办？杨森说：每月除由刘湘“剿总”按本军人数发给粮饷外，另由蒋委员长每月津贴10万元作为补助开支。本军虽然是刘湘“剿共”军第四路军名义，主要还是接受中央蒋委员长指挥。

我是当年7月1日到天全接任团长的。在天全训练部队的半月里，除派部分军官强征民工和材料构筑碉堡外，部队战地教育重在每晨爬山训练和夜间教育，准备和红军在丛山峻岭中作艰苦战斗。在精神教育方面，按照中央规定政治训练的内容，诬蔑红军是“跟着苏联走的”，“实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来麻醉官兵，为国民党统治卖命打天下。

二 大小金川追击之役

1. 进攻懋功的战斗

1935年7月下旬，刘湘转来蒋介石命令，主要内容：敌军主力已通过懋功、抚边，向青海方向“逃窜”。现懋功仅有少数部队防守。第二十军应以主力部队，于7月26日攻占懋功城，迫其全部进入草地而围歼之。杨森奉命后，决定进攻懋功的作战计划如下：

军以追击红军攻占懋功城为任务。以第三、第四两混成旅，由硃碛本道经夹金山、达维，向懋功城攻击前进；以第二混成旅及精练司令，由宝兴左前方的羊村取道夹金山的左侧，经大小茶山、干海子，向懋功城攻击前进，各部应于26日攻占懋功城。第五、第六两旅位于硃碛，其余由本道随第三、第四两旅前进。后方军部仍留在宝兴城内。这个计划下达后，各部按军的命令行动。

第二混成旅由天全出发，经宝兴、羊村、大小茶山，于7月26日午后接近懋功城。仅该旅前卫部队第四团与红军部队发生战斗约1小时，即占领懋功城。第三、第四混成旅亦陆续到达懋功城附近。红军部队转进至抚边，沿金川河岸防守。次日，杨森到达懋功城，在天主堂内住了几天，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军官讲过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本军遵照限期占领了懋功城，受到蒋委员长来电嘉奖，是我原来预料不到的。就目前情况看来，红军主力已向青海方面“逃窜”，在各友军的围追下，已处于进退艰难的局势。现在进攻懋功任务已经完成，我就要回到后方军部，前方部队由第三混成旅长杨汉域指挥；第四混成旅部队留驻达维，担任前后方交通维护的任务；第二、第三混成旅及精练司令部队留驻懋功城，向抚边方向警戒。当杨森刚离懋功返硃碛时，又奉到

蒋介石电令：为了巩固懋功，第二十军应向抚边进攻。必须攻占抚边！特别要杨森亲自指挥部队攻占抚边后，再返后方军部。因此，杨森即驻留碓碛，命令驻在懋功的部队立即准备进攻抚边。

2. 进攻抚边的战斗

8月4日，杨森在碓碛电示前方各个旅长，主要传达了蒋介石的电令，并要求占领抚边后，相机派部队追击到两河口、卓克基为止。还说他要“在碓碛静待捷音”等语。这个命令下达后，前方部队在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的指挥下，决定了进攻抚边的计划，下达如下命令：

（一）敌情：防守抚边的红军约有一师的兵力，位置在潘家山及抚边城，其前线部队沿小金川河北岸向南戒备。

（二）任务：本军以攻占抚边城为任务。

（三）兵力部署：第二、第四混成旅除各留一个团在现地担任持久防御外，其余部队及精练司令所属部队，均于8月6日由现地出发，7日进入准备攻击位置，8日拂晓开始攻击。第二混成旅及精练司令部队，由小金川河西岸前进，担任潘家山的主攻部队。第三、第四两混成旅，沿小金川河东岸向西为助攻部队。

（四）前方指挥部设在懋功与抚边之间地区。

第二混成旅受命后又发出进攻抚边的作战命令如下：（一）第四团留驻懋功担任沿河防守任务。（二）第五、第六两团于6日由懋功出发，到达八角。7日推进到潘家山前面的河边，就准备攻击位置，切实侦查当面敌军情况。（三）按第六团、第五团、精练司令所属各部队顺序，由右向左对敌采取大包围态势，8日拂晓向潘家山红军阵地攻击。（四）旅部位置于第五、第六两团的中间地区。

我的第六团奉命后于7日黄昏前，到达潘家山前面的河边，侦察情况后，决定次日拂晓进攻计划如下：

敌情：红军主力部队在山腰间防守。

地形：沿河都能徒涉。

部署：第二营先行过河后，由山脚向山上进攻。第一营由本道向抚边城挺进。团部率第三营过河，位置于山脚的本道上为预备队。

本团的作战计划由我现地告知3个营长，并向他们说明：开始攻击战斗后，应采取猛攻方式，更重要的是争取先进抚边城。因为这次是几个部队共同进攻抚边城，根据以前作战的习惯，谁先进城谁就居首功，不要出力反而落在别人后面。各个营长都表示同意。这时我的思想充满了轻敌观念，认为一开始向红军阵地攻击，就会轻而易举地攻占抚边城。同时，又因出发前李君实旅长召集3个团长研究进攻计划后，他对第四团团长吴建中说：“我报一个时辰，你掐算一下，8日能否打进抚边城？”吴掐算后说：“8日不可能进城。”我内心里对这种迷信非常不服，所以在侦察阵地后，同3个营长研究进攻计划时，鼓起勇气，便想在8日攻入抚边城。

结果，事实并不如我所料。当8日拂晓，进攻潘家山红军阵地战斗开始时，第二营由山脚强行过河，向山上进攻；第一营由本道向抚边城挺进。初先比较顺利，但第二营攻到半山之后，受到红军的反击，有18名士兵被红军大刀砍死，部队被打跨后退。嗣因左翼第五团向红军进攻，我当面阵地又才稳定下来。这时，我第一营由本道进到距抚边约5里的小高地，与红军部队发生战斗。据第一营营长舒楚藩报告：红军占据高地，居高临下反攻，本营不但没有推进，还感到孤军深入，恐有被歼灭的危险。他请求从山上派队增援，由高处对红军采取包围进攻。此时，我正将第三营部队，增加到正面向山上强攻，反反复复没有进展，内心非常惶恐不安。后来听到左翼第五团枪声浓密，判断全线都在向红军阵地猛攻，才决定把第二营换下来，派一个连从半山腰去增援进攻抚边城的第一营。直到当天黄昏前，山上战斗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红军仍坚守山顶阵地。我又决定派第二营营长李显宗率领

现有部队，向红军山顶阵地进攻。并命令他说：“攻不下山顶，不要回来见我。”在这样逼迫下，第二营部队很快就攻上山顶了。可是不久，又被红军用短刀砍下来，李营长被砍死。此时天色入暮，只好令第二营就地防守。我内心又十分惶恐，认为战斗了一天，不但进不了抚边城，而且入夜后，倘若红军居高临下反攻，我团还有被歼灭的危险。想把主力部队在入夜时，撤到山下去，仅留小部队与红军相持。于是我将这种打算书面向李旅长报告。后奉到李旅长的回复说：你团舒楚藩营（第一营）在抚边城附近，已俘虏红军战士50多名，并夺获有重机枪、手枪各一枝，步枪30余枝，人枪已直送旅部。现在该营部队，既已进到抚边城附近，判断红军今夜一定要撤离抚边城，希将现有阵地固守。这时我的心才安定下来，立即组织小部队向山顶搜索前进，在拂晓前占领了山顶，9日午前，各部队先后到达抚边城，战斗始告结束。

同时，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决定派精练司令的两个团，沿着红军撤退路线，逐步追击至两河口附近停止，向卓克基方向戒备；其余部队集结在抚边附近待命。在攻占抚边后，杨森认为已完成了蒋介石所赋予的任务，才由抚边回到宝兴军部。一周后，杨森电令：精练司令部队开转抚边八角，担任前线防守，其余部队仍回原来驻地懋功。

红四方面军反攻懋功与第二十军惨败

李 介 立

约在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部队由草地回师反攻懋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抚边以北地区，分两路用大包围形势向懋功攻击而来，使第二十军驻防懋功的第二、三、四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精练司令的部队，在一昼夜间遭到惨败而溃逃。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第二十军在攻占懋功、抚边后，仅在其狭小地区防守，认为红军可能开进到草地后，在国民党各军的包围下会土崩瓦解，产生了轻敌观念。因此，各级军官特别是营以上的军官昼夜赌博，忽视了警戒和继续侦察红军动态；二是第二十军占领懋功、抚边后，部队的给养在军的指示下就地征发。因而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方法向地方抢粮，或由当地保甲长向农民强派，迫使老百姓男女老幼日日夜夜都为部队送粮，或派兵下乡挨门挨户搜粮，造成十室九空，引起群众怨恨，失尽民心。所以，当红军突然大举反攻时，第二十军战备松弛，战斗一开始，担任前线警戒的精练司令各部队，一枪未打就崩溃下来。懋功附近的高地为红军所占领。只有一天多点时间，我们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后方溃逃。

就我军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即可了解到惨败的景象。头天下午，刚听说前面发生战情，第二天上午，前线部队就蜂拥似地垮了下来。第二混成旅旅部指派我率领本团两个营，到懋功后山上占领阵地，掩护收容这些部队。到达后山才发现红军已经占领了一切制高点，我们部队忙找地方隐藏起来。午后派人到懋功去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川军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第六团团长。

取联络，据报说：“城内已被红军占领。”入夜时，四处无枪声，始知我军所有部队都已逃走。我和团部的人员，便在夜间从大山之中空隙的悬崖上，用所有的绑腿联结起来，一个一个地坠崖而逃。其中有一人吊在半崖时绑腿断了，滚下去发出“哎呀”的喊声，有人制止他说：“不要乱叫，逃命要紧！”本来约定一齐吊下去，沿着去懋功的道路向后方逃走。可是，副团长胡显荣却第二个先坠崖，想早点逃出危险界。由于他刚从成都来不久，方向不明，竟向懋功方向逃去，从空隙钻到红军警戒线以内，又在山内东藏西躲，大约半年后才逃回成都。

我们坠崖后，向后方逃走，经过整夜时间，快到天明时，才开始在路上碰到一些零零星星的部队，越往后走，发现路旁都有人睡着，但谁也不管谁的。上午才赶上旅部。见到李君实旅长时，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昨天红军突袭攻进了懋功城，所有部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不知分成多少路向后方溃逃，当时无法通知你。现在既已到来，快向后方走吧！”我也认为逃命要紧，哪管部队不部队，就回旅部一齐走了。

到了午后，因红军停止向我追击，始由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城决定：各部队开始收容整理，按旅团番号向夹金山方向开走。可是，到了夹金山上时，荒无人烟，又值冬季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上积雪甚厚，官兵又冻又饿，疲惫不堪。特别是夜间，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大雪仍不断地飞落，士兵们都未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着“妈呀、妈呀”地呻吟之声。第三天继续在雪山上行军，有的掉队被冻死，有的滚在路旁雪坑里湮埋而死。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忽由旅部传来通报说：“接到后方军部来电，红军有一部由夹金山本道追来，要赶快通过山顶，才能脱离危险。”这又才鼓起逃命的勇气，加快速度往后跑。被打得惨败溃逃的第二十军，已成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景象狼狈。后来，经过两天行军到达碓碓，才由驻该地的部队派出掩护部队，将残兵败将收容起来，开赴宝兴军部，全军结集洪雅，进行整编。

松潘先姬山战斗

沈 仲 文

1928年，我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分配在胡宗南部队。当时任第一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附兼第二连连长，参加过松潘北先姬山战斗。

基本情况及奉命入川

胡宗南第一师是1932年秋由湖北黄陂地区追踪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汉中，后奉命旋驻陇南。

第一师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编制特大，有4个旅。第一旅李铁军，第二旅先是袁朴后是李文，独立旅丁德隆，补充旅廖昂。每旅三个团，另有一个补充团，共13个团，无论兵额、装备、火力都比一般的部队要强。胡宗南以天水为中心，除师部、师直属部队及补充旅第一团驻守天水，补充旅（缺一团）驻兰州外，第一、第二两个旅分驻两当、徽县、略县、文县一线；独立旅进驻碧口，以九个团的兵力扼守要道。同时加强训练山地行军作战，研究四川的人事地理，以至藏、羌族的风俗习惯，积极准备入川作战。但山地行军作战时，大部队联络相距几百里，不能依靠传骑和有线电联络。于是，胡宗南在蒋介石那里搞了一批2.5瓦的小型无线电台，只要两名无线电员便可背带，一个军士就可

*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一师第六团第一营营附。

操纵，使用很方便。胡宗南因此规定，凡派出执行任务的营连部队，都要配备这种小型电台，按规定时间同师部电台联络，以便随时掌握情况。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声势浩大，川军因一再战败，才不得不向蒋介石请援。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援川的电报时，曾很自信地说：“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他对川军过去婉拒入境仍很愤慨。邓锡侯为了表示诚意，亲到胡宗南师部请援。胡宗南为了讨好川军，他故意亲自站在仪仗队前列，以接待长官之礼相迎。邓、胡商定，川北广元、昭化地区的防务改由胡担任。胡宗南乃命令原驻碧口的独立旅丁德隆部进驻广元、昭化。

不久，红四方面军即包围广元。当时丁旅守广元的只有第三团的一个营，但红军并不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在青木川、石门关、后在羊模坝，分别消灭了胡部增援的刘超寰团大部和蒋志高团全部。参谋长讲到这段经过时，很沮丧地说：“胡先生刚刚大骂川军不中用，现在轮到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心情更加烦躁了。”

抢占松潘 部署阻截红军

红四方面军消灭胡部两个团后，即主动从广元撤围，向四川、甘肃边境的青川、平武前进。胡宗南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后，蒋复电判断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西进，似有在川西北同越过天渡河北上的中央红军会师，然后进出甘、新、青，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企图。胡宗南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判断。胡说：“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者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资援助。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好对付了。”胡还大骂盛世才拒绝第一师进驻新疆，“误

国不浅”。

当时，蒋介石唯恐红军进出甘、青、新，对西北军事重加部署。蒋介石以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杨虎城、邓宝珊、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以及马家部队等所有在西北的国民党军。以胡宗南为第三路军的第二纵队司令。除原有的第一师外，另增调原驻芜湖附近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驻开封的第六十师陈沛部，驻保定的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驻赣东的第一补充旅王耀武部，驻北平的第二师补充旅钟松部，统归该纵队指挥。蒋介石一再严令胡宗南先率第一师进入川西北，任务是阻截红军向西北发展，并配合由南向北跟踪而来的薛岳第二路军消灭红军于川西北地区。

1935年4月下旬，当胡宗南率第一师主力到达碧口时，红四方面军西移的态势更加明显，胡宗南认为应先机抢占松潘。于是，胡部沿涪江北岸、青川、平武西进。具体部署是：以第一旅李铁军为右纵队，越摩天岭向平武前进；第二旅李文为左纵队，向青川搜索前进；补充旅的一个团留驻碧口警戒，并接应后续部队；师部、独立旅、补充旅(缺一个团)在第二旅之后跟进；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一师、第二师补充旅、第一补充旅也按序经碧口跟进；以第一旅在最后掩护。胡宗南严令先头旅不惜一切代价，向松潘交互攻击前进。胡说：“能先抢占松潘，就能协同第二路军消灭共军。”

胡宗南抢占松潘后，即将第一师主力分驻漳腊营、校场坝、毛牛沟、哈密寺、丘吉寺、安顺关、镇江关等岷江东岸诸要点，以掩护后续兵团到来。胡另派李日基一个加强营扼守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并预定第四十九师到达后，即进驻西北约200里的上、下包座。

松潘战败 阻败红军成送行

这时，胡宗南仍十分自信，认为依托沼泽草地和岷江沿岸的

险要地形，加上优势兵力，定可阻截红军北上。胡宗南曾派师部少校参谋携带大批名酒、茶叶和现金等礼品，代表胡本人到阿坝同土司联络。土司再三对李芯说：“在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请转报胡司令官放心。”李芯回部报告，胡宗南大喜过望，更认为挡住红军去路满有把握，红军不免重蹈石达开之覆辙。于是，胡叫于参谋长即将这情况电告蒋介石，还得到蒋复电嘉勉。

但不久红军即猛攻松潘，于8月上旬，据守岷江东岸的第一师正面，自校场坝、毛牛沟、镇江关及镇平一线均发生战斗，其中尤以第二旅在镇江关的阵地争夺最激烈，第四团团长李友梅负重伤，两个营长被击毙，第五团也伤亡很大。我第六团团长李用章令第一营我二连（加强连）在镇江关的北边警戒先娅山阵地。拂晓时遭到红军袭击，我连利用已筑构好的工事地形坚守，并以我全营坚守增援。当战斗至黄昏时，因我用望远镜观看，暴露了目标而负了轻伤，士兵伤亡约三四十人。但没料到，正在我军紧急危难之际，红军枪声却逐渐稀少。到后来才得知是红军掩护其主力向毛儿盖方面前进。胡部激战至8月下旬，胡师不支，全线向松潘败退。松潘以南的白塔山，地形险要，关系松潘安危，经组织敢死队拼战两昼夜，并急调第一旅、补充旅，控制在平武、三舍驿附近的第二线部队赶来增援，才勉强稳住阵脚。

后来听说，这次红军对岷江沿线的攻击，只在于排除侧背威胁。当胡宗南部防守松潘时，红军主力迅速向毛儿盖和上、下包座地区突破。结果，李日基营大部被歼，仅少数残部突围回到松潘。正在向上、下包座前进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除余程万团未到战场即退回松潘外，其余大部被歼。伍诚仁曾再三电请胡宗南增援，但胡对属于第十九路军的部队在被围攻三昼夜以后，才派第一旅李铁军部往援。李旅在行进中因伍师的无线电台无法叫通，认为伍师已全部被歼，便又退回松潘。伍诚仁后来率残部逃回松潘，被蒋介石撤职。

胡部损失惨重 官兵疲劳不堪

胡宗南不仅连打败仗，损兵折将，非战斗减员也很大。听说，钟松补充旅从陕南往川北行进时，原可以从宝鸡取汉中大道，经褒城、沔县到川陕交界的阳平关，道路、宿营都很方便。但当时杨虎城部的冯钦哉师以及杨部在汉中的仓库、银行正由汉中向宝鸡、西安移动，胡宗南为避免两军途中相遇发生争执冲突，坚令钟旅经陈仓古道向阳平关前进。但陈仓古道多年失修，单人可以通过，重武器、骡马通过就很困难。钟松将情况电告胡宗南后，胡仍复电按原命令执行。结果只好不用骡马，改由士兵抬运武器、弹药。加以连续下雨，又只能露天宿营，装备也有失散，官兵疲劳不堪，钟松很不满意地说：“这样的走法，部队不要打仗，自己就拖垮了。”当部队从平武到松潘时，要通过雪宝顶，标高4500多公尺，是川北的最高峰，空气稀薄，又无人烟，山坡又陡，官兵无不叫苦连天。当时胡宗南的大部队都是沿着涪江上游北岸江边一条小路，经小河营、三舍驿，向松潘前进，堵截沿岷江北上的中央红军。他不顾红四方面军在涪江南岸的射击（涪江水面宽只有20—30米，水深，流速大，不能徒涉），不顾官兵的伤亡，令部队拉大距离，成一单行，不分昼夜前进，抢先占领松潘。我第六团副团长文于一在前进中，因跟在白马后，目标明显暴露，被红军枪手射中，脚负了伤。

在松潘时，军粮、棉衣也很困难。胡部在松潘时，几万大军的粮食要从川北江油山民夫挑来。从江油到松潘约四五百里，且山路崎岖难行，民夫挑得不多，甚至只能背负，除沿途民夫食用损耗外，运到松潘的已为数不多，远不敷部队食用。松潘所产青稞，不仅数量很少，而且性寒，外地人食用每易腹泻。有时连青稞、燕麦都供应不上，只好挖野菜和打死病马骡及牦牛充饥。胡宗南部在松潘粮荒最严重时，只好“放午炮吃饭”，即规定每天只

吃一餐饭，放午炮时开饭。在松潘战败时，气候已渐寒冷，而部队仍穿夏服，冻死的不少。尤其是通过大雪山时，士兵同民夫死在路旁的就有十多人，使人触目惊心，没人过问，也无人掩埋。饥寒之中，疫病流行。这些更使胡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

大约在9月初，中央红军越过了所谓“鸟儿也绝难飞过”的沼泽草地，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而红四方面军又经毛儿盖以西南下，出现在天全、芦山地区。胡宗南、于达参谋长得此情报后，茫然失措，既无力追击，又猜不着红军的意图，十分苦恼。这时，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第一师回甘南追击中央红军，配属胡指挥的其他师旅均归回建制。胡部因伤亡病疫减员大约半数，其余也疲惫不堪，回到甘南甘谷整补。参加过这次松潘战役的人们闲谈时，每每摇头叹息，甚至吐舌头，其狼狈情形可想而知。

附录

一 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部队指挥系统表

本表所用代号：

军：A

师：D

旅：B

团：R

独立：S

新编：N

编暂：T

(一) 湘粤桂边“追剿”军指挥系统表

(1934年11月13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蒋中正

“追剿”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 何 键	—	刘 建 绪	纵	18D (章亮基)
				19D (李 觉)
				62D (陶 广)
				63D (陈光中)
—	二	吴 奇 伟	纵	59D (韩汉英)
				90D (欧 震)
—	三	周 浑 元	纵	5D (谢溥福)
				13D (万耀煌)
—	四	李 云 杰	纵	96D (萧致平)
				15D (王东原)
				23D (李云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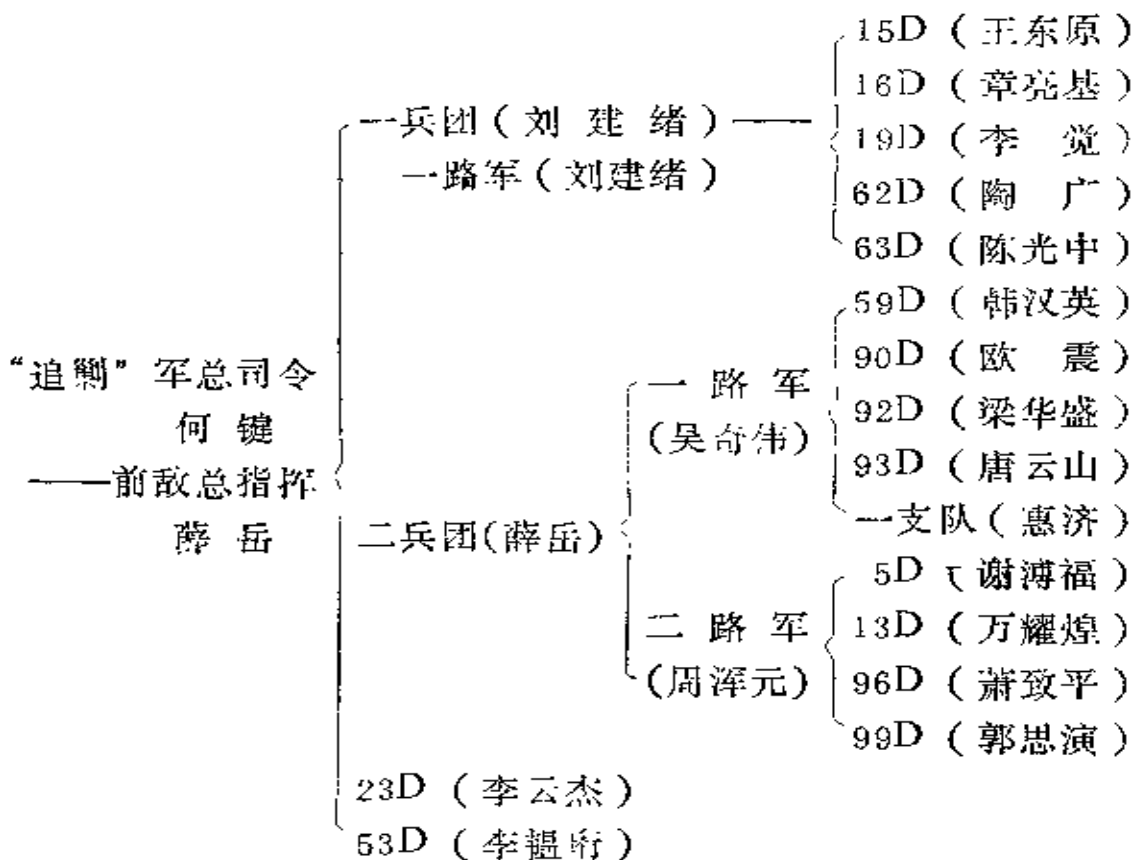
		五 纵	53D (李 搢珩)
		李 搢珩	一支队 (惠济)
		机动纵队	92D (梁华盛)
		薛岳(兼)	93D (唐云山)
			99D (郭思演)
广东“剿共”军总指挥 陈 济 棠	1A (余汉谋)	1D	(李振球)
		2D	(叶 肇)
		S3D	(李汉魂)
		教导D	(缪培南)
		S2B	(陈 章)
	2A (张 达)	4D	(张枚新)
		5D	(李振球)
			(前为张达)
		S2D	(张瑞贵)
		S4D	(邓龙光)
广西“剿共”军总指挥 白 崇 禧	7A (廖 磊)	19D	(周祖晃)
		24D	(覃联芳)
	15A (夏威)(代)	43D	(黄镇国)
		44D	(王赞斌)
		45D	(李云淞)
贵州“剿共”军总指挥 王 家 烈	25A (王家烈)	1D	(何知重)
		2D	(柏辉章)
		S1B	(李成章)
		S2B	(杜肇华)
		S3B	(犹禹九)
	3D (蒋在珍)	S4B	(周芳仁)
		教导D	(侯之担)
		S5B	(杨昭焯)
	S1D	(犹国才)	

说明:

- ①、粤军南路军布置于南雄、仁化、曲江、城口、九峰、坪石一线防堵,未参加追剿,故未列入。第二师、独二旅、独三师编为一个纵队,归李汉魂指挥。
- ②、薛岳部的指挥机构名称,初称“路军”,后称“纵队”。
- ③、惠济支队于12月下旬抵湖南芷江时,奉令调经武汉。
- ④、1934年12月底,贺国光率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南昌行营结束,成立重庆行营,上述“追剿”部队均改归重庆行营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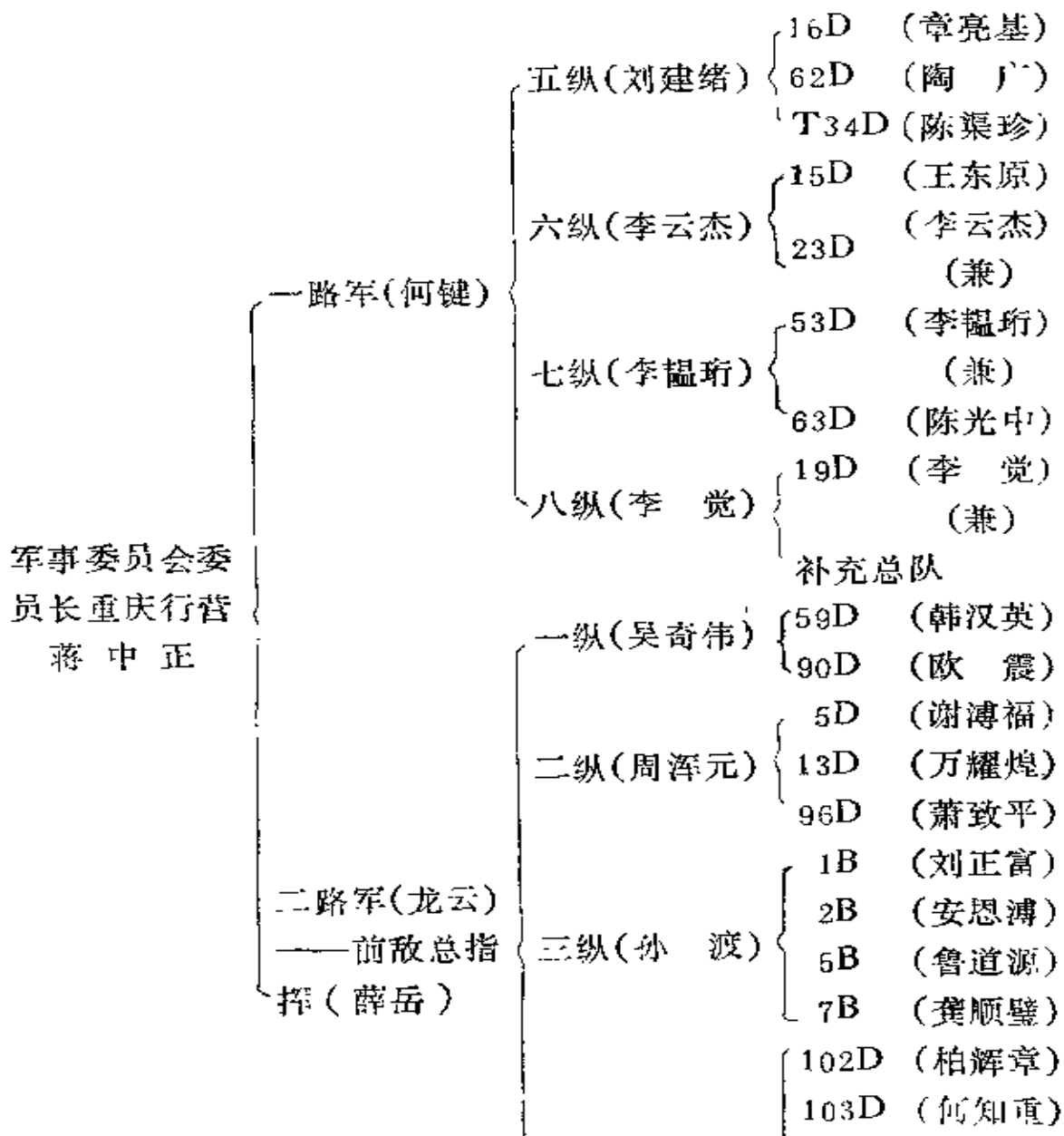
(二) “追剿”军指挥系统表

(1934年12月2日)



(三) 湘黔滇“追剿”军指挥系统表

(1935年2月2日)



四纵(王家烈)	{	121D (吴剑平)
		140D (沈成久)
		N8D (蒋在珍)
	——92D (梁华盛)	
——93D (唐云山)		
——99D (郭思演)		

(四) 川军潘文华各部建制表

(1935年1月14日)

(四川“剿共”军总司令刘湘，任命潘文华为南岸“剿共”总指挥，配合黔、滇军堵截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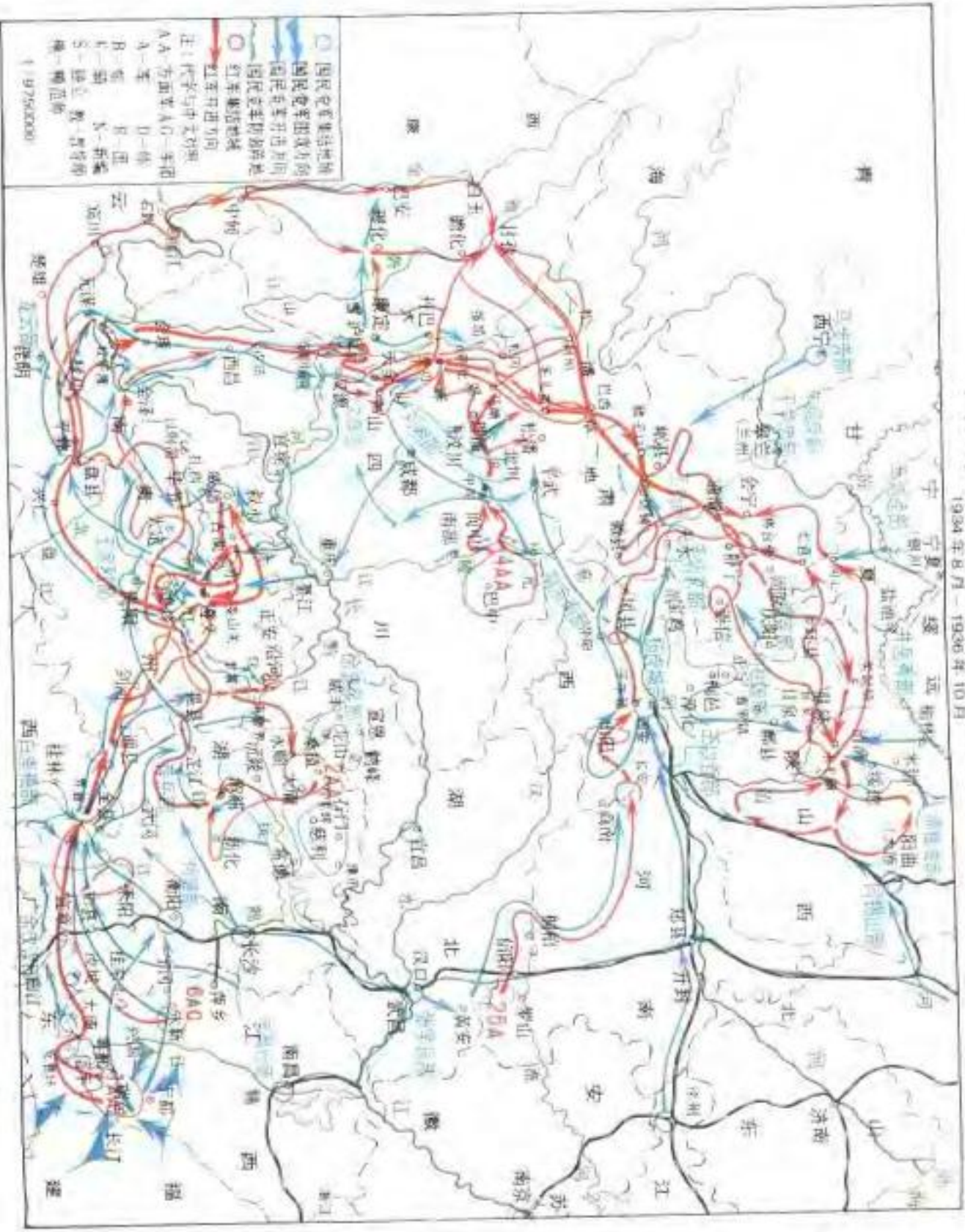
南岸“剿共”总指挥 潘文华	{	第一路指挥 范子英	<table border="0"> <tr> <td rowspan="2" style="font-size: 3em; vertical-align: middle;">{</td> <td>教导D1B</td> <td>1R (朱果)</td> </tr> <tr> <td>(章安平)</td> <td>2R (李长烈)</td> </tr> <tr> <td colspan="2"></td> <td>教导D2B</td> </tr> <tr> <td colspan="2"></td> <td>(范子英)</td> </tr> </table>	{	教导D1B	1R (朱果)	(章安平)	2R (李长烈)			教导D2B			(范子英)
		{	教导D1B		1R (朱果)									
			(章安平)	2R (李长烈)										
		教导D2B												
		(范子英)												
第二路指挥 陈万仞	<table border="0"> <tr> <td rowspan="2" style="font-size: 3em; vertical-align: middle;">{</td> <td>5D2B(达凤冈)</td> </tr> <tr> <td>14B袁如骏</td> </tr> </table>	{	5D2B(达凤冈)	14B袁如骏										
{	5D2B(达凤冈)													
	14B袁如骏													
第三路指挥 廖泽	<table border="0"> <tr> <td rowspan="4" style="font-size: 3em; vertical-align: middle;">{</td> <td>模范D3B</td> <td>8R (余岱)</td> </tr> <tr> <td>(廖泽)</td> <td>9R (凌谏衍)</td> </tr> <tr> <td colspan="2">边防第二路司令(穆肃中)</td> </tr> <tr> <td colspan="2">忠、丰、石清乡司令(周化成)</td> </tr> </table>	{	模范D3B	8R (余岱)	(廖泽)	9R (凌谏衍)	边防第二路司令(穆肃中)		忠、丰、石清乡司令(周化成)					
{	模范D3B		8R (余岱)											
	(廖泽)		9R (凌谏衍)											
	边防第二路司令(穆肃中)													
	忠、丰、石清乡司令(周化成)													

总预备队指挥	{ 教导D3B(袁冶) S4B (潘佐)
郭勋祺	
左侧卫支队田钟毅——	{ 1R (孟存仁) 2R (谢崇文)
S3B (田钟毅)	
特遣支队长徐国暄——	
1D3B7R (徐国暄)	
别动队长顾家辉——	边防第二路4R(顾家辉)
独立第一、二营及机枪营	
1D3B (刘兆藜)	
(缺七团, 附警卫大队)	
模范D1B (蒋尚朴)	(附机枪一团)
S1B (张竭诚)	
边防第四路司令魏楷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路线图

1934年8月—1936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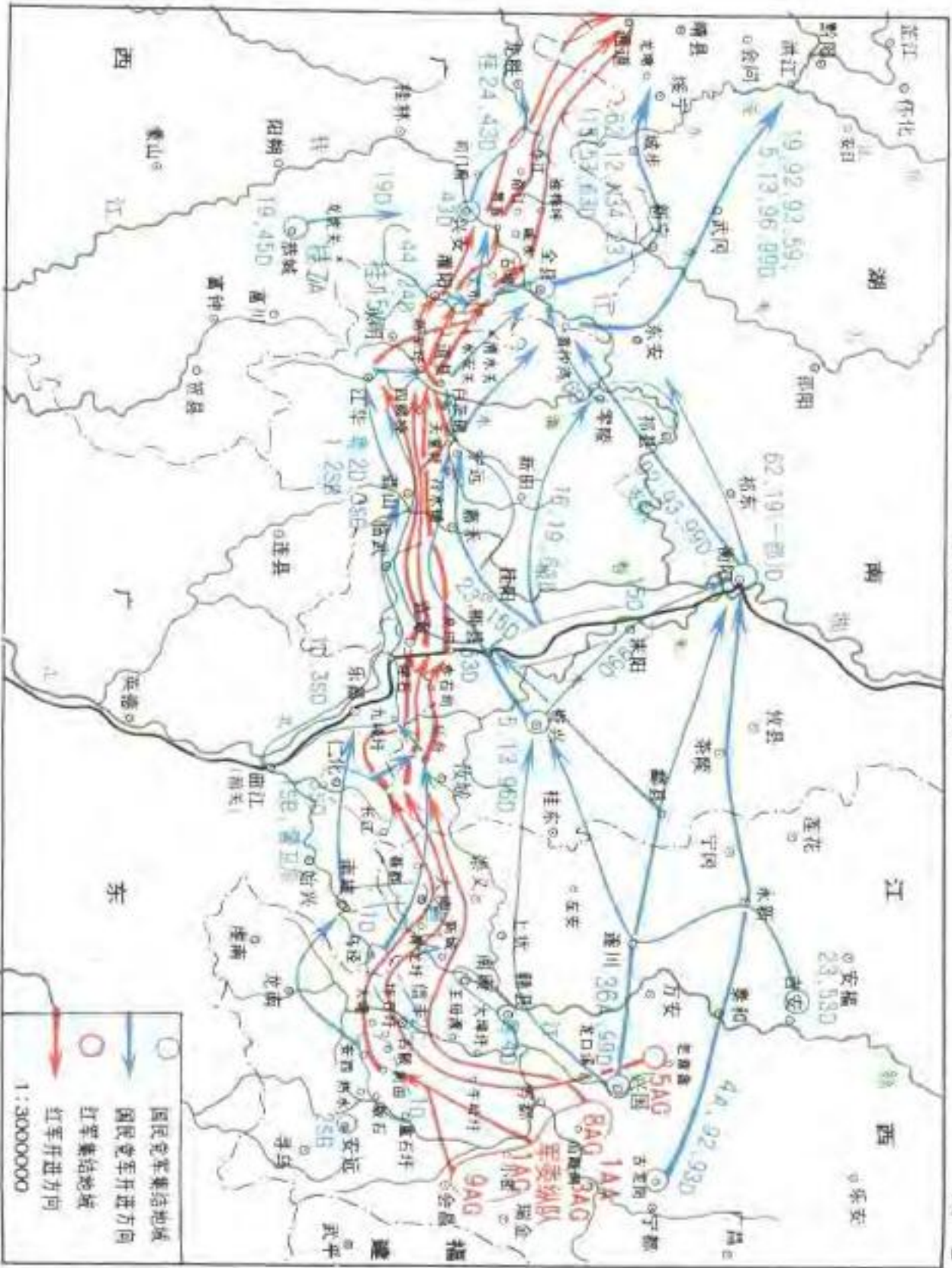
图一



赣粤湘桂边追堵要图

1934年10—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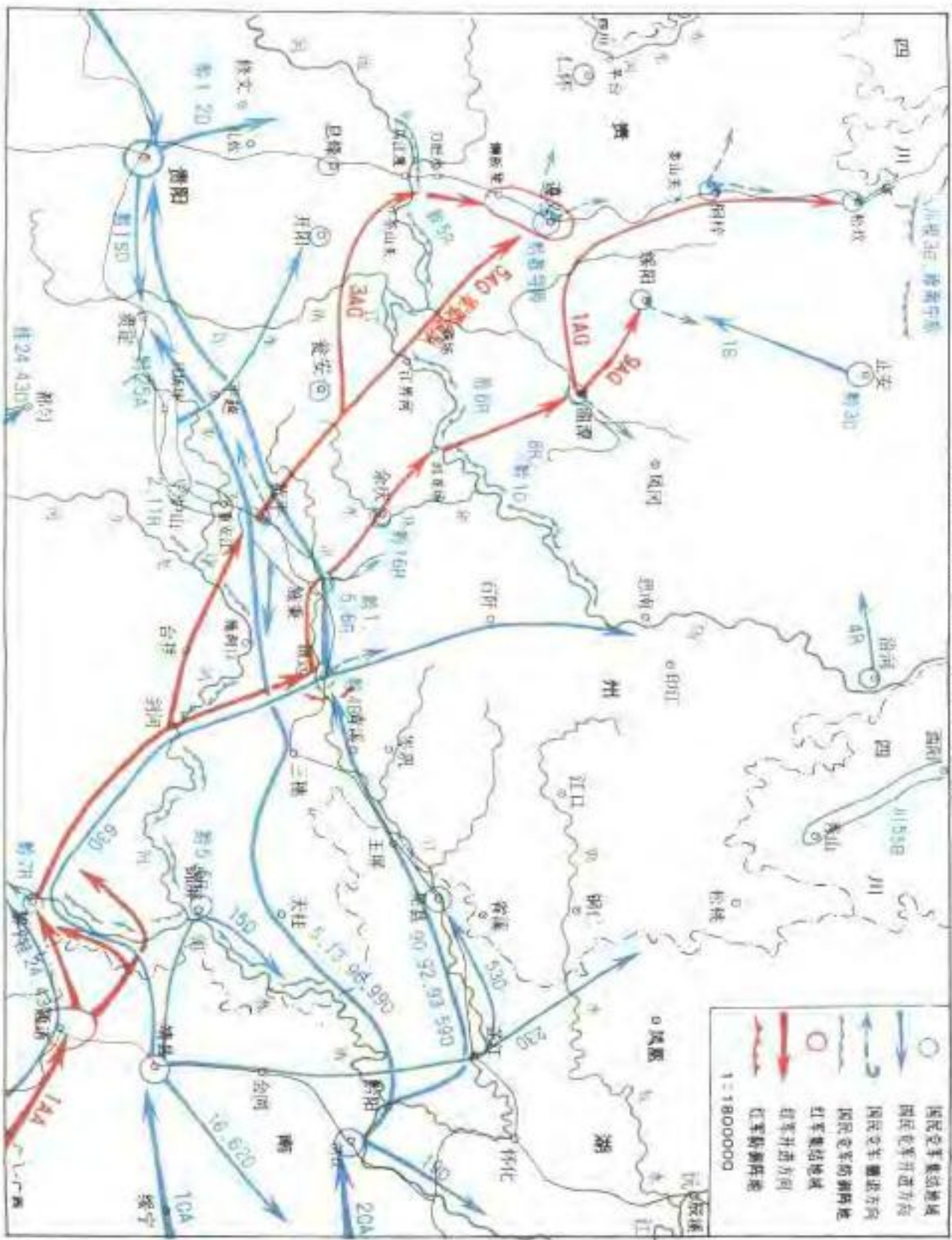
图一-2



黔东追堵要图

1934年12月24日—1935年1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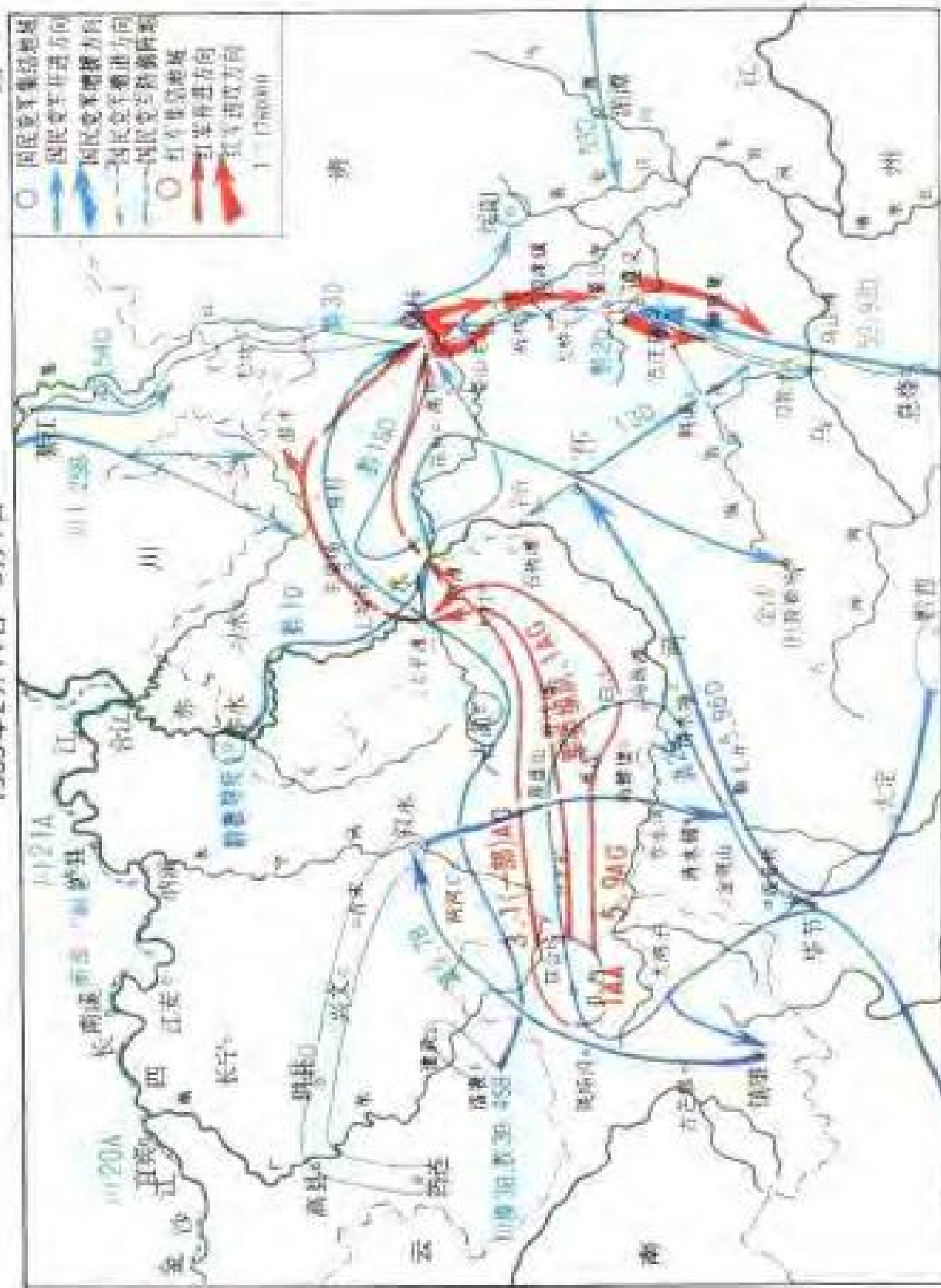
图一-3



追堵红军第一次东渡赤水要图

1935年2月11日—3月1日

图一五



追堵红军第二次西渡赤水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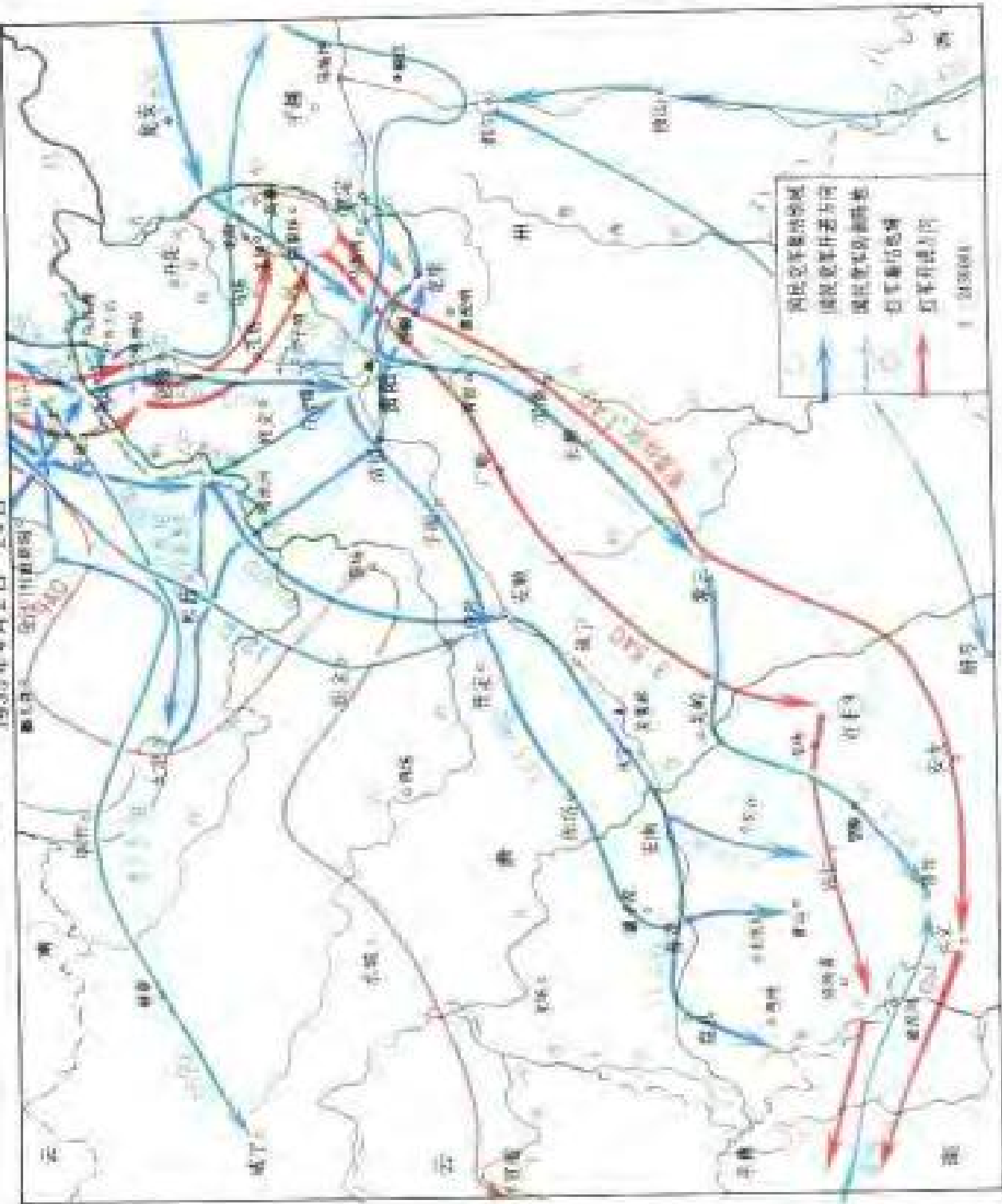
1935年3月11日—19日

图一七



贵阳防御与黔南追堵要图

1935年4月2日—24日



川西南追堵要图

1935年5月10日—24日

图-10



大渡河地区追堵要图

1935年5月25日 - 6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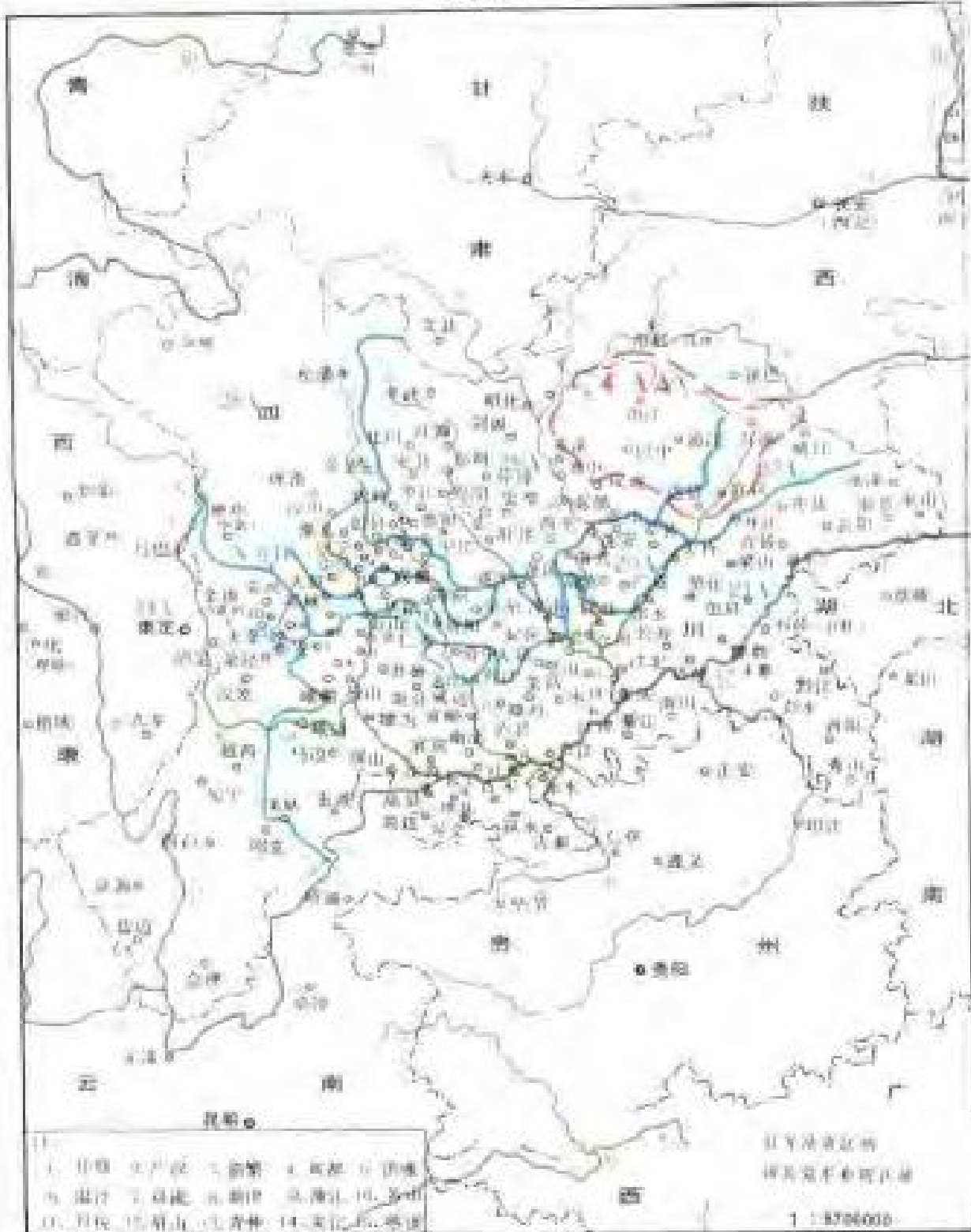
图-11



四川各军防区略图

1934年春

图 12



嘉陵江大渡河地区追堵红军要图

1935年3月—6月

图一 13



懋功、松潘地区追堵红一、四方面军要图

1935年7月—8月

图 1-4

